

武汉史话丛书

WUHAN SHI HUA CONGSHU

编委会主任 李宪生
主 编 涂文学

主编 袁 远

江 岸 史 话



江岸街为武汉的中心街区，和北京中国历史名城一样，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溯自夏商周秦汉以来，中国发生的许多历史风云，都曾经在这里绽放过浪花——

JIANGAN SHI HUA

武汉出版社

《武汉史话丛书》编纂委员会

主任：李宏生

副主任：涂勇 聂建新(常务) 林阳春

委员：马小援 王绍志 付明星 李子诚

李诗伟 刘家栋 杜福泉 吴清

吴一民 何艳 张福来 易福才

罗长刚 涂文学 黄楚平 黄克强

彭小华 彭丽敏 简永耀 樊启祥

学术顾问：章开沅 冯天瑜 皮明庆

《武汉史话丛书》编辑部

主编：涂文学

编辑：刘芳 宋晓丹

武汉史话丛书

WUHAN SHI HUA CONGSHU

编委会主任 李宪生

主 编 涂文学

主编 袁 远

江岸

史话



JIANGAN SHI HUA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岸史话/袁远主编. —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4. 4

(武汉史话丛书)

ISBN 7-5430-2911-1

I. 江… II. 袁… III. ①武汉市—地方史②区(城市)—地方史—武汉市 IV. K29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3879 号

书 名: 江岸史话

丛书主编: 涂文学

本册主编: 袁 远

责任编辑: 肖德才 齐大勇

封面设计: 吴 涛

版式设计: 吴 涛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南路 103 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85606403 85600625

印 刷: 中科院武汉分院科技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374 千字 插 页: 5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 000 册

ISBN 7-5430-2911-1/K·255

本册定价: 35.00 元 丛书定价: 420.00 元(共 12 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总序

李宪生

以史实为经，以区域为纬，由武汉市档案局组织编纂的“武汉史话丛书”，在各城区积极支持下，在编撰人员的艰辛努力下，历经磨砺，终于出版了。“武汉史话丛书”以广大市民和境内外来汉人士为读者对象，充分开发市、区档案信息资源，挖掘尘封史迹，填补缺损史载，条分缕析，卷帙浩繁，是一部史料价值高、普及面宽的世纪丛书。“武汉史话丛书”纵连古今，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各个层面，系统介绍我市及各区发展历史，理趣兼备，雅俗共赏，是一套融真实性、趣味性、思想性于一体，对广大市民尤其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武汉市情教育的生动教材。

武汉文明数千年。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在这水泽之域繁衍生息，拓展远古文明。殷商时期，兴建盘龙城，武汉开始了自己的城邑文明。东汉末，曹操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武昌、汉阳筑有夏口、郢月一批古城，武汉即有了城市雏形。千百年来，武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商贾云集之所、文豪泼墨之处，是区域政治文化中心、水陆交通枢纽和重要商贸城镇。汉口，则尤以商贸发达，继明清遽升为全国“四大名镇”之首，近代更被誉为“东方芝加哥”。辛亥革命，首义之旗率先在武昌城头举起；新民主主义革命，

武汉几度成为全国革命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汉保卫战”载入史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武汉三镇各有千秋而又相依共进，武汉区划建制也终由分治而归于合一，发展成为人口逾百万的大都会。建国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武汉生机勃勃，经济建设步入发展快车道，社会发展全面向前推进。时至今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武汉肩负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正以其高昂的创新精神、坚韧的革命斗志、顽强的拼搏干劲、特有的内涵潜力，坚定地朝着建成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宏伟目标迈进。

检索历史，可以说，一部城市发展史就是一部城市竞争史。而在城市竞争力中，经济发展速度、GDP总量、国民人均收入水平等，固然是城市竞争力的最直接表达，但文化对提高城市整体竞争力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目前，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和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除了用GDP这个常用指标外，还以HDI这个人文发展指数为衡量标准，把生态质量、文化质量和生活质量作为发展的重要参数。这种全面的发展观对我们的启示是，城市现代化建设应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与人文的协调共进。基于此，我市提出了“一个核心四个力”的城市发展理念，即以强市富民为核心，提升城市竞争力、增强城市亲和力、塑造城市个性魅力、提高城市综合实力。这种新型的城市发展理念，从根本上说，必须建立在对自己城市文化传统与现状的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城市文化是城市底蕴的厚重积淀，是城市气质的神采飞扬，是市民素质的客观展示，是城市魅力的个性表达。因此，系统清理和有序整合武汉城市文化资源，就显

得尤为重要。“武汉史话丛书”的编纂，就是对武汉城市文化资源的一次总盘点。丛书第一次以各城区为叙述、研究单元，在内容上，全面挖掘、系统总结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集政治史、业绩史、社会史、生活史于一体；在体例上，各区自成册，展示其历史演进过程，展示其风土人情、典故传说、历史人物、景观名胜、名厂名店、名优特产。通览丛书，可以综观武汉历史文化全貌；拾册细读，又可使我们对某些鲜为人知的、不被重视或为人们所忽略的城市历史文化的吉光片羽，得到一些新的了解和认识。总之，研读丛书，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市情和区情，对于提高市民素质，激励全市人民热爱武汉、建设武汉，都将大有裨益。

“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细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知金丹换骨时。”宋代爱国诗人陆游以切身之悟，道出了治学甘苦。学诗、写诗如此，从事学术理论著述更是如此。编纂“武汉史话丛书”，是城市文化建设的一项浩大工程，是城市档案事业的一个创举，更是武汉地区专家学者琢磨求真、切磋求新、锲而不舍、呕心沥血的结晶。丛书面世之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54 周年。她的问世既是对共和国的献礼，也是对武汉历史文化的一次系统宣传和普及。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尊重历史，服务现实，更加关注武汉历史文化研究，更全面的了解、更清醒的认识、更准确的把握城市发展轨迹，为加深城市文化积累、优塑城市形象、建设精神家园、推动发展大业而不懈努力。

2003 年 9 月 14 日

缘起

涂文学

在中国的城市群落中，可以冠之以“大”的，可能就是大上海、大武汉，而以城龄来论，武汉则要以煌煌 3500 年之高寿远居于上海之上。但是，论起历史记录的连续性和地方史籍丰富程度，武汉和上海比起来，实在令人汗颜。民初湖北方志大家王葆心在其所著《续汉口丛谈》中就不胜感慨：“近日有为《上海小史》者，其旨则专详见今。因淞沪大埠，自来纪述良夥，且云间一郡，明季清初，此类记乡土礼俗之书尤多，美备之余，无庸赘述。汉口则记者寥寥。”考武汉一地专述本乡土的史志著作，明清以降，除官修的《汉阳府志》、《汉阳县志》、《续辑汉阳县志》、《武昌府志》、《江夏县志》、《黄陂县志》以及《湖广总志》、《湖北通志》之类外，以叙记乡土礼俗、市井风情见长的私人著述，亦即所谓野史稗乘之类，仅《汉上丛谈》、《汉口丛谈》、《汉口漫志》数部。而据王葆心考，《汉上丛谈》为清嘉庆年间江陵人刘士璋所著，但未见传世。《汉口丛谈》和《汉口漫志》均为外省旅居汉口者所著，前者为浙江乌程人范锴，后者是安徽歙县人黄心庵，且未竣

而佚，“若有关汉口者，寥寥数则”（范锴语），只有少量内容为《汉口丛谈》所引用。范锴的《汉口丛谈》是目前仅存的第一部叙述汉口城市兴衰的乡邦史书，举凡前哲嘉言、近时灾异、巴蜀物产、荆楚人文、地理山川、堪輿术数，乃至人生感慨、读书心得等等，皆有所记。民国以后，先有1915年出版的徐焕斗撰《汉口小志》，后有约20年代成书、1933年出版的王葆心著《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等个人著述，又有1920年出版的《夏口县志》。以上这些史志，除《夏口县志》有涉近代商务之专志，大都厚古薄今，囿于传统史志的羁绊，重诗词文藻、军政文人、江山古迹、官衙旧学，轻商贾实业之名家、城市建设之新貌。即使是《续谈》、《再续》和《汉口小志》这样的民国作品，对武汉近代工商业和城市建设的發展也绝少涉猎，尽管其视野宏阔，纳入其视野的仍是农业文明的诗书孝义、兵灾人祸，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史话的意趣相去甚远。

武汉历史记录匮乏、城市记忆残缺，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武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是战事与水灾多发区。不少文字典籍或毁于战火，或失之洪灾。以档案为例，武汉市档案馆馆藏建国前历史档案17万多卷，也算洋洋大观，但前清官方档案完全阙如，民国档案也断断续续，专题档案很少有时序连续和内容完整的。譬如商会档案，汉口早在张之洞时代就成立商务局和总商会，但晚清至民国前期的相关档案一份也没有保存下来的，远不如天津和苏州商会档案系统完整，给研究者留下永远的缺憾。另一方面，历史记录的匮乏显然又与武汉重商轻文的社会风气有关。汉口因商而兴，因埠而活，作为“天下货物聚买第一大码头”，汉口有的是繁

华与喧闹的码头与市廛，缺少的是肃穆与宁静的思索空间；多了些天下熙攘、利来利往的铜臭气息，少了些浪漫、高雅、空灵、悠然的贵族气质。如此城市氛围和城市性格，使武汉人的性格浮华、浮乏和浮躁，忙于营利而厌倦读书，如范锴所云，“多半商贾致富，书奇风雅勿尚”；善于开新而疏于聚敛，亦即志书上说的“流坎之性有余，艮止之气不足”。城市记忆的积累就像汉口码头的货物一样来去无踪，聚散无常。武汉人，尤其是汉口人，这种过分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历史态度，不仅使当时人忽视城市精神的构塑，更重要的是使后人失去对城市往事追忆的依凭。

其实，城市历史的记忆材料不仅仅是一种读物，它还是城市精神的重要载体。透过它，人们能触摸城市往昔和现在甚至未来的心跳，与城市进行超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这种神交式的精神对话中找到重塑现代城市精神的原点，开拓城市新的美好的未来。为了打捞和锁定城市记忆的久远沉积，链接和绵续今日武汉的前进轨迹，开启江城未来航程，于是我们萌发了编撰“武汉史话丛书”的动议。

以各个城区为叙述单元来编撰史话，是一次尝试。这一叙史方式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某些人物、事件及城市发展脉络的叙述，既有相互割裂，又有一些交叉重复。读者在短时间的阅读中，也不易对武汉城市发展史留下整体印象。然而，武汉是一座组合型的城市，不论是在城市起源、城市功能还是文化特色方面，三镇有先后，各区大不同，这样，分区叙史与三镇鼎立、特色各异恰好又若合符节。在中心城区，唐朝以前，武昌、汉阳就形成了隔江相峙的双城格局。《武昌史话》将武昌从军事要塞向区域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演变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勾勒，并凸现了科教名区特色；《汉阳史话》描绘了一个传统府县治所在近代城市功能骤变轨迹，并勾勒出其在武汉乃至全国近代工业奠基者地位的特色；汉口是明朝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商业巨镇和国际商贸大埠，硚口、江汉、江岸三区史话，正好反映了汉口城市从汉水沿岸发源到沿江崛起的辉煌，即从一个进行区域经济循环的传统商业市镇到“东方芝加哥”国际大都市的演进轨迹。《硚口史话》浓墨重彩地讲述了汉口发源与崛起的故事，生动描绘了汉正街与汉江码头的繁华与喧嚣；《江汉史话》讲述了汉口商业中心由汉江沿线转向长江沿线，从老城厢向后湖新城扩展的历程；《江岸史话》对1861年汉口开埠后租界的崛起与沉沦这段苦涩而又辉煌的历史作了详细描述和公正评价。其他城区史话也各有侧重，各具特色：《青山史话》以大量的篇幅重现以武汉钢铁公司为龙头的现代化重工业基地的建立和发展；《东西湖史话》突出展现了新中国农垦事业的辉煌业绩和台商投资开发区的新形象；《洪山史话》则敷陈了一个传统农业郊区到新兴的科教中心和高新技术产业中心的城市化历程。在远城区，《江夏史话》将辖境内发生的中山舰故事分陈缕析，挖掘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蔡甸史话》对知音故里独特的“知音文化”及以现代汽车工业为龙头的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风采作了重点展示；《新洲史话》揭秘古老的邾子国遗韵；《黄陂史话》对作为武汉“城市之根”的3500余年前殷商盘龙城的城市历史文化和“无陂不成镇”的独有的商业移民文化现象有所揭示。所有这些，构成了武汉城市史的大致轮廓，较为全面的展示武汉历史文

化和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一个立体的武汉完整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当年，王葆心谈到他继范锴《汉口丛谈》编撰《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的动机时这样说过：“范君生盛世，意主抒发性情；我今生值危难，意在网罗放失。”今天的档案、文史工作者，比起“生值危难”之时的王葆心来无疑要幸运得多。盛世修史，其意义已不单纯为了“网罗放失”、拯救城市历史记忆，更在于挖掘、盘点武汉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全面展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给后来者留下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完整、准确的信息。也就是说，让将来的武汉市民从这部丛书中触摸到世纪之交我们这座城市的心跳。怀着这种愿望，武汉市档案局此次倾力组织编撰“武汉史话丛书”，并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及各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全市各区档案部门的热情响应和通力合作；许多对武汉历史文化研究有素、学养深厚的专家学者悉心指点，使这套丛书能在不长的时间内编讫付梓。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当前，武汉城市史研究已经和正在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重视，方兴未艾，佳作时出，有望走出“记者寥寥”的历史“贫困时代”。王葆心老先生若地下有知，他的智者之忧也可以稍稍释怀了吧。

2003年9月10日

于汉口旧租界一幢百年官署老厦

序言

朱 毅

欣闻《江岸史话》即将问世，我衷心祝贺。

修史撰志，历来为盛世之举。江岸和全市及全国许多城区一样，历经改革开放20余年的春风吹拂，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编修区志，撰写史话，正当此时。

江岸作为特大城市武汉的一个中心城区，它和这座古老的城市一起，经历过中国许多大都会所历经的时代变迁。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许多历史风云，都曾经密聚于这个滨江城区。

19世纪上半叶，因江岸位于“九省通衢”之要，这里已经是樯帆林立，商贾云集，早已被列强所觊觎。随后纷纷涌入，来这里强占地盘，开设租界。从此，江岸便成了中国半殖民地状态下的一个社会缩影。武汉人民在这块土地上，与各国入侵者展开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不屈抗争。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中国近代的风云变幻，造就了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而江岸更是一次次扮演过重要的历史角色。弱肉强食，开埠商变，江岸产生了买办和民族工商业者，成为华中地区重要的商贸和金融中心；封建王朝风雨飘摇，楚善里志士聚义，江岸是反清风暴的重要发源地；工运铁流滚滚，罢工汽笛长鸣，工

人阶级从江岸走向中国的政治舞台；神州大地阴云密布，革命领袖们于鄱阳街秘密聚会，点燃了武装革命斗争的熊熊烈火；革命势力摧枯拉朽，人民军队挺进武汉，江岸最早迎来华中重镇的日出。

一部《江岸史话》，将向广大读者一一讲述发生在这里的历史沧桑。

同时，这本史话还浓墨重彩地向我们描述了江岸这片城区的崭新变化。在大建设、大发展时期迅速崛起的江岸，一片片新城高楼林立，一条条大道车流如潮，长江二桥如虹，滨江滩涂如画；经济实力凸现跻身强区，精神文明建设典型享誉全国，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在建设中不断与时俱进，呈现出现代都市的繁荣景象。

《江岸史话》在为我们描绘江岸崛起的长轴画卷时，还充分展示了江岸人民不畏艰难、开拓奋进的精神风貌，预示了江岸更加美好灿烂的未来。

《江岸史话》省略一般性的历史叙述，突出重大历史阶段、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及其有江岸地方特色的内容，把握江岸形成、发展的脉络，追根溯源，将江岸城区发展的轮廓基本勾勒出来，是一本反映江岸人民斗争史、创业史和发展史的爱国主义好教材。

编史修志，记录历史，传承文化，承载未来。通过《江岸史话》，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江岸、热爱江岸，并努力建设一个更加具有魅力，充满活力的新江岸，为江岸再创辉煌。

目 录

总序.....	李宪生	1
缘起.....	涂文学	4
序言.....	朱 毅	9

上 篇

形成与发展

第一章 追根溯源.....	3
一 汉水入江形成河网漫滩	3
二 潇湘湖与黄花地	4
三 先民遗踪与择台墩而居	4
第二章 从堤说起.....	6
一 三次筑堤奠定城区轮廓	6
二 清代后湖八景	9
三 江岸名称的由来	11
第三章 开埠与租界.....	13
一 不平等条约下汉口开埠	13

二	列强强租形成租界·····	16
三	租界行政机构·····	22
四	租界的保护伞——租界武装···	27
五	租界向外侵蚀·····	28
六	租界的发迹·····	29
七	教会兴办医院、学校·····	44
八	租界里的消闲娱乐·····	47
九	“天堂”之门——万国公墓·····	53
十	租界的收回·····	54

第四章 崛起与沉沦····· 56

一	租界人力车夫惨案·····	56
二	洋行老板的大总管——买办···	59
三	民族工业艰难诞生·····	61
四	城市的巨大变迁·····	66
五	华商总会大楼的春秋·····	83
六	租界罪恶知多少·····	85
七	直面租界历史·····	87

第五章 世纪风云····· 91

一	后湖风潮·····	91
二	辛亥喋血·····	93
三	工人抗争怒潮·····	106
四	湖北武汉总工会和武汉 工人运动·····	118
五	历史转折关头的“八七	

	会议”.....	120
六	“人或为鱼鳖”的 1931 年大水	122
七	抗战中的江岸	124
八	孩子剧团在江岸	127
九	恶魔大孚宪兵队	129
十	屈辱的“景明大楼事件”	130
十一	黎明前后	132

第六章 新生的江岸..... 139

一	政治行政中心的确立	139
二	江岸行政区划	142
三	抗美援朝中的江岸	146
四	扎实开展禁烟禁毒	148
五	解放初期妓女改造	151
六	战胜 1954 年特大洪水.....	153
七	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156

第七章 崛起的江岸..... 158

一	经济进入快车道	159
二	城区发展战略	172
三	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174
四	投资新环境	179
五	日新月异的城建新貌	193
六	江岸大地的文明潮	210

下 篇

区情区貌

第一章 经济纵横	223
一 百年春秋的名老字号	223
二 早期工厂与后建厂	233
三 明亮的工业新星	238
四 服务行业涌新秀	241
五 大型零售商巡视	246
六 异彩纷呈的市场群	249
第二章 文教名区	261
一 梨园笙歌令人难忘	261
二 文学艺术家的云集之地	269
三 尊师重教催生出大批 名校	272
四 特色医院标志着发达的 卫生事业	282
第三章 名胜遗址	293
一 机关旧址追忆	293
二 碧血染红的江岸	313
三 名人故居忆名人	330

第四章 地名故事.....337

- 一 租界五条街名来历337
- 二 “三北”的来历339
- 三 保华街的来历341
- 四 历史人物路名342
- 五 纪念抗战胜利的卢沟桥路 ...350
- 六 祖国统一化路名352

第五章 名人点击.....357

- 一 革命领导人江岸足迹寻357
- 二 军政名人在江岸366
- 三 工商巨子沉浮录372
- 四 帮会头目混世面孔383
- 五 外国人江岸留真386

第六章 民族·宗教.....391

- 一 二七街——回民聚集地391
- 二 港澳台胞、台属集中地.....393
- 三 宗教活动的名寺名堂394
- 四 基督教青年会404

第七章 民俗·文化.....406

- 一 清明时节话凭吊406
- 二 群众文化的四季歌409
- 三 黎黄陂路街头博物馆414
- 四 吉庆街民俗饮食文化416

第八章 休闲娱乐	419
一 沿江大道——武汉外滩	419
二 独秀的江汉路步行街	429
三 市民休闲多少好去处	433
后记	443

SHANG PIAN

上篇

形成与发展

XINGCHENG YU FAZH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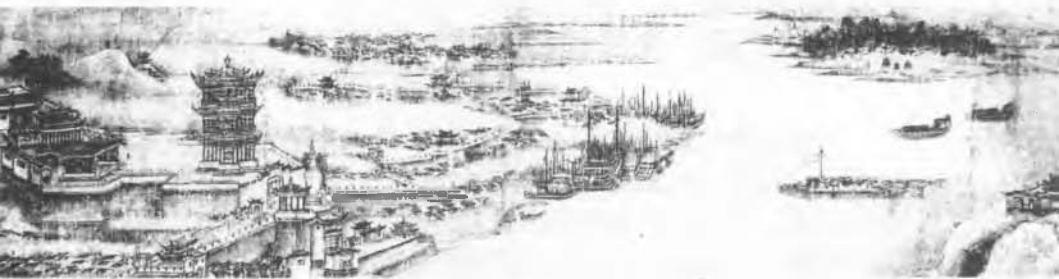
第一章 追根溯源

在武汉三镇中,武昌、汉阳历史悠久,而汉口不过五百多年。汉口三区中,硚口资格最老,江汉次之,而江岸形成最晚。

汉口的形成,源于长江、汉水交汇,江岸地处汉口的东北部。要了解江岸的雏形,还得追溯到很早以前汉水改道之时。

一 汉水入江形成河网漫滩

六千万年前,一条大河从青藏高原流经此地,她就是我国第一大江——长江;几百万年前,又有一条河从陕西流来,与之相汇,她就是长江最大



汉江交汇情景

的支流——汉水。

这一汇，使此地形成两江四岸，为后来这里发展成为“九省通衢”大码头、楚中第一繁盛处奠定了基础。这一汇，演绎出江汉朝宗、三镇鼎立、龟蛇对峙、楼峰江带、舟蚁人潮等等掌故，也使此地获得“江城”美名。

江汉汇合在何处？何处是真正的汉口？五百多年前，其脉络是不清晰的。原因是古汉水自沔阳以下，河道变化很大，入江时呈河网、河漫滩性状。不仅支流分汊多，且常发生位移。故古人也曾有“入江难考”、“几无可考”之叹。直到明朝成化二三年（1466~1467年），才形成今天龟山北侧入江的主泓道，确立了汉阳与汉口的分野。

二 潇湘湖与黄花地

汉口地势低洼，夏秋江河水涨，便成水乡泽国；冬春水退后，则是湖泊、河流与陆地交错，所以到元末明初，尚无人烟。

年深月久，河滩逐渐被泥沙淤积，河道渐宽而来水渐减，陆地与台墩渐显露水面，芦花荡中鱼跃鳧飞，吸引了周边汉阳、黄陂住民驾舟来此渔猎，但尚无人定居。相传当年朱元璋带兵过此地时，曾赋诗一首：“马渡沙头苜蓿香，片云片雨渡潇湘。东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在他眼前只有“平芜十里望无边”、“青草无依欲上天”的景观。

三 先民遗踪与择台墩而居

明朝天顺年间（1457~1464年），有一位姓张的农民在河滩台墩上筑基盖屋，随后又陆续有新的移民。他们过着半渔半农的营生。冬春水涸期间抢种抢收一季油菜。每到春日，油菜花绽放，一片金黄，故此处被人称为“黄花地”。

过了几十年,到了明朝嘉靖四年(1525年),上岸有张添爵等房屋630间,下岸有徐文高等房屋651间。属汉阳县管辖范围。

万历(1573~1620年)时,汉口有户万家、人口5万。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汉口港作为交通、流通枢纽的作用逐渐突显。史书说“汉口肇于有明中叶,盛于启正(天启、崇祯,即1621~1643年间)之际”。这是因为明代漕运(粮运)、鄂湘两省的淮盐专卖,船舶均以汉口为目的港。加上竹木、棉花、杂粮、茶叶、药材等贸易,帆樯林立,水中为市,十分繁荣。

汉口的优势,正如清代刘献庭在其所著《广阳杂记》中所言:“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

汉口在清初与朱仙、景德、佛山同被称为“四大名镇”,当不是偶然的。

第二章 从堤说起

早期的汉口一片泽国,满滩芦花。江岸辖区的所在地,民间习惯称为后湖。江岸从泽国中涸出,孕育于汉口三次筑堤。

学者杨铎曾指出:汉口的发展史与三次筑堤(城堡)有密切关系。也可以说,这三次大工程是汉口发展的“三部曲”。

汉口如今有这么大的格局,以及江岸的逐步形成与这三大工程密不可分。

一 三次筑堤奠定城区轮廓

袁公堤 江岸一片水茫茫

由于地势较高和濒临汉水的原因,汉口的市场和民居一开始就选建在今硚口区汉正街一带。到了明末崇祯八年(1635年),为了确保新兴城镇免遭水患,汉阳通判袁焜主持修堤,上自硚口,下至堤口(今海员俱乐部附近),长10华里,人称“袁公堤”。

堤内人口不断增加,至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已达129183人。当时有个范锴写了本《汉口丛谈》,内述“市场精华,多集中于汉口沿岸。”而他当时对今江岸区所辖范围的描述则是“夏秋水涨,名潇湘河;春涸草生,名黄花地”。

汉口堡 江岸城区见端倪

对于不断扩张的市场和剧增的人口,袁公堤内的土地,已显得捉襟见肘。清同治三年(1864年),汉阳知府钟谦钧、知县孙福海主持修筑汉口城墙。上自硃口,下至沙包(今一元路),长约11华里。城堡用红石、木桩、黄土堆砌成,城外又挖了护城河,其功能既有防水,也有防兵(捻军)的考虑。汉口市场已由沿河的汉正街,延伸至沿江的黄陂街了。

今江岸区江汉路至一元路、中山大道至江边地段,这次有幸被“纳入”城堡。汉口堡辟城门7个,其中循礼、大智、通济3门在今江岸区内。

堡建成



汉口东西湖(未围垦前)

后,原袁公堤失去作用,被铲平改建为街,即今长堤街。

光绪十四年(1888年),汉口堡内共有居民 180 980 人。

19 世纪初,汉口已是“千樯万船之所归,宝货奇珍之所聚”之地。

进入 19 世纪下半叶,1861 年开为通商口岸,1864 年汉口堡的兴建,以及 1899 年升格为夏口厅,汉口不再隶属汉阳县,而直属汉阳府。英、德、俄、法、日五国又先后在汉口建立租界。这些都促成了江岸地区经济繁荣与地位提升。

到了世纪末,汉口再换新颜。有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清朝学部颁行的教材——《瀛寰全志》为证。它是这样描绘当时的汉口的:

汉口,古名夏口,一名镇也,今改厅治属汉阳府,当四方之冲,得水运之便,故商贾辐辏,户口殷繁,居民约八十万。未通商前,舳舻云连,蔽塞江面,已为绝大市肆,称中国四大镇之首。同治元年开为通商口岸,中西船舶,益见屯聚。租界在本镇北部,街衢宽广,楼屋壮丽。海关、各国领事馆、公司、银行咸在。

以上这段文字,除居民数有出入,“同治元年”应改成“咸丰十一年”外,其他均属翔实。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租界、领事馆均在今江岸区内,而公司、银行也绝大部分在今江岸区内。

张公堤 江岸发展始直追

张公堤本名后湖长堤,因张之洞主持修建,老百姓感其深仁厚泽,故改称张公堤。工程于 1905 年开工,由洋工程师设计,耗银百余万两,1906 年竣工。堤长 23.75 公里,东起堤角,西至舵落口,将后湖十余万低洼地涸出,新增土地面积为原汉口堡的七倍。堤面宽 2~3 丈,底宽 6~8 丈,是汉口后方的防水屏障。它与沿江干堤、汉水河堤联接,形成全长 52.72 公里的汉口堤防。

张公堤的建成,使今日的硚口、江汉、江岸3个区当时都增加了土地面积,而江岸区则扩大了数十倍,是最大的受益者。

张公堤建成后,汉口堡的城墙成了累赘。1907年,决定将之拆除,平为街道,市民称之为后城马路,即今中山大道之前身。

由于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廷多年力争,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终于同意兴修铁路,“先修芦汉”。1895年开始测量,随即南北同时开工,并向比利时银行团贷款。1898年5月,玉带门至滂口间23.5公里通车。1901年通广水,1902年通信阳。1903年修建大智门车站,1905年交付使用。1904年达郑州。1905年11月13日,黄河大桥通车。1905年12月20日,玉带门至北京正阳门1214.49公里铺轨完毕。1906年4月16日,京汉(原名芦汉)铁路全线通车。

铁路建成后,汉口商品流通量陡增1/4以上。带动了商业、内外贸、水陆联运、城建、工业的发展。土地也跟着升值。正如《夏口县志》所写,“猥自后湖筑堤,芦汉通轨,形势一年一变,环镇寸土寸金”。

铁路在汉口境内共有4个车站,即玉带门、循礼门、大智门、刘家庙(后改江岸),其中有3个在今江岸区内。后来循礼门、大智门两车站合并,前者专营货运,后者专营客运。大智门车站及车站路一带,人流日夜不息,灯火通明,热闹非凡。使该地带之商业、服务业、娱乐业得以迅猛发展。江岸区的许多历史、掌故,与此密切相关。

二 清代后湖八景

武汉三镇中,武昌、汉阳在历史上都曾评选出“十景”,那么,立马平川的汉口有无“景”?有几“景”?何朝何代被评选出来?今天还存在吗?

民谚说汉口是“五百年前一荒洲,五百年后楼外楼。”此话不假。汉口本是汉水入江口形成的三角洲,汉水正流出其南,

支流出其北,属于河网地带。夏秋两江来汛,烟波千顷,一片汪洋。但经过千万年的河沙淤积,河床上升,至明初,三角洲在冬春水涸时,汉口又形成河、湖、台、墩的混合地形。

当时渔民、船民(从事客货运输的)掌握了自然规律,利用冬春水涸之际,在台墩上抢种一季油菜、小麦,以维持生计。油菜花和野生的苜蓿花都是黄的,所以到了春天黄花绽放时,文人墨客总用“黄花烂漫,千顷一色”、“一片黄云”、“布金满地”等词汇来形容此天然美景。长期以来,此地也就以“黄花地”命名。而在涨水时,地名就变成“潇湘湖”和“后湖”(汉口镇之后)了。

明代,襄河故道淤塞,文人们便有“淤后襄河二百年,平芜十里望茫然”;“东西数十里,平畴旷野,弥望无垠”;“湖光野色,点缀可观”的描绘。不久又有“湖中远近,又有土埠布列数十处,乡人筑室聚族而居”,“故诸墩皆以姓氏名,如某家墩……”“以土石或筑墩、或围垸,与水争地,盖房造屋”。继而“茶肆罗列,歌管纷喧”;“春兰秋菊,各擅其芳”;“游目骋怀,为汉口胜处也”。

至清代嘉庆、道光(1796~1850年)间,这一带“寺庙庵观、会馆公所、茶楼酒肆点缀于民居之间”,一年比一年热闹。加上“百戏杂陈”,春游踏青,端午划龙舟,游人更多。

文人们在游玩、喝茶之余,评选出了汉口后湖八景,或称潇湘八景。这在清代嘉庆《汉阳县志》已有记载。这八景是:

- 晴野黄花(春景)
- 麦陇摇风(夏景)
- 菊屏映雨(秋景)
- 平原积雪(冬景)
- 断霞归马(傍晚远景)
- 疏柳晓烟(早晨远景)
- 襄河帆影(中远日景)
- 茶社歌声(近景)

虽然这些景点没有武昌黄鹤楼的人文积淀和名流掌故,

没有琴台的钟俞知音令人扼腕,有的只是“湖泊片片,水雾茫茫”,只能在“水”字上做点文章,却是当年自然景观与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些景点没有谁去投资开发,自然不可能卖门票,而是敞开,免费供应。只能说明汉口人对城镇喧嚣的厌倦,对自然、田野、宁静的留恋。也许是当年的汉口人存在返朴归真的情结,也可以认为他们看见或听说别处都评有十景、八景之后,附庸风雅的文人习气。

遗憾的是:潇湘八景只存在百把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张之洞主持修筑的后湖官堤(张公堤)竣工,将后湖以内全部涸出,土地随着城市发展,被工厂、民居、道路、农田所占,八景自然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三 江岸名称的由来

江岸区位于汉口北部,东南临长江,西南以江汉路、江汉北路、新华路为界,与江汉区毗连,北接张公堤、朱家河与谌家矶。城区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2公里,东西宽3—5公里。地理位置在东经 $114^{\circ}16'—21'$ 、北纬 $30^{\circ}34'—41'$ 之间。地质地貌属冲积平原型。海拔平均高度22.86米,地势低洼。东、北两边都有防洪大堤,江堤海拔平均高度为29.3米。境内无山,曾有过许多湖泊,如陈家湖、黑泥湖、南湖、鲩子湖、玻璃淌子……但今已填塞、干涸。

在清末至民国期间,此地曾有过“大智坊”、“模范区”等名称。抗日战争胜利租界全部收回后,汉口市政府曾将今江岸区划分为若干行政区,如大智区、云樵区、汉景区、和平区、永清区、张公区等。解放后划为第四区、第五区,而后湖一带郊区属第七区。

1952年,第四区改为江岸区。1955年2月,成立江岸区人民委员会。

为什么要命名“江岸”呢？不外乎以下三种原因：

第一，汉口三区中，硚口区只濒汉水河，江汉区既濒汉水也濒长江，而江岸区只濒长江，且江岸线长达 37.62 公里。

第二，境内有刘家庙车站，该车站距江边仅 200 米，人们习惯称之为江岸车站。由于约定俗成，铁路部门也将其定名为江岸车站，立牌印票。江岸站及江岸西站共长达数公里，至黄浦路今长江二桥下，位置重要。

第三，1923 年 2 月 7 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全线大罢工，是一次伟大的政治斗争，英勇牺牲的烈士们，用鲜血谱写了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历史的光辉一页。江岸车站及其成立的江岸京汉铁路分工会，是这次罢工运动的发生地和见证者。因此用“江岸”命名。

第三章 开埠与租界

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被辟为通商口岸。深具现代都市眼光的列强,将租界选择在汉口旧城区花楼街向东的滨江一带,他们划定扩展租界,对租界实行统治,江岸人深受其苦难,饱经沧桑。

洋人们依靠长江的黄金水道发展航道。洋行、银行、教会纷纷抢滩江岸;近代工厂兴起,商人云集,江岸开始书写都市喧嚣繁华的一页。

开埠与租界述说着江岸的历史,改写了江岸的命运。中西文化的碰撞提前到来。福兮,祸兮?

一 不平等条约下汉口开埠

“开埠”与“租界”这两个名词,青年读者可能感到陌生。然而,你若要了解武汉的近代史,就必须先懂得它。

自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六十几年间,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对我国进行侵略,中国沿海的军队招架不住他们的



旧江滩

坚船利炮，屡战屡败，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的共同内容，就是清政府答应割地、赔款、开埠、划租界给帝国主义者。

所谓开埠，就是允许洋人到中国沿海或沿江的某个城市自由贸易，既允许他们来我国高价倾销他们的产品，也允许他们随便贱价收购中国的土产及原材料。当然，他们的商船也可以在中国沿海、沿江自由航行或停泊，中国人无权检查。

所谓租界，就是在中国城市的土地上，划一块地租给它们。虽说是“租”，也只象征性地给一点租费。这种租称为“永租”，包括使用权和所有权。租界的一切事务，中国政府无权过问。租界有行政管理机构、警察巡捕、法庭、监狱，有时还有军队。中国人想在租界内建房、开店、居住，还得经洋人批准，有些地方不允许中国人进入，有些设施中国人不能享用。所以称租界为“国中之国”，一点也不过份。

汉口是什么时候开始开埠和设立租界的？根据 1858 年 6 月清政府在战败后与英国签订的《天津条约》和 1860 年签

订的《北京条约》，汉口均是英国要求开埠的通商口岸。不过，这时候正是清军和太平军在长江流域酣战之际，航行与商贸无安全可言。所以条约的履行，推迟到太平军退出湖北的1861年。因此，1861年才是汉口事实上开埠的时间。

再谈汉口设立租界的时间。在汉口设立租界的国家，先后有英(1861年)、德(1895年)、俄(1896年)、法(1896年)、日(1898年)等五国。尽管开租的时间、面积大小、年租多少不同，但却有其共同点：

(一)都与武汉地方政府订立了《汉口租界条约》，条约内容大同小异。

(二)都确定租界土地采用永租制，即中国让出该片土地的永久使用权。

(三)都规定中国人在租界无居住权，原居民必须将原住房依市价转让给外国人后迁出。中国人如申请在租界居住，必须得到租界当局批准。

(四)租界当局拥有市政规划和建设权、市政设施所有权和管理权、征税权。

(五)租界行政管理机构采用殖民政府模式，设工部局、巡捕房等。该国驻汉领事是租界最高领导。

(六)租界的选址都选在汉口长江岸边。具体地说，则都选在今江岸区辖区内。由今武汉关至抚顺路一带，按英、俄、法、德、日顺序连成一长片。除江岸外，武汉市其他区都未设过租界。所以，汉口租界史发生在江岸的土地上。

开埠和租界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国耻，是屈辱。我们必须直面它，而不应回避，它毕竟是我国近代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开埠给外国商人敞开了大门，提供了商机。他们办工厂、开洋行、设银行、兴航运，仰仗其特权、资本和科技优势、先进的交通和通信手段和严密的推销网络，占领中国市场，攫取超额利润。

二 列强强租形成租界

步步蚕食的英租界

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战败,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英舰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汉口英租界一角

1856年至1858年,英国再次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先攻广州再攻天津,清政府求和,再签《天津条约》,汉口被列为增开通商口岸。1861

年,英国官员要挟湖广总督官文立即将汉口开埠,并划定租界。由汉阳知府、知县陪同英国人在汉口镇下街尾(今黄陂街东北口)划界。从花楼巷往东8丈起,至甘露寺江边卡东角(今合作路)止,长250丈,宽110丈,共458亩零80弓土地,“永租给英国”。英方每年向汉阳知县交纳地丁漕米银92两6钱7分,便可将界内土地自由处置。

1898年,英租界当局又软硬兼施,要求扩界,英驻汉领事霍必澜与湖北按察使兼江汉关监督税务瞿廷韶签订了《英国

新增汉口租界条款》。新增面积 337 亩 5 厘，每年缴纳地丁漕米银 67 两 4 钱 5 分 2 厘。至此，英租界面积达到 795 亩，而总租金仅每年 160 两 1 钱 3 分 4 厘 1 毫。

英租界还不时利用倾倒煤渣、垃圾，填补低洼，修路等手段，不断蚕食我土地。还曾在租界外购地建房，于今之怡和村、解放公园路建西商跑马场（今解放公园）。

迫日“还辽有功”的德租界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不仅台湾、澎湖被割让，连辽东半岛也在割让之列。俄、德、法等国考虑到本身在华利益，也不愿眼看到日本在中国坐大，因此联合起来出面干涉，向日本施加压力促使“还辽”。日本被迫还辽，改以清政府赔款 3000 万两银作补偿。

1895 年 9 月，德驻华公使绅珂，便借口迫日还辽有“功”，向清政府总理衙门索取在天津、汉口两地划定租界的权利，清政府被迫答应。



汉口德租界一角

1895年10月3日，德国驻沪总领事施妥博来汉，与湖北汉黄德道江汉关监督签订了《汉口租界合同》，规定在汉口城堡通济门外，自沿江官地起至李家冢止，计长300丈，深120丈（即今一元路至六合路附近一线，长江江边至今中山大道），共占地600亩，永租与德国。每年租银121两3钱2分，送交汉阳县收，界内华民不准居住。

德租界曾在禄街（今三阳路）江边起修一条铁路，与京汉铁路相交，形成水陆联运。另外，在辛亥革命时，华景街被北洋军焚烧，德租界工部局妄图越界筑墙，以保平安为名，实则想扩大租界地盘。但其阴谋被华景街市民识破，纷起反对，德人未能得逞。

特权条约下的俄租界、法租界

甲午战后，日本从中国夺取了大量土地和赔款，特别是割让辽东半岛，使俄罗斯想独霸中国东北的计划破灭。俄立即联合德、法，发起三国干涉日本“还辽”。

1896年3月，俄罗斯与清政府签订条约，迫清政府给予俄



俄租界工部局巡捕房



20世纪初的汉口法租界一角

罗斯修筑中东铁路的特权,并提出划定汉口俄租界的要求。

1864年,夏口为防洪水和捻军入侵,沿后湖构筑城堡,由礄口至通济门,长11华里。英租界在城内。1895年,德国划租界于城外江边,长300丈、宽120丈,是一块整齐的长方形。

1896年6月2日,俄国与法国外交官同时与湖北汉黄德道江汉关监督签订《汉口俄租界条约》和《汉口法租界条约》。他们选择的地方就在城堡内、英租界以下的这块空地。空地总面积不大,但在城内总比在城外安全。

俄、法分地的原则是:城内俄占 $\frac{2}{3}$,法占 $\frac{1}{3}$;江岸线俄占 $\frac{2}{3}$,法占 $\frac{1}{3}$ 。合作路至通济门288丈,俄界占192丈,法界占96丈。形状是不规则的,俄租界呈“L”形,法租界呈“T”形。俄租界紧贴英租界,法租界在俄租界下。

俄界总面积为414亩6分5厘,年租银83两8钱4分2厘。法界总面积



汉口法国租界界碑

187 亩,年租银 37 两 8 钱 1 分 1 厘。

1902 年 11 月 12 日,法国与清政府又签订《汉口展拓法租界条款》。因为未来的大智门车站离法界很近,法国人为了扩大地盘和靠近车站,亟须扩界至城外,终于把距铁路 60 丈,与铁路平行的地段收入囊中,新增面积 185 亩,总面积达 372 亩。

忍辱“兑现”的日租界

中日甲午战后,签订了《马关条约》。从此日本不断威胁我国逐条“兑现”,否则不从威海撤兵。1896 年 10 月 19 日,中日再签《通商口岸日本租界专条》,规定日本政府即在上海、天津、厦门、汉口等处设日本专管租界。

1898 年 7 月 16 日,湖北按察使汉黄德道兼江汉关监督税务瞿廷韶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签订《汉口日

本专管租界条款》,划定汉口镇德国租界北首起,东界沿长江 100 丈,东起江岸,西至铁道地界为止,为日租界区域,面积 247 亩 5 分,年租 50 两。

1907 年 2 月 9 日,日租界当局又与汉口关道桑宝签订《展拓汉口租界条约》,将租界沿长江下扩 150 丈,新增面积 375 亩 2 分 5 厘,总面积达到 622 亩 7 分 5 厘。日本还肆



30 年代的武汉日租界一瞥

无忌惮地在华界内租地、购地、建房、驻军、演习。

比利时谋求设租界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朝廷,力主修筑“自京城之卢沟桥起,经行河南,达于湖北之汉口镇”的铁路。奏折中历数修此铁路之“七大利”,还陈述修路之具体步骤与方法。

朝廷中派系斗争复杂,各地又争修铁路,且朝廷财政困难,因此一拖数年,议而不决。经张之洞力争,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才作出“先办卢汉,次第及于苏沪、粤汉”之许诺。同年,设总公司于上海,开始勘测、设计,并着手举借外债之准备。

消息传出后,列强纷至沓来,展开了贷款及筑路权的竞争。法、美、英、德、俄、比等国纷纷派人游说疏通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等政要。但张主张向比利时借款,因“比系小国,别无他志”,且“比以钢铁著名,利多害少”。1897年7月27日,在上海正式签订合同。但为平息列强争端,又将中东路、胶济路、广九路和沪杭甬路、粤汉路的修筑权分别给予了俄国、法国、英国和美国,以满足列强“利益均沾”的要求。

比国虽获卢汉铁路修筑权,然财力实不逮,法、俄又成为其后盾。贷款450万英镑,条件是:按9折实付,年息5厘,30年还清,以铁路及其附属产业为担保。材料除部分采用汉阳铁厂产品外,均由比国采办。监造铁路及建成后的营运业务,均由比国行政、技术官员总揽大权。

贷款刚到,比国驻汉领事即通过公开和隐蔽方式,想在汉口攫取一块租界。明里以比国筑路员工将达数千人,为了居住和管理方便,应享有“英、德、俄、法、日等国同等权利”;暗地通过法商立兴洋行,在刘家庙一带购地600亩,每亩价银约10两,为下步筹划租界造成“既成事实”。张之洞本来答应二百多亩给比国作租界,可比领事硬要加宽靠近铁路。张之洞考

虑若逼近铁路,有碍铁路主权和沿线军事设防,又恐日本也趁机要求扩界,始终未允。比国将 600 亩地契送关道办税和公证,又遭拒绝。比驻华大使向清廷施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多次谕示鄂省作出让步。张之洞力陈利弊,指出比界再扩,势必跨越铁路,横挡要冲,铁路利权难以维护。建议“将比国原在汉所购之地议价收回”。双方僵持 8 年,张坚持比国筑路员工之住所,可由铁路公司租屋提供,先行借住,工程竣工后收回,实无划界之必要。

至 1905 年,卢汉铁路全线竣工。比国员工陆续回国,比国索要租界之理由不复存在。经过讨价还价,张之洞以每亩价银 1363 两的高价,赎购此地,共支付 81.8 万银两,超出原价的 136 倍。比国大赚了一笔,但谋求在汉划租界的阴谋未能得逞。

三 租界行政机构

权力极大的领事馆

领事馆既代表该国行使外交职能,又对租界实行统治。虽



日本领事馆



德国领事馆旧址

然租界设有一个市政委员会,由6位居民代表(当选者都是“大款”)组成,但正如英国人所写的一份《海关十年报告》中所说:“总领事实际上是真正的权威统治”。

在汉口建有总领事馆和领事馆的国家,除英、德、俄、法、日5个辟有租界的国家外,还有美、葡、荷、比、意、墨、芬兰、丹麦、瑞典、挪威等10国。另外,奥地利、西班牙、瑞士、刚果、菲律宾等国未在汉设领事馆,但委托以上15国代理领务。

领事负责外交事务,主要工作是帮助洋商出谋划策、打通关节,在商场多捞些经济利益,调解一些华洋纠纷,保护居留侨民的利益。

租界中大部分外国人是从事银行、洋行、工商工作的,但也有在教会、学校、医院、海关等工作的,还有些谍报人员。日租界侨民中此类间谍、特务、浪人最多,因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极大,对中国内陆一切情况均在刺探之列。租界内当然也有各种商店、开车行、开赌行、赌赛马、卖淫和从事招摇撞骗的。

各国驻汉口领事馆一览表

国别	馆名	地 址	开闭年月	备 注
英	总领事馆	今沿江大道市政协大楼和天津路2-4号文史馆	1861.4-1941.12 1945.12-1951.1	武汉沦陷之后关闭，胜利后复馆
美	总领事馆	今车站路1号武汉市人事局用房	1861.4-1941.12 1945.12-1949.10	1861年在汉阳，并代理俄在汉通商事宜，后迁俄租界领事街口，1905年迁河街威尔逊总统路口（今车站路1号）
俄	总领事馆	今洞庭街74号湖北省电影发行公司大院	1861.7-1917 1925-1927 1933年又复馆 1946-1947	始在汉阳，后移汉口，1902年迁入俄租界新馆，1947年闭馆，1959年房产作价售与省电影发行公司。
法	总领事馆	今洞庭街105号	1862-1950.12	1865年购地建馆，1892年馆房被大水冲毁，是年又重建。
葡	总领事馆	今胜利街（合作路至黄兴路口之间）	1864-1945	
荷	总领事馆	今洞庭街（车站路蔡锷路口之间）	1874-1941.12	原设于英租界宝顺街以南。与英领事馆隔街相望。
日	总领事馆	今山海关路2号	1885-1937.8 1939-1945	1873-1884年由驻上海领事馆兼任，1885年正式派驻汉领事，适1898年日租界划定后，迁入新馆，1939年又移今胜利街交通银行内。
德	总领事馆	今沿江大道一元路口武汉市政府大院	1888-1917 1925-1945	1888年前先后由英驻汉领事代理

行使管理的工部局

工部局(Municipal Council)由纳税人会议产生,纳税人会议由在租界中有产业的外侨推选产生。每个纳税人单位推选1人。如英租界英国人有23个单位,便产生23个代表;美国有4个单位,日本有5个单位,德、意、法、俄各有1个单位,共产36个代表。由于英国代表占64%,因此英国人成为英租

界纳税人会议的主宰。

经纳税人会议推选9~11人组成工部局,每三年选一次,可以连任。委员不驻会,聘请职员若干,其中一人为执行秘书(或称总办),即工部局负责人。



汉口英租界

以英租界为例,总办为英籍,下设会议、工程、卫生、警察4科,每科的科主任也是英籍。工部局编制15人,英籍8人、印籍1人、华籍6人。总办月薪1200两银,科主任500~600两银,而华籍职员仅100元左右。

法国工部局设总办1人,正、副局长各1人,再聘3~4名华人为翻译。法国工部局的主要工作是征税和市政管理,机构较简单。设有消防队,队长1人(法籍)、队员10人(华籍);清洁卫生所所长1人(法籍),有中国头佬数人,分管街道、江滩、码头卫生和清除粪便。电铁组组长设中国头佬1人,带领几个工人,管理电、水和铁栅栏及公共设施的维修。

警察职能的巡捕房

巡捕房即警察科,领导均为洋人。主任又称大保正,下面的巡官人数不等,如系洋人则称洋保正。也雇用几个中国人,担任翻译、“包打听”(侦探)、拘留所管理员。英租界拘留所有屋几大间,可同时关押百余人。



原德国巡捕房

法国巡捕房设大、二、三、四保正，都由法国人担任（四保正有白俄当过）。巡捕通常有100人左右，由安南（今越南）人和华人充当。但安南人持枪，故称手枪队；

华人只持警棒，故称警棒队。

巡捕的权力很大，经常在街上或栅栏盘查刁难华人，稍有不满，轻则侮辱打骂，重则关押。

领事裁判权的产物——会审公所

会审公所又称会审公堂，它是不平等条约中领事裁判权的产物，相当于一个法庭。汉口5个租界的会审公堂，都设在其领事馆内。

通常审案有两个审判员，如英租界规定由英、华各1人担任。英方为领事馆助理员（俗称三领事，因系领事馆的“三把手”），华方为洋务公所委员。

每天上午10~12时为开庭时间，出席者有检察人、见证人、翻译等。检察人为洋保正，提交《犯事报告单》给审判员，发言补充。证人指证，指证完毕，由华审判员审问。最后，由英审

判员判决签字于《犯事报告单》上,退还大保正带回巡捕房存档。

判决人犯需拘留者,则交洋务公所执行。该所设有拘留所,可关押犯人。

洋务公所委员担任华审判员,显然不能左右审判结果,只能起一点协调、监督作用。

四 租界的保护伞——租界武装

租界武装分为两类,一是居留民组织的“民兵”,名称有“射击协会”、“志愿兵团”、“义勇队”等。如1916年,英租界志愿兵团有122人,配备轻武器。有时几个租界联合组织应对紧张局势。如1900年英、德、法三租界联手成立“国际志愿兵团”,以提防义和团运动波及汉口租界。

一是正规军队,在租界江面上经常停泊有军舰,尤其在时局动荡的太平天国时期、义和团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如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时,汉口一侧江面停泊军舰数达20艘,其中英舰8艘、德舰5艘、美舰3艘、日舰2艘、俄舰1艘、奥舰1艘。

日本还曾以保护租界为名,派遣2000名陆军进驻汉口,将兵营及无线电台越界设在今解放公园北侧至上世纪30年代的数帧汉口地图上,日本兵营和日军司令部赫然入目。在日租界江边,日本设有海



驻汉口外国水兵保护租界



1916年的汉口日租界日军营房

军陆战队司令部、海军慰安所。法租界则在霞飞路(今岳飞街)建立兵营,长期驻军,士兵为安南人,军官为法国人,配备坦克2辆。每年7月14日法国国庆时,还组织阅兵仪式,届时坦克也开出来炫耀一番。

1927年4月大革命高潮时,各租界如临大敌,调来军舰35艘之多,其中英、日各10艘,美11艘,法、意各2艘。

五 租界向外侵蚀

列强在汉口以“租”为名,行霸占之实,开辟租界后,并不满足,无时不在图谋扩大地盘。其阴谋手段得逞的有:

软硬兼施要求扩界。五国中除俄国外,其余四国都屡以各种借口要求扩界。理由有“过于窄狭”、“无法满足将来工商发展”、“不敷使用”等。

清政府一再软弱退让,同意扩界。1898年,与英签《新增租地条款》,英租界扩地337亩。1902年与法签《展拓条款》,法租界扩地305亩,所扩面积为原面积的163%,即1.6倍。1907年与日签《推广汉口租界专条》,扩地375亩,日租界总

面积达 622.75 亩。1898 年 8 月，与德也签约同意扩界，幸好华界市民极力反对，阻拦划线，德租界扩界未能实施。

扩界后，五国租界总面积由原先的 1907.48 亩，增至 2924.80 亩。



1900 年前后的汉口外滩

六 租界的发迹

开埠与租界给武汉增添了许多新鲜事物，如银行、洋行、机器、轮船、买办、西装、西餐、教会等，中西文化的碰撞提前到来。福兮，祸兮？

繁忙的长江航运

汉口开埠与设立租界后，大量的进出口货物，为发展长江航运、江海联运提供了契机。1863 年，美国人金能亨集资创办了旗昌轮船公司，以 4 560 吨的旧轮船“惊异”号，开辟了第一

条沪汉客货定期航线。等到清军与太平军间的战事刚平息的1864年,在长江上航行的各外国轮船已达16艘(见下表)。



1924 年后的新汉口码头

1864 年在长江上定期航行的各国商轮一览表

船名	国别	公司	总吨
飞似海马	英	宝顺	1 215
慕容	英	吠礼查	1 223
火箭	美	琼记	678
江龙	美	琼记	945
快捷	英	怡和	489
罗纳	英	怡和	1 215
爆信	英	广隆	1 014
快也坚	英	广隆	3 801
鄱阳	美	同孚	827
大江	美	同孚	609
九江	美	同孚	1 065
湖广	美	旗昌	1 339
山西	美	旗昌	1 006
四川	美	旗昌	1 006
江西	美	旗昌	1 086
浙江	美	旗昌	1 261
合计			18 805

进出口外轮及其载货吨位、总值见下表:

1861-1864 年汉口进出港外轮简表

年份	进出港外商船舶		外轮载货总值 (两)
	艘数	总吨	
1861	401	93 433	9 779 909
1862	1462	290 536	12 046 009
1863	1033	395 312	27 333 595
1864	793	417 855	25 517 183

1869年,英国蓝烟卤轮船公司派轮船两艘,定期航行于汉口—英国之间。

从1863年至1938年(武汉沦陷),先后来汉经营轮船运输的外国公司有23家。参加营运的轮船共118艘,6.62万总吨。经营客货运的公司以汉申、汉湘、汉宜、汉渝四大航线为主,经营进出口货运的公司轮船则可不定期地来往于汉口与神户、大阪、横滨、汉堡、不来梅、鹿特丹、马赛、安特卫普、热诺亚、塞得等港之间。

输出的大宗货物是棉花、矿砂、黄豆、牛皮、茶叶、蛋品、生漆、猪鬃等,输入则以棉纱、百货、煤油、机械、五金等为主。

由于航运业的丰厚利润,1873年,清政府也成立了官办的招商局,参加长江航运角逐,打破了外国公司的垄断。

1896年,汉口地方集资成立仁记轮船公司,购“楚裕”、“楚胜”二小轮,经营三镇间轮渡。1897年,湘、鄂商绅合办两湖轮船局,以“楚宝”、“楚威”、“湘庆”、



码头工人

“湘泰”4轮,对开汉湘航线。1899年,春和轮船公司成立,以“紫云”、“飞云”二轮航行汉口—沔阳间。据统计,1937年在汉成立过轮船公司(含总公司、分公司)的,共有200多家,其中外资23家;轮船近千艘,其中外轮118艘。最著名的轮船公司有太古(英)、怡和(英)、日清(日)和招商局(官办),属于中国民办的在江岸地区的较大的有三北、鸿安等公司。只有1~3条船的公司有一百多家。请看下列图表:

1906年汉口港航线及船舶分布情况

航线	船数	总吨	所属公司	国别	班期	
汉口上海线	4	6041	大阪商船会社	日	1月12回	
	4	5860	招商局	中	1周4-5回	
	4	7707	太古轮船公司	英	1月12回	
	3	6210	怡和轮船公司	英	1月9回	
	4	2679	鸿安公司	英	1月12回	
	2	2290	瑞记洋行	德	1月6回	
	3	3453	美最时洋行	德	1月9回	
	3	5180	东方轮船公司	法	1周两地1回转	
	2	1324	太平洋行	名为英实为日	1周1回	
	2	不明	麦边洋行	英	不定期	
汉口宜昌线	2	2141	大阪商船会社	日	1月6回	
	2	1183	招商局	中	不定期	
	2	2145	太古轮船公司	英	不定期	
	1	1354	怡和轮船公司	英	不定期	
汉湘线	长沙、湘潭、常德三地	1	930	太古轮船公司	英	不定期
		1	696	怡和轮船公司	英	不定期
		1	不明	招商局	中	不定期
		3	1160	湖南汽船会社	日	不定期
		2	285	两湖汽船会社	日	1月9回
4	不明	两湖轮船局	中	约5日1回		
日本线	神户、大阪、横浜	2	3691	湖南汽船会社	日	每年4-11月 江水上涨期开航
		3	不明	大阪商船会社	日	
		2	2492	日本邮船会社	日	
江汉线	仙桃、蔡甸、岳口	2	不明	泰安公司	中	
		2	不明	春和轮船公司	中	
汉口—咸宁	不明	不明	华昌公司	中		
湘汉沪	14	不明	汉冶萍公司	中		

轮船多了，码头也要相应增加。从江汉关至今合作路的英租界江岸有怡和、太古、鸿安、麦边等英商码头，合作路至黄兴路俄租界江岸有日本大阪轮船公司和俄商新泰货栈码头，黄兴路至一元路法租界江岸有法商东方轮船公司、日商邮船公司码头、三北轮船公司码头，一元路至六合路德租界江岸有汉堡亚米利加栈、美最时洋行、瑞记洋行码头，六合路至吉林路（今郝梦龄路）日租界江岸有太平洋行码头。

晚清时，汉口港跃居全国五大港口第二位，仅次于上海。正如当时日本驻汉领事水野幸吉著书所说：“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直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这是因为汉口对外贸易额占全国总额的10%左右，是惟一可与沿海几大通商口岸相匹敌的内地通商口岸。

汉口市场最初是从汉水沿岸发展起来的，“以上至硚口，下至黄陂街一带最为繁盛。”《夏口县志》也说：“开辟市场之始即定于襄河沿岸一带，盖一以扼上游之津要，一以便商船停泊，避风涛之险。”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处地势较高。明末袁公堤修成后，基本上可避免水患。咸同间（1851~1874年）因商业发展，人口增加，市场中心再向长江方向移动，至黄陂街、四官殿上下，但仍在长堤内外。及海禁大开，通商开埠，又划租界，兴航运，加之同治三年（1864年）汉口城堡建成，为市场中心下移至租界创造了条件。

总之，汉口镇市区由清初的沿襄河岸边，至清末逐渐下移扩展至长江边，将原来的荒唐野湖变成了街市，汉口由此进入“长江时代”。其原因是很多的：

（一）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多，有扩大市区的需求。

（二）开埠意味着外贸的启动和货物吞吐量增加，洋行、货栈、码头的设立，均需土地。

（三）轮船以其载重量大、速度快、能抵御风浪等优点，几

乎完全取代了木船，而在河面狭窄且水浅的汉水行驶、调头、停泊是比较困难的。长江才能满足其要求。

(四)汉口城堡、张公堤的建成，洒出了土地，使扩大市区的需求成为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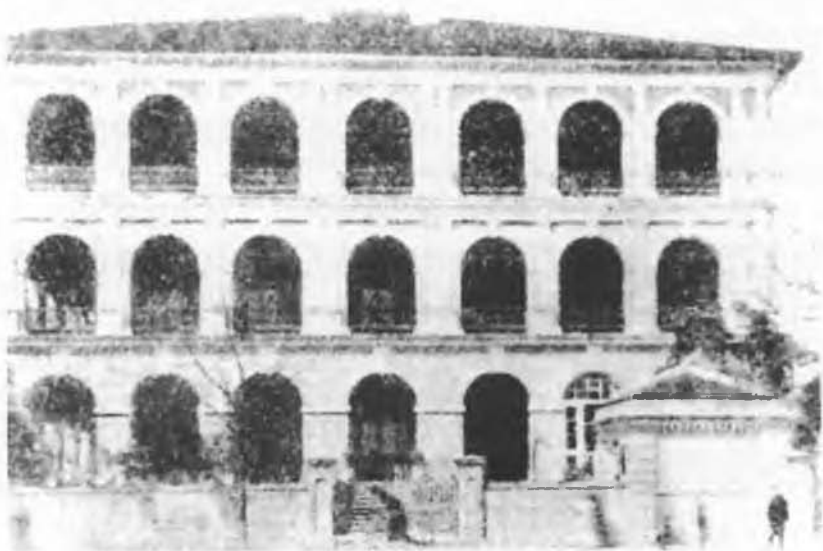
(五)租界的设立，外国人建房、开工厂、码头货栈用工，吸纳了大量本地劳工，也带动了租界内及周边华界的商业、服务业。

(六)卢汉铁路通车，大智门车站和循礼门车站客流和货流量巨大。

江岸辖区正是在汉口市不断下移过程中，逐渐崭露头角的。

商品贸易说洋行

外商前来汉口，一般不是个人行为，他们都是从设在本国的总公司或设在香港、上海的分支机构派出来的雇员。经过



英商怡和洋行



40年代末的汉口沿江景色

考察论证,请示总老板,决定在汉口做生意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在汉设立办事机构。

这种洋人出资、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单位,被通称为“洋行”。有的洋行在汉口分行下还设有沙市、宜昌、老河口支行,在县城、乡镇还设有分店、经销店,形成推销网络。

在汉口,还有些外国人不从事进出口贸易,仅开一小商店如西餐馆、咖啡馆、照相馆、理发馆、药店等。这些属于小老板。

据1905年统计,汉口的洋行及外国人商号达250家,其中日商74家,英商57家,德商54家,美商22家,法商20家,俄商8家,丹麦商5家,比商、印商各3家,葡商、瑞士商、菲律宾商各1家。

各年洋行数,见下表:

清末汉口洋行发展概况表

年代	洋行户数	人数
1892	45	374
1901	76	990
1905	114	2 151
1911	125	2 864

主要洋行组织进口的产品,英、美商垄断石油、纺织品,德商垄断油漆染料、五金机械,日商则输入棉纱、食糖。

洋行组织输出的产品,俄商垄断砖茶,英商出口红茶、蛋
品,德商出口牛羊皮、桐油、五倍子,日商则收购棉花、杂粮、猪
鬃出口。

下表是 1908~1910 年在汉洋行:

各国在汉洋行表

国别	名称	开设时间	地址	主要业务
英	怡和洋行	1873 年	英租界	航运、食糖、五金机械输入,一般输出
	沙逊洋行	1904 年	英租界	进出口
	太古洋行	约 1909 年	英租界	航运、食糖等输入,一般输出
	太平洋洋行		英租界	输出茶叶
	华昌洋行		英租界	进出口
	祥泰洋行		英租界	木材输入,输出红茶
	胜家洋行		英租界	缝纫机输入
	顾发洋行		英租界	五金输入
	天祥洋行		英租界	输出红茶
	天裕洋行		英租界	输出红茶
	嘉乐洋行		英租界	输出红茶
	协和洋行		英租界	输出红茶
	隆泰洋行		英租界	输出红茶
	锦隆洋行		英租界	输出红茶
	公信洋行		英租界	输出红茶
	柯化威洋行		英租界	输出红茶
	国	礼记洋行		英租界
顺昌洋行		1901 年	英租界	输入纺织品,输出桐油、苧麻
宝顺洋行			英租界	红茶、牛羊皮、五倍子、桐油、苧麻输出
杜德洋行			英租界	购红茶为主兼其他输出
金途洋行			英租界	进出口
平行洋行			英租界	进出口
良济公司			法租界	输入纺织品、杂货、军需品,输出桐油、 麻油、皮毛等
泰和公司			英租界	出口公司
卜内门洋行				输入碱类、化肥、染料等
和记洋行			德租界	蛋品肉食输出
别发洋行		1903 年		西药
礼福洋行			俄英租界	苧麻出口
福利公司			法租界	洋杂百货
惠司公司		法租界	洋杂百货	
屈臣氏药房		英租界	西药	
平和打包股份有限公司	1903 年	德租界	棉花、牛羊皮、羽毛、苧麻打包、桐油、生 漆、猪鬃、五倍子等输出	
隆茂打包股份有限公司	1907 年		棉花、牛皮、苧麻打包	
英美烟草公司汉口分公司	1909 年	英租界	卷烟产销	

国别	名称	开设时间	地址	主要业务
德国	波弥尔文洋行	光绪末年	德租界	进口
	利昌洋行		英租界	进口
	禅臣洋行			输入五金机器,输出牛羊皮、桐油、猪鬃、五倍子、苧麻、红茶、芝麻、生漆等
	瑞生洋行	英租界	五金机械	
	泰来洋行	德租界	进口	
	味洋行		输出牛羊皮、桐油、芝麻、皮油、生漆、苧麻、猪鬃,进口杂货、石油	
	元亨洋行		英租界	输出牛羊皮、桐油、皮油、牛油、苧麻、芝麻、五倍子、红茶、杂货
	多福洋行	1891年	德租界	出口矿产
	嘉柏洋行		英租界	进出口
	礼和洋行			输入钢铁、五金机械、光学仪器、西药、化工原料、石油等,输出桐油、五倍子、芝麻、苧麻、猪鬃、红茶、矿产等
	美最时洋行	1862年	德租界	输入钢材、机械、光学材料、化工原料、电器、百货,输出蛋品、芝麻、牛羊皮、桐油等
	福来德洋行	光绪末年	日租界	棉纺织品输入,棉花等输出
	嘉利洋行	光绪末年	英租界	输出杂货、牛羊皮
	瑞记洋行		法租界	输入石油,输出牛皮、五倍子、桐油、杂货
	西门子洋行	英租界	输入电器	
	美隆洋行	英租界	出口	
	艾礼司洋行	英租界	染料等输入	
谦信洋行	英租界	输入染料、钟表		
德昌洋行	德租界	肠衣输出		
卜西牛羊肉庄		德租界		
发利牛羊肉庄	德租界			
法国	公兴洋行	1894年	法租界	输出羽毛、牛皮、杂货、牛羊肉、红茶、蛋品
	立兴洋行		法租界	输入钢、铜、玻璃、面粉,输出芝麻、牛羊皮、猪鬃、苧麻、桐油、皮油、五倍子、红茶、生丝、杂货
	永兴洋行	1875年	大智路	输出牧草、桐油、芝麻、苧麻、五倍子、丝、杂货
	万顺洋行	法租界	输出牛皮、小羊皮、芝麻、桐油、牛油、五倍子、漆、矿产	
	万兴洋行	法租界	出口	
	乌利文洋行	英租界	输入钟表、首饰	
	福泰洋行	英租界	出口	
	利安洋行		输出野鸡、锦鸡、羽毛	
德明饭店	法租界	旅店业务		

国别	名称	开设时间	地址	主要业务
美国	恒信洋行		法租界	输入染料 输入石油 输入石油 输入电器, 蛋品加工输出 桐油输出 出口 外洋航运, 输出桐油等
	光裕洋行		法租界	
	美孚洋行		英租界	
	慎昌洋行			
	胜利洋行			
	德泰洋行		法租界	
	大来洋行		后城马路	
俄国	顺丰洋行	1863 年	英租界	加工砖茶输出
	新泰洋行	1866 年	英租界	加工砖茶输出
	阜昌洋行	1874 年	英租界	加工砖茶输出
	柏昌洋行	1893 年	英租界	加工砖茶输出
	源泰洋行		俄租界	茶叶输出
	巴公洋行		俄租界	房产
比国	茂兴公司		法租界	输入洋杂货、纺织品, 输出杂毛、杂皮、苧麻、杂货
奥地利	和顺洋行		英租界	输出杂货
瑞典	瑞嘉洋行		英租界	输出杂货、禽兽毛皮
	瑞兴洋行		日租界	蛋品加工输出
丹麦	盛亨洋行		俄租界	收购纱厂废花
	宝隆洋行			输出桐油界
印度	金龙洋行			饮食料品
	兴隆洋行		英租界	百货
	八查利洋行		英租界	食品进口
	法郎治洋行		英租界	食品进口
日本	三井洋行	1908 年	英租界	输入食糖、海味等, 输出棉花 输入纸、棉纱、布、碱类、煤、钢材等, 输出杂粮、 油脂、铁矿等 输入布、纱, 输出棉花、榨油, 收购桐油、油 料、榨油、油粕 输出 输入, 杂货输出 输入, 杂货输出 百货输入, 杂货、棉花输出 输出生漆 输出杂粮 输出杂粮 输出杂粮 输出猪鬃 贩卖药品 药品, 书籍, 杂货 收购麦, 加工面粉销售 收购麦, 加工面粉销售 售纱、购棉 输出棉花
	三菱洋行		江汉关左侧	
	日信洋行	1905 年	英租界	
	日华洋行		日租界	
	铃木洋行			
	吉男洋行			
	瀛华洋行		英租界	
	斋藤洋行			
	汤浅洋行			
	黄泰洋行			
	岩井洋行			
	大仓洋行			
	长赖洋行			
	九三洋行			
	思明洋行			
	东亚制粉	1907 年	罗家墩	
	和平制粉	1910 年		
半田棉行				
日本棉花				

由于洋行林立,特别是洋货的充斥市场,这对汉口社会及其原居民的影响是巨大的。“汉口市民对于外国制造的杂货,如玩具、工具、铅笔、图书、装饰品、伞、利器、假珠宝、肥皂等的需要也不断增加,这些货物已成为一般商店的商品”,“汉口四郊百姓,或祭祀,或应酬,或往稠人广众之中,皆穿洋布”。生活方式日趋“西化”。

这些舶来品不仅其质量优于汉口原来的手工业产品,即使加了运费后,其价格还低于我手工业产品,所以在市场不胫而走。例如洋布、洋纱、呢绒、纸张、玻璃器皿、洋烟(纸烟)、洋油(煤油)、洋火(火柴)、洋蜡(烛)、洋伞、洋酒、洋灰(水泥)、洋钉(钉子)、洋碱(肥皂)……已进入千家万户。

洋行的推销手段也是很高明的。如煤油经销商美孚洋行,大量赠送煤油灯灯具,使用时相当安全,价格、卫生各方面都优于老百姓千年以来所用的菜油、桐油、麻油灯。日商生产的面粉增白剂,市民怀疑对人体有毒害,不愿购买。彼则将这种增白面粉制成点心、饼干,赠送给工人食用。还将增白面粉分装5市斤小包装,配产品说明书,沿街抛撒;继而在包里放彩票,进行抽奖。经过如此促销,增白剂和增白面粉终被市民接受。

至于推销肥田粉、染料、药品、毒品等,则举办讲座、训练班、示范等措施,而且先给用户使用,见了效果再结账。

洋行在收购我土产品过程中,为了谋利,也是不择手段的。如收购芝麻时,要先通过其风货机进行“除潮”、“除杂”,进去100斤,出来只有80~82斤。在农业产品大量上市时,洋行故意拖延时日,压价勒掇华人行庄。对于鲜蛋、生猪、家禽等鲜活产品,更是降级、砍价、压秤。

应运而生的外国银行

汉口开埠以后,外国人来此办工厂、开洋行,进出口贸易两旺,这真是金融业施展拳脚的好地方。

可是,汉口在19世纪时,金融业只有票号、钱庄,经营一点汇兑和借贷业务,资本相当有限。另外,本地的金融者也不懂

外贸和涉外金融业务,认不到洋文和外币,更没有国际行情信息渠道。因此,外国银行应运而生,纷纷抢滩汉口。1863年夏,英国麦加利银行来汉租屋营业。1865年,在英租界购地建楼(今洞庭街55号),正式开业。这是来汉的第一家外资银行。1866年,英资汇丰银行开业。随后,又陆续开了几家,见下表:

外国在汉银行一览表

行名	国籍	总行地址	汉口分行地址	设立年代
麦加利	英	伦敦	英租界	1863年
汇丰	英	香港	英租界	1866年
德华	德	上海	德租界	1895年
华俄道胜	华俄合资	彼得堡	俄租界	1896年
东方汇理	法	巴黎	法租界	1902年
正金	日	横滨	英租界	1906年
住友	日	大阪	散生路	1908年
义品放款	法比合资	布鲁塞尔	英租界	1911年(一作1912年)
花旗	美	纽约	英租界	1910年

汉口租界银行一览表

行名	国别	开停年月	行址	总行地址
麦加利	英	1863~1949.2	今洞庭街55号(青岛路口)	伦敦
汇丰	英	1866~1950.3	今沿江大道103号和青岛路2号	香港
道胜	中、俄	1896~1927.9	今沿江大道黎黄陂路口下首	原设彼得堡 后迁巴黎
德华	德	1898~1932	今沿江大道市政府大院下首	上海
东方汇理	法	1902~1949.8	今沿江大道125号(车站路口)	巴黎
横滨正金	日	1906~1945.9	今沿江大道南京路口	横滨
住友	日	1908~1945.9	今江汉路	大阪
花旗	美	1910~1940.12	今沿江大道102号(青岛路口下首)	纽约
万国通商	美	1910~1950	1927年收回英租界后,花旗银行易名万国通商银行	纽约
义品放款	法、比	1912~1942,后被日军没收,抗日胜利后复业,1954年歇业	今车站路	布鲁塞尔
中法实业	中、法	1913~1921		巴黎
台湾	日	1915~1945.10	今江汉路23号(洞庭街口对面)	台湾
中法振业	中、法	1917.2~1924.2		北京
中华汇业	中、日	1918.2~1928.10	今沿江大道合作路上首	北京
友华	美	1919~1924.2后并入花旗	今鄱阳街	纽约
中华懋业	中、美	1919~1929.4	今沿江大道市政府礼堂上首	北京
汉口	日	1920~1945.10	今洞庭街北段	汉口
华义	意	1920~1924.1	今沿江大道市政府礼堂上首	天津
震义	中、意	1921~1924.10	今江汉路洞庭街口	北京
华比	比	1906~1941.12	今沿江大道市政府礼堂上首	布鲁塞尔

外国在汉银行经营主要业务有：吸收存款、发放信贷、经营汇兑、承担江汉关税收保管等。清代中国无纸币，使用银两、银元、铜钱，因而，银行又多了一项兑换业务。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

外国银行贷款给做出口的洋行、湖北地方政府、汉口钱庄和民族工商业，而经营外贸的中外企业，又必须通过它汇兑。

所以，在 19 世纪 80 年代，一位来华的英国人曾经写道：“外国银行已赢得在中国贸易中发号施令的地位”。

在吸收存款中，别认为贫穷的中国老百姓没有款可存，银行就冷清了。实际上，在汉的外国领事馆、教会、公司、洋行的外国机构和人员，中国政府的公款、军费，工商业营业资金、官僚的贪污



汉口商业银行大厦（今武汉图书馆老馆）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

款及灰色收入等,都是大量的。所以,对外资银行经营业务之繁忙、金额之巨大是无庸置疑的。何况它还经营保险业。

外国在汉银行的主管称大班,1人(副班 1~2人),下分

洋账房(写字间)、华账房(买办间)。前者负责出口、汇兑、文牒、金库,多为外籍职员,后者包括跑街、跑楼、簿记、出纳、工友等工作,全是华籍员工。

洋人争办工厂

在清代,茶叶是中国出口产品之大宗。鄂南是俄商的主要采购地。清同治二年(1863年),俄商巴提耶夫更深入崇阳大沙坪、蒲圻羊楼洞等地,陆续开办了几家制造砖茶的茶庄,1865年后将厂迁至汉口。至19世纪末,汉口俄商砖茶厂已有8家,其中顺丰、新泰、阜昌3厂的资本共达400万两银。阜昌一家即雇工人2000以上。这些厂全部在租界内。

武汉地区丰富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是外商办厂的理

想之地。他们就地取材,或就地倾销,或加工打包后转运外洋。主要的工厂有:

蛋品厂:至1908年,共有6厂,职工366人。生产蛋白、蛋黄粉全部出口至欧洲。蛋品出口量占全国50%。每家工厂每日打禽蛋数万枚不等。这些蛋厂也多在租界内,著名的有英商和记蛋厂,厂址在今六合路中南商都。

打包厂:机器打包,主要是打包出口的棉花。英商的平和、隆茂和日商的棉花打包厂是最大的。后者每昼夜可打棉花1000包以上。这些厂也都在租界内。

卷烟厂:利用河南、湖北烟叶,在汉口加工卷烟,然后在内地倾销。英、美商人合资办厂,名为颐中公司,厂在今六合路及硚口区宗关。共雇工五六千人,每天产烟1000万支以上。

制革厂:用机器压制皮革,用于出口。英商压革厂在1877年一年就压制5万担。

面粉厂:英、荷、德、日商均办有。小麦从本地收购,产品也主要销周边地区。

此外,还有制冰(含冷冻)、汽水、酿酒、冶炼、金属加工、榨油、机修、发电等厂。据资料统计,1863~1911年,列强各国在汉口办厂有76家之多。



打包厂

七 教会兴办医院、学校

兴办医院

1864~1880年,英、美基督教循道会、伦敦会、圣公会在三镇办了5家医院,但都不在今江岸区辖区内。直到1880年,意大利天主教会才在英租界怡和街(今上海路)办了汉口天主堂医院,病床100张,属于武汉最大的教会医院。此即今市中心医院的前身。

梅神父医院位于江岸区江汉北路。1923年9月4日,意大利籍神父梅占春在湖北应城被人打死。意大利对中国政府施压索赔,湖北省长萧耀南同意赔款6万元并道歉,教友刘歆生捐赠地皮3万余方,再由官商与教会分途募捐,修建医院一所,命名“汉口天主堂梅神父纪念医院”,1924年1月1日立碑。门外马路也命名“梅神父路”(今江汉北路)。

该院设病床120张,也有教堂、神像宗教设施。



1895年汉口天主堂医院

1950年9月,位于江岸区瑞祥路特1号的武汉市传染病医院与梅神父医院正式合并。沿用传染病医院名称。1953

年10月，完成接收梅神父医院手续。

外国人在今江岸区办的医院，还有1902年日本同仁会在今一元路办的汉口同仁医院，其规模在当时与汉



1895 汉口天主堂医院内景

口天主堂医院不相上下。但同仁会不属教会性质。还有1912年建立的“万国医院”，今市中医院的所在地。

兴办学校

19世纪60年代，西方基督教传教人员为扩大教会影响，在教堂或其附近开办“义学”。1869年，三镇共有学生208名，其中女生10名。

1872年，汉口有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开办的男生寄宿学堂，



1926年建成的梅神父医院全景



1935年开办的私立汉口上智中学教学大楼前景

光复武汉，外籍校长、教师撤走，学校停办。1931年，中华基督教会华中区接收该校，迁胜利街，改名懿训女子初级中学，由中国人任校长。1933年改为完中，改名私立汉口懿训女子中学。1938~1945年西迁四川江津东门外，重庆南岸等地。1945年迁回武汉，原校舍在抗战期间炸毁，暂借格非堂（荣光堂）上课。1948年2月校舍修复，师生回原校上课。初、高中共10个班，学生384人，教师24人。1956年改女校为男女合校，命名武汉市第二十一中学。

上智中学前身是德国传教士于1908年开设的私

此即后来的圣保罗中学，位于英租界内。

懿训女中是英国基督教伦敦会于1897年创办的，先在县华林，后迁汉阳东门。1926年北伐军



汉口代牧区主教希贤

立德华学堂,位于德国球场(今球场路),市民们常称之为德国学堂。1919年8月湖北省政府接管,改名省立汉口中学。



30年代的汉口私立安多小学

1927年春,改为省立二中第一分部。1935年,汉口天主教堂意籍神父在德华学堂旧址,开办上智中学,隶属德国教会。解放后,1953年由政府接收,改名武汉市第六中学。

圣罗以中学是1912年由美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校址今合作路,校名圣罗以女子中学。现为武汉市第二十中。

教会中学还有美国安息会办的三育中学(1918年)、青年会办的商校(1919年前后)、汉光中学(1931年)。

教会办的小学更多,1930年统计有28所,至解放前夕,还有18所。解放后,这些学校均为市教育局和民政局接收。

八 租界里的消闲娱乐

蜚声三镇的德明饭店

1906年4月1日,卢汉铁路全线建成通车。汉口法租界与铁路距离很近,尤其是大智门车站直线距离仅48米。

法国商人圣保罗,预见铁路建成后的商机,投资建一座饭店,位于法租界的德托美领事街(今胜利街)与福熙将军街(今

蔡锷路)。由法籍犹太人史德生设计,三层砖木结构,法兰西风格。工期拖得很长,直到1919年才开业。法商老板用法语Terminus命名,意译是终点,音译即德明。

在旧社会,德明饭店属于豪华旅馆。国民党政府要员如蒋介石、程潜、白崇禧、唐生智等都曾来此下榻。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也曾于1938年1月在这里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八路军打游击战情况。抗战胜利后,中共和谈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李先念、王震等曾人多次入住德明饭店。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部驻此。1954年,改名江汉饭店,成为省市接待外宾的主要场所。曾接待胡志明、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尼赫鲁、吴努、哈马舍尔德、苏加诺、伏罗希罗夫、西哈努克、范文同、奈温、艾地、苏发努冯等。

1956年6月和1958年11月,毛泽东主席两次在这里参加舞会。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宋庆龄、刘伯承、陈毅、叶剑英、郭沫若、贺龙、彭真、徐特立、阿沛·阿旺晋美等均在此住过。另外,法捷耶夫、乌兰诺娃、加加林、陈嘉庚、梅兰



德明饭店外貌

芳、程砚秋、吴运铎、华罗庚、韩素音、徐悲鸿、齐白石、黄胄也曾住此。许多人还留下了墨宝。

改革开放后，江汉饭店首批被批准为三星级饭店。1992年，江汉饭店与香港胡汉辉集团合资，组建“饭店管理公司”。

服务洋人的西餐馆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口租界里住有大量的外国人，以1911年为例，就有2862人。

欧美人习惯吃西餐，所以在租界内及租界附近应运而生了不少西餐馆（或称番菜馆、西菜馆）。有外国人开的，也有中国人开的。

最著名的有太平洋饭店，位于今中山大道皇宫照相馆下旧浙江实业银行大楼最高层，有电梯上下，面积很大。其次德明饭店（今江汉饭店）、天星饭店（今江岸文化馆）、汉口饭店（今沿江大道127号）也都供应西餐。德明还做西点。

再还有中国街（今鄱阳街）的美琪、美宜琦、美的和一家白俄经营的邦可，都是西餐馆，虽然不很大，但都各具特色。

大西餐馆的主菜是“热四道”、“冷四道”、猪排、牛排、面包奶油、果酱、童子鸡、咖啡、牛奶，汤多是“罗宋汤”、鸡汤。主食则有西点、炒饭、皮萨饼等。如寿里口的冠生园卖西餐西点，还卖武汉人喜欢喝的瓦罐鸡汤。有几位西餐厨师合伙开了间西餐摊子，名字就叫“靠墙泰”。顾名思义，可见其小。该摊子的主要食品就是“烙饭”，味道不错，且吃一份就饱了。地点先在珞珈山街，以后又搬到中原电影院对门。

抗战胜利，租界收回，在汉口的外国人减少，西餐馆只得改营中餐，或是关门大吉。

洋人娱乐休闲的波罗馆

租界中的外国人为了娱乐休闲，都建有波罗馆（日租界称



1931年的英国波罗馆

俱乐部),属“夜总会”性质。

馆内设有酒吧间、大餐厅、弹子(枱球)房、保龄球、打牌室、图书阅览室、浴池、理发室等。日本俱乐部还设有击剑、弓箭道场、棋艺室等。

各馆只对洋人开放,或在此娱乐休闲,或全家周末欢聚。也是洽谈商务、互通政治、军事情报的场所。

英租界波罗馆在今鄱阳街、南京路口西南角市中心医院职工宿舍内。

德租界波罗馆:今洞庭小路5~7号。

俄租界波罗馆:鄱阳街小学北侧。

法租界波罗馆:胜利街车站路口扶轮大厦处。

日租界俱乐部:胜利街山海关路口东北角。

租界的“四多”

自从1861年汉口划了租界后,租界里住进了许多外国人,最多的时候有三四千人。

外国人吃的是西餐，穿的是西装、皮鞋，留的发型也与中国人不同，总之是别具一格。因此，在租界里逐渐兴起了为洋人生活服务的各种第三产业。铺面有大有小，老板或洋或中，生意有零售兼批发，也有自产自销、前店后坊的工厂。行业包括西餐、酒吧、咖啡厅、服装(西式)、皮鞋、理发、照相、洗衣(含干洗、熨烫)……

当然，光顾以上商店的除了外国人外，更多的还是中国人。在清末民初有许多生活或工作在租界里的华人，他们或在租界行政管理部门(领事馆、工部局、巡捕房)供职，或在洋人控制的洋行、工厂、公司、银行、海关、邮局、教会里做事，经常接触洋人，多半会些外语，其衣食住行生活方式也逐渐“西化”。包括西餐馆里的服务员、常为洋人理发的理发师、裁衣的裁缝。还有些年轻人，既不与洋人打交道，也不懂外语，而且又不是在租界里住，但他们喜欢到租界里来理发、订做西服、吃西餐，“韵味”一下“洋味”。照相也要到租界里的照相馆来照。

这就难怪租界比华界繁荣。市民们总迷信租界里的西服等商品要比华界正宗些。这也是租界“四多”(理发店多、西服店多、皮鞋店多、照相馆多)形成的根本原因。

最著名的理发厅有上海理发厅、万国理发厅、紫罗兰理发厅等，它们大部分是扬州人创办的。当时租界的时装店也是全市最多的，著名的有白海记、首家、怡和、劲夫、祥康等。汉口的皮鞋店也多集中在租界内，从中山大道一元路到三阳路一带就有多个皮鞋店，大的就有茂记等。启新、铁鸟、时记等照相馆也名扬三镇。

西商跑马场

西商跑马场，全称为汉口西商赛马体育会，地点在现在的解放公园及其周围地带。

汉口之有跑马场，是在1861年汉口开辟租界之后，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属“舶来品”。外国侵略者以租界为依托，大



汉口西商跑马场一角

肆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在租界上建起高楼大厦,兴办花园、舞厅、波罗馆(即俱乐部),吃喝玩乐,仍然感到精神空虚,于是又搞了跑马、打球。首先是英国人,在英租界的外滩荒地,即现在的兰陵路与黄陂路之间一带,不经中国官厅许可,擅自开辟马道子(即跑马场)和球场。至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这块马道子和球场划进了俄租界范围,他们又在现在的复兴路、昌年里一带新辟马道子和球场。这是帝国主义在汉口建立的最早的跑马场和球场。1902年,这里被划进法租界。英国人又经过策划,以贱价从洋行买办、“地皮大王”刘歆生手里购得汉口西北部的水荒地800亩,于1905年正式开辟为西商跑马场。

西商跑马场分内场和外



赛马盛事

场。内场设有酒吧间、舞厅；外场有两个中心，一为马道，一为高尔夫球场。马道有两圈，外圈周长1英里，宽30米。这是赛马时的跑马道，沿途竖有里程碑。赛马终点有公证亭，亭旁建小型看台，专供外国人使用，而偏僻的大看台，才是中国人看赛马的地方。内圈在马道内，是马球和橄榄球场。

九 “天堂”之门——万国公墓

继1861年英帝国主义来汉口开辟租界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德帝国主义也接踵而至。它看到好的地段已被英、法、俄等帝国主义国家捷足先登，不得已只好在城外选择地皮。自旧城通济门外沿江官地起，划出长300丈、进深120丈共600亩土地，即今一元路到六合路下、江边至中山大道的长方形地片，包括沙包在内，辟为德国租界。

1899年，德国派驻汉口兼宜昌的第一任领事禄里章到任，开始着手租界建设，领事馆规划在江边南端（今市政府）相交处的西北角（今市保安集团公司）。从此，德国商人、官员、军人、水手、传教士及大批家属接踵而至。自然就少不了有生老病死之事。德国人信基督教，死后有一套宗教仪式，棺葬后都要筑墓立碑，竖十字架。工部局对面原中国人的坟地（解放后曾改作儿童公园，今划入市政府大院）又被他们看中，所在坟堆尽被铲除，把中国死者骸骨埋往他处，辟为德国人的陵园。砌围墙，种树木。教会还雇专人看守，平日园门紧锁。汉口老百姓称之为“德国坟山”。1917年2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向德国宣战。3月18日，我国将租界收回，后改为汉口第一特别区。陵园几经周折，又成美国基督教路德会的墓地。美、英、法等国教会神职人员死后，也长眠此园，因此又有“万国公墓”和“国际公墓”之称。

解放后，此地改为儿童公园，给了孩子们许多欢乐。2000年后，因城建规划另作他用。

十 租界的收回

汉口五国租界收回之时间、方式及原因，均有所不同。

最早收回的是德租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主战场在欧洲大陆。德、奥、意等组成的“同盟国”，与英、法、俄组成的“协约国”开战。意大利随即倒戈，美、日乃至中国等国也参加“协约国”阵营，参战国达33个。

同盟国渐感不支，各自投降。中国当时的北洋政府也壮着胆子，于1917年3月14日宣布与德绝交。湖北督军王占元紧跟，于3月15日奉令接管汉口德租界。设“特别区临时管理局”，派汉口警察厅厅长周际芸兼局长。8月4日，北洋政府再向德、奥宣战，管理局前的“临时”二字去掉。1926年9月又改为“特一区”。

1919年6月28日，德国以战败国身份，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条约中“承允取消得自中国政府现有的汉口及天津租界……”追认既成事实。

第二个收回的是俄租界。俄国十月革命后，1919年7月25日，苏联外委会向中国南、北政府宣布“废除沙俄政府强加

给中国的各项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特权”。1920年9月27日，重申“放弃侵占所得的中国领土及中国境内之俄国租界”。

1924年5月31日，中国政府代表顾维钧与苏联代表喀拉罕在北京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中



1927年1月5日武汉群众捣毁英租界

第十条是“放弃前俄政府在中国境内……所得一切租界”。

因租界内俄商(俗称“白俄”)的阻挠,及英、法的垂涎(英、法租界在俄租界两侧),湖北军政兼民政长官萧耀南迟迟不接管。1924年7月1日,才在俄租界工部局门口挂一“收回俄租界临时管理处”铜牌,升五色旗一面。实际上并未接管,其原有董事会仍照常工作。

迟至1925年3月1日,萧耀南才下决心宣布“收回俄租界”。3月2日,沈子良交涉员以特别区督办名义,接管了俄租界改为“第二特别区”。并在第一天将原来俄式路名改为中式路名。

第三个收回的租界是英租界。1926年10月,北伐胜利。国民政府随即决定迁来武汉,大革命高潮到来,工人、学生经常集会、游行。1927年1月3日,租界英军重伤我集会群众1人,伤多人。外交部长陈友仁向英领事馆提出抗议,但群情愤怒,冲入租界。至5日,已基本控制租界,并成立“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维持秩序。11日,英驻华使馆参赞欧马利抵汉,经与陈友仁谈判,英方只得同意放弃租界,双方签订了《关于汉口英租界协定》,规定英租界工部局于11日解散。3月15日,国民政府正式接管。改名“第三特别区”,设市政局管理。

第四个收回的租界为日租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处于战争状态。日租界立即开始撤侨,至8月11日下旗,最后一批离武汉回国。汉口市政府于8月13日正式接管并于1938年8月13日改第四特别区。10月25日日本占领武汉,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日租界才正式收回。

第五个收回的租界是法租界。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946年2月28日,法国驻华大使与外交部长王世杰签订《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公约》,法国“放弃其对于上海、天津、汉口及广州租界的权力,同意将上述租界完全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权力之下”。

从1861年3月21日英租界开埠,到1946年2月28日法租界收回,汉口租界一共在汉口今江岸区存在了85年。

第四章 崛起与沉沦

列强在租界内肆意欺凌，任意宰割，江岸既遭羞辱又遭掠夺。

随着五国租界的建立，昔日荒芜旷野的滨江之区，逐步形成一条带状的现代市区。卢汉铁路的开通，大智门火车站建立，铁路边华界与租界之间，很快得发展，形成一个新兴商业区。民族工业在军商竞争的夹缝中兴起，电力、邮政近代公共事业陆续起步，铺设马路，营造高楼，市政建设和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列强的掠夺、欺辱和一个新的城区发展轨迹交织在一起。

一 租界人力车夫惨案

旧社会，武汉的人力车很多，尤其是汉口。汉口又以租界车最多。

人力车夫生活最底层，受尽剥削压迫，而他们在租界里拉车谋生，更易受到洋人、巡捕、水兵、醉汉等的伤害，甚至殴打致死。以下就是比较大的几次惨案。



旧汉口的人力车夫

吴一狗案

1911年1月21日。黄昏时分,人力车夫吴一狗(应城人,住后湖)在英租界拉着空车揽客,遇到外号“黄胡子”的英国巡捕头。黄胡子用警棍敲了吴的车,吴以为他要坐车,便停下来。无意中车轮碰到了黄胡子的腿,黄大怒,一警棍将吴击倒,又猛踢几脚,吴当即死亡。在场有4个路人看见暴行全过程,巡捕恐泄露真相,把他们4人也抓走,关进巡捕房。

经过巡捕房医生“验尸”,竟宣布吴一狗系“气厥”致死。将尸体送出租界外的华界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嘱华警通告其亲属认领。吴的家属及亲友同乡闻讯赶来,发现吴身上伤痕多处,知是遭殴打致死,当即将吴尸抬至英租界巡捕房论理。

夏口厅应英租界之请,派巡防营兵丁前来弹压,一面带件作赶来验尸,也骗家属说“毫无伤痕,委系病死”。赏薄棺一具,草草装殓封棺,抬出租界,企图平息事端。

次日,后湖一带人力车夫及填湖民工纷纷前来英租界,包围巡捕房,强烈抗议,并要求惩办凶手。英领事调海军陆战队上岸,开枪射手无寸铁的中国群众,击毙14人,伤10余人。群众返奔,遇夏口厅官兵丁,愤怒群众扔石块击伤夏口厅丞王

国铎及江汉关道齐耀珊等。湖广总督瑞澂见事情闹大，派提督张彪率大兵过江戒严，示威群众才逐渐散去。后清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英方抚恤死伤的20多人，英领事借口乱民捣毁租界设施，反向夏口厅索赔。

龚银保案

1913年6月17日，人力车夫龚银保在大智门附近的法租界厕所外面随地小便，被法国巡捕房的安南（今越南）巡捕逮住，用警棒劈头盖脸打来，打得龚鲜血直流，昏迷倒地。该巡捕再用脚踢，将龚活活踢死。巡捕正拟将尸体拖出租界时，被旁观的众多车夫上前扭住，并将龚尸体一起拉往巡捕房（今岳飞街）评理。围观路人越聚越多。法领事闻讯急调法国水兵荷枪实弹驱赶群众，双方对峙，火药味甚浓。

汉口镇守使杜锡钧恐酿成事端，急派宪兵前来弹压，一面报告黎元洪派员与法人交涉。汉口商会也照会法领事要求惩凶（59号安南巡捕）。6月23日，开庭预审，证人证词接二连三。英、德、日国医生验明确系伤毙，而法、俄医生则咬定是病死。结果法领事允给安葬费若干，但惩凶一事则没有了下文。

徐典案

1925年2月17日，人力车夫徐典在英租界拉车，忽遇一辆汽车迎面开来。徐躲闪不及，误撞了一英国巡捕。当即拘入巡捕房，不容徐辩白，一阵拳脚，将徐打死。巡捕房将尸体偷偷装棺封钉，企图掩盖罪证。

人力车工会得讯后，立即向英租界交涉抗议，发表宣言，向各方呼吁。各界团体及报纸先后响应，纷纷抗议英国侵略者暴行，还有人强烈要求政府收回英租界。

8月3日，英租界全体人力车夫开始罢工，提出5项条件。汉口警察署长出面调停，工会也不答应。英租界见工会声势

浩大，乃被迫释放被捕者，严令巡捕以后不得殴打车夫，如有再犯者，交中国官厅依刑律惩办，抚恤徐典家属 300 元。3 月 5 日，人力车夫复工。

“四三”惨案

1927 年 4 月 3 日下午 4 时，4 名日本水兵乘 4 辆人力车至日租界南小路（今陈怀民路）一日本酒店下车。因付车费与人力车夫发生争执，日本水兵大冈胜芳飞腿猛踢华兴人力车公司 148 号车夫，致使该车夫重伤，街上一人上前救助，竟遭日兵用刺刀捅死。附近民众纷纷赶来制止，酒店内又跑出日本水兵数人挥刀相向。怒不可遏的群众越聚越多，终将日本水兵 6 人和帮凶日侨 4 人簇拥至湖北省总工会拘禁。日本驻汉总领事急调水兵 200 余人上岸，领事馆的卫队也架起机枪扫射示威群众，当场打死 7 人、伤 10 人，这就是“四三”惨案。

在湖北省总工会的领导下，人们在武昌、汉口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开追悼会，向政府情愿，要求收回日租界。但武汉国民政府对日外交问题委员会谈判不力，仅商定非正式解决办法六条：1. 日本撤退租界驻军，撤除各种防御工事；2. 日商复业，发给华工工资；3. 国民政府撤退驻防租界附近军警及纠察队；4. 工人绝对服从政府命令，决不仇视日本人；5. 国民政府负责保护日人生命财产；6. 保留“四三”惨案继续谈判。

直至 1929 年，谈判仍未有实质性突破。

二 洋行老板的大总管——买办

洋老板在中国开洋行、做生意；如果做出口，那就要设行庄收购，甚至跑到产地去采购；如果做进口，那就要设批发、零售门点，送货，还要到县城、乡镇去建经销店，也要有专人收账。以上这些工作，既烦琐，又劳累，不仅要对中国城乡的市场情

况十分熟悉,还要有地方上红、黑两道“开绿灯”。因此,洋老板首先就要在本地物色一个代理人,来帮他统管这些事。这个洋行聘用的大总管,通称“买办”。

买办通常是事业有成的生意人,有一定资产,公关能力强;多少会一些外语,能与洋老板沟通并领会其意图。

买办的报酬不是拿工资,而是根据收购或销售量拿佣金(回扣)。买办是个“肥缺”,因为他可以根据市场变化,上下其手,多方、多层次地吃回扣。另外,在数量、等级、价格、损耗上作弊搞鬼。洋老板和地方商人也无可奈何。

不过,买办不是任何人都可做的,资产、能力、经验、外语等条件都要求很高。买办也不是通过公开招聘而来,一般都是社会名流、“大蔓”推荐,或家族内世袭——父传子、兄传弟。

汉口著名买办很多,如俄商洋行的刘辅堂、刘子敬父子,法商洋行的刘歆生,英商和记洋行的杨坤山、黄厚卿,日商日信洋行的赵耀堂、高云卿,德商美最时洋行的王伯年等。这些都是富甲一方的买办阶级中之佼佼者,至于一些担任较小洋行买办或任职时间不长的,则有数百人之多。他们发财后,或投资工商业,或购买田地,但更多的是在城市里添置房产。汉口大部分建于建国前的里份房屋,都是他们的财产。如刘子敬家族建有辅堂里、辅仁里、辅义里、辅德里、方正里等;杨坤山建有坤元里,又与黄厚卿合买了中原里,改名坤厚里。王伯年拥有昌年里等。

买办下面还设有账房、跑街、管仓、过磅、验货等部门,雇有一批工作人员。这些人的工资由买办发给,其人员多少、录用、解雇,均由买办说了算,洋老板是不过问的。

一个洋行要请几个买办呢?通常是只请一个,但有时正、副各一位。也有上面一个大买办,各分部再设小买办的。

另外,外资银行、外资轮船公司一般也聘本地华人任买办。

三 民族工业艰难诞生

燮昌火柴厂

宋炜臣,浙江镇海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在上海协助宁波富商叶澄衷办缫丝、火柴等厂,先后任副经理、经理,获利百万。1896年携资来汉,先在歆生路(今江汉路)开办华胜呢绒军装皮件厂。次年,宋出资14万元、叶澄衷出14万元,余集零星股共42万元,创办汉口燮昌大柴厂。生产雄鸡、双狮牌火柴。第一年即获利银18万两。工厂设在燮昌小路(今郝梦龄路),从后湖购土方填低洼建厂(取土处现称燮昌函子),购排梗机38部,雇工千人,多是童工。

在燮昌厂开办之前,武汉及附近城乡出售的火柴,全部是进口的。主要是日本产的,其次是欧洲产的。但自燮昌投产后,因价廉物美,将“洋火”挤出市场。使日本商人哀叹:“本邦火柴,市场敛其影,全然被驱逐也。”“燮昌火柴独占市场”“为我火柴之敌手,独有燮昌品而已”。1896年,日本输入汉口之火柴有566875罗。逐年减量,至1902年仅输入汉口22660罗(每罗12打)。

燮昌火柴的黄金时代是在1920年以前。除质优价廉外,因国内外连年战争,水运多阻,进口减少所以燮昌占领了湖北城乡市场,乃至远销河南、陕西、甘肃等省。

燮昌火柴厂还是武汉首家民族资本家办的工厂。在它之后开办的火柴厂还有燧华、楚胜、三井、燧华(新记)、汉口、武汉等,但都业绩不佳,在解放前均关门。

解放后,燮昌厂先是公私合营,改名武汉火柴厂。1958年6月,武汉与燧华(新记)合并,厂名国营武汉火柴厂,厂址在硚口仁寿路燧华(新记)旧址,属一轻局。

1992年,工厂亏损,1993年元月停产。

1993年由三江航天集团收购,全厂1200职工,50%办理退休,50%“买断”。

扬子机器厂

江岸区民族工业发展较早,较具规模,设备较好,其中用工超过千人的厂,除燮昌火柴厂外,还有扬子机器厂。这两家工厂均建在今江岸区辖区内,一在今卢沟桥路、一在今谏家矶。

扬子机器厂于1907年建立,系由侨商顾润章出资,王光、宋炜臣参股,共集资49万元,在汉口谏家矶建厂。开办初,由于设备和技术的不足,只能制造和修配一般机器零件。后几经扩充,引进煤气引擎作动力,生产经营范围向多样化发展。1909年,该厂已有工人1000多人,被誉为“全省最大的机器制造厂家”、“全国第二大机械厂”。

至1920年,工厂资本已增至150万两,可生产铁路车辆、桥梁等部件,还有叉轨、煤气机、化铁炉等,连外商也来订货。该厂还在长江岸边建有专用码头一座。

毕竟好景不常,旧社会民族资产阶级本身力量薄弱,资金短绌,市场狭窄,而技术、设备又无法与进口机器产品竞争,加上连年战争,苛捐杂税,通货膨胀,民族工业生存条件恶劣可想而知,终在30年代关门倒闭。

茂记皮鞋厂

辛亥革命前,浙江镇海有位皮匠师傅名叫李厚谟,因受当时汉口华胜皮件公司老板宋炜臣(又是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和燮昌火柴厂的股东、经理)之聘请,来汉口担任皮件公司的掌作师傅。辛亥革命后,李在法租界亚尔萨罗南尼省街(今中山大道车站路口)的恒生里街面,自营皮件作坊,取名“茂记皮革制品商店”,资金仅百余元。

李雇师傅及学徒四五人,前店后厂,劳资双方一齐干。主

要根据顾客需要、做一些马车上用的皮件、套具如缰绳、马鞭、皮带之类小皮件，后逐渐发展到生产马鞍、皮包、皮箱等大型皮件和马车坐垫、车篷等。当时马车是中外官商自备的交通工具，马



茂记皮鞋厂经营部

车在大街上行走，不能不讲些气派。李老板生产皮件，供应民用军需，生意越来越好。

1921年始，汉口三家跑马场（西商、万国和华商）都来订购皮靴、皮鞋，供跑马骑师穿用，业务更加繁忙。因此，规模不断扩大，人员增至40人，以生产皮鞋、皮鞭为主，名气越来越大。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茂记位在法租界内，仅能勉强支撑。李厚谟于1943年病逝，由其长子李庆华接班。

抗战胜利后，武汉人口激增，各业兴旺。穿皮鞋成为时尚，皮鞋供不应求。李庆华乘机而上，扩大茂记的门面厂房。他经营有方，又谙外语，常周旋于上层人物、洋人、领事馆、外商轮船、大公馆，为富贵人家划样生产，送鞋上门。因为产品选料上乘，制作精良，服务周到，颇受中外人士青睐，销量倍增。原英国驻汉领事格林威调往印度加尔各答后，还多次来信邮购茂记皮鞋。

解放初期，苏联专家和过往外宾亦多光顾茂记，故被指定为“国际友人及驻汉外交使团皮鞋供应专点”，茂记皮鞋（特别是小方头）名扬中外。

1956年，茂记公私合营，不久成为国营工厂。1980年迁址新华路取水楼，新建5层厂房，职工达500人以上。创男式线缝皮鞋“双五”名牌，获国家银质奖章，在汉口同行业中一枝独秀。

宝华洗染厂的兴盛

宝华洗染厂创办人贺宝庆，浙江镇海人，念过私塾、初中，长大后到外国上当勤杂工，随船到过东南亚各地，懂得一些英语和洗染技术。

1911年，25岁的他来武汉闯荡，在汉口法租界庆平里口（今车站路40号），用芦苇搭起了个简易棚子，用2米长的白布写上“宝华西法洗染公司”作招牌，开始营业。店里请了4位工人，按其规模设备，只能算是间小作坊，面积只18平方米。

因为加工精细，服务热情，赢得外国人和租界里住的有钱的中国人家的光顾，不几年便发财致富，从一个门面发展到三处门面。

1921年，他将三处合在一处，扩建装修，改名宝华机器洗染厂，专接丝绸、毛呢、高档原料制成的中西服装的洗、染、烫、缝纫、织补业务。添置了手摇甩干机、礼帽压平机等，故在同行业中独占鳌头。随后，又逐步把业务扩大，在三镇多处设门市部。中山大道现1149号为一门市部，南京路为二门市部，汉润里为三门市部，江汉路为四门市部，武昌司门口为五门市部，花楼街为新宝华，汉阳为新大陆。分别由其兄弟及亲友操持，企图垄断武汉洗染市场，成为贺家的天下。加之贺宝庆与军政界关系密切，和湖北省主席万耀煌、汉口市警察局长任建鹏、白崇禧手下副官、警察局巡警长胡适廷都有来往，因此宝华在同行业中咄咄逼人。

但市场的竞争仍是激烈的，因为开业的洗染店始终有增无减。只是到了1931年，汉口水灾，一些中小洗染店被淹生

意萧条而歇业。而宝华却登报催顾客前来取衣，并承诺在水灾中损坏的衣物，一律按成色、时价赔偿，获得顾客信任和社会好评。据说，这次共赔款2万银元。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大多数洗染店关门，少数迁硃口，在难民区开染坊。宝华也只剩下法租界车站路老店一个门面挣扎度日。

1945年抗战胜利后，各洗染店又纷纷复业，宝华在芦席街扩建新厂房，恢复花楼街的新宝华分店，招聘工人、职员100余人，收徒工30余人，雄踞江城洗染业榜首。又故伎重演，在报上登招领启事，实则是打广告。表现店大，分点多，讲诚信，气派不凡。

宝华总店的业务有西服来料加工、小百货、发货部和收货部。收货部收进洗、染、烫、织补的衣物，包括皮毛服、绸缎干洗除渍、台湾蓆子的精工缝补。特别是烫衣技术讲究，名闻遐迩。

为了招揽业务，配有外交经理，会讲英语、俄语，专揽洋人的大宗生意。也到电影院打电影广告，还在黄兴路、江汉路建警察岗亭，在亭子外面用油漆涂广告。逢年过节时，还赠送一张洗衣票给老顾客，以示优惠。

然因老板与同族子孙、同乡亲友间的矛盾，对职工的刻薄剥削，加上老板和主要股东染上毒瘾，至解放前夕已呈险象。职工们被迫接管店务，按营业额提取工资，勉强支撑。

解放后，经调整改造，原有8个厂店业务上升，又新增青山点。

国营宝华和集体新光两家洗染厂，都扩建了厂房、添置了锅炉、电动甩干机、摇锅、烘干机、光烧毛机、平光机，还从国外购回4台大洗衣机，实现了生产机械化，大大增强了加工能力。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培养出了一批批高级技师。

解放50多年，一直为三镇市民服务，还曾为毛主席、周总理及中央省市领导同志干洗礼服。

四 城市的巨大变迁

租界矗立的西方建筑

汉口自 1861 年开埠后,英、德、俄、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在今江岸区沿江地段设立租界,建了许多楼房。这些建筑既是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又是输入的西方文化,也融合了武汉工匠的技能和智慧。有些楼房的建筑与艺术质量较高。现将有代表性有特色的建筑介绍如下:

圣约瑟天主堂。位于上海路鄱阳街口,清同治五年(1866 年),意大利籍主教明仁笃购汉口英租界土地 6 044 平方米,1875 年修建教堂,1876 年建成,耗资 12 万法郎,命名圣若瑟堂。教堂为罗马式,平面呈十字形,长 40 米,宽 26 米,中间正殿宽 14 米,正面地坪至堂顶十字架处高 22 米,正殿后侧左右各有圆形塔式钟楼一座。1899 年,增修左右侧殿,内设祭台 5 座。建筑面积 1 024 平方米,可容 2 000 人。教堂以古罗马的耶稣会教堂为蓝本,采用拉丁十字马西利卡式,也是巴洛克风

格的建筑,雄健肃穆。

俄国东正教堂。在今天津路鄱阳街口,光绪十一年(1885 年)建成。为六角形单层建筑,中轴线前



俄国东正教堂旧址

后有门,运用拜占庭的穹顶和拱券技术。上下周围用大小拱券支撑,窗口上端均砌成尖拱,重点突出礼拜堂主体建筑。体形虽小,但造型活泼。顶部立有大十字架,外墙面



英国汇丰银行旧址

装饰雕刻图案比较丰富,属于俄罗斯化的巴洛克风格。

英国汇丰银行。位于沿江大道青岛路口,占地3591平方米,由上海派纳洋行总工程师派纳设计,汉协盛营造厂施工。1922年开工,1924年竣工,造价150万银元。整体为花岗岩大

楼,风格为希腊古典的爱奥尼柱式,比例协调,秀丽端庄。

美国领事馆。位于沿江大道车站路口,建于1905年。巴洛克建筑风格,突破



美国领事馆旧址



景明大楼

了文艺复兴和古典手法常规,形像较为张扬,装饰比较繁冗。曲线的墙面,流畅的线条,使建筑显现出运动感。三层重复使用的砖拱窗,产生韵律的美感。整栋建筑采用红砖清水墙勾缝,砖拱、门窗、窗台及腰线均以麻石镶成,极有特色。

景明大楼。鄱阳街青岛路口,建于1920年,是一座六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占地为一块三角形,布局灵巧,内部平面布置紧凑合理。在立面设计上采取结合结构支配建筑外观的手法,全部运用柱、梁和大玻璃作立面,并采取形状

多变、长短不一的阳台和挑出的檐口、悬吊的雨篷等,丰富了立面造型,加强了立面的艺术效果。

临江饭店(又名亚细亚火油公司大楼)。1924年兴建,位于沿江大道天津路口,系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大楼在质量和造型上堪称



临江饭店(1931年)

上乘,立面水平划分,运用分段,既有变化又有统一,檐口线脚和墙面转角部分的隅石造型别具一格。

建房热中的模范区

1912~1920年,汉口出现了建房热。一般中小业主在自己原先的房基上重振店业、家业,规模不大,而在接壤租界的空地和废墟上,则成为富商巨贾、军阀官僚的抢手地盘。

1914~1918年,沪商蒋广昌和胡庆余堂,在今江汉路南京路之间合资修建义成总里,官僚袁海观修建了保和里、保安里、保成里。

1918年以前,大智路到车站路之间的友益街还是水塘。著名的叶开泰药店于1918年填平水塘,兴建三层大楼(今武汉市文化局)。小军阀寇英杰和程汉卿(吴佩孚的军法处长)也各盖一座大楼于附近(后为江岸区公费医疗门诊部等)。王占元督鄂时任过省长的何佩瑢修建了尚德里。

当时,在这一空前的建房热中,要以私营、民建的模范区建设最为引人注目。有一位对黎元洪自称“都督创建了民国,我创建了汉口”的地皮大王刘歆生(1857~1943年),预测汉口市场将进一步发展,地皮日后必将看涨,他决心从事地皮经营。张公堤建成前后,城墙内外有很多低洼之地,后湖地带湖塘更多,夏汛来临,尽成水乡泽国,地主和农民纷纷低价出卖土地。刘向银行、钱庄借钱,大肆收购土地。据说,刘歆生以“划船计价”,先在四界插旗为标,然后乘船沿线按划桨次数为计量单



租界建房热

位,以每桨一串或 300 铜元的低价,一片一片地购进。刘所购汉口土地,上起舵落口,下至丹水池,西抵张公堤,南至铁路边,地域广大,约占当时汉口市区郊区 1/4。每购一块土地,就挂上“立兴”界牌,表明在法国“立兴洋行”挂了旗,受到租界保护。他还建立填土公司(1901 年),并创办铁工厂,为填土公司专门安装自用的轻便铁轨和运土机车、轮车。又购来推土机、法国小火车头,还雇用大量劳工,从姑嫂树一带长年累月运土,填平了今江汉路到华清街等处地面。

刘歆生为了牟取利润,承包了租界内填地、修路、建房等土木工程。英租界当局为了繁荣租界市场,便利交通,计划从长江边一码头起,经太平街(武汉关至鄱阳街口),再由后花楼街口起,向西延伸,修一条直街,以接通湖南街(胜利街)、湖北街(今中山大道江汉路口下)。但这一带土地已为刘歆生所购得。英工部局总办米勒认为这块土地影响租界治安,要求借、租或购买此地,拟用租界内的垃圾煤渣将这儿填平,并纳入英租界范围。刘歆生盘算后同意了,因为这里由英方筑建马路后,除路基之外,其余土地纳入英租界范围,仍为刘歆生所有,而路修成,必然使地价提高,可从中牟利。这一来,英租界扩大了 1/3,刘歆生此举受到英方赏识。英租界当局呈准英国女



1929 年的歆生路加铺柏油路面后的状况

王,将这条街命名为歆生路(江汉路一段)。但与此同时,刘歆生“让基筑路”的行为却遭到了社会的非议。

不久,他又萌发在华界修马路、建房屋的想法,随即将歆生路向西延伸,穿过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直达铁路边(即今江汉北路),统称为歆生路。后来又与这条路向南垂直,修建了歆生一、二、三路(江汉一、二、三路)。

刘歆生还提供地皮约800亩(今解放公园处),帮助外商办起了西商赛马体育场。又将一块地皮卖给西商,建成了西商网球场,所在地即今球场街。

刘邀约实业银行行长梁俊华、粤商韦紫峰和巨富刘子敬等人于1909年集资,兴建起华商跑马场(在今同济医科大学、万松园路一带),占地3.3万多平方。每年春秋两季举行赛马,招徕观众,络绎不绝。但由于各项经营开支过大,流动资金转为不动产,加之地方当局作梗,至1911年刘已积欠达500万两。经湖广总督瑞澂奏准,由湖北当局借洋例银500万两,使刘还清债务。同时,将刘的部分地皮及建筑划归湖北官钱局和其他业主。

辛亥首义中,刘的房地产在汉口大火中进一步受损,但剩余的部分仍大得惊人,又引起“首义新贵”——将军团的垂涎。1914年,湖北当局成立了由义威将军——“首义三武”之一的孙武任督办的清查汉口地亩专局,打击矛头直指刘歆生。刘占有后湖大量土地,但当初收购时没有划出明确地界,地契上只有购得某某名下地皮一块之类的模糊记载。孙武亦为柏泉人,两人从小格格不入。孙武欲将大块土地收归“公有”,刘则在报刊上登启事,声明产权。为了保住地产,刘一方面邀请汉口总商会会长吕伯超从中斡旋,除纳税外,还乐捐50万元;又向将军团中的人物行贿,如将西园(今中山公园)送给财政厅一将军团中要人李华堂,答应以济生一路至五路(今前进一路、民主一街、自治街、友谊路和民意四路)一带之4万余亩地皮低价入股,组成济生公司。该公司股本200万两,由吕伯超出任经理,将军团的李春萱、李华堂等任董事、监事。将军团



1929年歆生路(今江汉路)加铺柏油兴工情形

中的其他成员和地方显要均纷纷认股,每股1万两,但实际只付3000两,而公司的利润则按股分配。这样,后湖清丈风波才告罄,而孙武等“将军团”人物则从中大捞一把。当时,刘的填土工程继续向西推进,从江汉路经交通路、江汉一路、生成里到济生堂(堆放棺材之处),均次第填平。在此之后,他着手模范区的建设。汉口的租界是洋人的天地,中国买办巨富,可以在租界居住,但毕竟要受到种种限制。因此,华商总会的富商、买办决心在华界创建模范区,以“与租界媲美”。之所以称模范区,以取孙中山民初将汉口建为“模范之市”之义。当时选定西起江汉路,北抵铁路,东至大智路,南抵中山大道这一地段(相当今江岸区大智街办事处管辖范围)建立模范区。经过几年建设,在刘歆生提供的土地上,修建了丹凤街、华商街、铭新街、吉庆街、泰宁街、保成路、汇通路、伟雄路(今南京路,伟雄系刘的大儿子)、云樵路(今黄石路)、瑞祥路、交易街等。商贾们纷纷购置路旁土地建房、开店。刘歆生邀约华商总会会长蒋沛霖等人出面,串联武汉“将军团”中的显要和绅商买办参与建房。买办们聚会的华商总会大楼亦在此落成,并将大楼所在之街命名为华商街。这些街道一般为10~12米宽,铺以碎石。因为灰尘多,下水道狭小,到30年代时,才进一步

加以改造,将下水道改成砖砌马蹄型和U型暗沟。模范区的房屋有一定的标准,茅屋、板房一律不得修建,均须建成甲级砖木结构或质量较好的房子。区内房屋比较整齐,里弄住宅成排兴建,入门设有小庭院,内有堂屋和居室。窗户较大,楼上有平台、阳台。临街铺面开阔,为大铺面,开放型。同时,除成排的里弄外,还有一些大楼和别墅。在当时,的确是比较新式的建筑。房屋建成后,一律报当局备案。区内设有警察署,专司治安,这较之汉口传统的汉正街老区及棚户区,确乎有一番新的面貌。

在模范区大兴土木修建的2000多栋房屋中,除刘歆生参与外,还有安利英洋行买办蒋沛霖修建了德润里,猪鬃买办周德安修建丰寿里,桐油买办周绣山修建云绣里,阜昌洋行买办刘子敬修建辅义里。在租界边沿,刘子敬等人还修了辅堂里、辅仁里。和记蛋厂买办杨坤山修了坤元里、坤厚里、宝庆里、宝善里,美最时洋行买办王柏年修了昌年里,永兴洋行买办元坤山修了璐安里、昭凤里,和记洋行买办韩永清修了永贵里。

在这一建房热中,汉口闹市区的地价飞速上浮,数年之间,地皮价格一翻再翻。如1912年建义成总里时,每平方丈地价100两银子,数年后上浮到360两银子。1914年修建五常里时,每平方丈50两,1915年涨至200两,1917年涨至1000两。富商、买办、官僚、军阀、政客在建房中又发了一笔横财。

划时代的照明变革——租界发电厂

“老武汉”多半知道汉口有个“汉镇既济水电公司”,其电厂设在今利济南路河边(旧地名叫大王庙),开始时用3台500千瓦直流发电机,于1906年8月起供电灯2万余盏。以后该厂不断发展,担负汉口的全部供电任务

但在汉口江岸区原租界曾经有过三家电厂,则知者不多了。

第一家是英租界的英国皮货商人于1906年5月集资3万英镑,在界限路8号(今合作路市供电局变压器修造厂)成立

了英商电灯公司。9月开始送电,供电范围为英、俄、法三国租界。开始只有3台直流发电机,总容量仅125千瓦。1924年增加到7台,总容量为2825千瓦。1935年,又更新设备,总容量增至5750千瓦。1921年11月,英商汉口电灯公司与原俄租界工部局签订经营合同。1941年,日本占领军令日本华中水电公司株式会社接管电灯公司。1945年,抗战胜利,由既济水电公司接管,此时发电量仅为4750千瓦。

第二家是德商美最时电灯公司,1907年设立于德租界二码头(今沿江大道二曜路),其老板是美最时洋行主人,设备为857.5千瓦直流发电机,供电范围为德租界。1917年3月15日,中国政府收回德租界,美最时洋行负责人归国,在汉企业由荷兰领事代理。1919年,汉口市政府令汉口警察厅长为德商电灯公司经理,收归湖北省官办。1922年,美最时洋行老板花费重金赎回财产,与汉口特一区市政局签订了15年的责权利合同。1937年,合同期满,决定由既济水电公司出资购买德商电灯公司的输配电线路、电表,而740千瓦的发电机设备则采取租用3年的形式。既济水电公司将二曜路电厂改为第十一区发电



所,安排9名工人轮值发电。1938年武汉沦陷,该厂被日本华中水电株式会社接管。1940年柴油机两台售给日商作他用。因日本

1906年建成的武汉既济水电公司

与德国是同盟国,日商多少给了点钱美最时老板。从此,该厂停止发电。

第三家发电厂是日商大正电气株式会社,由日商大石洋行于1913年开办,地址在日租界上小路(现中山大道郝梦龄路口)。1934年前,该厂有40千瓦柴油发电机2台、60千瓦柴油发电机1台、100千瓦蒸汽发电机1台,总容量240千瓦,均为直流。1930年该厂锅炉爆炸,100千瓦蒸汽发电机停产,日租界曾向既济水电公司购电50千瓦,又增资购设备,至1936年,总容量达到505千瓦。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驻汉日领事机构、工商、居留侨民全部开始撤离回国。撤离前,日海军陆战队在8月7日

敲碎所有路灯,撤走发电机组,租界顿成黑暗世界。8月9日,既济水电公司奉汉口市政府命,供应原日租界用电,并安装了13盏路灯。8月21日,原租界内路灯全部恢复。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



汉口瓦斯灯厂制造的圆形灯



灯头零件造成后,由技术人员装配成形

陷,日本华中水电株式会社接管武汉三镇水电企业,但没有恢复原日商大正电气株式会社的这间发电厂,厂址后被改为酱油厂。

标志性建筑——大智门火车站

1896年4月,清政府批准修筑卢汉铁路。大智门火车站作为南端中心站,属首批开工项目。1903年竣工,立即投入使用,通潏口、信阳、郑州,直到1906年全线开通。

大智门火车站占地仅800平方米,比利时贷款,法国工程师设计,“广帮”的建筑公司施工。房屋坐西朝东,法兰西古堡风格,钢混结构,水磨石地坪。正中为一层凸起,内空10米,两翼内收,二层楼房。总建筑面积1022平方米,楼下售票和候车,楼上办公。

为突出立体效果,四角各建有20米高塔堡,堡顶铁铸流线方锥。屋顶正中高耸,四坡铺红瓦,两边平顶,覆盆式铁瓦屋面。屋面均不出檐,檐周修栏杆式女儿墙,用落水管下水。窗户采用玻璃。底层券拱式,上层长方形。大楼正中主出入



汉口大智门车站

口,由三洞六扇门并列组成。

装饰也较讲究,室内用方形立柱,以爱奥尼式涡工装柱头;室外檐口和窗眉以层层递进的线条装饰。塔堡檐下饰以撑拱,望柱柱头立体几何型,如上圆下方塑件。整栋建筑方中有圆,直中有褶,凹凸与平顺相间,对称中有变化,庄重中显活泼,是一幢颇具欧陆特色的建筑。

1906年开始客货营运后,业务一直繁忙。车站每天开往北京特快列车3趟,直快列车2对,客货混编1对,短途往返列车若干趟。至解放前夕,车站每天始发列车有7对。

解放后,即将循礼门车站并入,更名汉口火车站。随后,又多次整修和扩建,使站房达到4086平方米、2座站台,3个候车室。1991年,每天始发和通过旅客列车33列,发送客人逾万人。

从1906年至1991年的85年间,车站内外及周边街道的景象热闹非凡,日夜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也带动了车站路附近方圆数里的商店、旅店、饭店、小吃店、娱乐业、茶馆、打包托运、小件寄存等百业兴旺,且长盛不衰。

国家“七五”期间重点工程之一的汉口新火车站,于1987年4月1日在汉口北郊的金家墩破土动工,1991年10月1日交付使用。新火车站整体规模仅次于北京(西)、天津、上海和沈阳,为全国第五和华中第一。而汉口老火车站——大智门车站也于1991年10月1日这一天光荣退休。

武汉市人民政府于老站封闭之际,即宣布将其永久保存。1992年12月16日,湖北省人民政府鄂政发[1992]166号文件,公布汉口老火车站为“湖北省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凭君传语——首家“客邮”

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的邮局,清政府称之为“客邮”。早在1834年,英国人在广州首先开办;到1872年后,英、法、德、俄、日等国也相继在汉口设本国邮局。起初只收寄其本国



40年代的武汉电信局总营业大楼

侨民的邮件，后来也兼收寄中国人的邮件，邮资由各国自定，贴各国的邮票。

英国客邮于1872年英租界宝顺街（今天津路2号）设邮政代办所1处，属香港邮局领导。每月收寄信函、包裹、汇兑业

务，折合1500美元。1922年12月30日撤销。

法国驻汉领事馆于1898年在汉口法租界设一等邮局1处，属巴黎邮局领导，收寄邮件按国际邮资标准收费。1901年，寄出信达2万件，投递信达5000件，也有若干汇兑、包裹业务。

德国驻汉领事馆于1900年在德租界皓街（今一元路）2号，设大德书信馆，邮资按马克计算。1900年，共收信8万件，寄发信6.6万件。收邮包350个，发邮包500个。1917年3月中德绝交，4月25日，我交通部决定撤销德国在华邮局、代办所、信箱。

俄国驻汉口领事馆于1900年在汉口俄租界“巴公房子”设邮局，只经营发往俄国的邮政业务。1919年7月，苏联政府宣布放弃沙俄帝国缔结不平等条约而享有的在外国的一切特权。次年，中国政府通知其停办在华邮政机构。直到1921年2月才撤销完毕。

日本是在1897年就委托美国驻汉口代理领事克宁汉为

日本办理在汉邮政。1899年9月,日本在法租界开办邮局。以后还在日租界、俄租界、德租界设分局,在武昌东大街设邮政所,同时还在各租界内设信箱若干。

昔日的代步工具——人力车

众所周知,轿子作为短距离的代步工具,在我国已有上千年历史。当然,达官贵人、新娘、老病者多需要它,一般老百姓很少坐。

轿子在清末开始衰微,到了民国后期的1946年,在武汉已基本绝迹。击败它的不是汽车,竟居然是人力车。而第一辆人力车首先是在今江岸区亮相的。后来,江岸区人力车数量也居三镇总数的一半以下。因此,这人力车的故事,也大多与江岸区有关。

人力车是1870年由日本人礁加夜答首创的,故中国人叫他“东洋车”。

1888年,由汉口俄商新泰茶厂老板进口了一辆,作为他的“专车”,在租界内大出风头,令人瞩目。但当时尚无人看到它的商机。

这玩意构造并不复杂,很快就有许多人仿制,不过是两杆、两轮和一座,并非什么高、精、尖技术。许多人在开始动脑子。

开始是用木轮(直径1



1931年的人力车

米左右)、大木轴(两头方榫),走起来咯吱作响;同时,木轮外包的铁环,走在石板路、砂石路上,与地面磨得火星直冒不说,乘坐的人还会感到剧烈颠簸。人们继续研究改进,改铁环为铁皮槽,槽内嵌硬橡胶带一圈,减震性大大提高。

于是试着投入营运,与轿夫们争生意。到1901年,汉口租界办理正式登记时,已有人力车1000辆。而华界因街窄,路不平,只有少量。

至1907年,木轮被钢圈取代,上钢丝,配充气轮胎,车轴内装滚珠,车座改车厢,加坐垫。这种新车轻便、减震、舒适,在平路上也比轿子跑得快,还可以载货。所以很快就得到市民青睐,把轿子排挤出局。

至1911年,三镇营运的人力车,已达3300辆,其中租界1500辆,汉口华界1000辆,武昌和汉阳800辆。租界车最多的原因不外乎:道路状况较好,商业繁荣,人流量大,有钱人多,妓院、戏院多,还有靠近火车站、码头等。

汉口华界的千辆人力车,主要集中在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这条马路是1907年拆除城墙形成的,为人力车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1915年,后城马路共设停车场16处,由警察厅登记编号,并按月收费。

1920年,人力车已发展到刷黄色亮漆、装防雨防晒油布篷,故又有“黄包车”之称。

据1931年12月16日《申报》报道,当时武汉营运的人力车3096辆,私家包车2016辆。私家包车的主人都是大官、大款。为了争雄斗富,都在包车装饰上下功夫,如钢丝镀锌、钢圈镀铬、装踏铃、车灯(晚间用),冬天还装门帘、毛毯。

1931年,三镇人力车行67家、汽车行54家、自行车行18家,还有马车行若干家。从客运总量计,人力车居首位,其次是公汽,再其次是马车,可见人力车行业之发达。

又据1938年的统计数字,三镇人力车行215家,车辆1万,拉车工人3万。其中,汉口8588辆。

解放前的1946年,汉口人力车工人与马车工人为争线路

抢生意发生了争执。人力车行业人多势众，采取了阻拦进入揽客和扣车等手段，逼得马车不再走中山大道，而原设在前进一路的马车站也改到前进二路了。

这一年3月，汉口街上出现了20辆三轮车。这一下，唱响了人力车的丧歌，就像当年人力车取代轿子一样。湖北省政府于5月1日宣布：三年内废除人力车。但至解放前夕，仍剩6000辆。

人力车在武汉全部绝迹，是在解放后的1956年。

富豪权势的大观园

歆生花园 又名刘祥花园、刘园。是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所建私人花园。

该园坐落在今江汉路北端，靠近循礼门，在老京汉铁路之外。现武汉船舶公司是其主体部分，但它越过了解放大道，包括今省纺织品大楼、红艳村全部，约占地25亩。

它利用地形，靠铁路这边垒山，在解放大道那边挖湖，形成有山有水的园林格局。围墙或堞或窗，园中广种杨柳，池中



1931年杨森花园

遍植荷花。有翠寒亭、清妍亭、浮碧轩等景点，通过板桥、月门、花屏，环山绕湖前行。沿途设有书画古董，雅致宜人。且有笼鸟，也可下棋小憩。

老百姓说，在中山公园未建成前，刘园是武汉最佳的现代林园，堪称三镇一绝，但入园要购门票。

1911年阳夏战争时，此处一度成为民军汉口临时指挥部。战争中损坏近半。

1917年，国民党在此设军法处，内关押犯罪军人，不再对外开放，门口有军人站岗。

1918年，被征作军用，内曾为一路军司令部。

1926年北伐胜利后，刘佐龙的二十九军军部曾设此。

1929年，夏斗寅任警备司令，叶蓬为参谋长，将刘园改建，新建有大门、办公楼。1935年，曾于此办防空展览，宣传抗战，影响很大。但因有类似日本国旗、日本人形象的靶子，引起日领事抗议。

1938年沦陷后，叶蓬为伪警备司令，伪警备司令部仍设此。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法处又占用。

1949年武汉解放后，该处拨给中国船舶机械公司使用。

杨森花园 杨森(1884~1977)，四川广安人，是臭名昭著的反共军阀，国民党陆军上将。1927年5月，在蒋介石策动下，与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发动反革命叛乱，妄图颠覆新成立的武汉国民政府，未能得逞。1939年6月，驻守在湖南平江一带的杨森二十七集团军，又制造“平江惨案”，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

杨森政治上极端反动，生活上荒淫无度，妻妾成群。据说他的妻妾有12人，子女有40人，还不包括私生子女。

杨森每到一处，便大造公馆别墅花园洋楼，为自己提供享乐的基地。如在老家广安筑有“涵虚山庄”，在重庆建有“渝舍”，在泸州造“泸庐”。在汉口，他于1928年购今惠济路地皮一块，修建了一栋三层楼公馆，并建有一个杨森花园。中有树木花草，还有一个120平方米的游泳池，花园共占地56200平

方米。

杨森花园在1931年被水淹过。1938年,郭沫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厅长时,其下属的电影制片厂曾在此住了几百人。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日军曾住此。另外,国民党的政要如蒋介石、白崇禧等,也都曾在此住过。抗战胜利后,杨森本人也来住过。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杨森公馆及花园由中南军政委员会接管,作办公用。1954年中南局迁广州,又移交中共武汉市委。1955年,作为市委部长的住房。1966年度,市委组织部在此办理组织关系。1974年,改为市委老干部管理处和人民来访接待室。

后来,杨森花园地基盖了宿舍。

五 华商总会大楼的春秋

江岸区汇通路口,江汉二路157号,有一幢20世纪20年



华商总会大楼

代的4层大楼。虽然在现今高楼林立的武汉，它不算起眼，但它古老的风格，也多少给路人一种庄严神秘的感觉。

原来它是1922年由汉口华商总会出资兴建的大楼，占地650平方米，由当时施工力量最强的汉协盛营造厂包工完成。最先只有3层，大楼的功能主要是娱乐休闲，供会员请客吃饭、品茶喝酒、下棋赌博，设有台球、书报阅览室，也有浴室、理发、客房等。被老百姓称为华商波罗馆。因当年租界洋人都设有波罗馆，专供洋人娱乐，中国人入内常遭限制或白眼，故华商开辟此处，多少有些为中国人争一口气的意味。不久，大楼又加一层。

不过，能到这里来玩的人，都是当年的商场大腕。给他们提供了谈生意、交换商业情报、联络感情、开会议的好地方。

1926年北伐军到了武汉，此楼被北伐军总部借用，华商总会迁吉庆街青云里。

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部设在此，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贺龙。

大革命失败后，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驻此办公。随后，武汉行营的侦缉处也曾设在此。将一楼地下室隔了一间20多平方米的地方，改作密封式牢狱，关押、刑讯和杀害了不少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

1930年，行营主任何成浚手下的侦缉处副处长蔡孟坚就在此收买过中共叛徒尤崇新和顾顺章。

1932年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鄂特派绥靖公署驻此，主任何成浚在此办公。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武汉行营迁武昌平阅路，这里改为国民党的新生活俱乐部。

1937年“七七事变”，1938年上海、南京相继失守，蒋介石的军事大本营内迁武汉，军事委员会机要室、铨叙室设此。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此楼成为日本军事机关，房屋四周加布铁丝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汉

行营(后改行辕)设此,程潜任主任。

1948年6月,此楼又换上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招牌,白崇禧任总司令。白为了表现有和平愿望,将“剿匪”牌子换成华中军政长官公署。

1949年4月“和谈”流产,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白崇禧一面布防,作困兽之斗,一边抢运物资,准备南逃。5月15日上午将公署迁武昌。下午1时,白在南湖乘飞机逃往长沙。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7月8日,此楼挂上中苏友好协会中南暨武汉分会牌子。1951年1月,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武汉分会在这里挂牌。1956年,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湖北省暨武汉市分会在此。1957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武汉分会设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各外事机构和团体陷入瘫痪。1971年,武汉钟表厂由吉庆街迁此。1973年,钟表厂迁武昌。

之后,武汉市科技情报处(后称武汉科技情报中心)设此。

1993年夏,二楼大厅及一楼地下室承包给单位职工。情报中心的大门由此移向侧边,投资400万元装修,大楼门面焕然一新,二楼大厅请沈醉题写“将军宫”匾额。同年8月,对外开放,开业3月后,因亏损关门。

光阴荏苒,大楼经历了80个春秋,见证了武汉市多少沧桑,记录下多少风云变化啊。

六 租界罪恶知多少

租界是“国中之国”,是列强强占的“飞地”,汉口租界更是列强侵入中国内地的桥头堡。租界存在的84年,其罪恶罄竹难书。

在政治上,它不断插手湖北、武汉政局,如协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镇压自力军起义。对辛亥革命也采取敌视态度,如宝善里爆炸案,俄国巡捕房及时将人、证转交清地方政府,武昌起义后,又暗地保护满清官员。

凡是当局镇压工人运动(如二七大罢工)、学生运动及民主革命,租界始终站在反动当局一边。1925年5月,因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武汉三镇罢工、罢课、罢市,抗议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工人,英租界勾结军阀萧耀南出动军警,制造了“六一”惨案,打死市民30多人,伤20余人。

至于“吴一狗事件”、“水杏林事件”等在租界内发生的华人遇害事件,更是层出不穷。还有“景明大楼事件”,是外国流氓、兵痞强奸我国妇女的暴行。

由于租界的行政、司法、警务、征税等大权,由洋领事执掌,中国政府无权过问,因此各种逃命官僚、失意政客、下野将军、遗老遗少、被通缉的政治犯和刑事犯,都把租界作为了他们的庇护所。

租界为了更多更快地敛财,从不顾及道德与形象。例如法租界是公开的烟、赌、娼世界,曾组织武装贩运鸦片烟土,每月有“万佛”轮往返重庆、汉口,到货后在租界批零兼营,批发通过铁路、水路,均买通乘警护航。零售烟店只需向巡捕房卫生检查所买得牌照,即可开业。烟馆林立,瘾君子大称方便,因此法租界被人称为“毒化区”。



1931年汉口租界区的洋房



40年代的汉口滨江人行道

日租界也是毒品集散地，且品种较法租界为多。“红丸”、“白面”货色齐全。日本浪人还在租界经营武器批发零售，真是惟恐中国不乱。日租界的娼寮、妓院也很多。

在经济上，租界前濒长江，后近铁路，以此作为外贸基地，大量倾销洋货，廉价收购我内地原料土产。由于列强控制了中国海关，垄断了航运、金融，更是得心应手，一本万利。凡是能赚钱的生意，如烟土、军火、赛马赌博等，无不染指。

在租界内，视华人为“二等公民”，订立的一些章程，都加入了若干对华人的歧视性条款。如“倒提鸡鸭行走者，拘罚”、“肩挑背负行走于人行道者，拘罚”、“行人喧哗、大声喊叫者，拘罚”等。

七 直面租界历史

租界是国耻，是民族的屈辱，但也是历史的一页。我们无法回避，必须直面探讨。

回忆租界历史是痛苦的,但教训从这里汲取。“落后就会挨打”,让子孙后代永远牢记。

租界虽是罪恶的渊藪,但中西文化的碰撞,迟早是要进行的。这是人类文明相互渗透的必然。洋人所带来的一些先进的东西,不是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恩赐,而是列强经济掠夺、资本积累、思想渗透、文化奴役的需要。

汉口租界的建立和存在,对近代武汉城市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复杂广泛的,其效应多样,正面负面的东西共生共存。

隙缝效应 租界在外国治权下形成隙缝,如同一张无形的保护伞。不同阶层、不同政治观点的好人与坏人都曾利用它。

租界是反动与进步、罪恶与文明相交织的城区。如汉口租界,既是各种邪恶势力的大本营,也是革命人士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自立军领袖唐才常等常藏身租界,辛亥革命前革命组织共进会,其机关设在俄租界宝善里。1927年,“八七会



武汉早期的小轿车

议”在原俄租界召开,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李立三等都曾在租界居住和进行革命活动。向警予烈士是在租界内住所(三德里)被捕的。

示范效应 租界与华界相邻,租界洋人的市政建设、街道布局、公共设施、卫生绿化、议会制度、娱乐方式、生产管理,衣食住行、价值取向等,都对华界的政府和市民起着示范作用。

随后,华界街道的拓宽,洋房的兴建(钢筋、水泥之应用、欧美房屋设计特色),水电公共设施的筹划,警察局、马路工程局等机构的建立,汽车、自行车、人力车的推广,西服、西餐之普及,运动、赛马、彩票、电影等都进入国人的生活。另外,基督教、天主教积极开展教会的活动,广收教徒,深入教育、医疗、宗教等领域。

物流效应 外贸在开埠和划界后得到蓬勃发展。洋货倾销取得很大成功,洋布、洋火、洋油、钟表、机械等已被国人接受。而出口的增加,市场的繁荣,打破了传统城乡的封闭形式。封建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物流效应促使城市扩张,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许多农民流入城市成为工人或苦力,新式商人、近代知识分子也出现了。城市居民的思想观念嬗变,新知识、新思想、新道德的传播,促使中世纪的封建城市向近代资本主义城市的转化进程加速。汉口崛起为华中地区的外向型近代巨型商场。

发展效应 汉口市场是从汉水北岸发展起来的,“上至硚口,下至黄陂街一带,最为繁盛。”1861年,英租界设立时,选址在袁公堤(长堤)外,基本是块荒滩。1864年,汉口堡筑成,城区扩大到今一元路。英租界圈入堡内,才免受洪水的威胁。1896年,俄、法租界又挤进堡内(故两国租界面积较小),德、日租界选址在堡外,也相当于郊区。1904年,建立张公堤,租界才全部在堤内。

五国租界滨江而立,修建洋房、码头,开洋行、银行、工厂,中国商人也进入租界办厂开店,官僚及失意政客也想得到租界的保护,继而为租界新增人口提供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也

跟踵而至。再加上京汉铁路的开通,大智门车站是起讫站。汉口租界及相邻华界由一片荒凉之地很快发展为“危楼杰阁,车马殷阗,万里航船,衔尾碇泊”的新兴商业区,连外国人也感到“异常的喧闹”、“这样的拥挤”、“汉口的拥挤在中国城市中达到了独一无二的水平”、“汉口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如此的市容和商业景观,是今江岸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的真实写照。



20世纪初的汉口街景

第五章 世纪风云

正因为江岸区是租界的所在地，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和政治风暴来临时。政坛名流，军旅要人，集聚江岸，一展身手。革命团体机关在这里；辛亥革命的外交主战场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的“八七”会议召开在这里。也正因为江岸是租界的所在地，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工人阶级、劳苦大众的反抗斗争聚积，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篇章“二七”大罢工发生在这里。

二十世纪，江岸发生的一幕幕多么悲壮而又可歌可泣！

一 后湖风潮

地处江岸区东北角，与黄陂、东西湖接壤，原是一片荒湖，有过潇湘湖、黄花地等名称。又因在夏口城镇之后，故还有后湖之称。由于地势低洼，夏秋江河涨水，便成汪洋。

这里的原居民是各地来的灾民，多以捕鱼、挖藕、种菜、放鸭子等为生。无固定住所，大水来

时则搬家至墩台或上船，生活环境极差。清末报纸时有后湖灾民“风雪中冻毙、饿殍累累”、“灾民有生食野兽之肉者，有握泥果腹致毙者，有掘挖树皮草根以济急者，令人不忍睹”等种种报道。

民不聊生的灾民，往往怀着希望“闯汉口”。但城市既难谋生，又得不到救济，只好钻到这个几不管的荒野来。这里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官家、地主来收税收租，找你的麻烦。因此，迁居到这儿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甚至居住了好几代。

1905年后湖长堤（张公堤）建成后，原来的低洼地涸出，不再受渍水之苦。加之灾民几代的辛勤经营，少数地段已成为沃土良田，虽然没有地照田契之类的凭证，却是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既成事实，几代人付出了艰辛劳动，而且今后还要赖以为生。夏口官府觊觎此万亩土地，命清丈局订出章程，规定无买卖契据的全部土地作为“官荒”充公。

后湖住民为了生产资料和生活来源不被掠夺，奋起力争。或到官府集体请愿，或刊印传单在街头散发张贴，呼吁社会同情支持。

1908年5月30日，清丈局官员到后湖丈量没收土地，居民苦苦哀求网开一面。遭到拒绝时，与夏口巡防营兵勇发生冲突，乡民8人受伤。乡民们群起反抗，打伤兵勇4人，抢走兵勇军械，撕毁其制服。一直游行到清丈局，砸烂其门窗及屋内设施。

后来，千余名乡民又抬着受伤群众，到汉黄德道署、夏口厅署游行请愿。迫使官方同意乡民要求：受伤农民立即送医院治疗；土地丈量暂停。

后湖风潮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与湖北省各地农民的抗粮、抗税、抢米、大闹官府求赈等运动彼此呼应，给岌岌可危的清政府以有力的打击。后湖的反政府风潮虽然最后遭到重兵弹压，但是农民的反抗精神，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不少后湖农民在阳夏战争中或参加战斗，或救助伤员，或搬运物资，或支援粮秣，奉献出了生命、热血和汗水。

二 辛亥喋血

自立军庚子起义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和光绪帝逃往西安。当时唐才常在上海，林圭力促唐才常兼程至汉口，利用有利时机进行军事发动。唐才常于8月9日（农历七月十五日）溯江西上汉口，同行者有日本人田野橘次和甲斐靖。在船上，唐才常对田野橘次说：“安徽之铜陵、南陵地方，昨日既皆举事，余当速赴鄂，以节制诸同志。”

林圭在汉，原定起义日期为1900年8月9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在两湖和安徽同时大举，但因军费不继，只好延期，待款而动。原来自立军的经费，一靠国内会员的捐纳，这是很有限的；二靠康有为在海外华侨中征募。唐才常相信当时坐拥巨资，安处海外的康、梁，对他这个勇于兴师勤王的党徒，是能源源接济的，也就愿以此自任。不料康有为所谓源源接济，竟是一句空话，求援函电也竟石沉大海，毫无消息，弄得这个总粮台（唐才常）成了无粮台，结集起来的起义军连饭都没有吃的。他们原商定的庚子年（1900年）8月9日各地同时举事，因康、梁汇款不到，只得一再延期。

自立军展期起事的决定，并未通知到各地。秦力山、吴禄贞在安徽大通如期举事，武汉方面则还在焦灼中等待康有为从海外的汇款以济军需。原定的8月9日各地同时大举，首先在汉口未能实现，只得展到8月13日，后又稽延至8月23日。

唐才常到武汉时，大通已经发难。原先大通起事，指望武汉应援，结果大通失败，又牵动了武汉局势。“大通势孤力弱，遂为刘坤一所败，败报频至，唐由是心气昂进；又闻张之洞将尽拘康有为之党人，呈不两立之势。与其我为彼制，不如谋先发之机，遂期22日先夺汉阳兵工厂，以为军资，然后率军渡江，

赴武昌，拘禁统将张彪、吴元榘及督抚，自取代之，以一展平生之抱负。其将举事之前曰，欲向在汉各领事及外人公启，乃由自立会宣言，欲兴义兵，以革新中国之意旨。”写在上面这段话的田野橘次，当时亲与其谋，是较为可信的。这就是说，唐才常决心发难本来早有策划，又受到两个新因素的刺激：一为大通起义的败耗；二为运动张之洞独立未果，而张之洞将拘捕新党，所以唐决计破釜沉舟，毅然发动汉口之役。

唐才常、林圭起事的总体计划，是以汉口为中心，五路并举，首先经略长江中游，进而引兵至西安，然后北击幽燕。他们在武汉的具体行动计划是：22日先夺汉阳兵工厂，解决起义军的装备、军需，一举攻占汉阳、汉口；第二天（23日）进攻武昌；当时武汉三镇行动时，湘、鄂各州县亦同时并举。鉴于当时慈禧、光绪逃向西安，北京被八国联军攻占，唐才常拟引武汉义师，西指长安，营救光绪，并北击幽燕，以成大业。

按唐才常、林圭计划，起事前草拟了《讨义和团檄文》、《告全国民众书》、《通告友邦书》。当时由容闳驻上海任外交事务，黎科驻汉口任租界交涉事务。容闳受委起草了一个英文对外宣言（即《通告友邦书》）。其文曰：

中国自立会有鉴于载漪、荣禄、刚毅等之顽固守旧、煽动义和团以败国事也，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因以伸张乐利于全世界；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借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举。惟此事须与各国联络。凡租界教堂以及外人，并教会中之生命财产等，均须力为保护，毋或侵害，又望诸君子起事时，切勿惊惶。别有军令八条如左：

第一条：勿侵害国民之生命财产。

第二条：勿侵害外人之生命财产。

第三条：勿焚毁寺院，勿惊动教堂。

第四条：保护租界。

第五条：严禁奸淫窃盗及一切不法行为。

第六条：待遇擒获敌人禁用残酷非刑，须照文明交战条规处治之。

第七条：对敌，用残酷待遇，及猛毒武器，均所不禁。

第八条：所有清国专制法律，建设文明政府后，一概废除。

由于汉口起事预备不周，败之于弯弓待发之时，所以这些文告还来不及公之于世。但作为这次起义的指导思想，文告所揭露的中心之点仍在于“勤王”，“复起光绪”，以图实现“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建设文明政府”；反之，则谴责了载漪、荣禄、刚毅。实质是慈禧“煽动义和团以败国事”，主要是“排外”和“篡夺光绪帝帝位”二端。文告中所规定的军令则强调了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租界、教堂。文件对义和团采取谴责态度，对帝国主义却无所批判，这是自立军领导者阶级立场的暴露，但可贵的是提出了“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所有清国专制法律……一概废除”的主张，这不能不是当时反封建专制的强烈呼声。

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人的活动，集中在军事部署上，包括前、后、左、右、中五军的建置和调遣，发动起义日期的确立，起义文告的起草，以及点兵和操演。据吴良愧在《自立会追忆记》中所述，早在五六月间就在汉阳鹦鹉洲有过会操。又有一次，武昌方面的清军，派人来见林圭，报告说：“他们营里的炮口已经调换方向，直对着总督衙门了。当时林圭兴致很好，并予嘉奖。”吴良愧还说，1900年夏，天气闷热。一天，他到宝顺里自立会机关，在那间蒸笼般的小屋里会见了林圭、田邦璇、蔡钟浩、沈荃、陈犹龙。面目清秀的林圭穿着一件短衣，声音响亮地讲述当初苦心经营自立会的经过，“直讲到以后起事，如何夺取武汉，然后传檄湘赣各省、提兵北上，直捣幽燕”。

除此外，唐才常、林圭还忙于筹款。由于康有为汇款不至，“唐君因财政缺乏，遂散布贖造纸币数十万元，且布告于公众

曰：吾党倘取天下，此票必可交换正货。人民信之，使用此纸币者甚多。”除在华侨中劝募外，国内也开展了捐输活动。慈利会员朱墨仲曾因资助巨款，后来被拘禁二年之久。

正当唐才常、林圭执戈待举之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已抢先一步，一举抓获唐才常等人。张之洞对自立军从不干预甚至默契，为什么突然下此毒手？这与当时北方政局的变化有密切相连。当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对外“宣战”时，南方三督抗命不奉谕，帝国主义公开出面支持“东南互保”，似有形成南方独立的势头。但到了8月中旬，八国联军已攻陷北京，慈禧和光绪已向西安逃跑。当时攻陷了北京的列强需要平衡他们相互间的利益，谁也无力一口吃掉中国，因而暂时都无意于彻底摧毁清王朝，也不准备动摇以慈禧为首的清廷中枢，而只是逼迫它俯首就范，充当“洋人的朝廷”。窥测方向的张之洞，敏锐地觉察到经历大动荡后的中国政府将在苟安中趋向稳定，所以他不可能和清政府决裂。同时，英国也鉴于不可能实行中国东南部的独立，而惧怕自立军的起义将影响其在长江流域的殖民统治利益，因而也在破坏这次起义。至于李鸿章，则早在7月18日就离开香港北上，接受清政府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任命，而拒绝了英国香港总督卜力和兴中会策动其实行两广独立的主意。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张之洞对自立军从不干预以至默契，到转脸一巴掌打了过来，置自立军于死地的遽然变化。

张之洞逮捕和杀害唐才常是突然而又残酷的。唐才常、林圭被捕前，还以为自立会机关设在租界，又以为张之洞与其有师生之谊，其兵力亦难于伸进租界之内，以致疏于防范。

老于权谋的张之洞在行动时，事先告知汉口英国军舰在长江口外停泊。英领事欣然签字，为张派兵入租界附近抓人大开绿灯。

8月11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晚，在事先与英国驻汉代理总领事傅磊斯策划之后，张之洞令亲军包围了宝顺里和李慎德堂等处，于12日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

人。与此同时，在武汉三镇被捕的有30多人。22日夜，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在武昌紫阳湖畔和大朝街天符庙等处被害，还有些自立军志士被杀于汉口。在这一段时间，湖北全境被杀害多达300多人；两湖和安徽等地区总计牺牲不下千人。这是戊戌变法后更大的一次流血。这次流血事件成为中国人民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命运，寻求国家和民族的出路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上承戊戌变法，下联辛亥革命，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过渡。

孙武革命党人与宝善里14号

孙武原名葆仁，字尧钦（或尧卿），号梦飞。湖北夏口（汉口）人。他自幼好武，故以武为名。18岁时入武备学堂，与吴禄贞、傅慈祥等同学。毕业后任湖南新军教练，后调武威营队官。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吴禄贞介绍他任岳州司令，事败避居乡间。其间先后参加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的活动。萍醴起义失败，湖北大兴党狱，他在乡间深居简出不与人通往来，但清吏仍然抄了他的家。

季雨霖因日知会案系狱获保释，约孙一同北上。他变卖田产衣物成行，到东北后穷困潦倒，辗转经由同乡介绍与刘弹子相识，由刘资助抵日。

时值云南留日学生开云南独立大会，黄兴正起兵河口，他决意赴云南助战。方到香港闻滇事已败，只好折返日本，入大森军事学校，和喻培伦、焦达峰、黄复生、熊越山等人学制炸弹。共进会成立，被推任军事部长。议定本当由刘回国主持共进会



湖北共进会会长孙武

事宜,因刘一时尚不能离开,即由他代刘先行回鄂活动。

1909年春,孙回到武汉,联络会员,委以名号,如某地某人为第九镇统制之类。由于会党轻举妄动,贸然起事,屡遭失败,因此他总结出—条经验,今后惟有运动士兵,借矛夺盾,方可奏效。同年冬天,广东同志聂荆来电,据称广西刘玉山起事机遇甚佳,邀请相助。他偕潘善阳等人欣然前往,不料行抵广州而南宁已败。他独自转赴香港,欲访党人赵声不遇,在《中国日报》社与冯自由、胡汉民、洪承点等相识,由冯介绍正式加入同盟会。翌年春返回武汉,一度停顿的共进会又恢复其活动,并进一步开展军运工作。

1911年2月,谭人凤、居正、杨时杰等先后来武汉。谭认为武汉四方受敌,革命起事以广州为宜。孙极不以谭说为然,详论武汉发动起义之有利条件,据理力驳,终于说服了谭、居、杨等。谭在离汉时留下200元充作活动费。

孙从此更加积极进行活动:一面增设秘密机关,作为联络、集会和办事之用;一面与文学社磋商联合,拟集中力量,统一指挥。1911年9月24日,共进会、文学社举行联合大会,同时决定起义计划。大会由孙担任主席,决议推文学社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分设政治筹备处、军事筹备处于汉口、武昌。对起义步骤,分担任务,都作了具体规定。

10月6日,革命总机关迁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8日下午孙在机关检试炸药,不慎发生爆炸,他受伤脱险入院医治。俄巡捕闻声赶至,所有印信、名册、旗帜、布告和预制的中华银行钞票等悉数被抄,连同被捕诸人,一并转送清方。一时人心惶惶,惴惴不安。同志纷纷向孙询问行止,他当机立断,声言“为今之计,只有死里求生,即日起义”。即令邓玉麟飞报武昌小朝街军事指挥部下达起义命令。10月9日,因炮兵出事误期。10月10日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英勇就义,刘听后大哭。又嘱邓再通知即日大举,武昌首义的枪声,终于在10月10日晚间打响了。

此时刘公避难未出,孙武受伤就医,蒋翊武出亡。革命爆

发了，而领导无人。在此关键时刻，清军协统黎元洪被推为鄂军都督，孙任军务部长。但他伤未愈，直至10月25日才到武昌就职视事。此时民、清两军已对峙于汉口刘家庙一线。

10月28日，黄兴抵武汉督师。以黄在同盟会的地位和历次领导起义的威望，不仅一般党人为之振奋，市民也无不敬仰。相形之下，孙大为逊色，从而产生了忌妒心理。在商讨安排黄职务时，他不表态；对黄出任总司令的方式问题，他不置可否。黄守汉阳，他公开诋毁说“黄不过先声夺人，实不知兵”。总之，对黄不是积极支持，而是消极抵制。

汉阳失守，武昌危急，孙虽不赞成东下，也不愿负责城守。刘公临危自告奋勇守城，他又故意刁难。张振武阻黎元洪出奔，他竟劝黎暂避葛店。

南北议和期间，他以民军代表名义赴沪活动，对南京临时政府思得一陆军次长职。黄兴主持人事，意在用知兵同志以为己助，故陆军次长一职，孙武未如愿以偿。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去，且以怨黄而迁怒南京临时政府，决心与同盟会为敌，另组民社与之对抗。

民社先在上海成立，其分子极为复杂，有立宪派、官僚政客、旧军人等，并创办《民声日报》，公开打出反对同盟会的旗帜，又在汉口成立民社分社，内奸如孙发绪也充任要职。民社理事长推黎元洪担任，孙武为副社长。

孙回武昌，调动带兵的首义同志，以黎本曾、石星川、夏占奎分任统制、统领，派刘成禺、时功玖、张伯烈为南京参议院参议员。孙借用黎之名以培植自己势力，形成供己利用的武昌政治集团。1912年1月8日，黎元洪接受当选副总统证书召开大会，孙竟然说什么“宁可承认北方政府，也不承认南京政府”。当时杨时杰、查光佛立予痛斥，然终未能阻止孙一意孤行。

1912年2月27日发生驱逐孙武事件，孙随之去职。后任北京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同年10月10日授勋。袁设将军府，又授孙以义威将军。1915年12月24日，即袁世凯称帝前夕，授他为参议院参政。次年1月2日，觐见窃国大盗袁世凯

时面称：“蒙授参政，恭谢鸿施”。其后一直依附北洋军阀，但不为北洋军阀所重用。

1922年，湖北督军兼省长萧耀南委孙为汉口地亩清查督办，萧死后去职。后居北京作方外游，1939年11月10日死于北京拈花寺。

阳夏战争之汉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湖广总督瑞澂、镇统张彪携残部由武昌逃到汉口刘家庙。10月12日，清廷将瑞澂革职留用，命其戴罪立功。同时命陆军大臣荫昌赴湖北督率各军，共组织了两军南下：荫昌率第九镇、混成第三协、第十一协为第一军；冯国璋率第五镇等为第二军；令载涛率禁卫军及第一镇为第三军，守卫京畿。

10月14日，又请袁世凯出山，任湖广总督。此时张彪得河南南来的张锡元、王鼎华两股部队增援，对在武昌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构成威胁。黎元洪却一直观望，经外国驻汉领事团送来“中立”照会，清海军又愿反正，加上革命党人谭人凤的鼓动，黎元洪才同意民军进攻张彪部。

10月8日，民军步队一标（相当于团）、炮队一队由武昌渡江来汉口，与驻汉标统林翼支部联合，向刘家庙发起进攻。张彪残部及河南军约2000人



革命军在抗击清军

登上火车，从车厢向外还击，民军伤亡较大，二营管带赵承武阵亡，部队撤至大智门。下午，民军援军至，再攻刘家庙。敌故技重演，又乘火车向民军驶来。民军士兵与铁路工人拆毁路轨，阻住列车前进，民兵还开枪射击列车。当清军从列车下逃时，民军及附近农民、工人，冲杀上去，歼敌400多人，缴获粮食600担，子弹400箱，军衣、军鞋3000件，帐篷400顶。

10月19日，何锡藩率第二协从武昌过江来增援，在西商跑马场（今解放公园）与清军遭遇战。清军败退，沿路又遭民军追击。民军缴获火车厢10余列，马100匹，还有粮食、子弹等。武汉三镇庆祝胜利，悬灯结彩。汉口商会送来酒肉犒军，湖北军政府军乐队也前来表演。

清军虽遭打击，但决不善罢干休，不断乘车南下，集结于滠口一线。而民军却未构筑任何工事，使清军轻而易举地占据了三道桥。民军几次想夺回，均失利，死亡200余人、伤100余人。指挥员何锡藩引咎辞职。

10月29日，黎元洪派29标标统张景良接替何，任汉口军事指挥。司令部设江岸车站。张指挥无能，又远离前线，且民军中新兵多，武器亦不如北军，所以屡遭败绩。清军猛攻刘家庙、江岸车站一带，清海军舰艇也在谏家矶造纸厂江边开炮，侧击民军，民军牺牲500余人，造纸厂与刘家庙失守。

10月26日，张景良不知去向，四标统带（团长）谢元恺自告奋勇带领部队，吹起冲锋号，向前冲杀，与敌肉搏，又夺回刘家庙。但追至造纸厂时，遭敌军大炮、机枪猛击，民军大量伤亡，估计在1000人以上，谢元恺标死伤600人。清军也付出了不小代价。

10月27日拂晓，民军再组织进攻，挺进至三道桥。张景良此时躲在歆生路（今江汉路），又不补充子弹。战斗时，既无人指挥，每个士兵又只有10发子弹。而清军不断增援人员、弹药，海军又助战发炮。民军伤亡较大，后撤至大智门一线。

10月27日，袁世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取代荫

昌督师湖北。以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围剿民军。

10月28日，清军自刘家庙出击大智门民军，谢元恺组织部队隐蔽，待敌靠近，吹起冲锋号，民军在喊杀中冲向敌群，清军暂被压回刘家庙一线。清军后备队机枪投入战斗，民军退回大智门阵地宿营。

29日清晨，清军再攻我民军阵地。谢元恺与炮队标统蔡德懋组织士兵于上午11时全线反击。在大智门、球场路激烈战斗，拉锯战持续3个小时，民军终不支，向歆生路撤退、蔡部则向黄孝河方向撤退。黄孝河、三眼桥至后湖一带，革命军伏尸遍野。民军炮队阵地在大南湖和循礼门被敌重炮猛轰，蔡德懋阵亡。

谢元恺督阵前沿，遭敌机枪扫射，战死沙场。敢死队队长马荣、工程队长李忠孝均死于29日战斗中。张景良临阵逃跑，藏匿于后方，被汉口军政分府士兵在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捉拿，军分府负责人詹大悲下令处决。

28、29日两天战斗，民军阵亡达2000多人。辛亥革命亲历者杨玉如著文称：“汉口球场各烈士坟墓，即是役阵亡官兵也。”这便是老百姓所说的“六大堆”。

民军士气极高，据参与与目击者回忆，报名参加敢死队时争先恐后，非常踊跃。“民军勇往直前，誓死不回”、“受枪后，忍痛前进，不肯就医”；轻伤不下火线，血流满面仍坚持战斗，受伤后刚包扎完马上重返前线。负重伤战士被红十字会抬进医院，在半昏迷中仍呼喊杀敌。

29日，黄兴设临时指挥部于满春茶园，督师前线。30日，激战1日。清军冯国璋部进入市区，兵力大增。为防止民军凭借房屋作掩体，冯部放火焚烧租界以外的一切房屋。大火从歆生路烧起，经花楼街烧到满春茶园，再烧至硚口。革命军在强敌压境情况下，节节败退，至11月1日夜，汉口全部沦入敌手。战事移至汉阳。但大火延至11月4日才熄灭。

11月16日夜，黄兴曾率军分三路反攻汉口，但未能立足，

又撤回汉阳。

21日,敌军由蔡甸过河。27日上午占领龟山,下午汉阳陷落。

从10月18日至11月27日,在汉口(夏口)和汉阳进行的这一场战争,史家称为“阳夏战争”。

10月18日至10月31日,战事的主战场是刘家庙至歆生路之间,属今江岸区辖区。江岸区经历的这一次战火的洗礼留下了光荣的一页。

“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

1911年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很快有14省(时全国有18个行政省)宣布起义和独立,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筹建临时中央政府,统一军政,彻底推翻清王朝。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于11月7日就召开各省督府代表会议发出征求意见电。11月9日正式通电各省督府,请派代表到武昌召开“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其后因上海方面浙江军人集团试图把革命中心这一有利地位从武昌方面转移去,也发起召开各省代表会议,有几个省的代表到达上海,并成立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经过黎元洪和在湖北的革命党人力争,并派居正为代表去沪劝说在上海的代表到武昌开会,代表们才离沪来汉。当10省代表从各地抵达武汉时,汉口、汉阳已失守,武昌也在清军炮火的威胁下。在这严峻的时刻,鄂军政府毅然将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移至汉口英租界英商顺昌洋行大楼举行。11月30日会议正式开幕,推选谭人凤为议长,并商定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在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前,由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临时政府职权。12月2日(另有12月3日之说),会议正式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由各省代表签名公布。

《组织大纲》分3章共21条,主要规定设置设立临时大总统和临时参议院,规定了临时大总统和临时参议院的权限,以

及设立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等5部，还规定参议院由各省都督府选派参议员3人组成。参议院成立以前，暂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代行其职权，赋予临时立法机构的职能，但表决权每省以一票为限。《组织大纲》规定的南京临时政府采用总统制，基本上按照美国模式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它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亘古未有的决裂。

汉口会议讨论通过《组织大纲》之时，江浙联军攻克南京。汉口会议休会以前，决定所有代表于一周之内到达南京集合，选举临时大总统。汉口会议为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在南京继续举行作了周密安排。12月9日，孙中山先生抵南京，各省代表根据在汉口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辛亥首义外交战的主战场——江岸

辛亥首义爆发后，无论是身处国外的孙中山，还是在扬子江畔浴血备战的湖北革命党人，都期望从被他们视作楷模的西方各国那里得到对革命的支持。然而，他们不但丝毫没有获得西方外交家与银行家们的道义上、物质上的支持，相反，他们遭到公开或暗地的反对。因为，西方列强不希望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成为他们竞争对手。列强的如意算盘是让中国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继续充作列强掠夺、吞噬的对象。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战略考虑，辛亥首义的前期、初期、后期，帝国主义列强实质上对中国革命持反对态度。

由于列强驻汉领事馆设在租界（今江岸区内），所以江岸成为辛亥首义外交战的主战场。外交战可分为辛亥首义前期、初期和后期的三个阶段。

辛亥革命前即宝善里失事后，俄国驻汉总领事奥斯特罗

维尔霍夫立即令俄巡捕进行搜查，抄去宝善里机关党人名册及印信旗帜等物，并逮捕了李淑卿、刘同、刘燮卿及同里居民王可伯、谢坤山、陈文山等人。复由俄领事通告江海(汉)关监督齐耀珊到俄国巡捕房领走革命党人及收缴的物品。

辛亥革命初，即10月11日、12日汉阳、汉口光复，即以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名义，照会各国驻汉领事馆，请守中立。

东京同盟会曾对革命后政权的外交政策有所规定，并事先草拟了革命政府的对外照会。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便以这个照会的文稿作底本，稍加变通如下：

为照会事，我军政府自广州之役团体溃后，军政府复念祖国情切，愤满奴之无状，复令本都督起兵武昌，共图讨满，推倒满清政府，建立民国。同时对于友邦各国，益敦睦谊。以期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幸福。所有民军对外之行动，特先知照，免致误会。

(一)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

(二)赔款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按期如数摊还。

(三)居留军政府占领地域内之各国人民财产一律保护。

(四)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

(五)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之权利，所借之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次知照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

(六)各国如有接济清政府战事用物品者，搜获一律没收。

(七)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与军政府为敌者，概以敌人视之。

以上七条，特行通告友邦，俾知师以义动，并无丝毫排外之性质。

照会一式5份,由外长胡瑛送往汉口江岸各国领事馆。10月14日,李国镛和夏维崧往晤俄领事,请求以领事团领袖地位给军政府以外交赞助。众所周知,俄领事正是破坏汉口长清里、宝善里革命机关的主使人,对军政府的要求虚与委蛇。

10月13日法领事到武昌拜谒黎元洪,刺探军政府对各国的态度。随后美国领事也作过类似刺探。

10月17日上午,驻汉英、俄、法、德、日5国领事推英领事葛福持公文一件至军政府,对革命军举动文明表示钦佩;在汉外侨,承予保护,极为感谢;故承认民军为交战团,各国将严守中立云云。黎元洪代表军政府表示感谢。

这是革命形势迫使各帝国主义国家作出的外交姿态,同时也是各国为了自己在华切身利益而采取的权宜之策,并非帝国主义分子对革命有何好感。但在湖北军政府中,却造成一些幻想,以为外国人同情民军,甚至某些高级党人也存在这种错觉。

辛亥首义后,军政府即探悉外国人并未严守中立,有以军用物资帮助清军的举动。于是军政府即派员到汉口江岸向领事团提出交涉。

事实上,从阳夏战争开始,驻汉各国领事就是偏袒清方,支持袁世凯,采用“以北压南”的方针。英领事葛福及其他各国领事,无论在汉口、武昌斡旋停战、议和,都有利于清方和袁世凯,最终让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当上了大总统。

三 工人抗争怒潮

汉口租界人力车夫罢工

人力车工人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他们没有生产资料、资金、房屋,也没有任何谋生的技能,甚至没有隔夜粮。

以民国初年的租界为例,车夫每天要先交5角车租给车

行,才能将车拉到街上营业;如一天生意不好,说不定还会饿肚子。炎热和雪雨天气也得撑着干。在租界里大声喧哗、随地停车、吐痰等,都会被巡捕打罚。

车行老板更肆意剥削工人,大获其利。以一辆车为单位算一笔账,每天收租5角,则每月收15元、每年收180元。修理、折旧费加上空租(战争、恶劣天气影响)损失,一年不可能超过120元。另外,每车每月向工部局交牌照费1.2元,全年14.4元,每辆车一年最少可赚:

$$180 - (120 + 14.4) = 45.6 \text{ 元}$$

开车行既然有如此大的利润,所以想涉足的很多,但租界工部局以发照来控制,不是有钱有势、黑社会头目或与洋人有特殊关系者,休想染指。如1912年,租界发照车行如下:

车行	行主	车辆数	背景
利通	梅妮	336	法国公司老板
飞星	名不详	250	希腊人
步记	游沪生	130	法租界翻译
富记	杜老五	130	军阀杜锡钧之弟
裕通	鄢霖生	109	夏口公署官员
汉通	马筱梅	100	夏口厅知事侯祖俞亲戚
元亨利	杜丽兰	80	稽查处稽查
笔记	李绍依	65	英租界工部局翻译

英国工部局按每车每年牌照费14.4元,每年可以收 $1200 \times 14.4 = 17280$ 元。此款按各租界面积比例划分。

租界对人力车编号,另外还制有号衣,号码与车一致。租车工人拉车前必须着号衣,才能上街。如被洋巡捕发现违章、乱停或撞了人,他将记下你的号码,以后再收拾你。

工人最担心的便是车行加租,可是车行老板总是想最大限度地谋取利润,不管工人死活。反正穷人、苦力多得很,不怕没有人上门租车。

1921年,租界内已发展到18家车行、1500辆车。利通、飞星两家车行竟占1/3。5月10日,串联18家车行统一加租,

每班车租由 800 文加到 900 文。工人强烈抗议，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和帮助下，组织起来，选举了代表，与车行老板谈判一夜，老板拒不让步。工人们绝大部分于次日罢工，对个别甘受剥削仍来租车的人，罢工者则堵住车行大门，阻止出车。老板们叫来巡捕，逮捕了工人代表。工人又组织上街游行，还喊口号，发传单，内容有“奋斗！争自由！争人格！”等。由于工人团结，坚持斗争，也得到市民和舆论的同情支持，车行才作出退让，同意暂不加价，并释放了工人代表。

可是到了 12 月 1 日，车行老板又以种种借口宣布加租，而且是由 800 文加到 1 000 文，因此爆发了第二次反加租斗争。这一次，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活动），其武汉分部即派林育南、施洋、包惠僧等前来，直接领导这次罢工。2 日，林、施秘密召集人力车夫代表开会，决定成立“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会”，以加强对罢工的领导。施洋还亲自为工人起草了《罢工宣言》和《告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书》，散发媒体和社会。

老板们先是请教会出面调解，继而以“关门”相威胁，放言“工人一星期不拉车会饿死”。可工人回答“宁可饿死，也不屈服”。老板们又讨价还价，说至少要加到 860 文，工人们不予理睬。

6 日夜间，林育南、施洋再召开工人代表会，鼓励大家坚持。一方面指导工人再造舆论，一方面组织“车夫讨饭团”结队到租界游行。

7 日清晨，游行自大智门景家台出发，共 6000 余人，冲破军警阻拦，举行“行乞”示威游行。人人手执小白旗，上写“敬求援助”、“死中求生”、“劳工神圣”等标语。先到汉口总商会，又绕英、俄、法租界。高呼“反对加租”、“要求减租”。这时法租界如临大敌，宣布戒严。工人们奋不顾身，冲入法租界，捣毁车行，与法界巡捕对峙达 3 个小时。巡捕捉了 4 个工人，工人也抓了 2 名安南巡捕。

法领事慌了，一方面立即向驻汉北洋军阀求援，要求派兵

弹压,另一方面同意交换“俘虏”。

经过谈判,车行同意取消加租措施,免租3天,成立工会车行不干涉,每车每日提取2文作工人福利费基金,罢工期间每日每乘补发2角损失费。至此,第二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大罢工,取得了全面胜利。

1922年,经过施洋等人具体指导和认真筹备,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会召开了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樊一豹、易明发、刘华山等组成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会执行委员会,聘请施洋律师为法律顾问和全权代表。

工会会址暂设大智门品记里13号。以后,施洋又协助在今公安路81号筹建了工会会所。1922年,武汉工团联合会(后改名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也曾在此办公。

汉口棉花工人大罢工

1922年10月下旬,汉口英租界的隆茂、平和等洋行的棉花打包厂,在武汉三镇工会运动的高潮中,联合成立了汉口棉花工会。对于棉花工会的成立,租界当局及其资本家处心积虑地横加干涉,肆意破坏。1923年1月9日,隆茂洋行打包厂发出了通告:“对于会员每日给工钱500文,非会员多给60文,以示优异。”10日,买办杨景笙又公开干涉工会发给会员徽章,并将两名工会首领无理逮捕。当全体工人包围英国巡捕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时,英国领事竟然调集大批武装义勇队,使用刀枪棍棒乱击手无寸铁的棉花工人,当场造成13人重伤,26人轻伤,并逮捕30余名工人。接着,英租界实行特别戒严,将“上自英界一码头下至六码头及其四要塞均架大炮各一尊,凡丁字路均派有小排步哨,所有前后花楼及河街口三处铁门均行关闭”。满载武装军警的英国汽车在街上奔驰示威,制造恐怖气氛。

英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激起全体棉花工人的极大愤怒。11日,3000余名棉花工人发表《罢工宣言》,举行同盟罢工。提

出了“争国体，争人格，争生存”的政治口号。

11日下午，湖北省工团联合召集武汉20余个工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援助棉花工人的罢工斗争。会议提出，这次罢工完全由于“外人摧残华工而起”，号召全省各界“勿以寻常罢工视之”。各工会代表一致表示，死力援助罢工工人。汉冶萍总工会和汉阳钢铁厂还发表声明：三五日内不释放关押工友，将全体罢工援助。

14日，武汉各界人民发起对棉花工人的声援。湖北自治筹进会、省立宪讨论会、民生研究会等10余个团体集会，声讨英帝罪行，支援棉花工人的罢工斗争。集会指出：英人此举“殊属蔑视我国太甚”，“不啻以亡国奴目我”。当即讨论通过六项雪耻办法。其主要内容是：推选代表要求政府与英领事严重交涉；英领事须向中国官厅道歉；此后英人不得擅自关闭后花楼及大智门铁门，致碍交通；将殴打华人之凶手交我国官厅惩罚；英领事及各花厂须认可工人之要求条件；英人此后不得荷枪实弹，在租界地界与华界毗连之街道行走及向华界架炮，不得摧残华工。

15日，花厂工人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发出宣言。宣言说：“我们与其冻饿而死，不如拼命前去打我们的仇人！仇人是哪个？就是洋资本家，就是侵占我们的领土的外国人”。同日，省工团联合会再次向各界发出《呼吁》。《呼吁》书说：“我们自十日被洋鬼侮辱之后，承蒙各位爱国同胞鼎力援助，不料丧心病狂的洋资本家一味高压，欲置我们数千工人于死命”，“我们挨饿冻誓死奋斗，以冀复我人格，雪我耻辱，惟望爱国同胞，矜怜苦况，从速援助，我等工人自当抱定宁死不辱之志，与洋鬼奋争”。

在以武汉工人阶级为主体、各界人士纷纷声援并参加的反帝怒涛的强大压力下，汉口警察不得已于15日下午将扣押的5名工人释放，洋务公所被迫将关押的7名工人卸下镣铐，转入“优待室”。花厂资本家被迫向工人让步，同意于16日至18日与工会代表举行谈判。

经过激烈的谈判斗争，花厂资本家被迫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18日，劳资双方代表达成协议：“复员行、号承认花厂工会，并有代表工人直接交涉权；凡花厂雇佣工人，均由花厂工会介绍；各行、号对于工头自行取缔；赔偿工会办公损失1750串银，先交1000串银，余750串银变作米粟俟年终交由花厂工会发给各工人；巡捕房拘留之25名工人及德华里拘留之7名工人，先放出后上工；每日工作以8小时为度，如超过所订时间，酌给工资”。19日上午，厂方向工会交付赔偿款，并将两处扣押的32名工人全部释放。同日下午，工人复工。至此，棉花打包厂工人的反帝同盟大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二七”风云席卷京汉

有关“二七大罢工”历史，这方面的史料和专论不少，其基本史实在“二七”纪念碑的碑文中已作如下基本概括：

1923年1月，京汉铁路工人筹备成立总工会，遭到军阀吴佩孚无理禁止，引起工人无限愤慨。他们不顾反动势力的阻挠破坏，于2月1日在郑州毅然如期举行代表大会，并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军阀武力竞强行侵占总工会会所，搜劫工会文件和财物，并且强迫代表和来宾出境。总工会决心领导全路工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将会址迁到江岸，从4日起举行全路大罢工。要求撤



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烈士



“二·七”大罢工领导人律师施洋烈士

除军阀走狗、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等人，赔偿工会损失，并派员道歉。这一英勇正义的行动受到武汉和全国各工人的同情和支援。军阀吴佩孚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的怂恿下，下令湖北督军萧耀南等于2月7日在江岸及京汉铁路沿线各站进行血腥镇压。工人群起肉搏应战，死难者约五十人，伤数百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同志被杀，先后被砍

七刀，血流遍体，始终严词拒绝下令复工。他切齿大骂：“头可断，血可流，工不能上！”壮烈牺牲于军阀屠刀之下。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同志亦于当日被捕，15日慷慨就义于武昌。

这次大罢工是中国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政治斗争，表现了中国无产阶级刚刚走上政治舞台时的英勇气概与革命精神。英勇牺牲的烈士们，用鲜血写下了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历史上新的一页。烈士们的精神永垂不朽！

武汉市各界人民敬立

1963年2月7日

这一事件自始至终都是在今江岸区的土地上演绎的，有关的旧址、现场今日尚能有迹可寻，烈士的鲜血染红了今江岸区。解放后，政府一再拨款建立纪念馆、碑，以“二七”命名路名，1968年7月至1969年11月，还将“二七”作为区

名。湖北省、武汉市、铁道部都曾命名二七纪念馆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7年又被中宣部宣布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当年领导“二七”大罢工斗争的指挥部设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即现解放大道1057号。这是一座青砖小布瓦房舍，房屋经几十年的风吹雨打，已显陈旧不堪。总工会办公室是进门左侧的一间12平方米的小房间。此栋平房共占地180平方米，绝大部分是工人住家用。

汉案(1925年)六一一惨案

1925年6月10日下午4时许，英国太古公司武昌轮抵汉卸货时，该公司管磅员寻隙将码头工人全金山的头部殴打成重伤，同时还打伤另外两名工人，看守洋棚的印度巡捕也用手棍协同殴打。工人见此情况愤愤不平，聚集口岸，要求惩办凶手。太古轮船公司反诬工人闹事，要求汉口警察厅派警“维护秩序”。军阀政府警察厅惟主子之命是从，立即派警察到码头进行镇压。

11日，数千名码头工人愤而罢工，并举行游行示威，强烈抗议英帝国主义分子殴伤中国工人的暴行，坚决要求惩办凶手。当日傍晚，同情码头工人的车夫、棉花厂等工人群众在太古码头集会，学生讲演队也到码头演讲。英国巡捕上前驱逐，群众不服，愈集愈多。这时，一艘英国军舰公然越界停泊在江汉关上侧苗家码头示威，英国巡捕、海军陆战队和各国义勇队倾巢出动，将前后花楼铁栅门锁闭，断绝租界和华界交通，用长枪、刺刀、水龙驱赶人群，当场用刺刀挑伤太古公司打包工人刘国厚。对此，广大群众义愤填膺，纷纷用石块、棍棒与之搏斗，并被迫向大智门方向退避。这时湖北军务督办兼省长萧耀南也配合帝国主义派出大批军警向租界进发，追堵群众。群众行至华英交界湖北路大智门之间时，由于通道被萧耀南的军警封锁，只得返回英租界。这时，等候在那里的英国水兵

和各国义勇队乘机用机枪向群众扫射，一时弹如雨下，血肉横飞，当场死40人，重伤17人，其中受害者罗良安年仅13岁。随后英帝国主义又将租界内的电灯熄灭，把被害群众的尸全拖到舰上，沉入江底。就这样，在上海“五卅”惨案之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又在汉口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一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英帝国主义和美、日等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妄图遏制武汉人民的反帝斗争。英帝国主义调“乃提”等三艘军舰“来汉示威”。日本帝国主义的“对马”、“菱字”两艘军舰也停泊于汉口江岸。英、美、日、法、意5国组成的义勇队，在汉口租界区“逡巡”。英国海军陆战队将河街前、后花楼铁门锁闭，并在江汉关前与庆昌里当铺前设置沙袋、架设机枪。英国驻汉总领事柏达还以无耻伎俩，强辞狡辩，推卸责任，竟称英国出兵“开枪有万分必要，而责在中国当局不能维持秩序”。

反动军阀萧耀南为了讨好外国主子，于惨案发生的当晚，下令各中文报纸不准登载屠杀事件的消息。翌日宣布全城戒严，禁止工人聚谈，解散学生联合会，封闭扬子通讯社，解散汉口中学，枪杀“常在汉口各报痛论当道是非”的汉口人道医院院长萧英等4人。一时间，龟蛇两岸，阴霾密布。

“水杏林惨案”

1928年12月1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汉口日租界搞军事演习，4辆炮车在大街呼啸而过，正在日租界同德里停车的人力车夫水杏林躲让不及，惨遭横祸，人亡车毁。

事发后，日租界巡警将尸体运往同仁医院太平间，以掩人耳目，对死者家属推卸责任，只同意发安葬费15元。

在舆论哗然的形势下，国民党湖北特派交涉员公署派甘介侯前往交涉。日领事先诬水杏林系服毒死亡，续称水系抢道被撞，咎由自取。

汉口法院派法医验尸后，交涉署为公正起见，再请法籍医生白朗士、中华医院胡院长进行第二次复验，为验证有无服毒，

还曾剖开胃部抽液化验，最后一致确认水系车祸造成外伤 11 处致死。

21 日，日领事令人将水尸体移往华界，表现出不承担责任的态度，旋又搬回日租界。22 日，交涉署除严重交涉水案外，还函日领事馆指出日军这次在租界搞演习是违反《华盛顿条约》，侵犯我国主权的行为。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撤退日本在汉全部水兵；第二，严惩肇事凶手；第三，厚殓棺葬死者，格外抚恤遗属。然而，日领事却置若罔闻。

水案发生后，汉口各界立即成立了“水杏林惨案后援会”。24 日，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汉口水案告全国工友书》，号召工人罢工，开展反日斗争。29 日，汉口各界市民 2 万余人游行示威。

罢工委员会成立后，推曾觉先为委员长。宣布总罢工于 1929 年 1 月 9 日开始，参加罢工的工人数万，连日商日清公司、三井洋行的华工也都报名响应。罢工委员会还组织万余人的纠察队，站在日租界线外，劝阻华工进入日租界上班。霎时间，对日经济绝交、收回租界等口号响遍江城。

日租界如临大敌，日夜戒严。江面抛锚的船舰均泊靠租界岸边。还从上海调来“安宅”号舰。各舰水兵随时荷枪实弹，作登岸之准备。

日本便衣警察又潜入华界劫持水杏林之兄水裕林到日租界警察署，进行利诱未逞，又将其打成重伤。交涉署刘明钊科长前往日领事馆抗议，次日晚 8 时才放人。

11 日，日领事同意我交涉署前所提部分条件，即：严行约束水兵、巡警、侨民，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惩办殴打水裕林之凶手；负担水裕林全部医药费。

1 月 12 日，日巡捕又越界抓走我纠察队指导员潘得姜等 5 人，在租界遭受殴打，经严重交涉后才放人。

1 月 21 日，“安宅”舰拦截我罢工委员会水上纠察队的“源安”轮，抓走指导员及水手共 5 人。22 日，甘介侯交涉员亲往日领事馆抗议。23 日，日方放回 5 人。但“源安”直到 29 日才放回。

4月5日,李芳接任交涉员。5月5日,继续交涉水案,日方要求我方停止“排日”,我方则要求日方撤走其海军陆战队,互提先决条件。

5月6日,国民党市党部召集反日罢工委员会协商,决定提出七个条件:1.撤兵;2.惩凶;3.日方出面道歉;4.抚恤家属6万元;5.交还水杏林尸体;6.日商工厂罢工工友复工后,厂方不得借故开除或凌辱;7.赔偿水案伤残工友损失1.7万元、罢工损失24万元。拖延1天,加补1天损失。

以上七条,日方一天不答应照办,反日排日运动一天不停止。日方初则拒绝,继而在抚恤、道歉、交还尸体几条上有所松动,但对撤兵则含糊其辞,其余也一概拒绝。

5月22日,日本舰队司令米内才宣布:日中两国悬案将由外交人员逐一解决。日本特别陆战队于5月31日撤回本土。

6月13日,李芳与日领事达成协议,7月7日晚正式签字。协议主要内容是:1.日本驻汉总领事书面向中国政府表示歉意;2.抚恤水杏林家属4600元;3.日商工厂工人复工。

水杏林父亲水德炳领抚恤金3600元,拿出1000元作其他伤残工友医疗费。水杏林尸体送回原籍云梦安葬。

水案前后历经半年,斗争胜利后,汉口“反日罢工委员会”改名“救国会”。

“一三”惨案

1927年伊始,武汉三镇广大人民为了庆祝北伐胜利,为了纪念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为了庆祝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各界联席会议决定:从元旦起连续三天举行提灯会、演讲会和集会游行。1月3日,正是武汉人民举行庆祝活动的第三天。中午2时,成千上万的群众秩序井然地聚集在汉口江汉关前面靠近英租界的空地上(现苗家码头)。这里当时有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30余名学生组成的宣传队在演说,晚上将燃放烟火。此时,英租界的印度巡捕,

竟越过租界线到华界内的沙滩上进行无理干涉；停泊在长江江面上的英舰也脱去炮衣，将炮口对着江岸。4时许，英国大批水兵突然从租界冲出，用刺刀驱赶听讲群众，当场将海员工会会员李大生的大肠挑出，重伤5人，轻伤30余人，制造了罪恶的“一三”惨案。当时汉口中国的各报刊马上刊发消息，对英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进行了及时揭露与谴责。



一三惨案时英国水兵与武汉民众对峙场景

面对英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广大人民群众怒不可遏，奋勇向前，与英国水兵展开搏斗。有的用手中的旗竿痛打英水兵，有的用扁担、杠棒与英兵枪杆互击，有的奋不顾身地徒手与敌人搏斗。一场激战，打得英兵仓皇退却，英勇的武汉人民追踪进击。在江汉关前，群众凌晨形成圆形包围英国海军陆战队，英军被迫退回到海关大楼前。晚间，双方仍然继续对峙，群众愈聚愈多，英国水兵托着步枪作射击准备。

当时正在汉口南洋大楼开会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闻讯后，立即派出代表徐谦、蒋作宾与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宛希俨、李国焯赶到现场。当时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共党员刘少奇同志闻讯后，马上同工人纠察队一起赶赴现场察看，并会同国民政府的代表，向英领事提出抗议，坚决支持工人阶级和群众的要求。武汉国民政府的代表要求英国水兵退入租界，同时于1月4日午后7时在新市场（今民众乐园）向群众宣布：“政府必当采取适当办法保

护人民，在 24 小时内当可决定办法，防止以后再有此等之事发生，及为人民报仇雪耻。在政府不决定办法时，望人民离开租界，以免危险。政府一经决定办法，立即通知人民”。随后英国水兵退入租界，群众亦陆续离去。

四 湖北武汉总工会和武汉工人运动

1926 年，北伐军由广州北上，直系军阀部队节节败退。9 月，汉口、汉阳光复。10 月 9 日，武昌孤城守军全部投降，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9 月，全总委员会李立三秘书长就抓住这一大好形势，来

到武汉。于 17 日在汉口物色到友益街 2 号（今 16 号、市文化局）三层楼房，成立了全国总工会办事处。由李立三任主任，刘少奇任秘书长。

10 月 10 日，在全总办事处的领导下，又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由向忠发任委员长，刘少奇兼秘书长。省总工会就在全总隔壁的一幢大楼，全总的办公楼是叶开泰的公馆，省总的办公楼是叶的女婿程汉卿（军阀王占元手下军法处长）的公馆。1927



湖北全省总工会旧址

年2月11日,中华全总由广州迁汉正式办公。12日,武汉市各基层工会为庆祝全总和省总工会的迁汉和成立,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全市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

2月20日,全总在汉举行执委扩大会,会议提出全国工人阶级当前斗争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反对向帝国主义及军阀势力妥协,反对个人专制和独裁,拥护革命政府北伐,支持农民要求土地的斗争。要求政府颁布劳动保护法,各地有组织工会和罢工的自由,工会可派代表参加政府会议等。

这一阶段,湖北和武汉的工人运动蓬勃展开,在收回英租界、反英示威、反英罢工及追悼“四三”惨案活动中,全市各阶层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其中为主体的是工人。

李立三、刘少奇在武汉领导省总工会工作时,大力整顿各级工会组织,大力培训工会干部。从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上半年,举办工人运动讲习所,训练工会干部。全总、省总工会开办50多所工人学校、夜校、教工人学文化、学政治。

刘少奇还撰写了《工会代表会》、《工会基本组织》、《工会经济问题》,作为工会干部的学习教材。

不到半年时间,湖北全省工会会员发展到51万人,成为全国工人运动最高涨的省份。

尤其是省总工会根据斗争形势,举办了工人纠察队训练班,培训男女纠察骨干,使武汉全市的工人纠察队员发展到5000多人,有枪3000多支。儿童团发展到1万多人。这对团结工人,开展斗争、维护社会治安,都起了很大作用。

5月20日,刘少奇在汉口召开的太平洋沿岸各国工人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6月19日,又在汉举行第四届全国劳动大会,选举了全总第四届执行委员,继续领导全国工人运动。

1927年6月28日,桂系军阀第八军军长李品仙派兵占领湖北省总工会,并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7月15日,汪精卫反动集团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逮捕、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革命遭到镇压,斗争转向农村。

五 历史转折关头的“八七会议”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5月,原国民革命军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被蒋介石收买,乘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武汉兵力空虚之际,率部叛乱。7月15日,汪精卫等右翼分子在武汉发动政变,宣布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封闭中华全国总工会,屠杀共产党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陈独秀一味妥协,节节退让,同意共产党全面放弃领导权,完全解除武装。7月12日,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总书记停职,不再担任领导。临时中央作出三项决定:1.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2.在南昌发动起义;3.召开中央紧急会议,清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今后方针。会议原定7月28日在武汉召开,由于当时的白色恐怖,通讯联络及交通不畅,会议延期至8月7日。

会议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紧张地进行了一天。地址选在旧俄租界三教街41号楼上。这是一幢三层楼洋房,是1920年

英商惠罗公司所建的一排公寓房,41号居中段。楼下是印度人开的小百货商店,楼上是苏联人洛卓莫夫的家。为安全起见,会议选



八七会议旧址内景

在靠后面巷子的后房而非面街的前房。

会议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瞿秋白分别作报告。罗明纳兹报告的标题是《关于党过去的错误以及新的路线》，瞿秋白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将来工作方针》报告。讨论时，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毛泽东对土地革命发表了重要意见，强调今后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英明论断。这句话以后演变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八七会议旧址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工人运动议决案》和《党的组织议决案》。选举产生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9人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7人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进行了一整天，中午简单地吃了些面包和罐头，喝了些茶水，吃完接着开会。散会后，分别从前门、后门逐个离去，消失在朦胧的暮色中。

八七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



八七会议记录



邓小平参观“八七会议旧址”纪念馆

大革命后期党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讨论和制定出挽救革命的新策略，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且把发动秋收暴动作为党当

时最重要的任务，在政治上使党有了新的出路，在组织上使党有了新的生命，重新把广大党员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它是中国革命由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标志。党发动和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很快在全国各地燃烧起武装斗争的烈火。这些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创建了崭新的革命武装——中国工农红军，开辟了红色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六 “人或为鱼鳖”的 1931 年大水

1931 年夏，阴寒多雨，武汉地区 5~7 月降雨量达 879.7 毫米，水位直线上升。8 月 19 日，江汉关水位达 28.28 米，创汉口有水文记录 66 年来的最高洪水位。

由于旧社会堤防失修，政府组织抗洪不力，给市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据当年报纸报道：整个汉口、半个武昌、部分汉阳被淹，时间长达 42~100 天。尤以江岸区受灾最为严重。

7月23日,江汉关水位26.48米时,大雨多日,外浸内渍,沿江及市内低洼处淹水。当局曾堵码头闸口与下水道,麻袋装土筑围,抽排渍水。

7月28日晨6时,江汉关水位27.15米。分金炉堤先溃。午后,邻近陈家墙的子堤崩倒10余丈。经围堵江岸火车站铁路口,又于六合路和记蛋厂侧面加筑麻袋土堤,江水暂未波及市区。7月29日晚23时,江汉关水位27.21米。丹水池油栈的103段堤溃决。至30日10时,105段堤再溃,形成260米之大溃口,江水倒灌直入,与后湖联成泽国一片。铁路、刘家庙、循礼门、中山公园、直至硃口,尽皆淹渍,陆地行舟。

8月2日17时30分,单洞门铁路路基冲倒,市内水位一再提高。仅宗关水厂、利济路电厂、申新纱厂、福新面粉厂等少数堤坚墙厚的工厂幸免于难,其余市街里巷均水深三四尺。江岸区沿铁路的棚户区,水深至屋檐。

据官方事后统计,武汉三镇受灾面积计321平方公里,汉口为79平方公里。被淹农田91847亩,汉口12930亩。受灾人数共636683人,其中汉口566864人。死亡3619人,其中汉口3515人。可见汉口是重灾区,而江岸区则是重中之重。



1931年武汉市内水况

由于灾后江岸区内灾民大多栖身于张公堤和铁路上，餐风露宿。有报刊曾报道他们的生活是：“毒水浸，蚊蝇虐，露天眠，疾病魔，一日之间发馒头两个，纵未溺死亦难免病死或饥饿。”“鸠形鹄面，惨不忍睹。”

这就是旧社会水灾之一幕。

七 抗战中的江岸

1938年6月12日，日军攻占安庆，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日本投入武汉会战的兵力有14个师团，300多架飞机，120多艘舰艇，连同后勤服务部队，共计50万人参战。武汉会战，大小战斗数百次，历时4个月，双方参战人数之多，作战地域之广，前所未有，为抗日战争中最大的一次会战。

抗日战争开始后，汉口日租界立即宣布戒严，江中军舰增至5艘，海军陆战队不时登陆作各种战斗演习。租界四周布满电网沙包，全副武装的警察来回逡巡。

武汉沦陷前，武汉军事当局在谏家矶水下设置水雷阻塞线，驻一队布雷员兵，水雷由德国土木工程师设计。钢铁雷壳

内装TNT炸药2吨多，外裹三合土，每个重约7吨左右。每3个水雷用电力交叉作为一组，按钮后同时爆炸，破坏力极大。安装时由两艘大铁壳驳船用吊杆吊起，将水雷慢慢沉入



武汉军民举行保卫武汉大游行

水底。岸上设有观测所,观察人员轮流防守。1938年8月,敌机10架轰炸布雷区,日舰3艘驶至谏家矶下离雷区约5000米、离炮台万米处,开炮轰击我炮台,两天发炮数百发。



汉口街上日军坦克横冲直撞

抗战以来,武

汉一直是日军空袭的重要目标。在武汉会战期间,日本空军对武汉加紧实施狂轰滥炸,以破坏我后方。

1937年8月,日本战机72架轰炸江岸车站等地,炸死炸伤民众1000余人,炸毁房屋785栋,汉口刘家庙、江岸车站一带民房烧毁过半,江岸下路近80栋木板房的火势尤为猛烈,烧死民众的残骸无法辨认。江岸车辆厂小工杨木山一家,除其本人外,其余6口均被烧成了黑炭。在平汉铁路医院门前,伤者大批聚集,医院人满为患。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开始轰炸武汉日军活动区,从汉口到汉阳、武昌,轮番轰炸。1944年12月18日,美机出动飞机200余架,利用在中国的基地,对武汉进行穿梭式轰炸,投掷了大量的燃烧弹。在一元路至五福路,江边至铁路沿线一带,长约3公里、宽约5公里的区域内,一片火海,房屋建筑被夷为平地。美机空袭中,汪伪汉口市政府亦被击中(即现在南京路与武汉图书馆旧馆之间)。三次大规模轰炸,江汉路向东北直至旧法、日租界,一片破瓦砾。武汉居民损失惨重,有全家被烧死者,有房屋财产全部烧光者。中山大道之世界大戏院(即现在兰陵路对面武汉交电公司)以及附近里弄全部炸毁。此里弄中有一高级鸦片烟馆,有数十烟民全部丧身。

为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入侵,中国空军不畏强敌,在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有力配合下,在保卫武汉的空战中,英勇顽强,屡挫强敌。

1938年2月,日军38架战机进袭武汉。中国空军派出战机28架在岱家山、滠口、舵落口上空与之激战,击落日军战机14架,其中一架坠落在岱家山之水塘内,其他有坠落在后湖、汉口与青山之间、汉口与黄陂之间等。4月,日军为庆祝“天皇节”,由日海军航空兵团派佐世保第二航空队69架战机空袭武汉,中国空军及苏联空军志愿大队67架战机迎敌。空战中击落日机29架,50名日军飞行员被击毙,2名被俘获。被击中日机,有一架坠落在刘家庙,一架坠落在谏家矶。5月,日军两批计54架战机进袭武汉,中国空军及苏联空军志愿大队升空投入战斗,采取冲向敌机将其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痛击敌机。经过30分钟激战,在汉口北部上空击落敌机12架。

1938年10月,日军第六师团佐野支队由黄陂进抵岱家山,并炮击驻守在岱家山、谏家矶阵地上的第九十四军第一八五师第五四五旅,该旅奉命向汉阳撤退。日本兵舰首先出现在汉口江面,开始从汉口特三区登陆,从黄陂县到刘家庙一带的晶本侵略军也进入汉口市,武汉沦陷。



2月18日敌机来袭,被我空军击落12架。图为是役参战空军之全体将士

八 孩子剧团在江岸

孩子剧团于1937年9月3日在上海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第一个少年儿童戏剧团体，是抗日战争的血泊孕育出的一朵奇葩。

上海沦陷后，“孩子剧团”历尽艰辛，1938年1月辗转来到武汉，受到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等革命前辈的亲切关怀。他们遵循周恩来走“救国、革命、创造”的指引道路，先后深入湖北、湖南、广西、贵州、四川广大城乡，以戏剧、歌咏等文艺形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抗日宣传活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

1938年1月29日，周恩来、王明致函郭沫若、于立群：“明日(30日)下午一时半，上海孩子剧团来办事处，请您们来和我们一起和小朋友聚谈。他们很想见见您们。”第二天，周恩来派吴志坚用一辆军车把孩子剧团全体团员接到“八办”，为欢迎剧团和回国参加抗战的郭沫若举行茶话会，出席的有周恩来、王明、叶剑英、博古、郭沫若、潘汉年、邓颖超、孟庆澍、叶挺以及“八办”的许多同志。会上王明、博古、叶挺、郭沫若等都讲了话。孩子们的代表傅承谟(现名陈模)介绍了孩子剧团成立的经过，全体团员唱了《孩子剧团团歌》，周恩来边听边打拍子，还热烈鼓掌。在茶话会开始之前和结束时，周恩来都讲了话。他说：“我们在长征的时候，有些小鬼，像彭桂生、吴志坚(用手指着彭、吴)……是和我们大人一道滚过来的。在最困难的时候，是我们把你们抱过来的，背过来的。可是他们呢(指孩子剧团)，一个大人也没有。从上海出发，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在敌人的炮火下，跑了几千里路，沿途还要做宣传工作，硬是跑到武汉来了，真是不容易啊！你们(指彭等)要向他们学习啊！……我送你们三句话好不好？第一，救国；第二，革命；第三，创造。你们要一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建立新

中国！”

2月12日,孩子剧团在汉口基督教青年会(今黎黄陂路10号)举行首次歌咏、戏剧公演。唱的是《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打回老家去》、《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演的是《捉汉奸》、《仁丹胡子》、《帮助咱们的游击队》、《放下你的鞭子》等,为期3天,受到人民群众的好评。吕复、赵明、冼星海、张曙等戏剧家、音乐家主动到团里帮助提高演出水平。

1942年9月,国民党下令“改组”孩子剧团,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把团员们逐步地撤退出来,送往延安等处学习;或到东江纵队等处工作。至此,孩子剧团宣告结束,完成了党赋予的历史使命。

1986年4月,在“八办”纪念馆和5位老团员的组织下,位

于江岸永清街辖区的武汉市二中、滑坡街小学、长春街小学等8所学校百多名少年儿童,组成了新孩子剧团。他们活跃在军营、学校、街道、里巷,为成千上万的听众演唱革命历史歌曲和时代新歌,社会各界反响很好。

1987年3月,武汉新孩子剧团全体团员发出了《为修建孩子剧团群雕倡议书》,这一倡议得到了广大少年儿童的积极响应。

1989年4月1日,孩子剧团老团长吴莆生、许翰如应邀到武



孩子剧团雕塑

汉,参加矗立在儿童公园的孩子剧团群雕的揭幕仪式。

多年来,新“孩子剧团”的成员有千千万万少年儿童在她的形象鼓舞和激励下,走上了建设和保卫国家的岗位。如今,由于市儿童公园改作他用,“孩子剧团”的雕塑迁至江岸区长春街小学内,愿“孩子剧团”精神永存。

九 恶魔大孚宪兵队

中山大道南京路口的前武汉图书馆外借处,原是大孚银行所在。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这幢大楼便被日本宪兵队霸占。从此,这个宪兵队被市民加上了“大孚”二字。

大孚宪兵队的工作,就是在汉口码头、车站设卡检查,也经常窜到旅社、民宅中随意抓人。抓进去后,任他拳打脚踢、鞭抽狗咬、或吊或摔、或灌盐水后踩肚子、或用电击。许多人受刑后,不是摧残致死,就是苦刑难忍时瞎供一气。

老百姓给大孚宪兵队编了两首民谣:“一进宪兵汉口队,有去没有回,就是能出来,也要成残废。”“阎王殿门朝西开,胡里马里抓人来。各种刑法都用上,天天都把死人抬。惟愿鸡叫天快亮,惟愿鬼子早垮台。”这是大孚宪兵队作恶的如实写照。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原汉口日军特务部长、战犯福山太一郎在战犯拘留所里供称:“在大孚银行的硝镪水洞内,骨肉化尽的中国军民有1万人,在中国银行院内(中山大道江汉路口、原日军汉口宪兵队本部)被狼犬咬死的有5000多人。在汉口华商总会(今江汉二路武汉科学技术情报中心)底层水牢中被折磨致死的人也很多”。

被大孚宪兵队残害的,不仅有抗日志士、爱国人士,更有不少无辜群众,例如“电线窃案”的受害者。

1941年7月间,循礼门的日军用电线被盗约200丈。大孚宪兵队班长田中二男带领宪佐、宪兵、中国翻译一帮人,强行抓走附近2000多人,集中到华商跑马场(今航空路华中科

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所在空地上),全部罚站,不准坐,不许睡,又不供饭给水。谁要一动,就会挨打。时值盛夏,许多人几小时后便晕倒,有的当场死去。

这样罚站刑讯,群情激昂,被抓者人人眼中是愤怒的目光。为避免激起民变,田中二男才同意交上500家商户联名盖印,对这些群众“铺保”,证明他们是“良民”后,才按名放人。抗战胜利后,制造“电线窃案”的主犯田中二男,被庄严公审,处以死刑,得到了应得的下场。

大孚宪兵队还在汉口郊区的坦教湖“低D洼”(今黄陂滢口),设有“杀人场”。头一天将受害人用汽车运来挖好后,便蒙上挖沟人双眼,强迫跪在沟边,逐一军刀砍头,踢进沟里,再用土掩埋。从1939年开始,到1945年8月止,月月都要在这里杀两三批,每批约20~70人。

1952年7月4日,当地农民纪念“七七事变”15周年,控诉日军当年暴行。会后,大家发掘埋人沟有60多条,仅第24号沟千尺长,4丈宽,4尺5寸深,就发现尸骨75具,一层一层堆起来,身首异处。有的尸骨上还带着手铐,穿着铁丝。现场所拍的相片,令人发指。

十 屈辱的“景明大楼事件”

坐落于江岸区鄱阳街与青岛路口,门牌号码为鄱阳街53号,占地面积575.04平方米,建筑面积3611.46平方米,外砌大理石,钢骨结构的6层大楼,是武汉市一幢较著名的建筑。原名景明大楼,现名民主大楼,是各民主党派市委会的办公楼。

此楼于1921年由英商景明洋行设计,汉协盛营造厂施工,建筑费、安装电梯和室内装修,共耗银14万两。建成后,1~2层由景明洋行办公用,3~6层出租给洋行及外国人。

1938年武汉沦陷被日军占用,1944年美机轰炸武汉,旁边同仁里被炸,该楼也受震动影响,多处损坏,并发生渗漏。抗

战胜利后,大楼成了外国人的公寓,6楼是犹太人开的赌场和舞厅。

解放后,经管人博利(法籍)登报声明放弃代管责任,我政府即按无主产业进行接收。1957年,进行过大修。以后又经常油漆粉刷、维修,保存完好。

也就是在这栋大楼里,曾发生

过震惊全国的景明大楼事件。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8月,正值武汉炎热夏季。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副经理利富即将调离汉口,他与美国空军军官乔治·林肯密商,要办一次舞会,尽情狂欢一下。为掩人耳目,以送行为名,找到歌舞厅的乐队指挥菲律宾人赛拉芬,要他负责拉乐队,另外尽量邀请中国妇女来伴舞(男士一律不要中国人,二十多位男士全是外国人)。赛拉芬决定与克劳兹组织乐队,拜托克劳兹的姘妇章月明出面邀约中国妇女,并许以酬金。章又通过舞厅、西餐厅的熟人邀约舞女、家庭妇女十余人,于8月7日晚到景明大楼5楼来参加舞会

十余人中,年龄最大的是32岁的曹秀英,最小的是其女儿,才15岁。除若干职业舞女外,多数是为赶时髦、过舞瘾和扩大社交面而来。

舞会开始前,举行鸡尾酒会,男女混杂,淫声荡语。9时半,利富令仆役将电梯上锁。舞会开始,洋人们借酒装疯,行动越轨。章月明趁机溜走,另有警惕性高的数人也溜走。



景明大楼

洋人们更加疯狂，强抱强吻，或将舞伴按倒在地，强脱衣服。此时又响起一声口哨，电灯随之全熄，舞厅一片呼救声和洋人淫笑声。乐队人员撤走，有的妇女挣扎从后楼太平门溜走，其余均遭到奸污。

晚 12 时许，受侮辱的歌女巧巧、莎莉（及其母亲）赶到市警察局报案。凌晨 3 时，六分局巡官马步云来到现场，只剩利富和乔治 2 人。现场虽尚存物证，但利富拒绝回答问题，马巡官只好离去。8 日上午，记者找到市警察局局长任建鹏，任拒绝采访。

汉口大小报刊乃至全国报刊，对此案件进行了一段时期的报道，有的要求国民党政府维护国家尊严，严惩凶犯。

主犯美国人利富和菲律宾人赛拉芬早已逃往香港，其他参加舞会的美军军官及英美侨民均逍遥法外。中国人章月明、杨玉麟、刘宝山、曹秀英、章继英等 5 人因邀人跳舞，处以有期徒刑。罪名是“妨害风化，意图营利”，当了外国人的替罪羊。

十一 黎明前后

党的地下斗争的重要战场

抗日战争时期，处于地下的中共武汉市委秘密办公处设在珞珈山街，领导和组织武汉人民争自由、要民主，反抗国民党的腐朽统治。解放前夕，江岸成为中共党的地下斗争的重要战场。

1946 年至 1947 年，中共江汉城工部在江岸地区设秘密联络处，为解放区秘密采购了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并输送了进步青年到解放区参加革命；1947 年至 1948 年，中共武汉市地下工作委员会和中共武汉地下市委先后在江岸区成立。解放前夕，中共武汉地下市委在江岸地区设立“迎接解放指挥部”，组织和领导武汉人民反破坏，反搬迁，保卫城市的斗争。中共

地下党组织在电信局建立了电话秘密指挥系统，各大工厂组织了工人护厂队，电信局工人“誓与机器共存亡”，阻止了敌人对电讯设备的破坏；街道由组织起来的工人纠察队分区联防；江岸铁路地下党支部组织工人开展了保卫工厂的斗争，江岸机车厂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将30多个火车头全部开走，疏散了大部分设备，使这些车头与设备得以保存，并在建国后迅速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去；轮船码头工人巧妙地与敌人周旋，保护了一些重要的船位设施。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设在刘家庙转车楼46号、48号。

1949年5月16日清晨，武汉各界代表乘车到浚口迎接人民解放军。下午三时左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一个营，由举着“天亮了”三字横幅的学生队伍为先导，由黄浦路经中山大道进入汉口市中心，赴江边布防。六时许，中国人民解放军40军118师从岱山进入市区。武汉市民几乎倾城出动，热烈欢迎子弟兵。汉口电信大楼前，挂起了毛泽东、朱德的巨



珞珈山街中共地下党组织驻地旧址

幅画像，到处都响起欢庆的锣鼓，到处都洋溢着革命的歌声，武汉这座拥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历史名城，在经历了漫漫长夜后，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从此获得了新生。

中原军区武汉办事处

1946年春，国民党蓄意挑起内战，动用30万大军，将解放军中原军区6万余人围困在宣化店一带，妄图消灭这支人民武装。为此，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进行了谈判。3月3日至8日，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在汉口向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三人小组陈述了意见，并与国民党武汉警备总司令郭忏谈妥，中原军区在武汉设立办事处。12日，武汉办事处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德明饭店二楼，郑绍文任办事处少将处长。

办事处成立后，立即开展了工作，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办事处多次与国民党武汉行营、北平军调部汉口小组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和交涉，争取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的同情和支持，将一批物资、药品运往中原解放区。办事处还配合军调部我方代表与蒋介石集团作斗争，在谈判桌上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办事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原解放军胜利突围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

在中原解放军被围困的日子里，中共中央多次与国民党当局和美国政府代表进行谈判，要求允许这支部队转移到华北或苏北；未转移以前，国民党当局应解除封锁，停止进攻。不久，签订了《罗山协议》、《应山协议》和《中原临时停战协议》。在周恩来再三要求下，三人小组在汉口杨森花园签署了《汉口协议》。根据协议内容，中原军区的700多名伤病员、眷属、医护人员全部先期转移到华北解放区。

鉴于此，中共中央急电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火速组织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6月26日晚，中原解放军在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

三领导下,全线出击,分途突围,主动向预定地区作战略转移,李先念、郑立三、陈少敏率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第二纵队十三旅、十五旅四十五团,王震率三五九旅和干部旅,从北路突围;王树声率第一纵队二旅、三旅和第二纵队十五旅,从南路突围;皮定钧率第一纵队十五旅,从东路突围。张体学率鄂东军区部队1万余人留下坚持斗争,并牵制敌人。

6月29日,中原解放军胜利冲破了敌人的包围,从柳林、花园之间越过平汉铁路向西挺进。经过多次激战,7月底,李先念、郑位三领导的主力部队创建了陕南游击根据地,王树声领导的主力部队创建了鄂西游击根据地,王震与皮定钧部分别到达陕甘宁解放区和苏皖解放区。中原突围的胜利,给反动派极大震动,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中原部队已胜利突围,加之全国内战爆发,7月9日,中原军区武汉办事处与北平军调部汉口小组、宣化店小组一道飞赴南京。7月13日,郑绍文在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了国民党进攻中原部队、全面挑起内战的阴谋。

中原军区武汉办事处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它设立虽只短短4个月,却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在

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形势要图



中原军区作战图

严峻残酷的形势下,临危不惧,讲究策略,巧妙斗争,力挽狂澜,显示了中共党和军队对敌斗争的水平。

岱家山与解放军入城处

贯穿江岸区的解放大道、中山大道、沿江大道、建设大道这四条大道中,最长的数解放大道。史料记载,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这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从江岸区东大门岱家山进入汉口市区的;当年解放军入城走过的路,被人民政府命名为“解放大道”。

岱家山古名晒甲山。位于汉口城区东北部,山体东至汉黄公路(汉口—黄陂),西抵张公堤,南麓有岱山村,北距二道桥400米。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50米,海拔37.1米。《汉阳县志》载为岱家山。传山上曾居鹤发童颜长寿老人,自称姓戴,善测天候,能预言风雨,乡人因称此山为戴家山。民间传说:三国时,刘备战将在此坠马,跌入府河,曾在此山晒铠晾甲,

因名晒甲山。

1952年区人民政府改“戴”为“岱”。自此改称岱家山。改意不详,有人释为是仿泰、岱(泰山)之名而称岱家山。因汉口自古有“十里沙洲”之称,一抹平阳,相比之



图为解放军入城部队行进在汉口中山大道上

下,此山可称汉口之高山,故以泰岱相喻。

岱家山扼汉口之咽喉,是兵家必争之地。辛亥革命时革命军曾与清兵激战于此。

1933年夏,国民政府在岱家山顶修筑钢筋水泥巨型碉堡,残堡至今仍存。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从岱家山侵入汉口,武汉三镇沦陷,驻此日军又修四座二层碉堡,增设哨卡。

汉口岱家山又是武汉走向光明、走向幸福的一个新起点。

岱家山,这个江岸区的东大门,1949年的5月16日,它首先迎接了解放。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领导下,横扫千军如卷席,国民党反动派已是穷途末路。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在汉口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一方面决定加强城防,固守武汉,另一方面却作逃跑准备。25日,湖北省政府开始迁恩施。5月初,以萧劲光为司令的解放军四野先遣队、二野第四兵团、江汉军区部队在武汉外围形成合围。10日,敌军开始乘车船分别从粤汉铁路和长江往南撤退。15日,解放军从团凤、黄石等地渡过长江。当天下午,白崇禧乘专机逃往长沙。敌第七军、五十八军也跟着逃离。晚7时,敌武汉警备司令发表“放弃武汉”的书面谈话。在武汉被合围的日子里,地下党武汉市委积极领导人民群众反搬迁,反破坏、迎接解放。16日清晨,汉口各界人士代表汉口84.6万人民乘车出岱家山至近镇滠口,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下午3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第四十军一一八师在师长邓岳率领下,踏上了岱家山的土地,经黄浦路向汉口市中心开进。部队队列的前面,是学生的队伍,他们高举着“天亮了”三字大横幅,喜气洋洋地在前面开道;沿途两旁被挤得水泄不通,汉口市民夹道欢迎,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合奏着胜利的乐曲。满街的一片欢呼,飞扬的彩纸,庆祝武汉人民的翻身解放,庆祝这盛大的节日。

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武昌、汉阳。整个武汉解放了。5月下旬,相继成立了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政委员会、



残存的岱家山碉堡

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湖北省军区和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在共产党领导下，武汉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地锁链，开始了新的生命。1949年5月16日，从此，成为武汉人民永志不忘的日子。

1958年冬，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张体学省长陪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至麻城参观视察，傍晚返汉，途经岱家山时，周总理曾询问此山名，隶属关系等等，并指示应在山头安装电灯，用作进入武汉市的标识，便于夜间为车辆照明。

今日岱家山的人们在努力促进东大门的繁荣。当年的乡间小路，如今已是全幅宽24米，由17米宽的高速行车道、1.5米宽的中央分隔绿带和4米宽的硬路肩组成的全封闭一级公路；当年的荒坡野地，如今已是绿浪滚滚，房屋错落。路两旁开辟了不定期的商业网点，成为一个繁荣兴旺的小市场了。

岱家山还在发展。一些了解这一历史的外地人来武汉，往往喜欢选择从此进城，肃穆而崇敬的心情可想而知。

第六章 新生的江岸

1949年5月，江岸摆脱了苦难，回到人民政府手中。

新生的江岸，刚从黑暗中走过来，就加入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中。清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恢复发展生产，战胜特大洪水，江岸人意气风发，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改造和新中国的建设中。

市场渐趋活跃，城乡物资流通，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

一 政治行政中心的确立

在江岸这块土地上，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风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直受到世人的关注。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武汉革命党人紧张筹备武装起义，在楚善里28号（现已拆除）试制炸弹，不幸爆炸，暴露目标，形势急转，紧接着爆发了10月10日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辛亥武昌起义。江岸地区成为辛亥革命阳夏战争首当其冲的

战场，民军与清军在潏口、刘家庙、姑嫂树、大智门、三眼桥、球场路等地反复争夺，日夜浴血鏖战。球场路的辛亥首义烈士公墓，就收集掩埋了许多当年激战后的烈士忠骨。

1920年8月，中共党的早期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当时共产国际代表——北京大学教授杨烈伟来汉，在德明饭店与董必武同志会见。

1921年5月，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和帮助下，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并成立了武汉地区最早的工会组织——人力车工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刘少奇、董必武、邓中夏、林育南、陈潭秋、项英等领导同志到武汉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1月，时任江岸京汉铁路俱乐部秘书干事的项英，由中共武汉区委书记包惠僧介绍，成为江岸地区第一个共产党员。同年，建立了由项英为负责人的江岸地区第一个党组织——江岸共产主义小组。1923年初，在中共武汉区委的领导下，陈潭秋、林育南、项英、施洋、林祥谦等组织江岸铁路工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罢工斗争高潮。1924年2月，中共汉口地委机关设在德润里23号，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顽强地领导着革命斗争。1926年至1927年，省总工会、全国总工会相继在江岸设立，李立三、向忠发、刘少奇等在这里领导工人运动，从此，武汉工人运动进入极盛时期，逐步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

1927年1月，湖北省总工会出面发起，组织武汉各界群众30万人举行反英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英国海军枪杀中国工人，迫使英国将在汉口的租界正式交还中国政府。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由沪迁汉，中央秘书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工委等部门均在江岸办公。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周恩来、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邓小平等同志以及宋庆龄在此领导革命斗争。

在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的危急关头，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秘密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确

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长江局设在长春街67号，“新四军军部”也设在江岸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博古）、叶挺、郭沫若曾在此工作，领导了抗日救亡运动；董必武、陈给禹（王明）、潘梓年等在此主办《新华日报》，大力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陶铸、张爱萍等中共领导人及国际友人斯诺、白求恩、斯特朗、艾黎等也都曾在江岸从事过革命活动。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处于地下的中共武汉市委秘密办公处设在珞珈山街，领导和组织武汉人民争自由、要民主，反抗国民党的腐朽统治。

江岸也曾二度成为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中心。国民党中央、省、市在汉口的行政首脑机关、党部、议会、法院及军警特机关大都设置在这里。国民党军政要员、社会权贵亦多居于此。是旧中国“高级华人”集中的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政委员会及中共武汉市委等首脑机关也设在区内，领导中南地区



武汉市军管会办公楼（今江汉饭店）

及全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江岸区是解放初期武汉市和中南地区的政治活动中心。现黎黄陂路 27 号、29 号这两栋俄式建筑所在地，经过了三次首脑机关迁移：第一次民国时期曾是国民党党部，第二次解放初期曾是中共武汉市委所在地，后市委搬迁至惠济路（原中共中南局所在地），第三次则是江岸区委区政府党政机关所在地。

当今，江岸地区仍是武汉市党政军机关的集中驻地。中共武汉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及 90% 以上的市直机关均集中在这里。军事单位、驻军部队也很多。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形成江岸区在武汉地区巨大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这也是江岸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迅速发展的政治优势和有利条件。

二 江岸行政区划

江岸行政区划及演变

清同治三年（1864 年），夏口镇修筑城堡，长 11 华里。循礼门以下属今江岸区，城内是租界，城外居住的华人也与时俱进。官方为了治理，设立了大智坊，因为大智门是城门、是要道、是人口集中地。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张之洞主持修后湖长堤，使大量荒湖干涸成为陆地。卢汉铁路于 1906 年通车。1907 年，拆除城堡，其城基成为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此后，循礼门至大智门铁路至后城马路的一块区域，被命名为模范区。大智坊向下扩大至今华清街一带。

1917 年 3 月收回德租界，1926 年 9 月改为汉口第一特别区。1925 年 3 月收回俄租界，1926 年 9 月改为第二特别区。1927 年 3 月收回英租界，改为第三特别区。1937 年 8 月收回日租界，汉口沦陷后日军恢复日租界的统治。1945 年同时收

回日、法两租界,恢复汉口市建制。

1946年,汉口市划分14个区,其中城区11个。而今江岸区占了4个城区(中山、大智、汉景、和平区)。

1949年5月武汉解放。1950年1月,武汉市调整区划,将中山、大智、汉景、和平4个区改为第五区和第六区。7月,再将第五区、第六区合并为第四区。

1950年12月,第四区人民政府成立。

1952年7月,第四区改称江岸区。

1968年7月,江岸区改称二七区。1969年11月,恢复江岸区区名至今。

区下面所属的街道时分时合,多的时候有23个,少的时候有7个。名称叫过人民政府、革命委员会、办事处,但以叫街道办事处的时候为多。

2000年底,全区划为上海、大智、车站、一元、四唯、永清、球场、西马、台北、劳动、花桥、二七、新村、丹水池、岱山、谏家矶16个街办事处和后湖乡一个乡政府。

街乡行政区划及演变

截至2000年12月31日,区辖16个行政街道,1个乡人民政府,158个居委会,28个村委会。

1951年7月,在居民中开始民主改革。1952年9月,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进行民主建政工作,全区划分为21个街道行政区。同年10月6日成立各街人民政府,为区人民政府的基层政权机构。1954年5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通则(草案)》的规定,街人民政府改为街办事处,成为区人民政府派出的办事机构。

从1955年起至1961年,先后变更5次。1955年3月从江汉区划来西马、解放两街办事处,8月撤销北京、岳飞两街办事处,新建太平、安静两街办事处,全区为23个街办事处;1957年4月合并为15个街办事处;6月,市人委决定将汉桥区的丹



武汉市江岸区域现状图

水池、黄家墩(同月改为新村街)两街办事处划来,全区为17个街办事处;1958年6月,扩大街道职权范围,调整为11个街办事处;1959年6月,按照市委关于“实行市、区、街三级领导”,充分发挥条块作用的指示,进一步调整为7个街办事处;1960年5月,开展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建立江岸人民公社,7个街均建立分社(未另设行政机构,只有1个街任命了分社领导人);1961年5月分社自行解体,并参照1957年街道设置情况,恢复为17个街办事处;1960年7月,郊区所辖的岱山人民公社划归江岸公社领导,改为分社。1961年5月以后调整为岱山、解放、谌家矶、塔子4个公社,1964年8月全部划归市郊汉桥区领导。

“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区17个街中有13个街办事处在扫“四旧”时更改街名。1968年4月至10月各街建立“革命领导小组”。1971年1月,17个街调整为12个街,同年相继成立了街革命委员会。1972年10月又改街名,12个街中,除保留二七街的新街名外,其余11个街均恢复“文革”前的原街名,其中四唯街的“维”改为“唯”。

1978年9月,撤销街革委会,恢复街办事处。1982年6月新建江岸区人民政府鄂城墩办公室,1986年3月改为鄂城墩街办事处。1985年2月,实行城带郊体制,洪山区的岱山街办事处、后湖乡、谏家矶乡划入。1987年7月新建江岸区人民政府花桥办公室,1988年5月,花桥办公室改为花桥街办事处。1992年8月,鄂城墩街办事处改名台北街办事处。2000年12月,谏家矶拆乡设街。至此,全区共有16个街办事处和1个乡政府。名称为: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上海街办事处、大智街办事处、一元街办事处、车站街办事处、四唯街办事处、永清街办事处、球场街办事处、西马街办事处、劳动街办事处、二七街办事处、新村街办事处、丹水池街办事处、台北街办事处、岱山街办事处、花桥街办事处、谏家矶街办事处及后湖乡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是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是区政府大量工作的承担者。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为适应加强城市管理、全面提升城市服务功能的需要,街道办事处



江岸区位置示意图

的工作重点,已由解放初期单一的“民政型”转向综合服务型;在经济工作方向,由办自救性的生产服务小组转向管理和发展第三产业;在城市管理方面,由对小街小巷的被动管理转向市容、环卫、绿化、城管、工商等方面的综合治理;在居民工作方面,从原来仅仅管老头老太、抓抓学习、管管救济,转向以搞好计划生育、社会治安、民事调解、卫生防疫、群众文体等多种内容的创建文明居委会和文明街道的轨道。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惠济饭店听取汉口交易街(后并入大智街)街长陈光中关于街道工作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每天和群众打交道,最有意思。你是基层领导,应经常检查自己的官僚主义,防止干部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掌好政权,巩固政权。不要脱离群众,遇事多同群众商量,多关心群众生活。”

三 抗美援朝中的江岸

1950年6月25日,美国等国发动侵朝战争。10月19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1953年7月27日,中朝与美韩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这两年的时间里,全国



在朝鲜前线慰问

开展抗美援朝群众运动。

1950年11月15日,中共武汉市委发出《关于加强时事宣传的指示》,全区(当时是武汉市第四区,1952年7月改江岸区)立即广泛开展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宣传教育运动。1951年1月29~31日,召开了“武汉市第四区各界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出席代表407人。会议通过了加强宣传、治安、拥军优属等决议,并成立“武汉市第四区各界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委员会”。基层划片成立联络站、宣传网,行动起来。具体工作是:

1.控诉美、日帝国主义罪行

针对群众中存在崇美、恐美的思想,组织控诉美帝在武昌花园山虐杀我国童婴16100名、在“景明大楼事件”中侮辱奸淫中国妇女的罪行。

2.和平签名运动

全区先后组织两次大规模签名运动:第一次是响应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和中国保卫和平大会号召,发起签名运动。截至1950年10月底,第四区参加签名者达12万人。第二次是反对美帝武装日本、保卫亚洲和平的签名运动,从1951年3月13日至4月底止,第四区参加签名者达118733人。另外,江岸区还发动群众写抗议美帝对日单独媾和的抗议信48530封。

3.示威游行

1950年12月12日全市工商界79000人举行示威游行,12月20日武汉地区文艺工作者抗美援朝示威大游行,1951年1月14日武汉妇女33000人抗美援朝大游行,江岸区均踊跃参加。

1951年5月1日,全市423000人游行大示威,江岸区参加人数为16076人。游行时间达14小时之久。

4.听志愿军英模报告

1951年5月至1952年2月,武汉市组织的志愿军、解放军、朝鲜人民军英模代表大型报告会有3次。1951年5月的第一次报告会,在汉口、武昌分别作报告18场,全市共有47.45

万人直接听了报告,约有60万人收听了报告。

5月21日,在江岸区铁路工人俱乐部举行的志愿军柴若川等的报告会,场内场外听众达1.5万人,铁路系统劳模范迪生代表全区工人讲话并保证“搞好生产,踊跃捐献,支援前线,必要时上前方并肩战斗”。在1951年10月和1952年2月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报告中,江岸区直接聆听报告的达16530余人。

此外,全区青年争先恐后报考军干校,经审查合格批准的有646人,铁路系统志愿援朝的先后有1006人,还有许多医护人员报名参加战地医疗工作。

在支前军需生产中,区委和区政府组织区内妇女赶制棉衣、棉被、军鞋、袜子,加工炒米、炒面,日夜开工。仅缝制袜底就动员了4万名妇女,10天内缝制袜底116600双。

许多工厂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口号有“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武器”、“多干一件活,就是多消灭一个敌人”等。

1951年6月1日,中国抗美援朝总会提出“推动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拥军优属”三大号召。全区职工和居民、学生积极响应,劳模带头倡议捐献“搬运工人号”、“武汉居民号”飞机。至1951年4月底止,已捐款115227707元(旧人民币,下同),5~6月又捐款272951050元。

1950年10月至1951年4月,全区在拥军优属方面,帮助解决烈军属就业319户、减免医药费165户、减免学杂费150户、发放补助粮(大米)17520斤。1952年春节慰问军烈属猪肉3080斤、送慰问金629万元,各剧院和文化部门发烈军属招待券14584张。

四 扎实开展禁烟禁毒

旧社会的江岸是毒品较集中的地区,因为这里有火车站、轮船码头,人流量大。既有租界,又有华界,你禁他不禁,大毒犯多有军政人员、租界实权人物、青洪帮作靠山,甚至军阀官

僚本身就是
癮君子。在
武汉沦陷的7
年当中,日伪
更是明目张
胆地鼓励中
国人吸毒,仅
在汉口便有
400家烟馆。

解放后,
中央人民政
府于1950年
2月24日公
布《严禁鸦片



武汉市委书记、市长李先念作禁烟禁毒讲话

烟毒的通令》。武汉市于1952年6月开始,开展了一次群众性的禁烟禁毒运动。江岸区成立了区禁烟禁毒委员会,区内17个派出所都成立了检查大队,由所长任队长、街民政干事任副队长,每队10~20人。队以下设发动群众、规劝毒犯和烟民登记3个小组,每组吸收居委会群干、居民中积极分子若干。

根据市政府的要求,6~8月要搞好材料准备、专案侦察、发动群众三大步,逮捕一批大毒犯。9月开始毒犯坦白登记、审讯、追缴毒品毒具和深挖大毒犯的工作,并确定以友益(现车站所)、云樵(现大智所)、天津(现上海所)、南京(现大智所)、汉江(现四唯所)等5个派出所为重点,以行商、私人西药诊所、旅栈、山货(尤其是烟叶行)为突破口。以大会报告、小会讨论的办法,教育群众懂得禁烟禁毒的重要性、迫切性,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心,了解禁烟禁毒是反帝斗争、爱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先后召开大小会议500次以上,参加的居民有16万余人。

根据不完整的统计,1952年全区共有241398人,其中制、运、贩卖毒犯和吸食者共2344人;制毒6人、运毒105人、贩

毒 1 103 人、吸毒 1 130 人。以上情况表明，江岸区禁烟禁毒任务十分艰巨。

经过层层动员，大造声势，毒犯与吸食者预感前途不妙，或坦白交代，或请求政府收容协助戒毒，或现身说法当反面教员，或被亲属检举揭发。但也有人订攻守同盟，说小不说大，说远不说近，交代问题像“挤牙膏”。吸毒者更是采取观望态度，到 8 月底主动前来登记者仅 272 人，还有 3/4 的人企图蒙混过关。

禁毒的重点是打击制造、偷运、贩卖中的大犯、主犯、惯犯和现行犯。对毒犯执行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吸毒者则限期登记，定期戒除，查出登记后复吸者予以处罚。

禁毒的头几年，对毒犯的打击处理有些偏轻，多被教育释放，致使毒犯有恃无恐，或采取更隐蔽狡猾手段。也有些吸毒者说风凉话：“对对对，只要把这些烟贩子都抓起来关在牢里，我们买不到烟，自然会戒。”

针对以上情况，各街召集毒犯家属座谈会、瘾民坦白检举控诉毒贩罪行会，也不断上门做毒犯、瘾民的思想工作，端正其态度。加上市、区组织的公审大会、毒犯游街示众、文艺演出、宣传政策、分化瓦解毒犯等办法，把全区禁烟禁毒推向高潮。毒犯李聚九说：“过去我的态度是不管政策压、开会挤，我是坚决不谈的。参加公审会后，我才感到只有彻底交代才有出路。”毒犯黄公臣的女儿在会上检举父亲贩毒的罪行，并动员其父亲交出毒品。陶某控诉大毒犯王清绪长期贩卖毒品，将她买来当佣人；长大后，又逼她当妓女为他赚钱。毒犯杜培森、白玉智、胡德安坦白交代，还交出吗啡 10 多两。全区被立案的毒犯共 247 人，其中运毒犯 31 人、贩毒犯 198 人、制毒犯 5 人、集团毒犯 13 人。至 1952 年 9 月 12 日止，共有瘾民 902 人先后登记，并提出戒烟的时间保证。

至 1952 年 9 月止，江岸区禁烟禁毒运动基本结束。

五 解放初期妓女改造

娼妓制度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特别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后，这种野蛮残酷摧残妇女的罪恶制度，成为旧中国社会的一大毒瘤。解放前，汉口是一座较大的商业城市，水陆交通方便，人口异常复杂。江岸区所辖范围既是当时汉口繁华地区的中心地带，又有英、德、法、俄、日等帝国主义的租界夹杂其间，成为乐户群集和妓女卖淫的场所。今江岸区如寿里、长清里、永贵里都是当年妓女窝子。解放后，虽有不少乐户和妓女外逃，但娼妓活动仍是严重的问题之一。

在江岸区经揭发逮捕的23名乐户老板中，他们先后共害死妓女41名。他们是残害妓女的凶神恶煞，是阻碍妓女跳出火坑的绊脚石。解放后，江岸区委和区人民政府根据市委指示，采取果断措施，在城市民主改革中将这些乐户列为打击的对象，为挽救妓女铲除娼妓制度扫清了道路。

妓女陷入火坑，虽是社会底层最受压迫与摧残的一群可怜人，却染上了人间最坏的恶习。她们中不少人信天命，讲迷信，喜怒无常，不知羞耻；有的纸醉金



解放前的烟花女

迷不能自拔，有的干下流事习以为常。她们既是旧社会遗留的受害者，是被扭曲的人，也是较难教育的对象。为了引导她们走新生之路，党和政府对她们的改造着眼于关怀，立足于挽救，采取了两个大的步骤开展工作。

第一步：江岸区委、区人民政府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 1951 年 4 月 21 日发出的“对妓女问题，应采取严格限制”的指示精神，调查了本地区娼妓活动的情况，并采取措施，如取消了一些不正当的娱乐场所，严查户口，控制嫖客，禁止妓女上街拉客等，用以限制妓女活动。为了帮助她们了解党的政策，并进行时事教育，于 1951 年 12 月在娼妓比较集中的地方长清里组织了两期学习班，参加的妓女有 48 名。宣传党对娼妓处理的方针政策，教育她们认清形势、端正态度，提高觉悟走自新之路；还关心她们，为她们积极治疗性病。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她们的思想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学习结束时，有 23 人要求参加工作和生产，有 4 人回家生产，有 8 人结婚，7 人有了对象，只有 4 人思想模糊，属后进分子，但愿接受改造，保证不操旧业。说明办学习班取得了成功，为改造和解放妓女迈出了

可喜的一步。

第二步，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 1952 年 9 月 10 日发布的《关于取缔娼妓封闭妓院》的命令，按照市府的统一布置，一举封闭了全区的妓院。至 1956 年，分批收容



消灭娼妓制度后，喜获新生的妇女跳起了欢快的秧歌舞

了明妓暗娼共 189 人,先后都送往武汉市新生妇女教养院(在今粤汉码头)学习改造。经过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她们在学习改造中逐渐都觉悟了,深深感到党对她们的挽救,洗心革面投入了新社会。有的结了婚,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有的被介绍到工厂、医院、机关、农场参加了工作和生产,而且在各条战线上做出了成绩,得到了好评。

虽然娼妓制度被彻底废弃,公开操业的妓女遭到禁止,但仍有一部分零星暗娼,杂居于街道里巷之中,依然暗中卖淫,有些又不够收容条件。为了发动群众,教育改造她们,不让她们再走邪路,江岸区人民政府于 1956 年制订公布了《江岸区娼妓交由群众监督教育试行办法》,立足于挽救,并从制度上保证她们通向光明大道。这样,在当时泛滥起来的一小股暗娼问题也得到解决,从而结束了中国妇女史上最耻辱的一页。

六 战胜 1954 年特大洪水

1954 年雨季到来早,且雨区广,雨量大,持续时间长。5 月,洞庭、鄱阳湖区大雨,6~7 月暴雨集中,月降雨量超过 600~700 毫米,较正常年份多 2~4 倍。长江中游、江汉平原、清江的雨水、山洪汇集,汉江亦相继出现洪峰。

武汉地区 5~7 月,2/3 时间为雨天,总降雨量 1394.2 毫米,为历史上同期之最。1~6 月降雨超过武汉历年全年降雨量。

6 月 25 日 14 时,武汉关即突破警戒水位(26.30 米),至 8 月 18 日 15 时,达到 29.73 米,为百年所未有。直到 10 月 3 日 7 时,武汉关水位方落至警戒水位以下,高水位竟持续 100 天。

汉口堤防共 58.58 公里,高度均在 26~29 米间,主要干堤按 1931 年的 28.28 米为标准设防的。沿江上段有 1929 年后修的 5.6 公里防水墙,下段(属江岸区)7.65 公里,原为各国租界各自设计施工的驳岸,加上 1931 年水灾后加修的防水墙。断面高低不一,规格各异,接缝龟裂。最可虑的是沿江码头闸



众志成城筑堤防，武汉关固若金汤

口多达 90 余处，且地下管道复杂，厕所、下水道封填不实，隐患甚多。

江岸区地域处于这场大水险要部位。东南是长江，1931 年首先溃口破堤的分金炉堤段、丹水池铁路路基堤均在江岸沿江堤段。虽经 1931 年大水后加修了防水堤，但全线断面高低不一，结构质量各异，接缝错位，龟裂严重。特别是 90 多个闸口，对防守压力大；还有地下复杂的管道铺设，以至填封不实的地下厕所，均存在隐患。尤其是 1931 年溃口堤段还未根治，更不能掉以轻心。汉口北侧张公堤，于 1931 年大水后虽增加高培厚，但处于河湖附近的地基更让人提心吊胆。更令人气愤的是，国民党军队溃逃前，曾在沿堤挖战壕、筑碉堡，破坏严重。虽经多年修复加固，但未经高水位考验，其散浸、管漏隐患甚多。尤以金银潭、垮档子、龙口、闸眼港、禁口等堤段，堤基淤泥深，堤内脚紧接塘游湖淌，在水位 28 米以上时，曾多次发生大滑坡，几乎酿成溃口。全堤防抗洪能力极差。

汉口沿江大道上海路口，位于堤身的抽水机房后墙冒水。8 月 17 日（水位 29.68 米）下午，筑于土堤身的抽水机泵房左方后窗发生严重漏水，经检查系土堤核心墙连接处有空隙。当即采取外帮麻袋土、堤身抽槽，用压力灌浆机向空中灌入混凝

土浆处理。经三天抢救,险情消除。8月24日(水位29.61米)下午2时,丹水池附近324号电杆处发现堤内背水坡有2厘米大的洞口冒水,几分钟后扩大到30厘米,江水内涌。总部决定:在堤外临水面用袋土加工帮护堤,堤内背水面做道滤井。400余人奋战一夜方脱险。25日上午10时,又在铁路子堤与老堤结合处发现两个大洞,水已满洞口。指挥部决定继续在堤外临水面以粘土加厚,堤内背水面筑围井,按技术要求填筑跌窝,终于使这一堤段脱离险情。

6月27日,武汉关水位26.47米时,市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布命令,动员全市人员立即行动起来,以防汛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7月10日,水位27.84米,市委决定实行一长负责制,严格实行“三包”(包守、包修、包抢)责任制。7月31日,水位28.27米,市人民政府发布命令,要求采取具体措施,确保安全,以防万一。市委、防汛总党委、市总工会也发出通知、命令,要求贯彻市府命令。市防汛总指挥部根据汛情发展形势,从6月底至9月初,按照水涨堤高、永远走在洪水前面的要求,进行了防汛抗洪的五期堤防工程,全市堤防普遍进行了加高培厚。江岸区的沿江大堤加高到了30.4~30.8米,堤身断面扩大了1/2, 1/3迎水面铺设了干



1954年江岸区防汛奖励大会

砌坦坡；张公堤进行了加高培厚，并整修了坦坡，加固了龙口、垮档子险工险段的基础处理，经受了8月18日29.73米的历史最高洪水位的考验。

8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致慰问电，号召全体防汛大军再接再厉，为争取最后战胜洪水而奋斗。8月7日，水位29.26米，市委发布《关于在“万一”情况下，组织居民转移安全地区，抢救灾民的指示》，并制定警报和信号。8月8日，水位29.56米，武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追悼在防汛斗争中牺牲的67位烈士。10月3日，水位落至26.25米，降到警戒水位以下。10月3~10日，自总指挥部至各级、各单位举行总结庆功大会，宣布武汉防汛斗争已取得最后的、完全的胜利。

6月30日~9月3日，总指挥部先后部署了5期堤防加高加固工程。武汉人民先后组织两次大型防汛慰问团，分赴前线慰问防汛大军及受灾人民，并于7月24日、9月18日举行两次全市性的慰问大会。

中央对武汉防汛工作十分重视，下达过多次紧急指示，中央首长亲自过问，并指定邓子恢副总理负责领导武汉防汛工作。毛泽东主席为庆贺武汉防汛取得伟大胜利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特大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七 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全市掀起了一次对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纷纷组织起来。1955年江岸辖区小商小贩共计6199户，大部分走上了合作化的高级形式，组织了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共负盈亏的合作商店和统一管理、分散经营、各负盈亏的合作小组。对经营统购统销的计划分配物资的粮食、猪牛肉、蛋品等行业，直接过渡为国营。部分有一定规模的小商并入了合营户实行定资定息。

1958年，市委对私改造领导小组发出“对残存小商小贩的整顿和改造方案”以后，有计划有准备的对小商小贩实行进一步改造。许多个体小商小贩纷纷申请，要求政府批准他们搞合作。这是1956年合作化后又一次集中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区人委制订了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几个原则问题的意见。到1959年9月，全区76%的个体小商小贩参加了合作商店（食堂）。据统计，到1962



1953年毛主席在武汉与小商贩交谈

年6月，全区共有合作商店核算店226个（供应点459个、3742人；合作小组315个、3033人）；零星个体小商小贩只剩下277人。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取得了对小商小贩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

1959年7月以后，全区进行了一次比较集中的小商小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了以“八好”（服务态度好、经营作风好、明码标价好、商品质量好、执行政策好、清洁卫生好、完成计划好、经营管理好）、“四坚决”（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遵守政府政策法规、坚决接受群众监督）为中心的服务良好活动。对提高思想觉悟，改善经营作风，提高服务质量，取得了明显效果。

第七章 崛起的江岸

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江岸的各项建设迅速发展。特别是近十年来,江岸区委、区政府坚持按照社区经济的发展思路,努力建设开放型的城区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全区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最近4年,财政收入翻了一番。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先后荣获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区、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城区、全国文化工作先进区、全国双拥模范区、全省文明城区、全省社区建设示范区等荣誉称号,并被确定为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2001年,江岸区第九次党代会进一步确立了社区经济一体化、城乡建设一体化、治城育人一体化的发展思路,有力地推动了全区城乡建设和各项事业。以黄浦科技园区、谏家矶制造业园区、都市工业园区、沿中环线物流业发展带“三区一带”为重点的江岸经济新格局,为江岸的更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经济进入快车道

区级经济发展回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岸区级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和加速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浅层次改革，到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结构创新；由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向谋求战略导向，推进区街经济民营化、集约化和股份化，历时近二十年。其发展轨迹大致经历了小步稳进与发展迈进两个阶段，逐步构建了区域资源配置、城区功能提升、综合实力增强的发展机制，实现了经济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一、小步稳进阶段。这一阶段大致在1980年~1993年。基本特征是以市场取向的改革为基本方向，以放权让利和企业承包经营发展经济为主要形式，具有3个特点。

第一，艰难起步。1978年以后，在全国改革由农村走向城市的大环境中，武汉市城区还没有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左的思潮还束缚着生产力发展。城区主要工作是精神文明建设和管好城市两个方面。江岸区提出的工作指导思想一直是“一手抓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主要精力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该说这个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但经济基础的薄弱直接影响着精神文明的建设。1979年市政府又将城区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无偿上调，仅江岸就被上收了70余家企业，使本来就十分弱小的城区经济更加脆弱。此时，全国改革和发展浪潮兴起，推动了城区改革的启动，各城区相继把搞活企业作为中心环节，以恢复区街集体经济本来面目为契机，以承包开路，放权搞活经济为主要形式，释放生产力，给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江岸经济在这种环境下开始启动，由被动发展逐步转向主动发展，由改革

推进逐步发展到改革与发展相互促进，形成城区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增长期。

第二，焕发生机。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按照党的新时期总路线，城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加快了工作重心的转移。1984年前后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发展思路，把过去以主要精力抓精神文明建设转向到以主要精力发展经济，推进生产力发展。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通过改革把生产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二是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把原有体制中受到压抑的物质能量进一步释放出来，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旧体制有了很大的突破，城区政府、企业和直接劳动者都尝到了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成果，使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1980年~1987年的7年间，社会总产值保持了年均增长13.88%的水平，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0亿大关。

第三，稳中求进。1987年以后，随着旧体制在各个方面逐步突破，经济秩序本身也出现了一些混乱。面对宏观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问题，国家作出了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在这一阶段，城区经济发展面对两大困难：一是由于经济发展基础脆弱，众多企业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市场占有率大，对计划经济体制和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双重依赖性较强，在发展中的从属配套地位比较明显，在治理整顿中“船小难抵浪”，处于艰难境地。二是城区经济改革仍然以单项突破为主要形式，综合配套改革，尤其是制度创新比较缓慢，经济发展缺乏新体制的支撑。单项改革难以推进经济稳定发展，导致城区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中出现徘徊。为适应这一趋势，不少城区被迫放慢了发展步伐。1987年江岸提出了“搞活经济，繁荣江岸，团结奋斗，争走前列”的工作思路，在发展计划安排上，提出了当年工业增长进度保5争7的目标。1990年进一步强调“把保持稳定作为第一位的任务”，要求全区“在稳定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在发展计划上要求全区以年均4%的速度增长。这样的速度与宏观相适应。

二、发展迈进阶段。这一阶段大致从1993年至2001年。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为标志,江岸经济发展实现了第二次思想解放,步入了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

第一,创新发展理念,改变营运机制。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城区经济发展随着改革的重心由破除旧体制转向到建立新体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江岸也在发展中摈弃了过去小步推进、单向突破的方式,探索以新的体制和机制推进经济发展,把经济加快发展的依托点放在不断探索区属资源与社区资源的整合上。1993年提出了“建立社区法人所有制与民营经济相结合的经济结构”的战略构想。第一次把全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思路和政策引向到依托社区资源,实施区域内的资源合理配置和运用,变营运区内资本为营运区域资本,形成了社区经济的新思路。

1997年提出了“三化”(民营化、股份化和集约化)的基本工作方针。从指导思想上进一步把社区经济运行体制进行了具体化。2001年,在总结“三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社区



区领导参加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

经济思路,提出了楼宇经济、街道经济、场所经济和园区基地经济的集群经济发展模式。

从社区经济到区级经济民营化、股份化和集约化,进而发展楼宇、街路、场所、园区基地经济,带来全区思想的大解放,促进了全区经济体制创新和结构创新,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要求,推进了全区所有制改革,加快了国退民进的进程。到2001年,全区国有企业改制面达到90%,集体企业改制面达到80%,民营经济和混合经济实体成为全区经济的主导,个私经济GDP和创造的财政收入占全区的1/3强。

第二,实施战略导向,整合社区资源。

江岸区在创新经济发展体制和机制的过程中,还积极探索经济的长远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谋划经济发展的战略导向。系统研究和提出战略构想是在80年代以后,从“八五”计划开始试运作,到“十五”计划逐步成熟。“七五”计划提出了“南工北商”的基本设想,“八五”计划进一步深化,强调了“两区一带”,即南有城中城和北有工业区,中有经贸带(中山大道商贸带、球场新光商贸带、解放大道下沿线商贸经济带)。“九五”计划提出了“依托社区,打好‘桥牌’,实现转变,再造江岸”的发展战略。规划了中心商务区、黄浦科技园区、谌家矶工业区、解放大道商贸新区等4个功能分区。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了“开发‘三沿’资源(沿江、沿桥和沿路),建设‘三高’城区(高水平的文教科技区、高品质的商贸商务区、高品位的生活住宅区),坚持可持续发展,实现新的跨越”的发展战略,规划了中心商业区,沿江金融贸易区、黄浦科技园区、北大门物流配送中心和后湖住宅新区,把发展战略与城区布局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发展战略上的转变。

第三,创新发展目标,加快发展步伐。

90年代以来,江岸经济发展目标逐步提高,实现两个跨越式突破,经济发展谋求5年翻一番。总的轨迹是由一位数增长上升到两位数增长,继而稳定在年均增长15%的标高上;由过去注重以工业、农业、商业分量指标转向到突出以区为单位

的 GDP 总量规模、财政收入、固定资产三大反映全区经济发展成果的目标。“八五”至“九五”间,全区经济发展目标在年均增长 15% 的标高上,实现了两个五年计划的翻番。其中:“九五”目标设置更趋科学,发展速度更具气魄,提出了刷新五大主要经济指标的目标,要求社会总收入、GDP、利税总额、财政收入和职工年收入五个翻番,达到再造江岸的目的。“十五”计划继续提出了各项经济指标年均增长 15%,五年再翻一番的硬目标。

社区经济发展透视

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不久的一天,有关领导、专家、学者汇聚江岸区,领会五中全会关于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精神,并从理论上指导江岸对发展社区经济所进行的新的实践和探索。

长期以来,城区经济共同面临的难题是资金短缺。但在同等的条件下,从 1992 年到 1994 年的近两年,江岸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令人注目的现象。截至 1994 年底,在 7 个方面实现突破性的增长,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新水平:

——农村社会总产值由 1992 年的 4.7 亿元猛增到 22.0233 亿元,净增 17.3 亿元,两年增了近三倍。

——区属商业销售由 1992 年 6 亿增长到 10 亿元,两年净增 4 亿元。

——新办三资企业由 1992 年以前累计的 21 家,增加到 132 家,两年新办的 111 家;引进资金由 1992 年的 802 万美元增到 5324 万美元,提前三年完成了党代会确定的兴办目标。

——规模经济迅猛发展,亿元街、亿元村、亿元企业 1992 年为零,1994 年发展为 15 个。

——个体经济由 1992 年的 4696 户发展到 8635 户,增加近一倍;产值销售额由 1992 年 4.3 亿元猛增长 26.46 亿元,增了近 5 倍。

——财政收入由 1992 年的 8 166 万元增至 18 500 万元，增了一倍多。

同样的天地，同等的基础条件，江岸区经济何以在短短两年间一别于以往，实现大跨步的跳跃式增长呢？从对实践的回顾和分析看，关键是找到了适合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社区经济（即：社区法人所有制与民营经济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最大限度地集聚了经济生长的有利条件的因素，创造了符合江岸区实际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区委在七次党代会上提出了建立“社区法人所有制与民营经济相结合”的社区经济发展新思路。

就内涵而言，社区法人所有制，是指一定社区中具有法人地位的企业财产重新整合所形成的资产结构；民营则指国有、集体经济以外的非公有制经济。生产要素按市场原则在相互之间自由流动或组合，融合众多的利益关系，提供了潜在利益的机会，能够使所有伙伴都可以获得比单独行动所取得的结果更大的好处，由此推动社区经济的繁荣。

提出这一思路的目的在于：打破所有制和级次隶属封锁，改变资源配置方式，由社区经济沙盘变为利益共同体，建立一种新的企业生长及组合方式，使城区经济发展壮大的立足点由只靠区属单位转向依靠全社区，把推动经济发展的任务延扩到社区乃至广大群众中去，成为社会各方、各种力量的共同责任，实现发展力量的社区内的全方位结合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建立一种具有社区特色的经济模式。

这一思路的关键在于重新塑造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和运行机制，从而增强经济细胞的活性，使其在碰撞中重构重塑，在融合中取长补短，实现三个转变：一是转变全区经济运行模式，即由过去封闭的、依靠自我积累扩大再生产的传统方式转变为开放的、吸纳社区内外各类法人生产要素共同实现扩大再生产，做到“找伙求财”，聚四方之力发展自己；二是转变企业生长方式，即以市场为导向，以产权为纽带，将单个资本自我积累实现由秩序式生长变为多个资本开放式积累，扩张式

生长,使全区经济在短期内快速长大;三是转变经济发展观念,即放手发展群众经济,把蕴藏在广大群众手中的消费资金潜在的能量挖掘出来,转化为生产资金,通过投资入股等方式直接参与社区建设。

新思路确定后,区里相继制发了《关于股份制试点区的实施意见》、《加快发展股份合作制意见》、《关于加快发展个私经济的意见》、《加快街道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旨在推动新机制建立的文件,并请有关专家论证,在组织各类研究班的基础上举办了副处以上领导和各级干部培训班。通过学习,统一认识,把新思路化为全区上下的自觉行动。

江岸推行“社区经济”新思路,加大探索的步伐,走出一条成熟的、符合江岸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全区经济发展迅速进入了快车道。

乡村经济巡礼

江岸区后湖乡位于武汉城区北部,东临长江、朱家河,南靠解放大道、建设大道,西与东西湖区张公堤接壤,北临黄陂区;京广铁路、汉黄、汉施公路穿乡而过,“张公堤”横穿乡境,是武汉市中心城区的北大门。境内湖泊河塘密布,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全乡面积 27.31 平方公里,24 个行政村,常住人口 25 698 人。

解放前的后湖乡,湖塘坟墓遍布,荒草萋萋,洪水来时泽国一片。农民种田捕捞依天候而获,长年劳作,难以养家糊口。即使在解放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后湖也没有摆脱“半年淹水半年干,半年糠菜半年粮”、“茅草房、烂鱼塘,修个猪圈当银行”的穷巴巴的日子。然而,后湖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为了摆脱贫困,他们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引导下,勇于改变后湖的面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最终使后湖成为华中大地一颗经济实力雄厚、农民生活富足的小康型乡村新星。

后湖，过去一直是城区市民农副产品和鲜鱼肉猪的供应基地。随着城市面积的扩张，后湖的大片耕地湖塘被征用，昔日的菜园、藕池、鱼塘上已耸立着一幢幢高楼大厦，田间小道已被宽阔的大道取而代之，城市化进程已使后湖菜地水面减少近30%。1950年，后湖的耕地水面面积共计近3万余亩，不仅种植蔬菜，还大量种植粮食作物，水稻、玉米、小麦、蔬菜的种植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的40%左右。鱼塘、淌子、沟渠遍布全境，渔业以捕捞为主，人工养鱼甚少。1955年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自发组成联户农业合作社，对种植、养殖依各村资源进行了分工。当时有蔬菜合作社、粮食作物为主的合作社和渔业合作社。后湖的幸福村最早成立渔业社，以捕捞为主，兼营鱼苗捕获及培养外销。到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后湖的农业才初步形成了以蔬菜为主，兼养殖渔业、牲猪、奶牛的农业模式。在“大跃进”时期，后湖依靠集体力量，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兴修水利，开鱼池、扩耕地，当时虽产量不高，但在农田基本建设上做出了成绩，在一定程度上给后湖的农业打下了基础。“文化大革命”期间，后湖的农业主要以集体农业、养殖



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的后湖乡农民在自己的渔塘内喜获丰收

业为主,蔬菜产品单一,质量不高,盲目追求产量,统购统销,每年重复种植,新品种甚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后湖率先在全市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民一户或联户承包菜地、鱼塘、藕池,自主经营。除上交集体外,剩余部分可自由买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全乡农业生产呈现生机勃勃景象。1985年全乡工农业产值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成为全省第一个亿元乡。随后,后湖陆续出现了一定规模专业化的养猪、养牛、养鱼专业户,蔬菜产量年年增产,速度超过建国后任何时期。农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社会事业不断进步,农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1993年,乡村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快速增长,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平均达20%。在不到8年的时间里,全乡大部分村的社会生产总值超过亿元。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至1990年,后湖的乡村经济发展彻底改变了后湖乡落后的贫穷面貌,集体和个体经济基本完成了原始积累。在1990年至2000年的10年里,乡村经济的发展以科技为主,注重市场竞争。他们开辟新的经济增长领域,大力发展庄园农业、高科技密集型企业,实行科学管理,理顺产权关系;建立工业园区,大办各类专业市场,招商引资,使后湖乡的经济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了质的转变。

而今,后湖进一步发挥武汉市“农副产品”基地的作用,每天向市场供应大量的新鲜蔬菜、鲜鱼、肉猪、鲜奶。2000年全年仅蔬菜完成了23888吨,生猪出栏4715头,牛奶2202吨,禽蛋分别为16.5万只和137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建有30个无公害蔬菜基地。乡内渠道畅通,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需要。农用物资供应充足,农业科研、示范、推广体系完善。农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为8.2%,达5647.50元。

进入21世纪,后湖提出了“二次创业”目标,在稳步发展农业、狠抓农业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坚持以项目为支撑,改革创新,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改善乡村面貌和投资环境,加快社

会事业全面进步和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2001年,全乡实现社会总收入 848 714 万元,实现利税 62 215 万元,人均收入增长 38.2%,达 5 647.5 元。

后湖这片土地上,处处呈现勃勃生机,展示了蒸蒸日上的发展活力。使人对历史的变迁感慨不已,使人对将来的发展信心满怀。

楚天第一村

后湖乡竹叶山村综合实力跃居全省第一,人均产值达到 100 万元,号称“楚天第一村”,并摘取全省“村状元”的桂冠。

十年前,竹叶山村还是一个小小的渔牧村,被称为汉口的“北大荒”,满目蒿草,出门泥巴塘,全村一年总收入不过几百万元,在整个后湖乡排后。如今全村年收入超过 20 亿元,村级综合经济实力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名列全省第一。从一个渔牧小村发展为集团股份公司,总收入从 1990 年的不足 300 万到如今的 22 亿元,综合经济实力、农民生活质量连续多年



由竹叶山集团承办的中国武汉国际机电产品博览会

稳居全省第一。

十年来,竹叶山村敢招天下客,敢聚天下财,敢为天下先,认准发展这一硬道理,产业形态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1991年退一进二办实业,实现第一次跳跃式突破,成立了武汉市第一个农民出租车公司。

1996年退二进三,办起了大型专业市场。他们“借桥发财”,利用长江二桥通车的机遇,先后建起了华中地区最大的竹叶山汽车市场,中南地区最大的竹叶山佐料、家禽批发市场,武汉市最大的竹叶山钢材市场;创建了全国第一个由村级组建的国际展馆——华中国际博览中心,第一家汽车贸易网站——东风环宇网络公司。

2002年又与泰国正大集团合作建超市,建成了全国第一个“汽车超市”。目前,已成为有10个子公司共20个经济实体、一个集物业管理、交通运输、高科技、工业贸易于一体的综合性股份制集团公司。2002年创造社会总收入228802万元,集团公司综合实力排在全市第27位。

竹叶山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村里先后拿出50万元与武汉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联合开办全省第一个农民大专班;在培养土专家的同时积极引进外来人才,制定一整套人才奖励措施,20多名硕士、博士纷至沓来。全村大专以上学历的村民有89人,成为竹叶山的顶梁柱。村里“以股聚财”,目前,该村已完成产权制度改革,将村所属的实业公司改制为集科、贸



竹叶山集团投资组建的高新技术创业孵化中心——创业大厦

于一体的竹叶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昔日村民变股东，积极性空前高涨。

2002年，后湖乡竹叶山村建起的农民新村花园式小区——竹叶山示范村，建筑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的别墅式小区拔地而起，每套住宅面积最低150平方米，最多400平方米。村民自豪地说：我们提前实现了小康梦想。

民营经济的突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个体工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全区注册登记的个体经营户1357户，从业人员1719人，注册资金17.4万元，产值营业额93万元。经过10年，个私经济逐步发展为民营经济。到1992年，个私经营户4860家，从业人员14186人，注册资金6431万元，营业额产值达到124000万元。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江岸区个私经济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截至2000年，全区注册登记的个私经营户12221家，从业人员52539人，注册资金85013万元，创造产值(营业额)504806万元。10年间，分别以2.51倍、3.7倍、13.2倍和4.07倍速度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江岸区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实现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民营经济进入空前活跃阶段，总量不断增加，规模逐步扩大，产业领域快速拓展，从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繁荣活跃市场、扩大社会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增加税收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城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据调查，到2002年底，在江岸区落户的民营企业有8560户(不含未登记的从事个体经营的个体户)，注册资产总额超50多亿元；其中：注册资本100万元到500万元的有510户，500万元至1000万元以上的有49户，1000万元到4000万元以上的有25户，6000万元以上有1户。其中，私营有限责任

公司、股份公司 2 649 户, 独资企业 333 户, 个体商 5 678 户, 从业人达 7 万多人。在他们中间, 从事商业、饮食服务的企业有 7 858 户, 占总数 90.74%; 科技型企业有 155 户, 占总数的 1.79%; 从事其他业务的有 647 户, 占总数的 7.47%。近几年来, 湖锦、太子、金色池塘、正远、航天科技、双利、西格利防腐技术、田田, 盛源出租车等公司以及欧亚达电子市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兄弟律师事务所加速发展, 成为民营经济的领头羊。

民营经济的主要特征有如下几点:

1. 总量不断扩大, 资金实力逐步增强, 企业由少到多, 规模由小变大, 实力由弱变强。民营企业 2002 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1.8 亿元, 占全区经济总量的 65.7%,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税 6 935 万元, 占全区经济总量的 89%。

2. 经济组织类型多样化, 涉及行业广泛。民营企业经济类型包括私营独资、私营合伙、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等多种经济类型, 其中以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独资、个体经营者为主要组成形式。从产业结构看, 除保险、金融等国家仍未放开的行业外, 其他行业几乎都有介入。从产业集中度看, 尤其是从事第三产业为多。在第三产业中, 又以商品零售业、餐饮业为主, 产生了太子、三五、湖锦、好又多等一批知名民营企业。

3. 民营企业加速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化。全区民营科技企业 155 户, 其中从事高科技电子与信息的企业 92 户, 占科技型企业总数 59.35%。民营技术企业形成了一定的行业优势品牌, 如正远公司的微机控制系统, 航天公司的无泄漏阀门, 双利公司的稀土合金铝绞线, 伟博公司的小孔眼镜, 田田公司的田田珍珠口服液等, 东风环宇汽车网络服务网被誉为中国汽车第一网等。

4. 推动国有中小型企业改制的深入进行, 社会效益明显。民营企业充分利用政府有关国企改革的相关政策及良好机遇, 在吸纳下岗职工再就业、支持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民营企业通过各种形式组合, 租赁、兼并、购买亏

损的国有中小型企业，盘活了国有资产存量，扩大了增量，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国有资产利用率。如人福高科技公司、汉正街江浙私企等分别参与了区医药公司、小桃园酒楼的改制，富豪集团、广地金属公司、艾立卡公司相继参与了空压机二厂、长征汽车改装厂、惠济燃料公司、武汉饮料一厂的改制，推动了资产重组，盘活了资产存量，吸纳了下岗职工，也壮大了民营企业。

由于区委、区政府把发展民营经济列入江岸区发展规划，成立高层次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推动机构，统一政策，统一步调，统筹安排，形成合力，齐抓共管。江岸民营经济，在近十年的发展中，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以民营经济支撑的区域经济逐渐形成。江岸个体、民营经济得到迅猛发展。

二 城区发展战略

江岸近十年来改革开放之所以能保持高速持续发展，成为江岸区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就在于几届区委、区政府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立足江岸区区情，发挥江岸优势，制定出最适合江岸的发展战略。

七届区委时期正值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目标刚刚确定。江岸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计划经济的所有制壁垒和级次隶属的封锁，这直接造成了资源体制性的分割和凝固。针对这一情况，七届区委提出了社区经济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社区内的所有部门、单位、个人的技术、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都看成社区赖以发展的共同资源；二是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力量，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使这些资源优化配置；三是在配置过程中进行体制创新，打破所有制和隶属关系的封锁，使社区经济沙盘变为利益共同体，建立一种新的企业生长及组合方式，使城区经济发展壮大的立足点由只靠区属

单位转向依靠全社区，把推动经济发展的任务延伸到社区乃至广大群众中去，变成社会各方面、各种力量的共同责任，实现发展力量在社区内的全方位整合和资源的市场化，建立了一种具有社区特色的经济模式。这一战略的实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短短几年江岸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随着城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己工作生活的环境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城市功能的升级，也使得政府要从经营城市的角度来思考，不仅能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可以改善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八届区委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推动江岸政治、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主要战略，以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将江岸历史的、人文的、地理的、社会的潜在资源都整合为推动江岸发展的现实动力。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推动社区经济的民营化、股份化和集约化，使江岸经济的生长方式、生产规模、经济效益都上一个新的台阶；二是进行环境创新，即通过环境整治、旧城改造、污染治理、小区建设绿化亮化、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创造一个现代新型成区，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三是制定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将社会和环境的发展目标作为发展项目，纳入全区的发展规划，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时期不仅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城市面貌也得到了较大的改观。

中国加入WTO，给江岸的发展增加了一个新的国际视野。面对这一新的历史背景，九届区委提出了建设开放型现代化城区的战略构想。它的内涵：一是将江岸的经济汇入世界经济的大潮，在直接的积极参与中，加快自身的发展；二是继续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三是调整江岸的经济运行方式，使之与WTO的运行规则一致；四是政府实现职能转变，为所有企业提供公平的、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五是推进社区经济一体化、治城育人一体化、

城乡建设一体化。

这些年来,几届区委区政府认真组织发展战略的实施,探索出一条具有江岸特色的持续快速发展之路。1992年到2001年9年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13%,2001年达到29.3亿元;全区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3%,2001年达到5.4亿元。与此同时,江岸的社会各项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先后荣获了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城区,全国文化工作先进城区,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区等称号,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计划生育连续9年实现人口负增长;连续9年荣获全市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一等奖;连续3年被市综治委授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胜单位”称号;连续3年进入全市经济强区行列;连续两届被评为“全省双拥模范城区”;获得省、市“教育两基达标先进区”称号,并被确定为全国教改实验区和全国信息技术教育实验区。

21世纪头5年是江岸实现开放型现代化城区和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为此,区委、区政府提出了“三区一带”的经济发展布局。即以珠宝首饰加工基地为标志的黄浦科技园区,以制造业为主的谏家矶工业园,以华中服饰基地为代表的都市工业园和沿中环线的市场物流带。

经过实施,江岸一个具有中等城市经济实力的富强文明的现代新型城区,将展现在人们面前。

三 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贯彻《中国21世纪议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既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也是江岸发展的必然抉择。江岸区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1996年创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以来,先后经历了武汉市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湖北省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三个阶段,推动了全区经济、社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1999年江岸区被国家科技部正式批准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全区坚持实施科教兴区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先后实施了两轮可持续发展项目行动计划，内容覆盖经济、人口与资源、社会与环境三大方面59个项目；进一步加大了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可持续发展的力度，有力地促进江岸区乃至江岸地区科技与经济、人口与资源、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1999年11月22日至23日，由国家科技部举办，江岸区委、区政府协办的全国首次“城市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武汉市江岸区举行。来自国家科技部、教育部、公安部的领导，湖北省暨武汉市的领导、国内专家代表和全国6省11市的50多位与会代表聚集江岸，共商“城市可持续发展”大计。国家科技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司长作了讲话。武汉市江岸区和北京市怀柔县、山东省日照市、江苏省江阴市、湖南省资兴市被批准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与时俱进，抢抓机遇，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推动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江岸区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始终贯穿于全区工作的一条主线。江岸区创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以来，全区科技兴区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企业成



武汉市江岸区社区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

为全区技术企业。武汉正远电气被科技部认定为火炬重点企业。维豪信息、正远电气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相继成立研究开发中心。正远电气开发出的“内燃机车微机控制系统”产品填补国内空白,列入国家火炬计划;长江电气兆欧表、75KW功率脉冲电源等一批新产品获国家新产品证书。全区共申报批准国家级火炬计划4项,实施国家级星火计划3项,国家重点科技成果推广计划2项,有6项科技成果通过鉴定,国际先进1项,填补国内空白3项,国内先进2项。先后建立了三阳、金冠、竹叶山等5个孵化基地及江岸区创业中心大楼,孵化面积可达2.5万平方米,进驻孵化基地企业43家,形成“一个中心,多个孵化基地”的格局。江岸区被列为全市科技成果推广示范区和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城区。

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为目标,提升城区环境建设和城区功能。黎黄陂路改造工程,中山大道、友益街、江汉路步行街改造工程,南京路小游园等大型绿地建成,使城区功能和城区环境有了显著的改观。黄浦路污水合理深排江工程,了解放大道以南、中山大道以北、江汉路以东、黄浦路以西3.38平方公里范围内的生活及工业污水的净化处理问题,改善了城区环境,减轻了对长江水源的污染。

坚持以人为本,狠抓环境创新。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牢牢抓住全市完善内环道路,建设中环交通,全面建设轻轨一期工程等一批大型市政设施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先后完成了香港路、建设大道科技馆路、京汉大道、后湖路、百步亭延长线等20多条道路的扩建工程和排水工程。特别是解放大道下延线经过拓宽,成为全市的标杆路段,为武汉市改善北大门的交通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

构筑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全面加强环境保护。按照市委提出的大力推动环境创新、加快山水园林城市建设的总体部署和要求,狠抓环境建设工程,营造新靓点,追求高品位,努力建设“洁绿亮安”的新江岸。几年来,全区实施了一批历史文化建筑实施整旧如旧以及亮化美化工程,建成了黎黄陂路

历史文化景观街、友益街景观商业街；“武汉外滩”江岸段建设工程，即沿江大道从江汉关到三阳路 2.4 公里段的道路建筑和“天梨路”江岸段 4.7 公里段景观路建设工程。突出社会绿化、道路配套绿化和中心区域绿化，大力实施绿化工程。谌家矶郊游公园、田田绿化广场建成，建成了中山大道少儿图书馆、扬子街等小游园，全区绿地面积达 580 万平方米。全面加强环境保护，在全市率先实现“一控双达标”，全面完成辖区 56 家工业企业污染治理，限期治理老污染源 27 项，加强控制新污染源，环境质量逐年提高。

坚持社会全面进步，推动各项事业加快发展。以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精神为指导，积极推进文明社区建设。在街道社区中开展了争创文明街道、文明社区、文明小区、文明门栋的活动，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的文明素质。百步亭花园社区狠抓环境创新，全方位完善社区功能，坚持实施教育可持续发展战略。近两年全区投入教育发展资金达 3 000 多万元，二中、六中等中小学和专业学校先后进入省、市示范学校行列，育才小学、育才二小被国家确定为全国“素质教育实验基地”和“创新教育实验学校”。李岚清副总理和教育部长陈至立视察后给予了充分肯定。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兴建了占地 10 000 多平方米的区文化馆，97% 居委会（村）建有文化室，而且全部达标，并有一批被文化部命名的“标杆文化站”。全区每年春夏秋冬都要组织不同内容、不同特点的群众性大型文体活动，形成了江岸区文化活动的“四季歌”。卫生战线建立健全了防保网络，初步形成了全区社区医疗服务网络。先后实施了第八医院和人民医院改建工程，为江岸两大医疗单位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体育事业保持了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事业齐头并进的良好势头。区内拥有 33.7 万体育人口，周继红、韩爱萍等一批誉满中外的体育名将走向世界。计划生育工作连续 9 年实现人口负增长。1997 年以来，连续 3 年被评为湖北省计划生育先进工作单位；连续 9 年被评为全市计生工作目标管理一等

奖,对人口增长实行了有效的控制。

新世纪之初,江岸与时俱进,再一次迎来了广交朋友,展示自我,与世界交融的机会。2002年1月16日至19日,由国家科技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和美国能源部APEC项目办公室主办,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办公室、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和APEC可持续发展社区能源小组承办,江岸区政府协办的“APEC能效与可持续社区规划管理培训班”,在江岸区长海大酒店举行。参加培训班的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的9名专家和全国23个省、市国家与地方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48名与会代表。科技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司长王晓方、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辜胜阻、湖北省科技厅副厅长刘海新、亚太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莱瑞·希尔、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以及江岸区有关领导出席了开幕式。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和时代前进的永恒主题。江岸,这块饱经历史沧桑的土地,如今旧貌换新颜,成为美丽江城可持续发展的—方热土。面对知识经济的来临和中国加入WTO,



APEC 能效与可持续社区规划管理培训班在江岸区举办

面对建设国际大都市武汉市,江岸将迈开大步,高举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两面旗帜,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走向新世纪,融入新世界,再造辉煌,迎接美好的未来。

四 投资新环境

招商引资热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区委、区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开放为先导”的方针,树立“引进”快,发展就快,“引进”是发展的主要支撑的思想意识,积极采取措施改善投资环境,夯实招商引资基础工作。

区第九次党代会后,提出了“大力建设开放型城区经济,必须坚持创造一流的投资环境”,要求进一步增强全区招商引资工作力度,推动全区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特别是着力打造“三区一带”增长极,为招商引资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

同时,扩大对外交往,多途径招商引资。区领导和有关部门近几年先后赴欧洲、澳大利亚、台湾、巴黎、深圳等地考察招商,邀请了美国加州湖北同乡会考察团,首届世界湖北同乡联谊会代表团来区观光、考察,进行项目洽谈。近几年来,全区招商引资呈现好的势头,以正大超市、好又多量贩店、数码港、港澳新世界百货为标志的服务业,以正远电器、双利电线电缆及航天波纹管、中兴纸品等为标志的工业,以科技园区和孵化区的兴起为标志的科技,以“九龙望江”建设为标志的商贸经济等方面的投资,显示了江岸投资的新亮点。

为了树立江岸“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形象,增强江岸对国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区委、区政府成立了对外开放领导小组,采取系列措施增强招商引资力度。

一、广泛开展“人人都是投资环境”实践行活动。成立实践行活动领导小组,由区委分管领导任组长,下设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督促和检查日常工作。

二、依法行政,创公平、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保护外商的合法效益。

三、成立重大项目招商工作专班,实行“贴身服务”,建立重大项目招商情况通报会制度。

四、对生产型、高新技术和出口创汇企业、投资额较大的三资企业、经营期超过10年的企业,除享受国家、省、市各项税收优惠外,还给予区级财政税收一定的优惠待遇。

五、成立江岸区清费治乱减员工作领导小组,严格审核收费项目和标准。

六、改善硬环境,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区功能。先后完成香港路、建设大道科技馆路、京汉大道、后湖路、百步亭延长线等二十多条道路的扩建工程和排水工程。全区市政道路发展到296万平方米,排水管网总长25.2万米。特别是解放大道下延线经过拓宽,成为全市的标杆路段,使武汉市东大门的交通状况大为改善,防汛、排渍能力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第四届“武洽会”江岸区项目签约仪式

七、引资渠道多样、灵活。采取“走出去、请进来”，“以外引外”、“以商招商”等方式，拓展在网上招商、电台招商、委托招商、扩大招商的范围，筹引资金。还可采用企业并购、项目融资等形式合作。

八、建设丹水池生产资料市场、黄浦科技园、谌家矶工业园、石桥发展区等园区，筑巢引凤，招商引资。有的现已形成规模。

九、制定奖励政策，对引荐企业来本区发展投资、赠款物、无偿转让先进技术的国内外企业、社会团体及其他经济组织及个人（统称“中介人”）进行奖励。

据统计，“九五”期间，全区实际利用外资 4 189 万美元，出口创汇 720 万美元，实施内联协作项目 218 项，实际引进内资 4.49 亿元。

随着我国加入 WTO，区对外开放再掀热潮，世界重量级“投资舰队”纷纷登陆江岸，全球 500 强的美国沃尔玛公司，法国欧尚公司，法国“加涪福”，英国“百安居”，北京东方集团以及台湾大润发、运车集团，香港中建集团，澳门金龙集团，福建侨成化等公司，多次来江岸实地考察洽谈，招商引资空前活跃，呈现出新的热潮。

重塑金融、商贸、信息中心

汉口是中国近代重要的通商口岸，江岸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曾经商贾云集，英国汇丰银行，美国花旗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中国的交通、金城及盐业银行及美最时洋行、安利英洋行、和记蛋厂等大的金融机构和商贸集团，构成了旧汉口的十里洋场，是当时重要的金融机构和商贸信息中心。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江岸区依托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及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优势，坚持高起点、大手笔地发展高层次的三产业，奠定江岸在全市金融、商贸、信息中心地位。

江岸区委、区政府非常重视发展金融商贸业，采取了一系

列举措来促进金融商贸业的发展。几年来,在沿江大道武汉关至三阳路地段,结合外滩改造,大力进行整旧复旧,让老建筑恢复历史旧貌,尽显其历史人文资源优势,并抓紧进行房屋置换,将一批旧银行及商号的房子腾退出来,积极对外进行招商引资,广泛与国内外知名金融机构及商贸集团联系洽谈,欢迎他们来此开展业务,共谋发展,再现昔日沿江金融商贸一条街街的繁华。此外,江岸还提出以“板块重组”为突破口,调整完善城区分区功能,形成适应未来发展要求的战略布局。其中在“永清片”实施大拆大建,进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共投入几十亿元,其中仅拆迁费就达7亿元,对428亩地共3335户实行整体搬迁,将这一块黄金宝地腾退出来,吸引开发商来此投资,建成高级商贸区;对“一元片”实施整体改造,整旧复旧,充分发挥其历史建筑众多、毗邻武汉外滩的独特优势,发展旅游观光及其他类型的高档次三产业。目前,面积为3.11平方公里的一元片正在积极进行招商引资工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目前,江岸区金融业发展迅速,交通银行武汉市分行、工商银行武汉市分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武汉分公司、太平洋保险武汉分公司、君安证券、华银证券等众多大金融机构遍布区内。2001年,全区金融业的区级税收达到5735万元,对全区财政收入的贡献率达到10%以上,成为江岸支柱产业之一。

路街特色经济是现代商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江岸区大力发展路街特色经济,紧紧把握江滩及沿江大道改造的契机,带动简称为“九龙望江”的与沿江大道垂直的南京路、青岛路、兰陵路、蔡锷路等9条特色商业街的发展,努力将其建成品牌商业街。目前,南京路照相器材一条街已初见成效,引进经营户100多家,建成两个照相器材市场,一批在国内有影响的照相器材企业如凤凰、上海、虎丘及台商仟乔、金成婚纱等都入驻南京路,成为全市最大一个照相器材销售市场。2002年全市统一进行环境整治,江岸区作为全市试点,环境整治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也给一批特色路街带来更加蓬勃的生机,使其文化内涵与商业氛围相互融合,特色更为浓厚。如吉庆街经过

整治重建后,民俗文化的特色更加突显,进一步打响了其民俗饮食文化一条街的品牌。台北街充分利用辖区内台北路、高雄路等一批以台湾地名命名的路名、街名、社区名所具有的独特人文色彩,倾力建设以台北路为中心的台湾风情一条街,将发展经济与营造特色文化氛围相结合,形成了一套具有现代气息、配套完善的整体规划方案,成功地吸引了台湾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秘书长等一批台商前来洽谈投资事宜,展现了台商项目扎堆发展的良好背景。

利用新建楼宇发展现代商贸信息业已颇有成效。江岸辖区内高楼林立,写字楼众多,发展现代商贸信息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据不完全统计,江岸辖区内共有150余栋楼宇正成为重要的现代商贸信息场所,海尔集团等国内大型企业营销机构都设在江岸楼宇内。经调查,其中41栋楼宇现有的594户实业公司。经贸型企业270户,占45.5%;房地产业和信息产业达140户,占23.6%。以上数据显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房地产业、信息产业、经贸型实业成为楼宇经济的主要产业,占总量的69.1%。在经贸型实业中,营销代理、市场策划和写字办公达到80%左右,呈现出良好的业态和组织结构。



沿江大道新姿

江岸是市委、市政府所在地,辖区内行政机关、科研院所、军事院校、新闻媒体多,众多的信息在这里集散,信息流通权威、量大、快速,因此,一大批信息企业应运而生,带动了江岸信息业的发展。如投资达亿元的电子图书物流中心就落户于江岸石桥发展区,以武汉维豪多媒体网络公司等为代表的IT产业蓬勃发展。辖区内电信通讯业发展迅速,以市电信大楼为中心,已发展成一个涵盖合作路、天津路、大智路、中山大道中段的庞大的电信市场群。武汉数码港、港澳中心等一幢幢大楼拔地而起,专门经销通讯产品。中国联通武汉总部也设在该区。江岸信息产业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已波及整个华中地区。

创业中心——科技孵化器

科技企业孵化器在我国又称之为创业中心,自2000年市科技局批准组建江岸区高新技术创业中心以来,江岸的创业中心建设得到了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区委明确指示,建设创业中心要突出江岸的特点,要把江岸发展楼宇经济的思



创业中心大楼

路与创业中心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由此,开始探索构建“一个中心多个孵化基地”的网络格局工作。

江岸的创业中心是由一个创业中心大楼和8个孵化基地组成。创业中心大楼位于黄浦科技园内,占地面积20亩,一期建筑面积1万立方米,二期建筑1.5万平方米,建设总投资将达到3400万元。一期工程建设,企业招商工作进展顺利。8个孵化基地分别为:竹叶山创业大厦、三阳广场、金冠大厦、天恒财智大厦、互联网大厦、跨世纪商厦、华通信息产业基地和佳特现代制造业基地。孵化总面积约5万余平方米,已入驻科技企业近60余家,涉及科技领域包括计算机软硬件设备、网络系统、生物工程、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设计技术等。各孵化基地在创业中心的统一指导下,初步形成了较为合理的管理制度和服务体系,为科技型企业基地内的创业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黄浦科技园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黄浦科技园坐落在江岸区后湖乡,是武汉市目前惟一位于城区中心的科技园区。科技园区有着独特区位,地处武汉市内环线边,后湖大道、幸福大道横穿黄孝河路延长线、新华下路于两侧。科技园远期规划面积5000亩,一期开发建设面积450亩。

开发区从2001年2月正式成立机构启动运作。一年多时间,园区总投资达8000万元,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园内市政道路、管网施工设计、黄孝河护坡工程施工及周边拆违工作已经完成,建成了总面积为20000平方米的3个绿化广场,园区环境有了根本性的改观。一个道路宽阔、成片绿化、干净保洁、昼夜治安的现代科技园区雏形已显现。2002年新增税收2000万元。目前,园区入园企业达到14家,一期征用开发的土地已经全部用完。入园企业中,金皇公司被定为“中国宝石生产示范基地”,将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宝石生产基地;



黄浦科技园

宝来汽车四位一体展销中心占地 25 亩,年经营收入达 1 亿元;武汉正远铁路电气研发基地占地 70 亩,丰田汽车华中展销厅占地 15 亩;江岸区创业中心占地 20 亩,建筑面积 5 000 平方米;田田药业园占地 60 亩;武汉新华书店物流中心占地 48 亩,将成为华中地区书刊物流、信息流中心。武汉长江通讯有限公司江北研发中心等一批具有高科技含量特征的企业将在此落户。黄浦科技园正在形成环境优美、功能齐全的高科技、高效率、高收益为区级经济可持续发展空间的工业园社区。

谏家矶工业园区

谏家矶工业园位于武汉市中心城区东北部,我市“东大门”谏家矶地区,东临汉北河,西至朱家河,南临长江,总面积 8.8 平方公里(堤内面积 6.5 平方公里),贯穿全境的汉施公路东连阳逻经济开发区,西接解放大道直达市中心。谏家矶地区是武汉市通往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华东各省市的交通要道,水、陆、空运输方便,距天河国际机场、阳逻国际机场、武汉港、汉口火车站、阳逻深水港、青山外贸码头都在 17 公里之内。

区委、区政府瞄准谏家矶地理优势,对工业园进行整体规

划,加大实施,近几年共投入4000多万元,用于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建标准化厂房,现有厂房建筑等6万多平方米。该地区目前拥有机械、电子、冶金、化工、轻工、服装、光纤电缆等10余种行业的不同经济成分的企业82家,其中加工型企业65家。园区中的南区主要以外资(港、台、日)企业诚力电子机械(武汉)有限公司、武汉吉品食品有限公司和出口创汇企业武汉华鑫塑网有限公司为代表。北区则是新建成的科技园区,主要以武汉双利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武汉锦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金龙王制冷装饰公司、天龙饲料、鸿源碳素公司为代表。据统计,累计吸引外来资金2亿多元。2001年实现产值1.4亿元,年收入1.7亿元,利税1600万元。

谏家矶作为全市重点经济建设区域,已被纳入武汉市“十五”总体规划(1997~2020年)。随着天兴洲长江大桥的建成,谏家矶园区将处于中环线上,南连青山工业区,北上岱黄公路。地区内交通便捷发达,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发展经济的空间和潜力巨大。区内水、电资源丰富,高低压线路齐全,新铺设的 $\phi 800\text{mm}$ 的自来水管网辐射全境,能满足各类项目的需



谏家矶工业园区示意图

要。邮政通讯设施齐全,金融体系完备,文化教育、娱乐广场、医院、集贸市场等市政基础设施功能优异。谏家矶地区治安状况良好,民风纯朴,多年被市、区评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先进单位,被市人民政府授予“无毒社区”的光荣称号。目前,地区软、硬投资环境已初具规模,具备一定竞争力;加之享有城市、农村双重优惠政策,以及“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和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开发原则,是投资的理想之地。随着城市发展重心的外移,谏家矶产业园区正日益发展成为都市中的新兴园区。

华中服饰基地

1998年以来,江岸区积极探索经济发展的平台,构建全区第一家都市工业园——华中服饰基地。自基地建设以来,不断做大做强。据统计,目前已引进服饰生产企业13户,利用闲置厂房2.21万平方米,安置下岗再就业岗位1740个。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基地的园均、户均效益可与优秀的上海杨浦

区工业园媲美。户均利用闲置厂房1700平方米以上,户均使用生产设备80~100台左右;户均注册资金198.15万元。2002年全年实



华中服饰生产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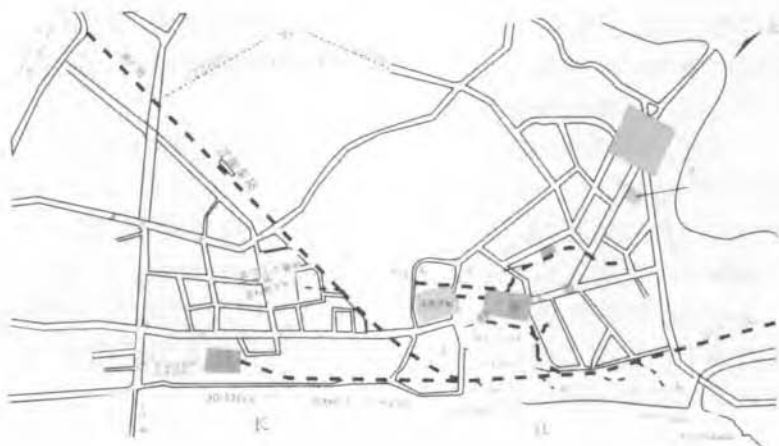
现入库税金 350 万元。同时，无线电厂也获取了丰厚的房屋租赁费，从而达到市、区、街、厂、企业“多赢”的效果。都市工业园中服饰产业的集聚，对投资者产生了很强的“磁场”效应，要求入园发展的投资者络绎不绝。

目前，华中服饰基地的多个名优产品已在法国、香港等地注册。如法国艾丝、妞娜公主、利莱士等产品在武商、武广等大型商场独领风骚，并且远销新疆、北京、广州、深圳等十多个大中城市。楚韵服饰还在多个大中城市设立办事处。与此同时，基地经济的发展也有力地拉动了区街的经济增长。该基地借助于武汉市无线电厂的空置厂房，为我区盘活资产存量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今日物流

江岸具有发展物流业的得天独厚的优势。解放大道、沿江大道黄浦路以下近 6 公里长的道路两边，聚集了众多的中央、省、市国有大型仓库。这里有数百万平方米的标准库房，有多年经营仓储业的人才和雄厚的技术力量，有专用铁路、专用码头、大型航调等基础设施，又地处城乡结合部，出场方便等等；具备了发展现代物流业的一切有利条件。近几年，区委、区政府抓住这一时机，营造新的投资环境，使这一带物流业态蓬勃发展起来。农机市场、钢材市场、塑料市场等已具备有数十亿的年交易额。特别是 661 钢材市场，仅场内交易，每年达 15 亿元，场外交易也有十几亿元。现在韩国三星集团已进驻 661，将之作为一个物流配送点。从整体来看，661 的经营业态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市场向综合的物流配送转变。另外，三九集团也在这一带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物流中心，正大集团也正在此筹建物流中心，一个为制造业服务的现代物流带已形成雏形。江岸将充分抓住入世带来的机遇，立足将这一带建设成为一个辐射华中地区、乃至全国的现代化的物流配送中心。

三九集团在发展医药连锁伊始，就非常重视物流问题的



江岸区物流中心示意图

存在及解决方案,在遵循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发展医药连锁中有关物流配送问题的相关规定的同时,为了更加合理、高效地处理好全国8 000~10 000家连锁药店的医药物流,集团进行充分的调研,并最终将三九药店体系全国中央采配中心的地址确定在武汉市江岸区后湖乡,并投巨资成立了专业的武汉市三九物流有限公司医药物流中心。已形成了一个占地面积约4 000多平方米,设有3 000个货位、5 000个拣选点的过渡性物流中心。完成了配送作业主流程及各子流程的设计和规划。武汉市三九物流有限公司医药物流中心现有的物流处理能力已达到每天处理100份定单以上,支持全国范围内500家连锁药店的物流配送能力。随着“三九”物流的启动,以中环线为主的物流带即将显现。

都市工业园

都市工业一般是指以大都市独特的信息流、人才流、现代物流、资金流等社会资源和区域土地、厂房、闲置设备等资源

为依托,以产品设计、技术开发和加工制造为主体,以都市工业园为基本载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能够在市中心区域内生存和发展,与城市功能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有就业、有税收、有环保、有形象的工业。加快都市工业园建设,是江岸打造“三区一带”增长极、推进江岸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充分发挥江岸智力密集、传统制造业集中以及部分处于城郊结合部的街(乡)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独特优势,加速区域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利于增强区级经济实力,促进区级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振兴武汉现代制造业”的整体部署,根据区第九届党代会精神和区“十五”计划要求,为着力打造“三区一带”增长极,加快江岸区都市工业园建设,为此,及时出台了《关于加快都市工业园建设试行意见》和《实施方案》。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本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力求科学合理的原则,制定全区都市工业园建设规划,使全区都市工业园建设有目标、有时间、有步骤、有标准地向前推进。

根据街(乡)情和企业特点,依托区域优势,因地制宜,加快创建具有区域特色的都市工业园。着眼于“一业为主”,把都市工业园建设成为各街(乡)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推动街(乡)经济走专业化、特色化路子,提高产业层次和产业关联度,避免低水平建设和企业间的无序竞争,重点支持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和就业量大的都市工业。力争引进一批有品牌、有市场、适应环保要求的企业入驻园区扎堆发展,形成多层次、多门类的企业群体。3年后,全区都市工业园力争达到20个以上。根据区域特色,建设一批“一业为主,多业并举”的产业基地,形成各具特色的都市工业园。

目前车站街、后湖乡、岱山街已初步建成华中服饰基地、红桥工业园、天马科技工业园、岱山佳特工业园等4个管理较规范的都市工业园区,吸引了一批同行业企业向园区扎堆,逐步实现聚集效应,并向特色化方向发展。据初步统计,这4家



外商考察谏家矾工业园

工业园共利用闲置场地 358.5 亩,建筑面积 10.55 万平方米,入驻企业 44 家,2002 年税收水平 839 万元,安排就业人员 5 350 人。从在建或拟建工业园产业发展情况来看,已有服装、针织品生产有 6 个,化工涂料生产 1 个,汽车零部件(配)件生产 2 个,日化、食品生产 1 个,电子、电器生产 2 个,机械加工 3 个,玻璃制品加工 1 个,纸业包装 1 个,轻工业制造加工 1 个,待确定 3 个。从现有的土地及空间资源来看,21 个园区(含拟建)目前占地面积共达 725.7 亩,建筑面积共达 24.5 万平方米,现已使用建筑面积达 13.5 万平方米,占 55.1%。今年红桥工业园将计划扩建 44 亩,使该园区总面积达到 120 亩。

华中服饰生产基地位于大智路 32 号,占地面积 12.5 亩,建筑面积 20 000 平方米,现已入园企业 14 家。产业发展方向:服装,预期实现生产能力 1 亿元,预期实现利税水平 700 万元。

五 日新月异的城建新貌

黄孝河治理

黄孝河是随着汉口城市发展逐渐形成的。黄孝河自庙墩开始,流经硚口、江汉、江岸3个行政区,至岱家山为止,而后经府河入长江,流域内的居民占汉口居民总数的85%,是汉口城区的主要排水干渠。黄孝河汇集了汉口130万人的生活污水和443家工厂和街道工业排放的废水,每天约50万吨之多。这条黑龙贯穿市区、孳生蚊蝇,散发恶臭,传播病毒,被人们说是“武汉的龙须沟”。也有人将它和南京的秦淮河、上海的苏州河、天津的祥水河并列为“中国城市的四大害河”。由于汉口城区地势低洼,雨量充沛集中,加之排水设施严重不足,每年小雨小渍,大雨大渍,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极大地限制了武汉市的城市发展和经济建设,严重影响群众的身体健康。因此,治理黄孝河是全市人民的迫切要求,是造福武汉人民的历史使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市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改革开放方针的鼓舞下,市委、市政府当机立断,作出了



黄孝河旧貌

依靠人民、自力更生,对黄孝河进行全面治理的决策,于1983年冬破土动工。

治理黄孝河工程规模浩大,投资过亿。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武汉市治理黄孝河工程指挥部”,同时分别成立各区治理黄孝河工程指挥部,由各区主要领导人担任政委和指挥长。江岸区各级领导十分重视,迅速组织了以区政府及城委领导为主的江岸区治黄指挥部,由区域委、市政、房地、交通等部门的负责人参加,组成领导班子。江岸区治黄指挥部按照市人民政府做好“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分片建设、逐年实施”的总安排和“先支流、后干流、先上游、后下游”的施工程序,组织辖区内有关施工部门参加,保质保量完成治黄工程。由江岸主要负责实施完成的工程项目有:

1. 机场河分流工程中航海照明厂至铁路桥段:该工程全长1363.9米,其中5.1米×2.7米双孔箱涵764米,6.8×2.7米双孔箱涵599米。该工程1983年11月开工,1984年4月完工。



江岸军民参加黄孝河路建设义务劳动



1985年10月5日，治理黄孝河主河道工程开工

2. 黄孝河主河道整治工程中惠济一路至赵家条段：该工程全长280米，均为 6.8×3.0 米双孔箱涵。其中包括吊物孔1座。该工程1986年11月开工，1987年3月完工。

3. 黄孝河明渠工程中余华岭至新益村段：该工程全长1113米，其中桥涵一座（畜牧岭桥），鱼塘取水泵站基础5座，鱼塘排水口5个，渠道进水口1座。该工程1988年10月开工，1989年4月完工。

4. 黄孝河路工程中惠济二路至江大路段：该工程全长245米，宽30米（其中车行道宽21米，两边人行道各宽4.5米），为水泥砼路面，施工中同步设置了电力、电信、煤气、自来水、路灯等管线。该工程1987年3月开工，1987年9月完工。

从1983年至1990年，治理黄孝河工程，施工战线20余公里。共完成挖填土方592万立方米，砼及钢筋砼18.4万立方米，用砖3460万块，总投资2.6亿元。通过8年的艰苦奋斗，胜利地完成治理黄孝河工程。它不仅解除了几十平方公里市区的渍水灾害，改善了市容与环境，而且带动促进了住宅、道



昔日黄孝河 今日靓丽路——建设大道

路、交通、绿化、供水、供电、供热和电信管道的建设，收到治理一条河，搞活一大片的综合效益。

黄孝河的治理使江岸城区向外拓展，台北街、花桥街，就是随建设大道的建成，人口聚集发展而设立的。如今这已成为全市闻名的金融一条街。

堤防改造

沿江堤坊改造。沿江堤防全长 11.86 公里，1998 年大汛以后，为了增强堤防的防御能力，改善江滩环境，国家累计投资 2.4 亿元对沿江堤段进行了改造加固，先后兴建武汉客运港改建钢筋砼箱式防水墙 142 米，完成钢筋砼 1 500 立方米。防水墙墙顶高程 31.73 米，顶部为 8 米宽的观江平台。武汉客运港至朱家河桥堤防全线吹填土方 269.86 万立方米。建成后堤外防浪台，台面高程为 28.8 米，台面宽为 160~240 米；新建预制块护坡 66 万平方米，坡比 1 : 3。江滩绿化建设 16 万平方米。朱家河桥堤外前戗台打 $\phi 800\text{mm}$ 钢筋砼灌注桩 108 根，新建驳

岸 200 米,完成钢筋砼 1 200 立方米,新建预制块护坡 7 000 平方米,坡比 1 : 3。沿江下段垂直隔渗累计 6 公里,水平隔渗 2.5 公里,处理伸缩缝长 935 米,处理裂缝长 2 380 米,新建驳岸 160 米。沿江共拆迁各类建筑物、构筑物 18.3 万平方米,征地 100 亩。

张公堤堤防改造。张公堤堤防全长 10 539 公里。在 1998 年以前,堤内外大部分地区是池塘,塘水长期浸泡堤脚,对堤防稳定造成严重威胁。1998 年以后,国家累计投资 9 800 万元,兴建改建了张公堤 0+000~10+539 堤外填筑防浪台,建成后台面宽 50 米,台面高 25.00 米。堤内填筑压浸台,建成后台面宽 30 米,台面高 25 米。累计完成土方 300 万平方米。新建预制块护坡 5.4 万平方米,格宾网护坡 1.63 万平方米,坡比 1 : 3。张公堤 0+000~0+203.7 兴建钢筋砼防水墙 203.7 米,完成钢筋砼 1020 立方米。张公堤 4+200 改建岱山闸一座,完成钢筋砼 4 400 立方米。张公堤共拆迁各类建筑物、构筑物 8 409 平方米,征地 2 882 亩。

谏家矶堤防改造。谏家矶堤防全长 11.428 公里。1998 年以前,全线堤防堤顶只有 6 米



沿江防汛大堤

宽,顶高为 28.00 米,且堤质较差,每到汛期,散浸管涌严重,险象环生。1998 年以后,国家投资加地方自筹,加高加固了该地区堤防,共兴建改建了谏家矶堤防 0+000~10+428 堤身加高培厚、堤内填压浸台、堤外填防浪台。建成后的堤防,堤顶宽 8 米,内外坡均为 1:3;堤内压浸台台面宽 30 米,高 26.00 米。堤外防浪台台面宽 50 米,高 26.00 米。累计完成土方 168.4 万立方米。谏家矶堤防 0+000~10+428 堤顶新建 C30 砼路面,完成砼 7 164 立方米。谏家矶堤防 0+000~10+428 堤外坡新建预制块护坡 8.85 平方米,坡比 1:3。谏家矶共拆迁各类建筑物、构筑物 30 192 平方米,征地 1 706.5 亩。

三段堤防的改造,大大加固了堤防防洪能力,消除了隐患,人们在堤内安居生活。

解放大道下延线扩建

解放大道下延线起于汉口黄浦路,止于朱家河大桥,全长 7.27 公里,是武汉市北大门的咽喉要道。但原有沥青路面宽仅 8~14 米,且破损严重,无完整的排水设施,遇雨即涝。1991 年市政府将解放大道下延线扩建作为城建一级目标,计划对此道路扩宽并同步进行市政基础设施的改造。该工程由市、区城建部门共同组织实施,分三期完成。

第一期工程:黄浦路口至新马路,全长 5 517 公里。全线路段根据现实条件,远近结合,除二七路至铁路桥段外,其他路段均按 14 米宽路幅改造为水泥砼路面;埋设 ϕ 1800 毫米以上管涵 2.3 公里。其中二七路至铁路桥段,长 1.4 公里,按 50 米规划断面一次形成,同步在路面下埋设排水、给水、电信、电力等公用设施,道路断面布局为机动车道 21 米宽,两侧各 2.5 米宽绿化带、7 米宽非机动车道和 5 米宽人行道。该工程于 1991 年 4 月开工,1991 年 12 月竣工。

第二期工程:黄浦路至二七路,全长 1 125 公里,将原有 14 米宽路幅扩宽至 50 米,路面结构均为水泥砼,同步埋设徐州

新村排水箱涵356米。该工程1992年元月动工,1992年9月竣工。

第三期工程:铁路桥至朱家河大桥,道路全长4.9公里,将原有14米宽的路幅扩宽至40~50米,沿线布设 $\phi 800\sim$



解放大道下延线街景

$\phi 2000$ 排水管;排水干管全长7721公里。该工程于1998年3月开工,1999年12月竣工。

该工程的建成,改善了汉中段北大门通而不畅的交通状况,使岱黄一级公路和汉施公路进出城区的道路畅通并消除了沿线地区渍水危害,具有显著的综合社会效益。

沿江大道改造

沿江大道是武汉市重要的滨江景观路,毗邻闻名全国的江汉路商业步行街。其中江汉关至三阳路2.4公里,既是传统的金融业中心,也是武汉的行政办公中心。同时,这里集中了13幢优秀历史建筑,是一个展示汉口城市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窗口。

沿江大道环境综合整治是武汉市江滩整治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把沿江大道建设成为一条高雅繁荣的特色景观路,市规划局及规划设计院反复调查研究并征求各方面意

见后,提出了临街休闲空间及街道环境的整治方案。

2001年4月,市外滩建设指挥部就7家单位的设计方案召开了专家论证会,邀请武汉地区各界9位专家对方案进行了评审。根据沿江大道综合整治规划要求,进一步调整沿街用地功能结构。

规划方案结合沿江大道历史特色和滨江特色,进一步挖掘和利用现有的街道空间,形成良好的空间尺度、舒适的街道环境和优美的街道景观。

沿江大道空间结合道路两侧的景观,总体上形成“两段、两心、八景”的总体格局。“两段”指以兰陵路为界的历史特色风貌段和娱乐特色风貌段;“两心”为江汉关标志性历史景观中心和时代广场露天演艺中心;“八景”分别为大都会西式餐饮中心、太古纪念广场、光大银行、康乐名人俱乐部活动中心、长海船吧、三北露天剧场、东方汇理艺术沙龙以及市政府礼堂。沿江大道景观的形成以道路北侧为主,南部堤防一侧以绿化修剪、植被改造和路面铺装为主。

接受沿江大道改造任务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强调



沿江大道

要举全区之力，高标准、高水平地完成这一项工程，立即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指挥长的建设工程指挥部，加强了该项工程的领导



沿江大道

力度。2001年3月2日，沿江大道改造工程正式开工。区五大家领导多次来指挥部听取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解决各种困难与问题。专班工作人员不分昼夜和节假日，高强度、高效率地开展工

作，使工程进展顺利。沿江大道建设工程项目有：拆迁拆建、立面整治、市政道路、管线入地、园林绿化、亮化广场招牌、街景美化、交通整治以及门面招商等工作。全部工程共完成拆迁24处、1.6万平方米；整治各类建筑60幢、立面11.32万平方米；铺设沥青路面43700平方米，完成人行道士基础33000平方米，铺设站卧石4500米，铺装人行道石材26000平方米；修建管线沟槽11446米，电力管线入地300米，电信、有线电视管线入地各2400米，排水主管876米，雨水管600米，新建雨水井97座；拆除旧电杆106根、架空线23公里、导线16公里、旧变压器10台，新增变压器14台、环岗柜13台；沿江大道南侧（外边台）新建绿化带7000平方米，北侧新建绿化带5000平方米，植树150株，上栽植器10个；更换高杆路灯60套，楼体亮化45幢，建大型广告6块、1800平方米；建雕塑3座、喷泉2处、报栏10组、露

天舞台1处,上广告机12座、公话亭12组、邮筒4个,摆放自动售货机10处、小货亭9处、体育健身器5套、垃圾桶100个,安装摆放地面家具15种、200余件(其中座椅5种40件)。通过整治,使该路段形成了金融、商务办公职能与高品位的观景、休闲文化娱乐相结合,室内空间与街道环境有机交融,具有欧式古典风格及高雅艺术情趣的城市景观路,成为武汉市靓丽、繁华、高雅,具有滨江休闲特色的历史文化景观大道,与江汉路步行商业街和中山大道南京路至六渡桥段连成一片,勾画出汉口地区最靓丽的风景线。

如今,当你走在宽阔的沿江大道上,看着整修一新的道路和街边建筑,你可知这其中凝聚着多少建设者们的心血和汗水?从开工到竣工,建设者们顶烈日、冒酷暑,仅用7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改造任务。改造后的沿江大道,处处焕发生机,宽阔的马路犹如一条黑色的缎带,一座座玉兰花灯犹如点缀在少女头上的明珠,发出璀璨的光芒。这条景观大道每天吸引着成千上万游客,给武汉市的旅游、交通等行业又带来新的商机。

旧城改造换新颜

据《汉口丛谈》记载:“汉口初一芦洲耳,洪武间(1368~1398年),未有民居。”“至天顺间(1457~1464年)始有民人张添爵等祖父辈在此筑基盖屋。”可见,在汉口有房屋建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50年前。

在近代,江岸区以其风格迥异的近代历史建筑群体及“汉味”街区风貌闻名于世。至1949年,全市共有208条近代里弄、3294栋“石库门”建筑,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大都集中于江岸区。以原京汉铁路为界,就是这些被武汉人称为“铁道内”的近代建筑,构成了“汉味”的老城韵味。

江岸区的老城区里弄建筑,按照建筑特色,可分为旧式里弄,新式里弄,花园式里弄和公寓里弄。按照原“租界”区位可

分为:1.租界内里弄,所处区域东起麻阳街,西至江汉路,北抵中山大道(其中法租界一部分越过中山大道,距京汉铁路东南200米),南临沿江大



旧城改造——永清片拆迁

道;2.租界边缘里弄,该区域包括大智路、京汉铁路、黄浦路、麻阳街、中山大道等邻近原租界的地段;3.“华南模范区”里弄,地处江汉路、大智路、京汉铁路、中山大道围合地段棋盘网格街区内的规范里弄。江岸区老城以里弄式住宅为特色,是一种多栋低层联排式住宅类型,起源于汉口开埠后的19世纪末。在历经近百年沧桑后已进入整体老化衰败时期,成为旧城改造重点。

据调查,全区有代表性的里弄58条、房屋1316栋。认定结果为,需要通过大修改造的里弄房屋占总量的26.7%,必须拆除大部分主体结构改造的里弄房屋占总量的40.3%,已严重损坏和处于危险必须全部拆除的里弄房屋占总量的7.4%。调查资料表明:江岸老城区建筑经过近百年损耗,呈现出房屋完损等级持续下降,危房不断增多;里弄住宅成套率极低,基础设施及居住环境很差;里弄设施功能严重老化缺乏;因维修资金太少,里弄住宅失修现象十分严重。

仅1998年至2002年,拆迁总面积为13.74万平方米,拆迁、安置2007户。其中如寿里危房改造、吉庆街改造均为区十大重点项目。

解放大道台北路口的联合大楼，原是一幢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5层砖混结构住宅楼。大楼一建成，就由于地基原因像比萨铁塔一样逐年倾斜。在这栋楼里，最规格的桌子都要在一侧垫上砖头找平，否则茶杯就放不稳。1997年5月被鉴定为：整栋危房，无修缮纠偏价值，限期拆除。这幢楼引起市、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市领导作过专项批示。仅用8个月时间，新建一栋8层11000平方米的钢混结构房屋。这项工程被评为市优质工程。这次危改大行动受到市区领导表彰。

吉庆街是闻名省、市乃至全国的一条民俗饮食街。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营户纷纷租借道路两侧民房经营餐饮。这些民房大都为砖木结构的两层建筑。经营户拆墙打洞，挖地增高，违章搭盖，牵线拉管，时有人为灾害发生，生活环境和经营环境很恶劣。从1997年开始修，于1999年10月完成一期改造工程，新建一幢5层楼、总建筑面积为4900平方米的商用楼。2001年8月，再次筹资贷款3800万，进行了二期改造工程。二期工程总建筑面积为1.8万平方米，共14层。为打造江岸区一条名街提供了“硬件”基础。

汉口南京路武汉少儿图书馆前的街心花园是一处亮点。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杂乱的经营摊点群。1998年，根据市、区政府的部署，在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基础上完成了拆迁安置工作，

南京路街头小游园



滨江苑新区

同时拆除了南京路口和附近义成东里 4 800 平方米建筑,动迁 130 户,新建 13 000 平方米的义成大厦,为武汉市建造街心花园提供了一块空地,也妥善安置了全部拆迁户。

继“全市危房改造的样板”——“如寿里人家”之后,江岸区房地产公司目前正在精心打造危改系列精品——“湖边坊人家”。这是一处被称为“地无三尺平,雨积三尺深”的低洼区。这里大多是 20 世纪 60 年代建造的砖木房,危破房率达 90% 以上。该项目占地 3 355 平方米。现已拆除建筑面积 4 600 平方米。在这里将竖立二栋设计新颖、功能齐全、总建面积 15 050 平方米的现代化住宅楼,一改旧城面貌。

如寿里人家

汉口老火车站一带,是典型的武汉老城区。这里原有着一片百年老宅,称作如寿里。早几年,要寻访老汉口里弄踪影,许多人都会找到这里。然而现在,人们惊奇的发现,老宅已被一座现代化花园式社区悄然替代。这就是被市领导称为“老城区危城改造的样板”,老城区新亮点的“如寿里人家”。

1902 年,法国人看好正在修建的京汉铁路,以英国在汉口“扩界”为由,要求援例,扩大租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屈就,如寿里这片土地就纳进了法租界。

1909年，浙江南浔大丝商刘澄如兄弟在这里投资修建民居。据说，“如寿里”得名于刘氏兄弟的名字。《夏口县志》云，这里“自后湖筑堤，芦汉通轨，形势一年一变，环镇寸土寸金”。刘氏兄弟慧眼识珠，在占地15100平方米的范围内，建造了76栋二层砖木结构联排式里弄房屋，俗称“石库门”。后增至99栋。当年《后城马路竹枝词》对这一片风光咏叹：“半是荒土半水塘，看他一一起楼廊。后来风景知多少，留待旁人说短长！”

有趣的是：如寿里建于清宣统年间，按照皇家定律，民间住宅不得与王族勋戚相匹敌，造屋不能超过100间。如果有“超标”建筑，也只能对外宣称“九十九间半”。这也许就是如寿里没有超过一百栋的缘故吧。

由于大智门火车站这一当年亚洲最华丽的火车站的建成，如寿里显露出大汉口的繁华与喧嚣，南来北往的旅客人流如织，周边旅馆林立，号栈繁多，京汉、万国等几十家旅馆迎来送往。如寿里的北面，有汉口最早的天桥——汉口车站铁路天桥。这是一处集聚三教九流，汇合五花八门的娱乐世界，热闹不会亚于北京的天桥。当年这里也曾是大汉口的娱乐中心，从如寿里侧巷穿出，有天仙和天声两个大戏园，不远处更有汉口大舞台，许多名角曾先后在此献艺。

当年的法租界，在汉口5国租界中面积最小，却是被最后收回的一个租界。1945年抗战胜利后，人民群众才将立在如寿里外刻有“大法国租界”5个大大的青条石碑掀翻。

如寿里是武汉早期的石库门建筑，历经沧桑，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显现老化衰败。厨房的墙壁乌黑油腻，墙面像考焦的千层饼一样，一层层起皮。一阵小风吹过，那墙上的灰土就像撒胡椒粉一样纷纷扬扬掉起炒菜锅里。黑皮电线的绝缘层已经粉化，让人望而生畏。墙体内，雨水随着裂缝渗透，吃饭时要打雨伞，睡觉时要在床上拉塑料布。有位姑娘结婚时恰好逢雨季，新婚当天竟找不到一块干地方，只能坐在新郎的腿上度过洞房花烛夜。最可怕的是房屋大梁的腐烂。51号住户上下楼时，不得不蹑手蹑脚，惟恐稍大的步履会震塌摇晃的

山墙和腐烂的大梁顶柱。他们对小孩早期安全教育居然是“下楼要过细”。在如寿里居住的 500 余户近千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烦恼——“方便”问题不方便。上千人共用一个公共厕所，每天为“方便”而排队，成了这里的一景。

一份 90 年代初期如寿里房屋状况的报告写道：房屋损坏极为严重，地基承载不足，墙出现明显裂缝，倾斜。厨房上部平台和上平台小楼混凝土已经炭化，酥裂漏筋，横断裂缝。木屋架和木楼梁变形，蛀蚀严重。外墙粉灰大面积剥落，墙面渗水等。结论是：危房占 75.83%。

老城区危破房集中区——如寿里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和江岸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1998 年 10 月，市区政府决定，将如寿里列为“全市危改试点”和江岸区可持续发展十大项目之一，由江岸区房地产公司负责项目实施。

1999 年 10 月 4 日为“世界人居日”。如寿里改造项目全面开工。经历了百年风雨的如寿里轰然倒下。

2001 年 10 月，一个全新的“如寿里人家”比原定工期提前两年矗立在老地方。新建的“如寿里人家”总投资 7 000 万元，



旧城改造样板工程——如寿里小区

占地 25 亩,总建筑面积 50 000 平方米,由 1 栋 12 层带电梯的小高层,9 栋底架空上退层的商住楼和 1 000 平方米的中心花园组成。

10 栋楼房均为全框架,全现浇建筑,带有欧式风格,保留“汉味”里弄建筑形态。红瓦退层坡的屋面,栗红色墙砖配上突出的白色线条外立面,新颖亮丽,统一处理的流线大阳台清新脱俗。小区内采取变频式压力供水,变压式排烟道,配置有防火、防盗、防煤气泄露、紧急呼救的安防智能系统。这里抬头不见“线”,低头不见“管”。各种网线全部作隐性处理。设立了图书室、儿童游乐及老人健身场所、社区服务中心、停车库等。

2002 年春节前夕,老如寿里 90% 的住户乔迁新居,他们发自内心赞叹:如寿里变得真美!

有人指着“如寿里人家”说,“人家”两个字加得好,即区别了反差巨大的新旧环境,也反映了我们这座城市对人居状态的深切关怀。一句话:老地方,新生活,百年情归如寿里。

长江二桥

1957 年 10 月 15 日,武汉长江大桥竣工通车,万里长江开始有了第一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大桥兴建后,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仅铁路货运过江节省的费用,头 5 年就超过了大桥的造价。同时,公路桥部分把三镇连为一体,大大方便了汽车运输与市内交通,其效益更是巨大。

30 多年来,市区交通中枢线,一直是由大桥这条航大线(航空路——大东门)承担。使江汉桥和大桥至 1990 年已呈超饱和负荷状态。

当务之急是把“三镇交通一线连”的状况改变为市内交通的内环线,其中的关键就是尽快建设武汉长江公路桥——武汉长江二桥。

早在 60 年代修订的《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就提出了

要在汉口黄浦路修建长江公路桥的计划。1976年,市政建设局委托铁道部大桥局进行了勘测钻探。1984年12月,市政府成立以王杰为首的建桥领导小组,加强前期工作。1985年3月1日又组织有关部门作出了《可行性研究报告》。1991年9月18日,正式开钻施工。1995年6月底,建成通车。



长江二桥

长江二桥桥址在江岸区黄浦路跨越长江至武昌徐东路。为预应力钢筋混凝土双塔斜拉桥,主跨400米,居当时世界同类型桥梁第二位。全桥总长4678米,其中正桥长1877米,北引桥长425米,南引桥长925.4米,其余1450.6米为北、南岸与正桥衔接的立交桥长度。桥面宽度26.5米,其中车行道宽23米,共6车道,两侧人行道宽1.5米。

长江二桥日通车能力为6万辆,可分流长江一桥公路交通量的51%,使以前经由市中心过江的车辆,大大缩短了里程和时间,基本消灭了长江一桥车辆堵塞排队的现象。

长江二桥的建成,对改善我市的交通、拉动江岸的经济,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武汉新客运港

武汉港新客运站是1986年4月动工,1992年投入使用的,总投资5735万元。码头有4座3千吨级浮趸钢引桥泊位,可同时靠泊4艘大型客轮。

1992年旅客吞吐量527.7万人次,其中发送量257.1万人次。

客运港的位置,在江岸区江边,距离江汉关和江汉路步行街很近。



武汉客运港

六 江岸大地的文明潮

奋力拼搏的九八抗洪

1998年以来,长江流域发生了继1954年后的又一次全流域性特大洪水。6月26日,武汉关水位进入25.0米设防水位,较正常年份提前半个月左右,随后水位一路跳涨,28日突破警

戒水位,7月1日超过紧急水位,7月25日达到危险水位,8月10日达到29.39米,8月19日创下历史第二的高水位29.43米。由于1998年洪水峰连峰、峰叠峰,高水位持续时间长;加之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暴雨袭击,城区普遍渍水,形成外洪内涝的严峻局面,给防汛工作带来巨大压力。

针对1998年年初气候异常,长江枯水季节江水不枯,可能出现特大洪水的征兆,区委、区政府、区防汛办高度重视,多次召开区委常委会、区政府常务会、区防汛工作会,统一思想认识,牢固树立防大汛、抗大洪的思想,研究制定了周密的防汛预案和抢险应急措施,并扎扎实实做了大量的汛前基础性工作。在大汛到来之前,区防汛办先后对张公堤8.5公里碑堤外防浪台280米进行填筑;完成了谏家矶东堤123米的加高培厚和西堤110米处险工程;新建了250米的谏家矶西堤护坡3670平方米;完成了西堤943米加高培厚和泵站改造;对谏家矶东堤长江化工厂前270米老险段进行了抽槽隔渗处理;对物资回收公司92米堤段加高培厚。同时,对全区39公里堤防进行了拉网式徒步检查,整治险工险段10余处,及时排除了各种隐患,提高了堤防的抗洪能力。

7月26日,长江武汉关水位达28.51米,突破危险水位且继续上涨,经过一个多月浸泡的大堤险象环生,防汛抗洪抢险进入非常紧张时期。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区委、区政府



1998年水位29.38米时的长江江面

主要领导始终坚持驻守一线指挥，严格按区防汛指挥部防汛预案，狠抓责任制的落实，科学有序指挥抢险。7月30日，丹水池中南石化发生特大浑水溃堤性管涌险情，江水穿透防水墙基础，在堤内涌起30公分粗、1米多高的水柱，向涌口处抛压的土袋、石袋像弹丸样被冲到一旁。区防汛指挥部领导带领工程技术人员不顾个人安危，靠近危险地段镇定指挥，有序调度。一方面，积极组织抢险物资，合理调配抢险力量；另一方面与市领导和市防汛专家一道研究制定和组织实施抢险方案，及时控制了险情发展，为成功扼制险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汛后，国家汛总认为，1998年长江出现的两处大险，一处是江西九江，一处是武汉丹水池，同样为溃口性险情，结果却完全不一样。因而，中央、省、市给予丹水池抢险“发现及时、指挥得当、措施有力、抢险有效”的高度评价。区领导还亲自组织指挥了谏家矶蓄洪垸漫堤抢险，使谏家矶地区免遭灭顶之灾，保住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住了武汉东大门交通畅通。为确保全区大堤安全，区指挥部组织防汛人员对全区堤防实行24小时不间断拉网式巡逻，巡堤查险人数



1998年7月30日，丹水池中南石化堤段发生管涌，
全体军民奋力抢险，终使堤段化险为夷

最多时达3 000多人。在丹水池“八厂联防”险段，实行10米一岗，加大巡查密度，及时发现和处理了大量险情。1998年，区指挥部处理管涌、脱坡、散浸、漫溢等大小险情200余起，全区共集结抢险队伍20 000余人次、车辆4 600台、船3艘，转移灾民2万多人次，运输各类抢险物资4 600余吨。区卫生局组织200余人的医疗队到抗洪一线送医送药，抢救伤员，并积极做好接触疫水人员登记、服药和灾后消毒杀菌工作。



抗洪英雄王占成

在与1998年特大洪水的殊死搏斗中，人民群众、解放军、武警官兵、公安交通干警、民兵突击队成为抗洪抢险的中流砥柱。丹水池中南石化武汉分公司堤段险情发生后，该公司全体职工和家属立即自觉投入抢险。公司离休干部、共产党员王占成冒着生命危险，奋不顾身率先跳入水中查找洞口，为成功堵住漏洞立下首功，被誉为“江城抢险第一人”，受到省、市委的通报、表彰，并受到江泽民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广州军区驻汉某部红一团官兵昼夜兼程，奔赴江岸防汛第一线，参加了西堤抢护、闸口抢险和防水墙身垒支撑垛等一系列抢险战斗；第二炮兵指挥学院、空军雷达学院官兵驻守江岸两大险段——“八厂联防”和谏家矶乡，及时抢护和化解了一个又一个险情。3个部队共出动抢险人员5 000余人次。区人武部组织民兵参加了13次大的抢险战斗，共出动民兵12 950人次，车辆千余台次；区公安分局在保证社会治安力量的同时，抽调了大批干

警加强对闸口和重要险段的守护,并昼夜进行武装巡逻;江岸交警大队全体交警顶高温、战酷暑,冒大雨、淌渍水,每天出警200余人次,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保证了防汛通道顺畅。

1998年的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取得了全面的重大胜利。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归功于中央、省、市的坚强领导和科学调度,归功于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区防汛指挥部的有力指挥,归功于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冲锋陷阵,归功于人民和人民军队的团结奋战,归功于伟大抗洪精神的大发扬、大发展。在这场艰苦的抗洪斗争中,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以及广大干部群众,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深入持久的文明创建

江岸区历史人文资源丰富,居民素质较高。从80年代开始,区委、区政府就注重抓精神文明建设,从“五讲四美三热爱”到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城区的创建,历时十几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特别是近几年,区委、区政府自觉地以党的十五大精神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把“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树江岸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作为全区文明创建的新起点、新目标,不断给创建工作注入新的内涵,拓展创建工作的深度和广度,有效地推动全区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江岸区于1999年荣获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区的光荣称号,并涌现出驰名全国带动整个社区建设发展的全国文明社区示范点的百步亭花园社区。

在创建过程中,他们与时俱进,更新观念,开拓创新,敢为人先,把推动可持续发展作为文明城区创建的总体方向,使全区文明创建活动始终保持一种高度的工作节奏,深入持久地开展下来。

区委、区政府在文明创建活动中,把创新环境、加强道德建设作为深化文明城区创建的两个重要环节,作为构建江岸

区文明城区创建工作重要立足点,并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框架。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提升城区功能。大力整饰历史老街和历史建筑,开发江岸城市文化资源。实施“洁绿亮美”工程,营造优美城区环境。坚持“以德治区”,加强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倡导科学文明的新风尚。通过总体部署,全面推进,为全区文明城区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构建全区文明城区创建两个重要体系的基础上,注重发挥区域优势,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的观念不动摇,积极探索,找准文明创建工作与全区各项工作的契合点。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文明创建贯穿于可持续发展示范区之中,按照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坚持以项目为动力,用科学的、系统的行动计划来充分保证文明城区创建工作的全面推进。注重社区建设创新,把文明创建贯穿于社区建设工作之中。夯实物质基础,把文明创建贯穿于建经济强区之中。坚持全面进步,把文明创建贯穿于教育强区和文化先



社区体育运动会

进工作区建设之中。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兴建了占地10 000多平方米的区文化馆,97%的居委会(村)建有文化室,全部达标,并有一批被文化部命名的“标杆文化站”。区属12家医院医疗护理管理不断加强,全部参加创等级医院,区妇幼所达到了省一级甲等妇幼所。

在新一轮文明城区创建工作中,江岸区“以人为本、依法治区、治城育人一体化”,全面促进人的素质提高作为文明城区创建的落脚点。把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法制意识等作为文明城区创建工作的一项基本保证,努力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和谐友爱的社会环境,不断提高市民整体素质,为创建文明城区工作注入新的内容。

江岸区的文明城区创建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区委、区政府把文明创建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并深入持久的引向深入。

驰名全国的百步亭花园

百步亭花园社区地处江岸区后湖居住新区南端,占地120万平方米,共住有3万多人。

走进百步亭花园社区,人人都会为这里扑面而来的新风所感染。壮观的楼宇,宽敞整洁的道路,4万平方米的绿化广场上,辟有篮球、足球、网球场。医院、商业网点、人防工程一应俱全。每天新人新事不断,充分体现社区浓郁的人文氛围和文明和谐的邻里亲情。这个荣获全国惟一“首届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的社区,全国第一个没有街道办事处的社区居委会,被居民们誉为“绿色社区、温馨家园、安全港湾”。

社区建立了党组织,由江岸区委直接领导。党小组建在门栋,将社区内的2 300多名党员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他们在社区内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带头做文明市民,创“五好家庭”、“五好门栋”。

建立了在党委领导下的“建设、管理、服务”三位一体的社

区管理模式,探索出由“党和政府领导,职能部门指导,企业主导,群众督导”的社区运作机制。不用政府出资、派人,不要居民掏钱,将社区管理得井井有条,让政府放心、群众满意、社会认可。

社区管理以社区管委会作指导和协调,社区居委会、业委会、工会和妇联等组织团结协作,资源共享,共管共建。公安、城管、交通、工商进驻社区,与居民共创文明社区,共建美好家园。

实现了“九个没有”,使居民们有了安全感。安全是居民的第一需要,社区先后构筑了8道防线,形成群防体系。5年来,没有一户家中被盗,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没有一辆自行车被盗,没有一起交通事故,没有一桩大的邻里纠纷,没有一处黄赌毒,没有一件易燃易爆品,没有一起火灾,没有一名法轮功活动者。使社区居民对社区安全一百个放心。

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社区办有老年大学、家庭教育学校、市民学校。社区文艺体育活动常年不断,如书画、棋类、球类比赛,晨练、扇子舞、健身操、时装表演、太极拳表演,电影、歌舞晚会、腰鼓、合唱等。重大节日还举行庆祝活动。每周一举行升国旗仪式,经常举办文明礼仪、科普知识讲座,广播站、板报栏宣传表扬社区层出不穷的好人好事。



百步亭花园文化长廊

社区内环境优美,长年洁净亮美,始终保持地面“三无”(无烟头、无纸屑、无果皮)。社区为居民提供“三全”(全方位、全天候、全过程)服务,从就业到医疗保健,从文化教育到操办婚丧、接生小孩,都能提供亲情服务。对下岗人员采取协助上岗、成立家政服务中心,低价出租门面等办法,已使 601 名下岗人员再就业。

百步亭花园“以人为本,以德为魂”,倡导了现代生活方式,更新了居民的社区观念,唤醒了居民的家园意识,激发了居民投身社区建设的极大热情,增强了社区文化的凝聚力,形成了“共建、共管、共驻、共享、共识、共创”的社区理念。做到人人参与、人人分享、人人受教育。“爱我花园,建我家园”,爱护环境,邻里和谐,昼夜安宁,积极向上的社区道德风尚,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湖北省文明委、武汉市委及市政府先后作出了《向百步亭花园社区学习的决定》,丁关根、罗干、彭佩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中央 20 多个部委办、社会各界、外国友人共 14 万多人曾到社



2003 年 5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参观百步亭社区

区视察参观,普遍肯定百步亭花园社区坚持“建一流住房,上一流管理,创一流文明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是市场化的物业管理与社会化的社区管理相结合的社区管理模式,值得推广。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经济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都曾以长篇通讯对百步亭社区作过报道。《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百步一亭,温馨家园》为题作了专题报道。

武汉市委、市政府提出“再造五个百步亭”的指示,即建占地共7000亩,入住共20万人的百步亭式的五个花园社区,并为其提供用地、划线、拆迁、办证等有力保证。

200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到百步亭社区视察,并召开了座谈会,发表了重要讲话。李长春同志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了百步亭社区“四结合”(社区居委会的建设、物业管理公司的管理,房地产开发公司回报社会加上当地市委、区委的高度重视四者紧密结合)的创新模式。

百步亭社区作为全国文明社区示范点,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典型,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优秀代表,是江岸区文明创建的一个品牌,是江岸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百步亭社区围绕“以人为本,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文明社区”的目标,探索了一条新形势下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之路,开创了社会化、市场化、科技化管理社区的新模式,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创造了许多有价值、可借鉴的经验,并将在江岸广泛推广。

家庭文化新领域——家庭档案

21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社会,作为社会信息资源系统的档案馆,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加速增强馆藏实力,使之有足够的资本发挥信息中心、信息服务、宣传教育等社会功能,是关系档案部门在21世纪里生存与发展的策略问题。自1998年以来,江岸区档案局大胆创新,勇于实践,率先将档案工作

触角向社区延伸,向家庭延伸;率先创建了一批家庭档案示范户、示范门栋、示范社区;率先创建了江岸区家庭档案协会;率先创建了家庭档案服务中心,开拓了档案工作的新领域,摸索了一套适合家庭档案管理的新路子,不仅增强了公民档案意识,也为寻求档案事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截至2001年,江岸区已建立有英模类、传统教育类、珍藏类、个私企业类、家政管理类、子女成才类等多个类型的家庭档案。全区共建有家庭档案示范户183个,家庭档案示范门栋6个,家庭档案示范社区9个,家庭建档达42 041卷(册、盒)。与此同时,为保护群众参与家庭档案创建的积极性,区家庭档案协会选择若干典型家庭的成员加盟,并不定期地把这些家庭组织起来,授以档案保护的应知应会,使之成为档案文化的传承源。家庭建档,已经成为江岸区现代型家庭的时尚,从普通百姓到戎马生涯的将军,从20来岁的小青年到七八十岁的古稀老人,都加入到倡导先进文化之中,使社区家庭文明建设充满了生气和活力。自1998年以来,全区利用家庭档案资源共举办各种展览18个,参观者达19 000人次。家庭档案作为一种创建过程已深入到江岸区千家万户,家庭成员在家庭建档中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在潜移默化中规范社区居民的行为。家庭档案已成为家庭物质文化生活的辐射源,不断提高着居民和家庭成员的素质。

家庭档案这一新生事物通过江岸区政府的正确引导和区档案局的指导与服务,已得到了社区许多家庭的积极响应,档案走进家庭、档案服务家政在各社区已蔚然成风,建家庭档案成为江岸地区精神文明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2001年9月“全国部分省、市家庭档案研讨会”在江岸召开,江岸的创举得到了国家档案局的充分肯定。

XIA PIAN

下篇

区情 区貌

QU QING QU MAO

第一章 经济纵横

江岸通商贸易的历史虽然不算长,但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一开始便有大批工商贸易者投身于此,有较好的工业、商和服务业基础。租界时期洋人建的工厂、民族工商业者开创留下的名老字号、解放初期前苏联帮助建立的大型工厂,都留在了江岸,更多的是在市场经济竞争中拼搏出来的工、商、服务业新星,它们推动着江岸的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一 百年春秋的名老字号

豆皮大王“老通城”

汉阳人曾厚诚,1929年在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大智门(今大智路口)开了一个小吃点,供应早、中、晚点。

因为该地原是汉口城堡的城门之一——大智门所在地,是来往城内、城外的通道,故店取名“通城”,也许还有期望“通达成功”之意。

通城饮食店的门牌是大智路3号,2/3的面积卖小吃,1/3卖香烟,总共约50多平方米。24小时营业,以甜食为主,有伏汁酒、冰莲、发糕、汤圆、油香、也有面点、烧梅、锅贴、油糍粑、大包等。元宵、端午、春节则增加些节令食品,雇有工人、学徒十四五人。

1931年武汉涨大水,水位达到28.28米。堤防被冲垮,陆地行舟。有的商店门口搭了跳板。曾厚诚租了几条划子,四处出售包子,用篮子叉棍卖给住家的或行人,赚了不少钱。

也就是这一年,通城开始做豆皮卖。有章、胡、钟、姜几位师傅轮班掌勺。

曾厚诚发家后,其三女二子都受到良好教育,有的还参加了新四军。

1938年武汉沦陷前,曾厚诚带领全家避难重庆,通城饮食店停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曾和全家回到武汉。然而大智路1~9号已被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占用,几经交涉才同意按抗战前格局继续分租。因为是重新开业,故改名为“老通城”。

由于汉口市民增多,大智路人流量大,且近火车站,生意



老通城夜景



毛泽东主席在江峡轮上接见老通城工作人员三排左二为“豆皮大王”高金安

越来越红火，增加二楼、三楼，品种则增加了瓦罐鸡汤、广东卤菜、叉烧，夏天加做冷饮冰镇酸梅汤、杏仁豆腐、豌豆黄、豆窝窝，尤以赤豆刨冰销量最大。

1947年，曾厚诚聘请高金安师傅到老通城，在以前豆皮的基础上增加肉丁、虾仁、冬菇作锅料的三鲜豆皮。很快一炮打响，受到顾客欢迎。曾厚诚干脆打出“豆皮大王”的牌子，还花了1000银元安装了霓虹灯广告箱。无论是冬天、夏天，还是白天、夜晚，食客盈门，长盛不衰，甚至名闻全国。

解放了，高金安走上领导岗位，就改由曾延林这位年轻师傅负责做豆皮。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店吃过他做的豆皮，毛主席于1958年来吃过。当毛主席住在东湖时，还请曾延林专程到东湖去摊过豆皮。

1953年，曾厚诚因患脑溢血去世，享年68岁。子女5人联名申请政府接收老通城，主动放弃继承权，同时还上交了铁路外地契和若干债券。

1953~1956年，老通城职工自行组织起来维持经营，性质

是公私合营。直到1956年,由江岸区零售公司接管,改称国营老通城餐馆。至世纪末,将一楼出租给手机商店,餐馆改在二三楼经营。

煨汤大王“筱陶袁”

汉口沦陷期间,美机时来轰炸。1944年12月9日将天堂医院(今市二医院)炸了,医院关门。医院厨房的工人只好回家自谋生路。其中西餐部的陶坤甫师傅,在兰陵路废墟上清了一块10平方左右的场地搭棚子,卖豆浆、糯米包油条等小吃。中餐部的袁得照师傅也来炸面窝,做点小本生意。

陶师傅的煨汤手艺,在医院里小有名气。他想:武汉人喜欢喝汤,如能煨汤卖,可能生意会不错。陶与袁师傅商量,居然一拍即合。先只煨牛肉汤和八卦汤两种,用瓦罐小火温炖。在选料、工序、制作方面,十分讲究,一丝不苟,因此生意较好。后来就增加一位帮手,在采购进货时也形成渠道,质量、数量、新鲜都有保证。只是价格一日三变(法币贬值),汤价也随时波动,好在食客尚能谅解。

1948年拆了棚子建店堂,大约有20多平方米,可以放3张桌子。



汤的品种也增加了母鸡汤、甲鱼汤、排骨汤、鸭子汤、鸽子汤、猪蹄汤、肚子汤、心肺汤等十多种,

瓦罐鸡汤

其中母鸡汤最受欢迎,连武昌、汉阳的人也来买回去吃。煨汤用的鸡,购自黄陂、孝感,大多为一斤半至二斤一只的活母鸡。经过宰杀、去毛、破腹、取内脏、去头脚,切成一寸半长的块子。入罐前,先用猪油、葱白在锅内稍炸,再用生姜、料酒、精盐、白糖倒入锅中爆炒,再放清水。待鸡肉变色时起锅,放入砂罐煨到八成熟。起罐停放一刻钟,在上火焖透后再按分量装小罐温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质量和味道。

虽已远近闻名,顾客盈门,但没有招牌店名,这才取名“小陶袁”,表示是朋友合伙,但后来怕“小”字不吉利,又改为“筱陶袁”。生意好了后,又改为先卖票、后取汤的办法。

1979年改名“小桃园”,建了八层楼房子。一二层营业,营业面积为解放前的50倍,品种繁多,二楼还可办酒席。

在国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小桃园酒楼因各种原因转入萧条,老字号的名声远不如前。为了挽救这老字号,重树“小桃园”声名,由几名满腔热血的年轻人,抱着振兴老字号,弘扬传统美食文化的使命,毅然买断“小桃园”,并投资装修,重新开门营业。此举既配合了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改制,又保护了老字号旗帜不倒。

2002年,浙江人经营承包了该酒楼。小桃园在保留传统煨汤特色的同时,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以经营中餐为主,包括地方特色,川蜀风味,粤杭风情等高档菜肴的酒楼,让顾客既能品尝传统美食,又能享受特色风味,有利于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人群,更好地为企业带来生机,使其发展和壮大。

汤圆粽子糕团大王“五芳斋”

武汉五芳斋食品贸易有限公司是由原国营武汉五芳斋酒楼改制组建而成。

该公司地处繁华闹市区域,建店历史悠久。解放前经营面积仅几十平方米,以经营江浙风味菜肴和小吃为主。其中汤圆、粽子、糕团风味独特,为世人称道。解放后几经投资扩



汤圆大王——五芳斋

大,企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经营面积达1300多平方米,经营品种不断增多,由原来的几种增加到几十、上百个品种,目前已发展成为集餐饮、食品加工、商业贸易、汽车运输等为一体的具有现代化管理规模的新型企业,批量生产经营的五芳斋速冻汤圆系列、真空保鲜粽系列、苏式糕团系列等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已成为武汉市乃至湖北省知名品牌和名优地产品。近几年来,为拓宽经营市场,扩大销售,其获奖品种五芳斋汤圆、粽子、糕团、宫廷饭等进入武汉市及周边城市中100多家大小超市,在同类产品中属畅销产品和质量信得过品牌。

公司获得的荣誉数不胜数,主导产品五芳斋汤圆、粽子、糕团在90年代一举夺得省商业厅授予的三块金牌,成为湖北省餐饮业中首家获金牌最多的企业,从此“汤圆大王”、“粽子大王”、“糕团大王”的美誉传遍武汉三镇,近几年来先后荣获省商业系统“先进企业”、“满意单位”称号,市政府授予的明星企业称号,国内贸易部授予的“中华餐饮名店”、“全国绿色餐饮企业”,并连续四年两届获得湖北省著名商标、省消协营造

“放心环境十佳单位”等等。

公司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和敬业爱岗的员工队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不断迎接挑战，在竞争中发展壮大。在公司承受力基础上，筹备组建食品加工基地，硬件设施逐步达到国际食品加工标准，进一步扩大生产，拓宽经营渠道，实施品牌战略目标。

百年老店“长生堂”

长生堂美发美容厅创办于1911年，创始人是江苏扬州来汉的张聚年。他本是走街串巷的剃头挑子，由于刻苦钻研技艺，服务态度好，且“文武双全”——既会理发，又会推拿，生意越做越红火。加上他省吃俭用，不数年，攒下一笔钱，买了一个小门面，就在繁华的车站路法租界里开了一个店子，取名“长生堂”，为的图个吉利，期望生意能长盛不衰，能招徕顾客。

从此，他告别露天作业，转入坐店经营。由于生意兴隆，面积不断扩大，椅子和人员与年俱增。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该店赶新潮、出新样，名师成群，又是名老字号，吸引了众多达官贵人、太太小姐、中外客人。市民的孩子剃满月头、生日头，青年男女结婚、老人做寿也多前来该店。一是慕名而来，二是店堂豪华，出入风光；三是喜欢“长生”这两个字。

车站路附近是戏院集中的地方，如天仙大舞台、共和升平楼、天声戏院、汉口大戏院、威严大戏院、立大舞台等，一些戏班的名角、名艺人对发型发式的要求很高，自然也是长生堂的常客，而众多女戏迷们也跟着来长生堂赶时髦发型。

以上这些外部条件，对长生堂的兴旺发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主观上的努力，刻意求新求变，与时俱进，则是其内部原因和发展动力。张老板常对新来的师傅和徒弟讲两副古人的对联。它们是：

1. 虽然毫末生意；却是顶上功夫。
2. 试天下头颅几许；看老夫手段如何。

凭着全体员工的干劲和钻劲,使长生堂的技艺、档次和服务质量常居江城的领先地位,声誉不胫而走。国民党的军政官员、富商大贾及他们的家眷接踵而至,连蒋介石在汉期间每次理发,都是派车来店接走戴恒贵、戴友宝父子,前往其下榻的杨森花园为其剃头。

至于租界的领事、官员、外国侨民、水兵等,也都是常客。

1938年,日机常来轰炸武汉,市民恐慌,纷纷逃往四川等地,或下乡投亲靠友,市场一度萧条。张老板也将长生堂转卖给戴恒贵,带着全家逃难去了。

戴恒贵和儿子戴友宝苦心经营,并吸收原长生堂的骨干师傅徐少斋、周德才、胡保正、张回卿等人为股东,集资对房子、设备进行改造和改善。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开始日军未进入法租界,仍保持昔日之繁荣,因而大量市民涌进法租界以求庇护,致使人口猛增数倍,长生堂的每日营业额反而比战前略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党政要纷纷归来,富人们也陆续返汉。长生堂投入万元现洋,将木地板改为进口磁砖,以铁制椅子代替木椅,并配有真皮坐垫;门窗也重新装修美化,大理石台板加红铜条包边,使店容焕然一新。

股东中以周德才出资最多,他对店务也最有发言权。他去上海请了8位师傅,使全店师傅达到14人、徒弟16人。此时,无论从技术力量、设备、店容店貌哪方面来说,在武汉理发行业中堪称一流。

当时,电影院经常放映美国电影,美国电影明星的装着发型成为青年人的时尚。特别是有一部美国影片《出水芙蓉》放映之后,片中女主角扮演者伊漱惠莲丝的发型,受到女士们的青睐,纷纷模仿。长生堂理发师周子善,连续看了两场《出水芙蓉》,掌握了该发型的特点,并结合中国妇女的外形和心理特点,设计出“泳式上旋”发型,女士们成群结队来长生堂点周师傅做“惠莲丝头”,把个周师傅累得够呛。

解放后,社会风气大变,长生堂的服务对象改变为平常百

姓、工薪阶层。1952年7月1日,周德才老板将长生堂上交国家,招牌改为“江岸区合作社理发厅”,性质为国营,合作社派冯正修任管理员。7月20日,正式开



长生堂领导美发新潮流

张,椅子由16把增至20把。1959年,又恢复长生堂原店名,钻研技术、领导新潮流的老传统始终保留着。如率先在全市淘汰手推剪,改用电推剪,无保留地将电烫技术传授推广到全行业,并为兄弟店培训了大批技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长生堂被当作封资修的典型,受到批判,许多传统服务项目被取消。店名也曾改为“武汉第二理发厅”、“二七理发厅”、“江岸理发厅”等。

直至1978年上半年,才又恢复了“长生堂”的老店名。二十多年来,经过多次改扩装修,现总店营业面积有500平方米、分店有300平方米,店名为长生堂美发美容厅。在过去美发、美容、化妆等服务项目的基础上,近年来又增彩漂、彩焗、精华素修护、香熏蒸气、足疗保健、皮肤治理等5大类、14个美容美发项目。先后推出139款经典发型,开发“整体形象设计系统”,并利用电脑选配发型、数码摄像、储存资料等手段,建立“形象设计豪华厅”。另有全自动按摩椅、坐卧式洗头盆、洗头化妆台等高档设备,使顾客来店能享受完美优质的服务。“长生堂”参加国际大赛所获奖项,填补了我省美发美容业在国际

赛事中无人夺杯的空白，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商店也被国内贸易局授予“全国十佳美容美发院”称号，成为全省惟一获此殊荣的美容美发厅院。

21世纪初，长生堂迎来了她的九十华诞。长生堂全体员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决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使百年老店永葆青春，再创辉煌！

旗袍权威白海记

旗袍本是满族的服装，在清朝统治中国的267年中，被汉人妇女移植过来。直至解放前，城市妇女及女学生多着它。改革开放以后，除少数妇女用作时装外，多作礼仪迎宾之用。

旧社会，武汉的裁缝店、服装店不少，但缝制旗袍最著名的，当数今江岸区的白海记。

白海记是黄陂横店人白海山创办的。他14岁时在汉口开始学手艺，两年后，又到河南去学。1937年在汉口民生路周义记裁缝店从师学艺，1940年进周畅记时装店帮工3年。1943年，他24岁时在华清街新康里找到一间10平方米的店面开业，加上妻子叶桃和弟弟白荣山，共是3人，有缝纫机1台。

白海山拜过一些名师，也见过上海、香港等地生产的旗袍，便采各家之长，独具匠心，研制出有腰翘、贴体的紧身旗袍，并在面料上下功夫，如春季做花夹、灰鼠皮的，夏季做绸料小纺、华丝纱的，秋季做丝棉、衬绒的，冬季做狐裘、羊皮



靓丽的旗袍

的。白还设计出海派大襟,胸褶大襟,紧扣立领,开花领款式,采用传统镶滚嵌牙工艺。还选择不同色彩面料、各色空花扣、实心扣,使之富于变化,别具一格,不落俗套。不几年,白海记旗袍轰动三镇,畅销不衰。迁入法租界(今胜利街205号武汉电影院附近)后,添人添机。据说,当时连香港、上海的顾客也来定制。

解放后,旗袍一度停产。白海记并入第二十五缝纫生产合作社,接着又改名红旗服装厂、海燕时装合作社、四新便装合作工厂等。白海山一直任营业员、技师等。董必武夫人何莲芝、汉剧名演员陈伯华也都曾慕名前来定做旗袍,侨胞和外国人则来得更多。1964年还曾做过些出口订单,远销东南亚、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地。

70年代恢复传统产品。江岸时装合作工厂除生产女春装、女衬衣、连衣裙等大路货外,还接国外、港澳订单生产旗袍、便装。

此时旗袍又有一些创新,如腰折、肩折、奶折、胸折、直袖、上袖、圆大襟、开胸琵琶襟,高叉、低叉等数十种变化。领式和袖式也学习西装西服,求变求新,中西式优势互补,款式、工艺日新月异,深受时尚妇女的喜爱。

白海山1975年12月在汉口病逝。

二 早期工厂与后建厂

汉口和记蛋品加工厂

19世纪末,英国公爵费史特以5万英镑成立“万国进出口公司”,登陆我国上海。该公司对外称“和记洋行”,又由于以经营禽蛋肉类出口业务为主,故市民又称它为“和记蛋厂”。不仅汉口,还在哈尔滨、天津、南京等城市也设了厂。

汉口和记蛋厂开业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二十



和记蛋品加工厂

八日,厂址选在德租界今五福路、六合路江边一片地方,以篱笆作围墙,收购禽蛋、活鸡、活鸭、生猪、肉牛等。

1903年起开始建厂房,在今胜利街283号先后建成4层楼房2栋、6层楼房1栋、机器房1栋、冷冻房1栋,共占地72650平方米。屠宰场、冷冻厂、鸡鸭饲养棚等,不在此列。厂方还在湖南靖港、益阳、宁乡、长沙,江西庐山,河南驻马店、确山、明港、信阳、鸡公山设庄收购。

和记洋行分内、外两部。内事部设大班1人,其下有副班、大写、工程师、车间、冰库、蛋厂等主管,全部使用洋人。外事部设买办1人,其下有副买办、账房、稽查、庄首等职员,全部是华人。内事部负责卖货(销售),外事部负责进货(采购)。外事部必需听命于内事部。

买办是个肥缺,每月工资600银元(约合大米100石),还在收购时通过假账、压收购价、接受庄首贿赂等手段敛财,所以杨坤山、黄厚卿、闵绍骞等和记蛋厂买办都成了汉口有名的暴发户。和记蛋厂利用江岸区这块水陆交通方便的土地和先进的设备,雇佣工人千余名,生产冰蛋(包括冰全蛋、冰蛋白、冰蛋黄、全干蛋片、炕蛋白)为主,还生产冻鸡鸭、冻猪、牛肉等产品,全部销往英、法、德、美、加等国。在抗日战争以前的各

年,每年出口量在15 000吨左右。

和记蛋厂对工人的剥削虐待,是骇人听闻的。首先是雇佣了大量女工、童工,因为他们的日工资只有男工的1/2~2/3。临时工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要先排队去领工牌,领到工牌后才能进厂上班。每天工作12小时左右,或劳动于严寒的冰库中,或站立于水中,或在高温的车间里。

下班时,不分男女要被搜身。厂内的工头及雇佣的流氓打手、印度巡捕(俗称红头洋人,因头缠红布)手持皮鞭、警棍,像对待牲畜一样奴役工人。工人们经常受到工伤,即使身体强壮,时间干长了,也会落得百病缠身。

1927年大革命时期,工人在湖北省总工会的领导下,首次成立了工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工人们发动起来后,奋起和老板、买办、工头们开展了英勇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和老板、买办们对工人进行反攻倒算。汉口蛋厂工会负责人陈旺芳、熊桂狗、万楚鹏惨遭杀害,和记蛋厂前的丁字街口也成了反动派屠杀革命者的刑场。1930年9月7日,大革命时期武汉共青团的负责人何恐就被杀害于此,同时牺牲的共16人。白色恐怖笼罩着江岸,和记蛋厂的工人们又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1949年武汉解放,和记蛋厂被湖北省商业局接收,改名湖北省汉口蛋品加工厂。占地面积15 430平方米、建筑面积36 620平方米,全厂正式职工1 142人,旺季时雇佣临时工千余人。产品仍以冰蛋、蛋粉、再制蛋、鲜蛋为主,也承接加工冻鱼、冻肉、冻家禽等业务,还生产溶菌酶口含片和肠溶片等药物。不少产品曾获湖北省优质产品称号。

1985年,为适应改革开放需要,工厂分别成立和记冷冻厂、和记食品厂、和记食品机械厂、生物制药厂、和记综合经营部等独立经济实体,以利经营和发展。年出口“和平”牌冰蛋5 000吨左右。



江岸车辆厂

江岸 车辆厂

成立于1901年。原名江岸机厂，为卢汉铁路附属工厂。设备简陋，职工不足300人，厂房也不多，工人多在露天作业。

1914年改名江岸修理工厂。厂房面积大增，职工500余人。能进行机车大、中修，客货车小修、局修，每月25辆左右。

1923年恢复“江岸机厂”旧名，生产能力下降。

1945年，抗战胜利后，厂房略有增加，职工增到1100人，仍以修理机车、客车、货车为主。

1949年武汉解放，先军管，后改属郑州铁路局汉口分局领



江岸车辆厂车间一角

导。不久,由郑州铁路局机务处领导,改名“江岸铁路工厂”。

1950年底,徐州铁路工厂与江岸铁路工厂合并。厂房面积和职工人数是解放前的两倍。1955年后,专修机车与货车。

1957年,机车修理迁往成都,该厂只修货车,改名“江岸货车修理厂”。

1958年,改名“铁道部江岸车辆工厂”。1970年改名“交通部车辆工厂”。1975年,铁道、交通分开,该厂仍恢复“铁道部江岸车辆工厂”,职工人数达到3 950人,年修货车达5 000辆以上。

该厂具有革命斗争光荣传统,建厂102年。80年前“二七”大罢工的优秀工运领袖林祥谦烈士,就是该厂工人。

肉联厂

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简称肉联),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并投产的。

工厂在江岸区朱家河与长江汇合处西南,张公堤的堤角边,是汉口的最北端。全厂占地5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



武汉肉联厂

平方米。

厂内有屠宰厂、肉脂厂、冷藏库、生物药厂、罐头厂、肉产品车间、锅炉房、氨气压缩间和污水处理站。日屠宰能力6~7千头，旺季可达万头。从屠宰到加工冷藏，全部自动传送，流水作业。车间内的通风、空调、安全设施一应俱全。是当时亚洲最大的肉类加工厂。

常年生产的主要产品有鲜肉、油脂、血粉、肠衣、罐头、卤制品、生化药品、肉类机械等。共有11个车间和22个科室。

职工有全民性质3400人，集体性质2900人。附设有小学到高中的子弟学校。

工厂濒临长江，有专用码头及大型趸船，供生猪过驳和冷藏船停靠装卸。还有专用铁路线直通冷库月台或生猪月台。

三 明亮的工业新星

田田集团

爱美的妇女，几乎都知道“田田珍珠”口服液。就是这个让不少女性焕发青春、保持活力的口服液，出于一个村办企业



新建的武汉田田生态科普园

——田田集团。

田田集团是一家以生产和销售医药及保健品为主营业务的股份制公司。1993年由江岸区后湖乡石桥村注册资本100万元,以生产“田田珍珠”系列产品和“田田妇康宝合剂”为主,自1994年产品正式进入市场以来,经营业绩一直稳步增长。作为保健品的“田田珍珠”系列产品,从进入市场到现在虽只六七年,但由于其酶解技术的应用及产品对女性独特的保健功效,再加上卓有成效的市场策划,产品一直保持较高的市场占有率。目前,该产品仍然是公司创造经济效益的主要项目。在该产品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情况下,公司在1997年进入武汉市医药制造业,根据自身的基本条件,着手发展治疗妇科疾病用药。目前,已投产的有“田田妇康宝合剂”,2003年准备投产田田乳核内消液。这两个品种目前在市场上的同类产品不多,而发病人群较大,因而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

正远电器

武汉正远铁路电气有限公司是一个集科研、制造、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注册资金8000万元人民币。公司总资产达1.7亿元。2001年实现产值上亿元,上缴税收过千万元。

公司的前身是武汉铁路电器配件厂,创建于1988年。1997年公司改制为武汉正远铁路电气有限公司。1988年,王建新总经理紧紧抓住改革开放和铁路牵引动力改革的机遇,自筹资金2万多元,从简易实用的机车小型配件生产开始,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立足“科技兴企”,大力引进人才、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由配件生产逐步转为整机化生产,从单一品种逐步发展到200多个高技术含量的品种,产品在全国铁路市场占有率较大的份额。2001年,国家科学技术部批准认定为国家重点更新技术企业。

武汉正远铁路电气有限公司致力于变流技术和计算机控制技术,在铁路机车、车辆领域和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的应用研



省长罗清泉(前左一)参观正远电器

究，现已开发成功产品多项。先后开发了铁道机车车辆用电气屏柜、内燃机车微机控制装置、客车监控装置、机车空调逆变电源、客车用逆变器、电力机车辅助变流装置。2001年，ZY2000机车控制装置列入国家级火炬计划。

以上这些产品的成功开发，不仅加快了铁路技术革新的进程，而且为城市轨道交通领域机车和拖车的国产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加速机车计算机控制技术革新和变流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武汉市科委又于2000年9月在正远公司挂牌成立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中心，针对电力机车、内燃机车、城市轨道交通(地铁、城市轻轨交通车)进行可控变流技术、逆变技术、控制技术的研究开发和产品转化。

双利电线电缆

武汉双利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为武汉双利电线厂，是由武汉铝厂出资金、出技术，江岸区谏家矶朱家河村出

土地于1985年联合创办的集体企业。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原有主导产品——铝绞线及钢芯铝绞线、聚氯乙烯绝缘电线电缆、架空绝缘电缆的基础上,公司先后投入资金3000万元进行设备改造和新产品研发,成功开发了稀土导线、铝合金导线等系列产品。所有产品均通过ISO9002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并取得了相应的生产许可资格。

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公司创造出显著业绩,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公司曾被有关部门评为“重合同守信用单位”、“经济小巨人”、“现场管理达标单位”。1999年,公司被列入国家经贸委《城乡电网改造推荐目录》,2000年获得“双利牌”注册商标、湖北省AAA资信等级、二级计进单位资格,2001年又被评为“十强企业”、“湖北工业企业综合实力五百强”,并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和“民营科技型企业”。

公司总资产达4000万元,2000年、2001年、2002年连续三年产值突破亿元,利税累计达2000万元左右,全员年平均劳动生产率达98万元。

四 服务行业涌新秀

亢龙太子酒轩

亢龙太子酒轩是以连锁模式经营中式餐饮的民营企业。经过1997年、1998年和2000年三次战略扩张,先后在汉口沿江大道、建设大道和武昌洪山广场建起了三座大规模的酒店。拥有营业面积1万平方米,经营台位500余桌,有各种典雅包房1百余间,就业人数1000余名。2001年度实现销售收入1.62亿元,缴纳税金653万余元,是武汉市及湖北省同行业中的龙头企业,为地方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亢龙太子酒轩创业十多年来,始终坚持了举品牌之旗,走创新之路,兴美食之业,树服务之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拼

博进取,与时俱进,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受到了政府及行业的一致肯定和表彰。近年来曾先后被湖北省及武汉市授予了明星企业、AAA企业、质量信誉保证企业、优秀慈善企业、质量计量及物价信得过单位、湖北餐饮二十强、市场绿色消费品牌、行业十大品牌等荣誉称号。2001年,被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烹饪协会评定为“中国餐饮百强企业”、“中华餐饮名店”;2002年又被市委、市政府授予“贡献突出民营企业”,使“亢龙太子”品牌誉满江城,名扬荆楚大地。

亢龙太子酒轩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逐步推行了管理规范化、经营个性化和服务亲情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其企业经营管理的成功之道,主要是坚持不懈地推行了六大战略。一是人才战略。人才是兴企之本,把爱才、聚才、育才、用才视为系统工程,整体推进。二是名牌战略。坚持品牌、品位、品质并举,德治、法治、诚信并重,打亮了亢龙太子品牌。三是创新战略。树立超前意识,紧跟市场,不断进行观念创新、技术创新、出品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与时俱进。四是大众战略。不断调整出品结构,全力满足多层次、多菜系、多风味的消费需求,营造出高品味,低价格,超值享受的美食环境。五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弘扬绿色、健康、科学、营养的主旋律,把美食与享受融为一体、品牌与文化相得益彰,努力营造出温馨舒适的美食环境和品位高雅的文化氛围。六是适度的扩张战略。追求成功,追求发展,永不满足地把企业做好、做大、做强。在实施整体推进的发展战略中,为江城人民奉献了又一处美食乐园。

武汉三五酒店

武汉三五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是湖北省内一家优秀的私营餐饮连锁企业。成立于1992年。1998年3月至2000年1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企业共开办直营店12家,加盟店2家,开店成功率达100%,创造了开办连锁店的奇迹,也实现了成

立管理公司后的第一次飞跃。1999年在主业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企业也开始尝试着经营其他相关产业(如食品加工、酒水代理等),取得了很好的效益,拓展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思路,也进一步提升了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并为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2001年管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800万元,武汉三五品牌经权威机构评估价值达3900万人民币,为企业扩大经营提供了一项重要的量化依据。

公司始终坚持“民以食为天,我以民为天”的经营理念 and “为顾客营造温馨家园”的服务理念,倡导诚信经营和超值消费,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各级政府的广泛关注,申请加盟者纷至沓来。截至2002年10月,共发展加盟店20家,连锁店达到26家,其中直营店6家。员工近5000人,其中先后安排下岗职工近400人,是市政府确定的“下岗职工再就业基地”。目前,武汉三五酒店连锁店遍布武汉三镇、湖北省内大部地市、河南省郑州等6个地市,在北京市场也已小有名气。在十余年的运作中,“武汉三五”品牌得到不断的延伸,市场份额逐年递增,管理工作也得到进一步规范,年营业收入逾亿元,利税过千万,产值、利税均居湖北餐饮行业前列。2000年以来,经中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烹饪协会、中国饭店协会评估,企业综合业绩连续两年入选中国餐饮百强企业。

该公司是“全国餐饮百强企业”、“全国绿色餐饮企业”、“中华餐饮名店”,湖北省“餐饮名店”、“风味名店”、“消费者信得过单位”,武汉市“合法权益重点保护企业”、“行业十佳”、“巾帼文明示范岗”、“下岗职工再就业基地”、“有突出贡献私营企业”等荣誉称号。在1999年11月在第四届全国烹饪大赛上,武汉三五酒店作为鄂菜的惟一代表,一举夺得“七金二银一铜”和团体金奖的优异成绩;2000年3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三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上,荣获团体金牌。2001年11月,随武汉市政府代表团在日本大分市成功举办了“武汉之宴”美食节,大大提高了鄂菜的国际知名度,为鄂菜的推广和走出国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香格里拉大饭店

武汉香格里拉大饭店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建设大道700号,1999年开业,有507间客房及套房,平均面积为38平方米,宽敞舒适;房间不仅布置典雅华贵,而且设施配备齐全,商旅更可充分享用豪华间之贵宾服务及多项优惠。忙里偷闲,消除疲劳,获得极大享受!

饭店里的健康中心,拥有多种现代化的休闲设施。其中包括:室内游泳池、配备先进的健身房、涡流浴池、桑拿和按摩室。此外,还有一座造型独特的美丽园林和一个户外网球场,为饭店增添无限生机。

无论是千人华宴或知己小酌,武汉香格里拉的各色中西餐饮设施可令人各得其所。香宫,不单精于烹调地道的粤菜名品,各省的风味菜肴亦美味无匹。

餐厅附设9个包间,可供10~16位客人进餐。在充满朝气的动吧餐厅及酒吧,一面欣赏现场助兴节目,一面享受现代美式、意式西饌。咖啡苑之开放式,厨房为您呈献琳琅满目的国际自助及零点美食,令



香格里拉大酒店

人大饱口福。

香格里拉一向以擅长承办最具规模的会议与宴会著称，而武汉香格里拉在这方面的设施及进行运作的专业人员也是市内最出色的。饭店的宴会大厅面积达 1 600 平方米，可容纳多达 2 000 名宾客，并可随意分隔成 3 个较小的宴会厅。此外，还有 7 个多功能厅，面积介于 64~288 平方米，并特设贵宾室和新娘厅。所有会议室及宴会厅均设有最先进的影音装置和同声传译设备。

金色池塘视听歌城

金色池塘 KTV 视听歌城是武汉市最大的 KTV 视听歌城，拥有 99 间 KTV 包房，采用了最先进的 VOD 电视播放系统，同时建立了拥有 2 万多首曲目，各种版本一应俱全的大型歌库，在十多名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的专业人员精心的调理下，一直在业界保持着领先水平。

金色池塘自助餐每日供应 100 多道菜肴，果品糕点，每道出品选料上乘，制作精良，加之收费合理，深受顾客青睐。

以诚信服务作为企业的理念，以服务中的热心、细心、贴



金色池塘 KTV 视听歌城

心去换取广大顾客的放心、舒心、开心。同时,金色池塘更加精心地去营造一个休闲、时尚的娱乐环境,回报广大顾客的厚爱。

在这里,不仅可以感受一流的音响视听效果,更可在优雅的环境中享受到星级服务的舒适和温馨,是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也是理想的商务洽谈酬宾之地。

五 大型零售商巡视

好又多长青店

坐落于黄兴路与中山大道交汇口的好又多量贩,是一家全国性的大型连锁超市。股东有世界著名的美国花旗银行,日本野村证券,台湾宏仁集团、诚达集团,中华开发基金会等。好又多量贩自1997年8月8日在广州诞生第一家店起,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已经发展到40多家店,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好友多长青店

好又多以“服务、诚信、拼搏、创新、团队、分享”的经营理念。面对“超市大战”激烈的市场竞争，好又多以敏锐的市场触角，探索商品经营与资本运作相结合的规模扩张战略，建立向“衣、食、住、用、行”全方位发展的超市。长青店开业以来，深得百姓的青睐和厚爱。曾被省、市、区评为2001年度“武汉市诚信纳税人”，2000、2001年度“酒类商品质量信誉保证单位”，2001年度“外商投资企业先进单位”，2001年度“消防先进单位”，2001年度“经警队先进集体”，2000、2001年连续被评为“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等荣誉称号。

“服务大众、回馈社会”是好又多的经营理念。长青店曾多次向社会各界捐赠，每逢六一儿童节、重阳节、春节都向幼儿园、孤儿院、敬老院等单位赠送慰问品。特别是对残疾人的关怀，不仅进行多次“助残捐赠活动”，而且还为残疾人提供劳动就业机会，真正做到了助残、护残、爱残。

“顾客永远至上，服务永远第一，保证满意”和“诚信服务”。长青店不仅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购物环境，而且不断提升管理与服务的品质和要求，让消费者都能购买到物美价廉、品质保证的商品时，同样感受到真诚的服务。同时，长青店也虚心接纳来自政府、顾客等各个层面的意见，不断改善服务水平和完备管理机制。

长青店正不断完善，加强管理，并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关心支持下，提升服务和竞争能力，走向未来！

正大超市与易初莲花

正大集团是泰国最富有和最具实力的家族企业之一。她的创始人是谢易初先生。

1921年，正大创始人谢易初先生从汕头到曼谷开了第一家售卖蔬菜种子的商店，专门出售由汕头进口的种子。70年代，正大成为最大的饲料和鸡类加工商，并拓展为猪、鸡、鱼、及鱼类养殖。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吸引外资，正大集团

是最早进入大陆投资的外国企业集团。

到现在为止,正大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跨国公司之一,它的业务范围已扩展至饲料业、水产养殖、国际贸易、石油业、通讯业、房地产业和零售业等十多种行业。

2001年,江岸区后湖乡竹叶山村引进了正大集团。当年9月,武汉市首家正大超市在竹叶山村开业,2003年易名为易初莲花购物中心。

易初莲花购物中心系正大集团下属大型连锁购物中心。易初莲花于1997年6月23日在中国建立了首家商场。

经过近5年的运行,易初莲花将最新最先进的现代零售购物概念带入中国,以全新的购物体验、便捷温馨的购物环境在市民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易初莲花主要目标是每天低价向顾客提供高质的商品,秉承“一次性购足”原则,在易初莲花可买到新鲜蔬菜、食用菜油、电器设备、自行车、服装、家居用品及儿童玩具。易初莲花志在提高中国公众的生活水平,创造就业机会。该公司还提供交通车辆,免费接送顾客。



正大超市、环宇车网信贷中心

新时尚购物广场

为进一步拓展潜质优厚的武汉市场,继成功经营武汉新世界百货商场后,2001年12月,由香港新世界集团投资6000万人民币,在武汉市最繁华地段——武汉百年老街江汉路步

行街，经营管理第二家百货商场——武汉新世界百货时尚广场。

武汉新世界百货时尚广场，具有浪漫现代的装修风格，



香港新世界百货时尚广场

国际化的导购设施，时尚潮流的商品种类，灵活多样的促销方式，让广大消费者充分享受购物休闲的乐趣。时尚广场1~5层，总经营面积近2万多平方米，是一家以经营时尚服饰为主，集餐饮、娱乐、休闲、服务为一体的新型购物休闲场所。

在这里，顾客可以精心挑选适合品味的各类时尚精品服装、皮具、珠宝、名表、饰品，也可以到具有巴西风情餐厅品尝巴西烤肉，或到美食广场挑选各类小吃；爱美的女士还可以去二楼美容院美容。优美的环境，一流的服务，令顾客流连忘返。

六 异彩纷呈的市场群

扬子江服装市场

武汉市扬子时装市场，位于扬子街，左邻武汉港大码头，右连繁华的江汉路商业步行街，是经济腾飞的“黄金长廊”。市场面积4000余平方米，设有精品时装厅2个。全场共有469个摊位，从业人员共有700余人，其中90%是待业青年和社会



扬子市场一角

闲散人员。自 1983 年 5 月开业以来，市场逐步发展成为批零销售，以经营青年男女时装为主的专业市场。它充分发挥式样新，款式多，色调全，信息快的优势；坚持“文明经商，信誉第一”的职业道德，以规范，新颖的面貌吸引着慕名前来的无数中外顾客。旺季高峰时

多达 10 万余人次，月销售额在 8 600 万元以上，市场成交额突破亿元。群众赞誉这里代表着武汉市时装的新潮流，它是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产物，为促进产品流通，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美化群众生活，安排劳动就业起了积极作用。

扬子市场的发展，得到上级领导和社会各部门的支持和



李鹏总理视察扬子街服装市场

关注。李鹏总理 1985 年来汉时曾前往视察,并给予高度评价。扬子市场历来被评为省、市、区文明市场,被武汉市商业管理委员会授予“第一流服务”先进单位,在邻近省、市乃至全国都具有较高知名度。市场孕育了太和、雅琪等一批汉派名牌服饰,并从中走出了一批有影响的企业家;同时,为武汉市个体经营经济的发展,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2002 年因环境整治,该市场拆除,扬子江服装市场也只有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了。

婚纱人像艺术摄影市场群

随着人们现代生活水平的提高,摄影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相当普遍的消费项目,伴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空间和层次,如纪念照、儿童照、老年照、全家照、婚纱照……摄影业是广告的互补行业,广告是企业营销的重要手段,广告业的发展也迎来了摄影的需求和发展。



新纪元摄影广场

武汉市九省通衢,摄影、图片制作业近年来也形成发展热点。为了推动此行业的发展,在武汉形成行业规模经济效益,政府工商管理部门倡导和支持举办摄影、图片制作“市场”,为摄影行业发展营造良好供求氛围。该市场以新纪元摄影广场

为中心,向东南辐射到中山大道黄石路一带,西南至江汉路胜利街。

新纪元摄影广场是中国第一家以婚纱、艺术人像为主的专业摄影市场。由省交通厅远大实业公司投资兴建。广场地处中山大道中段,紧邻闻名遐迩的江汉路商业步行一条街,占地7 000多平方米。2 000年7月开业,以全欧式风格庭院建筑,景色优美宜人。该场配套设施完善,经营种类齐全,集婚纱、艺术人像、儿童摄影和写真专辑、黑白经典、图片制作及专业培训于一体;纳地区专业人像名家、名店一场,被列为江岸区“八大”市场之一,并被中国摄影家协会评为全国第一家专业性的市场。

该场地处汉口中山大道与江汉路交汇地段,中山大道的历史建筑为这一地段增添了光彩。周围现有摄影商家近30个。著名的有:银汀、杜鲁成、皇宫、非凡、非常台北、芝柏、王开、色色等。摄影及其制作业在该区域已形成“隐形市场”。

武汉电信、华中通讯、武汉数码港市场群

武汉电信、华中通讯、武汉数码港市场群(以下简称大智



路通讯市场群)前临汉口中山大道,侧靠大智路,毗邻武汉现代交通大动脉轻轨铁路,与江汉路步行街和武汉江滩景观

武汉数码港

鼎足而立,成为武汉最大的商贸旅游区和商业黄金圈。

大智路通讯市场群凭借武汉市电信局所在地优势,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繁荣于21世纪,共有店铺80多家和华中通讯广场、武汉数码港、融兴通讯市场3个大型市场,营业面积37000平米。经营手机、寻呼机、灵通机、电话机、通讯系统及相关高端和辅配产品等。经营品种齐全,层次分明,时尚和二手通讯产品择场而沽。

倚仗华中通讯广场、武汉数码港、融兴通讯市场等现代物流港,集聚国内外知名品牌通讯专卖店、售后服务部30多家,成为辐射周边省市最成熟的通信市场群。

此地已成为武汉三镇猎奇时尚之地境。客流汇聚,周末更是人声鼎沸,客流量达3万多人。占据三镇通信市场五成以上份额,日渐兴旺。市场年营业额在7亿元以上,年均增长率近20%,是中西部地区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通信市场。

香港路副食茶叶市场群

武汉这样一个拥有831.26万固定人口的大都市,饮茶已成为百姓防暑降温的首选。茶叶还有帮助消化、解渴生津的功能,需求量很大。

香港路茶叶市场是武汉首家茶叶专业批发市场。自1999年1月建立至今,茶叶的年销售已达2亿元。该市场占地面积



香港路茶叶市场

达 1.4 万平方米，目前已承担了全市 2/5 左右的茶叶供应量，占有率仍在不断扩大，呈逐年上升趋势。它汇集了全国各地茶商 200 余户，面向全国各地销售不同产地、不同类别、不同等级、不同规格、不同品种的绿茶、红茶、花茶、乌龙茶、保健茶、成品茶、散装茶、极品茶、礼品茶等，初步形成了“汇五湖四海茶叶精品，迎天南地北大客商”的格局。

竹叶山汽车交易、零配件经营市场群

坐落于建设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的竹叶山汽车市场，是汉口地区惟一的一家大型汽车市场，于 1998 年 12 月 19 日正式开业。目前已成为公认的华中地区最大的汽车专业市场，年交易额近 20 亿元。以其规模大、品种多、信誉佳、服务好、价格优，在汽车行业及广大消费者中享有盛誉。是汽车经销商的必争之地，是购车者的首选市场。

竹叶山汽车市场除有 170 间铺面外，还设有各种品牌展厅，具有一条龙服务功能，工商、交管、税务、公路交通、保险、



竹叶山汽车市场

银行在市场内设点办公,购车办证一次完成。已建成一个集整车销售、汽车配件、汽车维修、汽贸信息、汽车电子商务、售前售后服务六位一体的高起点、多功能、全方位、开放型、规范化的大型汽车市场。

为了进一步规范经营户的商业行为,提高售后服务质量,汽车市场积极开展了创建“购物放心市场”的活动,为经营户统一制定了《商品质量管理制度》、《售后服务管理制度》,设立了投诉箱与投诉电话,被评为市级“购物放心市场”。通过市场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保护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做到质量放心无假货,价格放心无欺诈,服务放心无烦恼。经销商重承诺、守信用,文明用语、热情待客,建立了高层次的商业文明。

市场以真诚赢得信誉,以信誉保证效益。经过几年的努力,汽车市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和一流的信誉。“竹叶山市场”已成为全省乃至全国一个著名的市场品牌,形成了巨大的无形资产,确立了它作为湖北汽车消费市场风向标、晴雨表的地位。年交易额近20亿元,全年销售量占武汉市汽车销量的1/3。1998年至2001年连续四年被评为“武汉市文明市场”,2000、2001年连续被评为“湖北省文明市场”。

红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群

红桥蔬菜批发市场创建于1992年12月,原称三眼桥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坐落在蔡家田北区。红桥市场现占地面积8000余平方米,各类经营户近2000个,主要经营叶菜类、茎菜类、莲藕类、瓜果类等数十个品种。

红桥市场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第一”的经营理念,机构设置合理,规章制度健全,各项管理严格。创建10年来,红桥市场员工走过了一条艰苦创业的道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最初的十几名员工,发展到今天的85名员工;从最初不足400



红桥蔬菜批发市场大门

平方米的简易市场，发展到今天有 8 000 余平方米的规范交易市场；从最初几名菜农、菜贩，发展到今天有近 2 000 名经营户；从最

初经营几个蔬菜品种，发展到今天有数十个品种；从最初每天 1 000 多元的交易额，发展到今天每天近 10 万元交易额，在武汉市蔬菜批发行业，牢牢地占领了一席之地。

红桥市场成立 10 年来，不但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为武汉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一是为 85 名下岗职工和红桥村民提供了再就业岗位，为政府分了忧，为下岗职工排了难，为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二是为远至河南、近到郊县的近 2 000 名菜农、菜贩提供了交易场所，为集贸市场经营户和周边市民提供了方便，为武汉市“菜篮子工程”建设作出了贡献；三是每年上缴红桥村管理费数十万元，为红桥村的全面建设作出了贡献；四是向工商税各部门累计上缴各种税费近百万元，为武汉市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多次受到市、区、街政府的表彰。

丹水池生产资料市场群

武汉丹水池生产资料市场(661)是在江岸区委、区政府的直接支持与领导下，由中国物资储运公司武汉汉口公司于 1996

年3月18日兴办的金属材料现货交易市场。作为该市场的主办单位——中国物资储运武汉汉口公司,地处长江之滨,毗邻市区主干道——解放大道,同武汉钢铁公司隔江相望,处于华中第一站——汉口新火车站和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的结合部位,地理位置优越,交通运输方便。占地面积43万平方米,拥有20万平方米的标准货场,33栋共约6万平方米的标准库房,各种起重运输设备51台(辆),4条铁路专用线长达5公里。机械作业覆盖面100%,年吞吐量100多万吨,业务范围包括商品仓储(含公共保税)、运输、物资经销、生产资料市场库场设备租赁、国内物资中转、国际集装箱联运、起重运输设备制造与维修、金属材料剪切加工和物资配送等业务,功能齐全,实力雄厚,是一个具有多种服务功能的、综合型的、原国内贸易部在汉大型国有物资流通企业。

武汉丹水池生产资料市场(661)是前场后库、现货交易、集批发与零售于一体的金属材料市场,从创办至今已有6年的历史。在这6年的时间里,始终坚持滚动发展的经营方向,在稳定中不断发展壮大。由1996年创办初期的1个交易厅、30间办公用房,发展到现在的6个交易厅,213间办公用房。



丹水池生产资料市场大门



丹水池生产资料市场板材场

交易面积由最初的1 000平方米发展到现在的25 000平方米,进场交易商家从初期的15家发展到现在的260余家(含超市),投

入资金550万元,年吞吐量110余万吨,年成交额近3亿元。现在为发展配送代理业务,公司投资320万元新建一座高站台、多用途的配送分拣库房,面积3 668平方米。檐高5.3米,双跨度44米,屋顶由彩板金属制成,呈圆拱型结构。目前该库房处于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满足了现代物流配送功能的需要。现在,进入汉口丹水池生产资料市场(661)交易的全国大、中型钢厂10余家,联营钢厂20余家,以及中央在汉大型物资流通企业和省内外物资销单位,在武汉市乃至中南地区同类钢材市场中名列前茅。

该公司将成为华中地区第一家数码仓库,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EDI电子交易手段,针对现货电子交易这一全新的商品流通方式进行设计,使驻场客户可享受远程登录、了解动态库存信息、实时查询等服务。

武汉市文物监管品市场

为了更好地延续繁荣和发展历史文化,1997年经湖北省

文化厅、武汉市人民政府批准,开办了全市惟一合法的文物监管品市场——武汉市文物市场。

武汉市文物监管品市场坐落于香港路209号,地处繁华要道,交通方便。

在排排大型庭院式的仿古建筑面前,可充分领略到“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历史境界。

占地面积8000平方米的文物市场分为室内、室外两大部分:设有800平方米的展销大厅,250平方米的展览厅,250平方米的精品画室,还有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210多个大小造型各异的店铺,各种古玩、民间新老工艺品,目不暇接。

市场可容纳200多个室外摊位。在造型别致的石雕、各式奇特的盆景中衬托出了市场环境的优雅。配套的大、中型会议室、餐厅为投资者、经营者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场所。

市场以经营文物监管品、珠宝玉器、红木家具、文房四宝、挂毯刺绣、古籍善本、钱币邮票、民间古玩为主,它把民间古玩、新老工艺品融为一体,吸引国内各大工艺美术家、陶瓷家、刺绣家、古玩界、收藏界人士进场进行交流、串换、交易活动。

闻名中外的“中国瓷都”——景德镇的精品,“家有钱财万



武汉文物市场

贯不如钧窑一件”的钧瓷，宜兴的“紫砂壶”，苏州的“刺绣”，湖南的“湘绣”，河北的“易水砚”，以及郭沫若先生赋诗称赞“匪独青如玉，五彩竞相宣，斧凿奇神鬼，人巧胜天然”的青田石雕，都云集市场。

引人注目的明清时期的月洞式紫檀木满功架子床、二龙戏珠罗汉床、贵妃床、小姐床、双道关门床，其做工精细，龙凤呈祥，令人一饱眼福，展现出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精湛的工艺技术。

叹为观止的清中晚期山水人物瓶，缠枝莲喜字瓶，各种粉彩、五彩、青花格里红双鱼盘的瓷版，以及东方红西瓜罐，让人拍案叫绝。其余“抓革命促生产，以粮为纲”的各种瓷碗、红袖章、“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宣传画等“文革”文物，也让人惊异。庞大的市场，琳琅满目的古物，让人流连忘返。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民间收藏已成为人们文化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喜爱收藏文物的群众，希望通过市场的渠道得到文物，这已成为一种社会需求。因此，市场特设了大型的室外地摊，每逢周六、周日，这里车水马龙，人群中有来自各县、市的，更有来自河南、天津、内蒙古、辽宁、河北、湖南、安徽、江苏、广东等地的。他们中间有来“捡漏”的，有来探路开阔眼界的，有来长学问的，有来淘金的。该市场现已成为中南地区广大古玩收藏爱好者和广大市民交流、观光、购物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场所，也为一些下岗职工再就业提供了就业场所。被湖北省旅游局定点为旅游重点单位。

第二章 文教名区

江岸区一直以文化教育名区著称。自汉口开埠以来,城市的繁华,租界的影响,使这一地区很早就成为剧场、影院集中之地。解放后,江岸成为市委市政府所在地,也成为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文化机构设于此地。一批作家、艺术家创作出了具有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浓郁的文化气息熏陶着大批学子,百年老校再创辉煌。一所所闻名全市的中小学在全市的基础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里还有闻名的特色医院。

一 梨园笙歌令人难忘

京剧票社与“融社”

武汉京剧票房(京剧业余爱好者的组织,也称票社)自精武剧社起,历经华商总会到青年会,逐步发展到高潮。在此期间演出频繁,赈灾义演的次数多,有的票社单独被邀,有的联合演出,还有的与专业名演员和汉剧演员同台演出。如北

伐时郭德洁(李宗仁夫人)在汉举办了3天义演,欧阳予倩和王攀云(精武剧社)分别在《人面桃花》、《黛玉葬花》中扮演角色。为慰劳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的士兵,青年会每周演两晚,连续4周。1937年5月1日,梅兰芳、南铁生、章晓珊等还在汉口大舞台演出《花田八错》和《西施》,为市图书馆筹款,轰动武汉三镇。

武汉沦陷后,原有名票房(社)均已停止活动。但汉口法国租界尚不是日寇势力范围,一些京剧票友便以法租界为基地,开展业余京剧活动。1904年,在如寿里26号陈洁如家成立“融社”票房;继之成立的还有冬社、阳春、韵社、业余、文协国剧社、云锦、青年会、雅韵、民教等。票友中著名的有冬社的华香琳、融社的何友三、林震遐,阳春社的马叔璋、文协国剧社的管家驹等。

1945年,“融社”迁入汉口市文化俱乐部内,对外名义是

“汉口市文化俱乐部业余京剧团”和“汉口市融社业余京剧研究会”。“文革”前仍有活动的票房(社)有“海员业余京剧团”、“铁路业余京剧团”、“梨园春京剧社”、“江四寿星京剧社”、“满春业余京剧团”、“上海街业余京剧社”、“宝庆街业余京剧社”、“先锋居委会业余京剧社”、“武汉市业余京剧研究社”等。



汉风汉剧票房社员玩菊

花鼓戏与楚剧

楚剧,原名花鼓戏,又称西路子花鼓,即黄孝花鼓。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前后,汉口就有黄孝花鼓戏演出。最初演出地点是土垌(即今长堤街、统一街的下段)。当时,土垌一带的茶园较多,其中早逢春、望湖泉较为著名。黄孝花鼓戏也十分活跃,大都以茶园为活动舞台。诗人、浙江余姚叶调元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重游汉口,写了一部《汉口竹枝词》,其中就有关于茶园演唱花鼓戏的生动记录。如:

俗人偏自爱风情,浪语油腔最喜听。
土垌约看花鼓戏,开场总在两三更。

清茶寂寞殊无味,要听丝弦怕熟人。
能使两难成两美,地方最好早逢春。

沿湖茶肆夹花庄,终岁笙歌拟教坊。
金凤阿香都妙绝,就中第一简姑娘。

茶香烟雾袅灯光,为恋清歌不散场。
四座无言丝肉脆,望湖泉外月如霜。

这四首竹枝词,除描述当时土垌一带花鼓戏在茶园演出盛况,还记述了有关花鼓戏的三件事:一是花鼓戏的观众,即所谓“俗人”,即指在土垌一带劳作的黄孝帮人;二是花鼓戏的演员,即金凤、阿香、简姑娘等,都是当时的演员,均不见史籍;三是花鼓戏的唱腔,即所谓“丝肉脆”,无丝弦伴奏,只靠后台人声帮腔和接腔。

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为我们研究楚剧的源流沿革及发展轨迹,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前后,汉口下游的沙口、水口等地



陈伯华饰演《霸王别姬》

茶园盛行,其中以“望江”、“贤乐”两个茶园较为出名。黄孝花鼓戏就在这些茶园中“挂衣”(化妆清唱)演出。演出剧目有《十里亭》、《送端阳》、《白扇记》、《大反情》、《小反情》、《雪梅观画》、《雪梅吊孝》、《何氏劝姑》、《蔡鸣凤辞店》、《喻老四拜年》、《张监生调情》等数十出。主要演员有黄官保、黄子云、杨蛤蟆、甘石生、陈彬卿等。著名汉剧表演艺术家牡丹花(即董瑶阶)青

年时代也在沙口的茶园中唱过花鼓戏,后来改唱汉剧。清末民初,在沙口、水口演出的还有号称“三个半伢”的四个相公,即新洲县的恩伢、牛伢、好伢、货伢。

1902年秋季,黄孝花鼓戏艺人魏报应、黄子云,聘来沙口戏班,组成“同庆班”,在茶园老板侯林、吴继恒、胡桂生的邀请下,进入汉口法租界三码头的清正茶园演出,使清正茶园成为有租界茶园演出花鼓戏的第一家。演出主要剧目是“三个辞店四个楼”,即《蔡鸣凤辞店》、《胡宴昌辞店》、《张德和辞店》、《东楼会》、《西楼会》、《南楼会》、《北楼会》,所有剧目也只有60余出。主要演员旦角有黄和尚、余天保、许么、小炳杨、戴和尚、李品三(云中仙)等,小生有林曹、范么等,老生有黄子云、陈彬卿等,丑角有周元、陈大山等。当时,汉口茶园演戏,不卖戏票,只收茶钱。清正茶园自演花鼓戏以来,生意极好,每夜满堂,一般可卖300壶左右,轰动一时。于是各租界争相效尤,开设

了一批又一批唱花鼓戏的茶园。如英租界的美观茶园、双桂茶园、春桂茶园、天一茶园,法租界的共和升平楼、玉壶春(后改为春仙、天仙茶园)、天声茶园、文明茶园、福朗茶园、福和茶园、丹桂茶园、临汉茶园等,俄租界的东记茶园、怡红茶园,日租界的金谷茶园。在这段时间里,汉口共有黄孝花鼓戏茶园17家。

在这些黄孝花鼓戏茶园的竞争角逐中,涌现了一批名班名角。1914年,李百川率同庆班进入法租界的玉壶春,与共和升平楼的东秋屏(艺名小宝宝),各占一方,大出风头。1919~1921年,天仙茶园先后聘来了陶古鹏、沈云陔与各茶园竞争。在激烈的竞争角逐中,共和升平楼、天仙茶园、天声茶园,形成鼎足之势。与此同时,也涌现出如江秋屏、李百川、章炳炎、江南蓉、王若愚、陶古鹏、姚如春、黄汉翔、沈云陔等一批花鼓戏名艺人。他们在花鼓戏和楚剧前后两个阶段中都是熠熠生辉、载入史册的著名演员。

黄孝花鼓戏,实践并成功地进行了两项重大的改革:一是舞台布景的改革,二是伴奏音乐的改革。

1926年9月,汉口戏剧界筹建湖北剧学总会,李之龙倡导戏剧改革,由剧学会负责人、著名汉剧演员傅心一提议,将黄孝花鼓戏正式定名为“楚剧”。1927年2月2日(即丁卯年正月初一),陶古鹏率天仙班应聘,进入“血花世界”(今民众乐园)二楼首场公演。自此,楚剧纷纷走出茶园,进入剧场演出,使茶园萧条冷落。一部分茶园改剧场,另一部分茶园则纷纷倒闭,一度欣欣向荣的茶园结束了繁荣鼎盛的局面。楚剧在茶园里活动了几十年,因此汉口茶园对楚剧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楚剧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早期的电影院

电影院在武汉出现最早的时间是1912年,地点在租界内。第一家是法商开的,地址在今蔡锷路洞庭街口。1917年,俄商

在今一元路开维多利大戏院。1918年，法商在今蔡锷路开设威严大戏院。1920年，法商在今中山大道蔡锷路口建康登大戏院。1924年意商鲍特租李氏三兄弟在今兰陵路的土地，建了一座简易平房，用来放电影，取名“环球大戏院”。

电影院的老板多是外国人，放映的片子当然全部是进口的。

1928年，全市有11家专业电影院，另有9家兼营放映电影的游艺场所和露天戏园。11家影院中，华资7家、外资4家。这些电影院以汉口为多，汉口又集中在今江岸区。

1936年，全市电影院仅7家。武昌1家，汉口今江岸区6家，均为华资。

1949年武汉解放时，接管11家专营和兼营的电影院。1951年，各电影院改为国营。江岸区内的明星电影院改为武汉电影院，中央电影院改名解放军电影院（后再改为解放电影院），大光明戏院改为中南剧场，上海电影院先改为延安电影院，1952年再改为中原电影院。

1958年，在山海关路35号又建了七一电影院。另外解放公园内也设立了电影院。



1931年浸在水中的中央大戏院（今解放电影院）

1979年，市電影發行放映公司投資對全市電影院進行大修、中修並安裝制冷設備。江岸區內大修的有中原電影院、解放電影院、翻修的有武漢電影院、新安裝制冷設備的有七一電影院。

1985年，全市文化系統共有9家電影院。

最早改建為寬銀幕的電影院有江岸區的武漢電影院(1959年)，最早改建為立體電影院的是解放電影院(1963年)。

往日的演出場所

明、清時期，武漢地區的戲曲藝人只能在王府、官邸、富戶宅內獻藝，或演廟台戲、草台戲(露天場地)。

道光年間，漢口後湖一帶茶園興起，藝人找人多的茶館或在館外的空場開鑼演戲。隨後會館、公所內也建有戲台供演出以增人氣，如山陝會館設7座戲台，江西會館有2座。

19世紀末始有專業劇場出現，仍稱茶園，每天都演戲。1899年，位於今如壽里開了一家丹桂茶園，專演京劇。1902年，位於今華清街開了一家清正茶園，專演楚劇。隨後，在今車站路附近又增加了玉壺春、福朗、雙桂、春桂、新民、共和升平樓等茶園，日夜笙歌。

1908年後，各專業演出場所搬走茶桌，加高舞台，增添座位，改賣茶為賣票。名稱自然不再叫茶園，而稱戲院或舞台。在今江岸區就陸續出現了漢大舞台(北京路)、百代大戲院(蔡鍔路)、天仙大舞台(天聲街)、立大舞台(華清街)、威嚴大戲院(今解放電影院前身)、天聲戲院(天聲街)、漢口大戲院(今武漢電影院)。

1924年，又增模範村戲院(球場街)、光明大戲院(蘭陵路)。1927年再增共舞台(今人民劇院)、世界大戲院(五芳齋附近)，1931年又增上海大戲院(今中原電影院)，1933年又增京漢舞台(一元路)，1935年又增天一戲院(如壽里側)、寧漢劇院(華清街)、鏞記大舞台(洞庭小路)。

沦陷期间的1940年增大智舞台,位于球场街合丰里。

胜利后,车站路又开了家凯旋乐厅,瑞祥路开了家汉乐戏院。

解放后,江岸区的主要演出场所约有9家,即人民剧院(友益街)、新汉剧场(天声街)、民主剧场(天声街)、中南剧场(兰陵路)、光明剧场(瑞祥路)、武汉剧院(解放大道)、江岸剧场(刘家庙)、金声楚戏院(板子桥,1949年11月停业)、凯旋乐厅(车站路,1951年6月20日停业)。

总之,江岸区的影院、剧院数量,历来居全市各区之首。

另外,江岸区还有许多非专业、非经营性质的礼堂、俱乐部,偶尔也供演出、放电影之用。如市政府大礼堂、江岸区委礼堂、黄浦路礼堂、长江职工俱乐部、肉联俱乐部、汉口铁路工人俱乐部、教工俱乐部、文化俱乐部、江岸车辆厂俱乐部、江岸机务段俱乐部、解放公园露天剧场等。

位于江岸区解放大道的武汉剧院1959年竣工,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观众厅设1611个座位,大、小休息室7个。有冷暖气设备和宽敞停车场,是武汉市设备较完善的现代化大型演出场所。

位于江岸区友益街的人民剧院,前身是1914年所建共和

大舞台



汉口大舞台

升平楼,1927年改建后名共舞台。1923年重修,改名汉口大舞台,为武汉演出京剧的主要戏院。建国后定名人民剧院,有座位1957个。1973年再次大修,座位减少为1521个,但台前增设可容50人的乐池。可放映电影,有冷暖气设备。

2003年人民剧院又进行了重建,面目焕然一新。

二 文学艺术家的云集之地

建国后,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政委员会机关设置江岸,中南地区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也聚集于此。后来,江岸区一直作为武汉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文化团体也大多集中在此,如市文联、市作协、市方志馆、市党史办、市档案局、市社科院、市文化局、市文学院、市画院等文化机构及团体,均在江岸。市汉剧院、市京剧团、市楚剧团、市话剧团、市儿童艺术剧院、市说唱团、市木偶剧团、市杂技团、市歌舞剧院等艺术团体,也长期设在江岸。另外,江岸辖区内的剧院、电影院、演出场地也比较多。

丰厚的文化土壤孕育了一批成就斐然的文学艺术家。著名作家姚雪垠长期生活居住在江岸区,其巨著《李自成》大部分篇章就是在江岸完成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春风化雨,融化了祖国大地的寒冰,使文学艺术界迎来了新的春天。在动乱岁月被迫停止创作的不少作家、艺术家重新焕发青春,意气风发,创作了不少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艺术个性的优秀作品。

老诗人曾卓压抑了多年的激情如火山喷发,先后创作出版了《悬崖边的树》、《老水手的歌》、《听笛人手记》等诗集,并在全国文坛受到广泛好评。同时,一批中青年作家、艺术家迅速崛起,显示出旺盛生机,创作了大批贴近现实生活、反映社会风貌的文艺作品,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新时期的武汉文艺与时俱进,日益繁荣,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文学、美术、戏

剧、电视剧等方面的创作硕果累累。

在武汉市文联、作协,以杨书案、管用和等为代表的老一代作家和池莉、刘醒龙、方方、邓一光等一批中年作家潜心创作,勤奋耕耘,各领文坛风骚。以田天、李修文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学新星正崭露头角,后续着文学的春天。《烦恼人生》、《凤凰琴》、《我是太阳》、《你是一座桥》等一批优秀作品享誉文坛。

全区的文艺创作在全市的影响下显现了勃勃生机,1997年,江岸区文联成立,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交流的舞台,诞生了一批优秀文艺作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任蒙的散文、杂文、文艺评论和韩辉光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全市乃至全国文坛都有一定影响。

众多优秀中青年画家中,最为突出的是冷军和李乃蔚。

书法名家有黄松涛、周永基、万军、黄德琳、张少华、宋尚武等。

摄影名家有黄克勤、叶祥鼎、贾连成、茅春晖、李家琪等。

武汉京剧团 前身为中南京剧团,组建于建国初期,1952

年改名为武汉京剧团。50年代,该团名角荟萃,好戏迭出。以高盛林、高百岁、陈鹤峰、关正明、杨菊华、李蔷华、郭玉昆等一批著名演员为主干的强大演出阵营,成为全国鲜



夏雨田(右)与著名相声表学艺术家侯宝林合影

有的京剧大团,风靡江城与全国。如高盛林主演的《关羽走麦城》、高百岁的《徐策跑城》、关正明的《宋江题诗》、李蔷华的《锁麟囊》等。1990年,该团新创作剧目《洪荒大裂变》在唱腔、舞美及表演上均有创新与突破,荣获全国第一届文华新剧目奖。

武汉楚剧团 楚剧是湖北地方剧种,长期扎根在民间,注意刻画小人物,富有浓郁生活情趣,在武汉周边尤为盛行,逐步形成表演朴实、逼真、通俗活泼、清新自然的艺术风格,深受广大民众喜爱。组团50年来,楚剧有了长足的发展,一批整理、创作的优秀剧目脱颖而出,享誉京楚。《葛麻》1952年获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演出一等奖,1954年该剧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艺术片,在全国影响极大。80年代,《狱卒平冤》获全国文华奖。之后,《养命的儿子》、《穆桂英休夫》、《你是一条河》等剧目先后在全国获奖。1955年文化部、人事部授予该团“全国文化先进集体”称号,2001年被评为“湖北省十佳剧团”。

武汉楚剧团的卓越成就,离不开沈云陔、李雅樵、熊剑啸、袁璧玉、钟惠然等老一辈艺人的贡献与培养,更少不了于盛乐、张光明、邱长元、张一平等青年艺术家的继承和发展。

武汉话剧院 前身是中南文工团,后改武汉人民艺术剧院。60年代后,分为武汉话剧院和武汉歌舞剧院。1956年3月,话剧院创作的《扬子江边》,在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中获一等奖。这是武汉话剧院的开山之作、成名之作。进入60年代后的一批辉煌剧目,如《叶尔绍夫兄弟》、《武则天》、《悲壮的颂歌》等,使武汉话剧院跻身全国同行的前列。90年代以来,武汉话剧院驶入发展的快车道,一批创作剧目问世,如《人生一台戏》、《情系母亲河》、《青春独白》等。1995年的《同船过渡》,获全国文化奖、五个一工程奖;继而《春夏秋冬》、《三峡魂》、《母亲》等,相继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由此,武汉话剧院跨入全国话剧界三甲。

武汉汉剧院 在湖北现有的剧种中,历史最久远的首推汉剧。历300多年风雨而不衰,形成了我国以凝重风格见长的一个剧种,对京剧的形成与发展也有过重要的影响。

武汉汉剧团建于建国初期，60年代初改名武汉汉剧院，成为全国十大剧院之一。由杰出的汉剧艺术大师陈伯华领衔，成就显著。无论是传统剧目、改编剧目和创作剧目，均享誉全国，蜚声海外，如《宇宙锋》、《二度梅》、《柜中缘》、《状元媒》等。1978年，汉剧《闯王旗》拍摄成电视艺术片，产生较大影响。创作的《曾根崎殉情》在日本公演，引起轰动，增进了中日文化交流。

该院不仅拥有各派名家，如吴天保、李罗克等大师，还培养出不少新秀。如陈伯华亲授弟子胡和颜、邱玲、邓敏3位，均获戏剧梅花奖。

三 尊师重教催生出大批名校

市六中

武汉市第六中学是武汉市知名的百年老校，坐落在球场街与澳门路之间，占地34680平方米。

该校创办于1908年，由德国传教士开办，始名德华商务学堂，因建在德国球场（今球场街），故市民称之为“德国学堂”。1917年中国与德国绝交，收回了德租界；1919年8月湖北省政府接管，易名为省立汉口中学。1927年春改为湖北



武汉六中

省省立二中第一分部。1935年，汉口天主教会意大利人希贤接办，改名私立汉口上智中学，隶属于德国天主教教会。1938年沦陷前经教育部核准。沦陷后继续办学，直到解放后的1953年，人民政府于4月1日正式接管，改名武汉市立第六中学。

解放前，学校建筑面积为2019平方米，最多时能办12个班，学生不超过600人。解放后，先后修建两座教学大楼，还新建、扩建、改建礼堂、健身房、操场等，使建筑面积由10958平方米增至34680平方米。

学校有专兼职教师239人，教师队伍素质居省市前列。其中特级教师13人、高级教师98人、市学科带头人19人、区学科带头人16人、市优秀中青年教师6人、区优秀青年教师19人、省市区优秀青年专家11人、享有国务院和省市政府特殊津贴6人、武汉市“十大”名师1人。

学校每年平均有400余人次在市级以上各项、各类学科竞赛中获奖。男子篮球队、管弦乐队三镇闻名。高考平均升学率上省线，列省市前茅，2000年高考升学率创历史新高。

该校是湖北省重点中学，省、市两级文明单位，省市两级示范学校和对外开放学校。已与美、加、日、澳、德、法等国中学结成友好学校，与欧、美、加、韩、日和港、台等地学校交流互访。

市二中

武汉市第二中学，始建于1946年，是我省最早的省级重点中学。半个世纪以来，学校为国家输送了数以万计的人才，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作出巨大贡献。从这所“人才摇篮”里培养出“长征三号火箭”设计师、北京地铁设计师、中科院著名学者等数以万计的学生。

学校坐落在汉口中山大道东端，南靠长江二桥，占地面积26640平方米，建筑面积32000平方米。有实验楼一幢，实验设备达部标一类。有多媒体语音实验室两间。有电子阅览室

及网络教室三间,内设有计算机 150 台。有多媒体电教中心,建成了集多媒体教学评估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电话及音视频电化教学闭路系统为一体的信息控制系统。校园网已用 DDN 上因特网,现正以独立域名积极创办国际网站学校。图书馆藏书 6 万余册,期刊杂志 400 余种。图书馆采用计算机管理系统,实行全开架借阅。有艺术体育馆一幢,天文台一座,足球场和健身场各一个。为突出隐性教育,优化教学环境,学校建成了艺术长廊、体育长廊、科技长廊、德育苑和楼顶花园。

全校在职教职工 372 人,市十大名师 1 人,特级教师 10 人,高级教师 110 人,一级教师 105 人。教师中有全国优秀教师 3 人,国家级骨干教师 4 人,省、市管专家 7 人,省优秀教师 4 人,市区学科带头人 37 人,市区优秀青年教师 12 人,区优秀专家、拔尖人材 20 人。教师队伍学历达标,年龄结构合理,整体素质优良。教学人员与非教学人员为 4 : 1。

为争创全国千所示范高中,学校扩大办学规模,现已达 90 个教学班,5 000 多学生的办学规模。

近几年来,二中人继承和发扬“严于律己,勤于工作,淡于名利,乐于奉献,勇于拓新”这一主题精神,坚持“着眼主体,面向未来,培养志向高远,人格健全,基础厚实,素质全面,特长明显,自主自律,善于创新的一代新人”的教育目标,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奇迹。

学校领导对教师坚持做到“三诚”(政治上热诚鼓励,工作上热诚帮助,生活上热诚关怀),激发了教师工作积极性和高度敬业精神,一大批优秀教师脱颖而出。

全国优秀班主任田佩琼,从教 40 年,把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教育事业,根据学生特点把个别教育与一般教育相结合,严格要求与耐心细致相结合,寓教育于教学之中、活动之中、班级管理之中,在动态中教育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在实际工作中,学校把素质教育的切入点放在狠抓课堂教育这一素质教育的主渠道。



武汉二中教学楼

在全体教师中致力于“主体教育”的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构建,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活学生思维,注重方法指导,使学生的学习能力在课堂四十分分钟内获最大限度的发展。

学校近年来大力进行课堂结构改革,一改过去国家课程“一统天下”的旧格局,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必修课程、选修课程、隐性课程三大板块组成的新型课程体系。“科研兴校”取得长足进步。国家级课题研究工作已达到省内领先水平。

近几年来,学科竞赛成绩显著。1人获国际数学竞赛金牌,1人获国际奥林匹克竞赛银牌,3人进入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国代表队,4人进入国家集训队,3人分获全国数学、化学、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3人获银牌,1人获铜牌;6人进入北京国家理科试验班;有近50人进入湖北省学科竞赛集训队。每年在全国各类竞赛中均有30人次获国家级竞赛奖,70余人次获省级奖,100余人次获市级奖。

目前,二中对外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大。1998年和1999年先后两次组团赴英国曼彻斯特考察,开创我省学生组团出国访问的先例。对外友好学校发展到14所,遍及欧、美、澳各大

洲和地区。

近几年来,学校锐意改革,制定《改革与发展五年规划》,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主体教育,进一步完善德育三模式,新的办学思路正在形成。全校开展“绿色学校”创建活动,涌现出一大批绿色班级,既净化了环境,又教会学生生存意识,受益匪浅。“学会做人”教育、“创新素质实践行”活动以及大力开展“弘扬延安精神”活动,为学校德育工作注入新的活力,创设新的天地。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稳步上升,从1996年至今,发展学生党员55人。这一期间,学校德育工作受到省、市、区高度好评。学校于1999年12月顺利通过省级督导评估,成为“湖北省示范高中”。近年来被授予“全国民主管理先进单位”、“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省最佳文明单位”、“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军训先进单位”、“湖北省绿色学校”、“湖北省安全文明校园”、“武汉市实施素质教育先进学校”、“武汉市德育‘六有实体建设’先进学校”、“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状”、“武汉市绿色学校”等光荣称号。詹仲振校长近年获系列殊荣:省、市优秀校长、市管专家、省第九届人大代表,市第九届、第十届政协委员。

在科教兴国,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春天里,二中正在努力争创全国千所示范学校,为把二中办成全国闻名、国际知名的学校而努力奋斗。

市七一中学

武汉市七一中学位于中山大道1433号,创办于1971年2月,前身是三元里小学。开始为完全中学,1981年由完全中学改为单设初中。学校先后获得了首批“湖北省教改实验初中”、“湖北省电化教育试点学校”、“武汉市电化教育示范学校”、“武汉市办学水平先进学校”等光荣称号。

绿树掩映、环境优美的小操场,干净整洁的校园,统一规划、各具特色的功能室,让学生拥有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达

到部标一类的实验设备、高档次的双回路卫星接收站、设施齐备、功能先进的多媒体电教室、语音室、演播室、联网微机室、电子阅览室、课件制作室、藏书5万余册



武汉市七一中学校园

的图书室,为教学档次的提高、各项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学校现有教学班50个,学生2000余人,拥有一个朝气蓬勃、团结进取的领导班子及一支学历达标、结构合理、整体素质优良的教师队伍。教职员工168人,市学科带头人2人,区学科带头人8人,市、区优秀青年教师10人,参加国家级骨干培训2人,省级骨干培训7人,骨干教师占教师总数的24%。

学校严格把握办学方向,拟制出主体教育的办学模式。提出了高质量、第一流、有特色、现代化、示范性的办学目标和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人翁精神。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面向全体学生,突出特长,注重学生能力培养的办学风格。全校教职员工在“团结、进取、求实、创新”的校训鼓励下,提出了“向管理要质量,向队伍素质要质量,向科研要质量,向课堂教学要质量”的响亮口号。学校还十分重视对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在各类竞赛中喜报频传。

近年来,数学、物理、化学竞赛荣获全国奖人数、层次均处全市前茅。其中在2002年的全国数学、物理、化学竞赛中,获得丰硕成果:获全国一等奖23人,其中数学5人、物理6人、化学12人,获一等奖总人数居全省第一。2003年全国数理化竞

赛中 26 人获全国一等奖，其中化学 7 人，数学 10 人，物理 9 人，再创全省第一竞赛佳绩。

学校以良好的校风、班风、学风、教风以及优美的环境和稳定提高的教学质量，赢得了家长的信赖、社会的肯定。除连年中考成绩名列市区前茅外，学生各科竞赛也捷报频传，体育、艺术类教育成果显著，成为江岸区乃至武汉市的一所名校。近年来，又扩大了校园面积，加强了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的引进以及现代教育方法的研究，正向着实现建设一所现代化学校的目标迈进。

育才小学

创建于 1954 年，初名武汉干部子弟学校，1957 年改为武汉市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1984 年改为武汉育才小学。

学校位于解放公园路 101 号，占地 19 997 平方米。校园环境优美，布局精当。有主教学楼、钟楼、学生寝室、标准国赛乒乓馆、综合实验大楼等主建筑。综合实验楼内设环境教育室、自然实验室、大队部、多功能阶梯教室、电视演播厅、演讲



武汉市育才小学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左二)视察育才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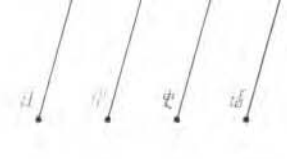
报告厅及 21 个专用教室。

学校有网络教室 3 间,配有计算机 143 台。多媒体教师讲台 12 个,多媒体投影教室 3 个和多媒体电子阅览室 1 间(配有电脑 20 台)。

学校组建了编钟、编磬民乐、交响乐、书法、绘画、体操、乒乓球、篮球、英语、电脑等校园百人特色活动队。科技电脑、书法、合唱、舞蹈等特色队参加省、市、区比赛获奖 1802 次。1993 年,学校被命名“全国乒乓球重点小学”、“全国省儿乒乓球训练基地”。校乒乓球队多次获得省市比赛小学组团体和单打冠军。

学校是武汉市首批开放小学,与澳大利亚一小学结为友好学校,与新加坡、香港、台湾、英、法等地学校开展多项教学交流活动。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都曾视察该校,给予充分肯定。学校坚持开展“和谐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出邓锴等一批优秀学生。教师刘芳获市、区“十佳”班主任称号。



学校先后获省、市绿化先进单位,市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办学水平先进学校,市办学水平综合督导评估先进学校,湖北省示范学校,湖北省素质教育实验学校,省、市“花园式学校”、“园林式学校”等称号。

2000年有23个班,学生1573人,教职工72人。

育才二小

位于惠济一路22号,创办于1989年。校园占地10507平方米,校舍面积7484.6平方米。有教学楼3幢,办公楼、综合楼、实验楼、公寓楼各1幢。有150米环形跑道、2个篮球场。还有图书馆、实验室、劳技室、仪器室、舞蹈室、合唱室、书法室、绘画室、大队部、专家室、科研室、医务室等。还建有校园闭路电视系统、校园网、多功能电教室、多媒体多功能会议厅及各学科教室。

学校有34个班,学生2177人,教师122人。办学模式为创新教育,即以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办学目标定为“三高—化”,即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益、现代化。

学校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及教科研的实验学校和对外交流的开放学校。在科研兴校方针指导下,积极成立了教科研领导小组及专家组,筹建了教科研究室,组建了教研队伍,全面实施教育科研规划。已完成“三大系列”(德育、学科改革、“和谐教育”改革)专题研究。

育才二小是全国第一所创新教育试点学校,《探索创新教育规律、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已申报国家级课题。对有效地适应创新教育的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探索,吸收国内外先进教学模式的精华。按素质教育理论,提出总揽全局的创新教育课堂模式:目标、激励、自立、创新,在市、区展示。

育才二小自1992年开始,已接待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加拿大、韩国、新加坡等国际友人数十批(仅日本

代表团就有 18 批)。与日、韩学校建立交流、互访协议。

1993 年,被市评为“三高一化”先进学校。1994 年,被市评为“办学水平先进学校”。1995 年,被市评为“德育六有实体建设先进学校”。1996 年,被省评为“少先队工作示范学校”、“全国少先队雏鹰大队”。11 月,在韩国举行的国际数学竞赛中,中国队获团体第一,育才二小学生刘梦龙获金牌。教师刘红获武汉市百名优秀班主任称号。1999 年,学校被省命名为“实施素质教育实验学校”。2000 年,被国家教科所命名为“科研先进学校”、省评为“现代化教育实验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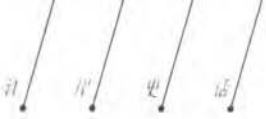
鄱阳街小学

创办于 1927 年,当时是汉口市立第五小学。1940 年,伪政府将其改为汉口市第一小学。抗战胜利后,更名汉口市立十九小学。1949 年改为大智区第二中心小学。1950 年改为武汉市汉口第三十一小学,1955 年改为鄱阳街小学,1967 年改称风雷小学,1974 年恢复鄱阳街小学名至今。本部位于鄱阳街 42 号,分校在洞庭街 34 号,现有教职工 116 人,学生 1 726 人 37 个班。

1963 年定为重点学校;1979 年评为省体育先进单位、市体保先进学校、市红旗单位,1980 年被市评为思想品德教育先进单位。1984 年创办市、区内“红领巾创造宫”,内设科技、电脑、歌咏、舞蹈、象棋、围棋、书法、绘画等十多个小组,90% 的学生参加活动,有效地培养了学生动手、动脑的创造能力,为早开发、早成才打基础。

1985 年,鄱阳街小学开办全区第一所学生家长学校,使学校教育 and 家庭教育密切配合。

1999 年,鄱阳街小学与洞庭街小学合并,属市改制学校。率先进行“小班化教学”实验。首期招生 3 个班,每班 30~35 人。学生座位变“秧田式”为分组式,教师从讲台走到学生中间,更多地参与学生的活动过程。教师根据小班特别采用分组教学法、个



别指导法、分层教学法、游戏教学法、师生交融教学法、活用资源教学法等。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学校以“科研兴校,科研强校”为宗旨,担负全国、省、市区重点课题的研究,圆满结题。在“和谐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心理辅导、提高学生数学素质”等研究中取得明显成绩。在市、区展示多次,成为市教科研学校 50 强。1996 年,被市定为电化教育试点学校。教师裴力被区评为十佳班主任。学生张磊获华罗庚少年数学邀请赛金牌,另有 2 人获一等奖、16 人获二等奖、1 人获三等奖。又国际楚才竞赛一等奖 1 人、三等奖 2 人。2000 年,被省定为“省教改试验学校”。

四 特色医院标志着发达的卫生事业

市中心医院

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第二医院),前身为意大利天主教嘉诺撒仁爱修女会于 1880 年创办的汉口天主堂医院,最初只有英籍医生加禄贝格 1 人,若干修女兼作生活护理,有一些平房。至 1949 年解放前夕,约有病床 320 张,职工 449 名。

1952 年 10 月,市卫生局接管该院,改名为武汉市第四医院。后与市二医院合并,组建成武汉市第二医院。1999 年,经武汉市卫生局组织论证,湖北省卫生厅批准,该院正式增挂院名“武汉市中心医院”。

在党和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经过几代医务工作者的努力,该院规模不断扩大,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现已发展成为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医院。

目前,该院共有病床 1 200 张,职工总数 1 057 人,其中卫技人员 819 人、副高以上职称 78 人,设置有 50 个临床医技科室。1992 年在汉口花桥增设门诊部。1995 年,在新华下路购

地 47 亩，建立了分院。3 处共占地 47 529.31 平方米，形成连锁式、辐射性的医疗格局。2001 年，兴建的双层医疗综合大楼正式投入使用。2003 年，一幢 15 层的科技大楼竣工，建筑总面积达到 99 870.64 平方米，极大地改善了医院环境。1996 年通过卫生部评审，成为国家三级甲等医院。1997 年，又被卫生部评定为“爱婴医院”。

近年来，该院年平均门诊量达 90 万人次，年平均急诊量达 10.4 万人次，年平均住院病人 2.1 万人次。购置 10 万元以上先进医疗设备 110 余套

(台)，总价值 7 500 余万元。其中有荷兰 1.5T 超导磁共振、日本螺旋扫描全身 CT、美国 2300C/D 直线加速器等，为提高临床诊断率提供了有力保障。

该院根据自身特色及专业发展动态，大力发展高、新、特色技术，先后开展了心脏病介入治疗、心脏病手术治疗、脑血管显微及介入手术、系列腔镜微创手术、内窥镜介入治疗、试管婴儿系列技术、干细胞移植技术等。一批重点专学科逐步发展壮大，在较高整体技术水平上形成了四大支柱科系，即：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肿瘤疾病和急救医学。一大批科研成果通过鉴定，分获国家、省、市科技进步奖。

1993 年以来，医院率先在卫生系统实施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为医院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后勤服务实现了社会



武汉市中心医院

化、专业化的物业管理,提升了后勤服务的水平和档次。

多年来,医院坚持走“质量、效率、水平”管理道路,探索新形势下加强精神文明的新思路,建立了与医院业务建设密不可分的精神文明运行机制。在省内率先开展了“病人选择医生”试点,使全院各科发生了显著变化,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

市中医院

该院于1956年元月16日正式成立,院址在原万国医院旧址(今黎黄陂路49号),占地面积259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不足500平方米。全院职工仅45人,仅设病房而无门诊部,有病床50张。另有观察室、化验室、X光室、药房、营养室、护理室、住院处等。

1956年7月1日,市中医门诊部与市中医医院合并。门诊部开设内、外、妇、儿、胃、针灸、痔瘻、骨伤等科,全院职工增至104人。

1970年7月,省、市革委会决定将市内七所医院迁往“三



万国医院旧址

线”，而市革委会则决定将市中医医院与市工人疗养院合并，迁到原市一医院地址，改名为武汉市第一医院，而武汉职工医学院附属医院迁至市中医医院旧址。

从创建至1970年被撤销期间，市中医医院一直是全市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的中心。先后吸收了三镇名医名家来院工作。在学术思想和临床实践深具影响的流派大致有：经方派、时方派、湿热派、寒凉派、攻下派、滋阴补土派等。首任院长陆继韩属温热派，多崇清代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诸家学说，长于治疗伤暑、湿温、冬温及麻疹等疾病。副院长熊济川属时方派，立方轻灵，随症加减，主次兼顾，疗效颇佳。次任院长黄寿人属滋阴派，按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理论，用滋阴益肾药方治病，药多清润，享誉三镇。吴恒平属寒凉派，常用寒凉方药，如石膏之类。黄纯左属攻下派，根据张子和的“邪不去则正不复”理论开方，多用大黄攻积泻火，解毒去瘀。李好生为补土派，根据李东垣“脾土为天之本”立说，多以调理脾胃为治疗法则。内科还有吴陶然、韩仁道、万济舫等，治病各具风格。草医科邵森林用草药治病，往往也能起沉痾之疾。骨科刘达夫自创麻沸散止痛，效果显著，柳枝接骨享誉海内外。痔瘕科陈济民等研制“内痔枯脱油”，达国内领先水平。针灸科王瑞卿医技精湛，自成一家。王永生研制成无痛进针器、多管旋转进针器，为患者减轻进针痛苦。此外，内科科研病房对流行病、常见病如乙脑、流脑、流行型肝炎、急慢性肾炎、泌尿系统结石等进行了重点研究，并协商出相关的主方、次方，临床应用均取得满意效果。

1976年，党中央制定和贯彻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方针政策。1978年4月19日，市革委会决定恢复成立武汉市中医医院，迁回原址。1979年4月27日，市中医医院恢复对外门诊，开设有内、外（皮肤）、妇、儿、眼、骨伤、针灸、按摩、痔瘕、草医等10个临床科室和药械、检验、放射、超声波、心电图、注射供应等室。

1979年7月19日，成立了教学、科研及编辑等小组，立足



武汉市中医院

于教学、科研、医疗和对在职医务人员有计划、系统的系统再教育,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对重点疾病、常见病、多发病,进行正确命名、完善治疗方案。对乙肝、冠心病等成立科研小组,重点攻关,开展临床学术交流。

1981年12月,卫生部副部长崔月犁、中医局局长吕炳奎先后来院视察,对医院以中医为主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82年元月17日,《健康报》发表了《坚持体现中医特色的办院方向》的专题报道。同年1月,又增设喉科门诊,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1982年8月2日,医院开设急诊专科,成立急症治疗小组,改变了长期形成的中医是“慢郎中”的传统观念,大胆创新进行了中药剂型改革,运用中医药治疗急症。1983年

4月,新建的4层楼病房开始使用,有各类专科19个。

1986年3月,在鄂城墩针灸门诊部;11月25日,在江汉二桥增设门诊部。1987年,成立武汉市中医药研究所,由市中医院管理。1989年10月,与日本大分市医师会合作,成立了“武汉大分中日友好诊疗院”。1993年,正式挂牌“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国医医院”,有20余名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被湖北中医学院聘为兼职教授、副教授。

1998年3月,19层门诊、住院综合大楼竣工。1999年,医院通过“三级甲等中医医院”的评审。

90年代以来,医院各方面工作迅速发展,开设了中医美容,组建了心血管病房、CCU病室、中药皮肤倒膜,治疗痤疮、

黄褐斑等获得较好疗效。眼科的白内障囊外摘除并人工晶体植入术,骨科开放性骨折复位手术、痔瘘科开展肛脓肿根治术、多发性肛乳头瘤切除术,外科卵巢囊肿切除术、阑尾切除术和胆囊切除术等,填补了医院历史上无腹部外科手术的空白。医院现设各类专科 32 个。

2000 年 3 月,医院进行了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将原有的 15 个科室扩大到 18 个科室。实行全员聘用制,改革分配模式,向临床和一线倾斜。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达 142 人。

医院肝胆专科现为武汉市重点专科、湖北省知名专科,心血管、中风、小儿、咳喘等专科也具有一定知名度。

全院年门诊人数超 50 万、住院年突破 4000 人次。2002 年,医院荣获“湖北省知名中医医院”称号。

市八医院——肛肠医院

武汉市第八医院暨武汉市肛肠医院,其前身是“中南邮电医院”。1958 年改称武汉市第八医院;1988 年经市卫生局批准增挂武汉市肛肠医院院牌。

医院始建于 1952 年,由邮电部中南邮电管理局创办,以解决职工的医疗问题。当时要求以“短小精悍,正规化”为建院指导方针,翻修和改建了坐落在汉口江汉路一号原邮电器材仓库为医院院址。1953 年元月 25 日正式成立中南邮电医



武汉市第八医院肛肠专科誉满全国

院,设病床49张,收治内、外、妇、儿病员。除原有卫生技术人员外,医院还采取上门聘请武汉名医到医院工作。如:请原汉口市传染病医院院长萧宜森(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医学系)任院长,江宗本(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医学系)任五官科主任,孔仁怀(留德医师)为妇产科主任,赫桂鲁(留德医师)任小儿科主任,何定尧(毕业于江西省医学院)任内科主任等,医院职工达105人。添置了5亿多元(当时1万元=现在1元)的医疗设备,设有内、外、妇、产、小儿、五官、放射、保健和3个保健站(武汉电信局、武汉邮局、武昌邮局),主要负责武汉市和邮电沿线邮电职工的医疗保健任务。

1953年5月,因隶属关系变更为武汉邮电局,医院更名为武汉邮电医院;1953年9月,又因隶属关系的变更划归为湖北省邮电管理局,医院更名为湖北省邮电医院。

1958年根据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工作报告中关于各工矿企业的医院、疗养所逐步交地方统一管理的指导精神,将中南邮电医院正式划归武汉市卫生局领导。武汉市卫生局决定将江岸区公费医疗门诊部,江岸区第二门诊部和中西联合医院等单位合并到中南邮电医院,联合组成武汉市第八医院。1970年医院隶属关系划归为江岸区卫生局。1988年6月经市编委批准升格为正县级事业单位。

1958年11月,医院将原江汉路1号的院址与解放军武汉市区后勤部管理处对换,搬迁到纯阳街23号(现为中山大道1307号)占地面积约8000平方米。为了解决门诊与病房置于同一幢楼互相干扰拥挤易于交叉感染的问题,1965年6月建筑面积为3000平方米的6层住院大楼交付使用,为医院业务发展创造了条件,对各病区进行了调整,使医疗业务用房更趋合理。

原中西医结合医院实际上是武汉三镇仅有的一所痔瘘专科医院,利用中医邱凤林在痔瘘专科的声誉,吸收市内外的患者。1958年合并成武汉市第八医院以后,设病床20张。由于专科影响日益扩大,业务量逐渐上升,远远不能满足痔瘘病人的需

求。1977年10月,武汉市卫生局将市公费医疗门诊部用房(汉口二曜路47号)划拨给八医院,设立武汉市第八医院痔瘘专科,设病床105张,医院派外科主任司永令、副主任孙爱群到痔瘘科充实力量,研究和治疗肛肠痔瘘疾病。痔瘘科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恢复和发展,业务蒸蒸日上。近年来,八医院为了充分发挥肛肠专科在省内外名牌效应,扩大影响,针对肛肠病人多、医院条件差的问题,从当前医疗改革的实际出发,为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层次医疗保健的需要,改善住院环境条件,决定在院内新建了一栋3765平方米的肛肠痔瘘综合大楼。该大楼设有星级(宾馆化)病房,有门诊部和治疗中心、肛肠病研究等3个病区,共有床位105张,配备了纤维结肠镜、微波治疗仪、全智能洗肠机、电子肛门压测试仪等一批较先进的专科检查、治疗仪器,有各种系列的制剂应用于临床。近期,痔瘘科还利用电子数码摄影技术,为患者留下直观的临床第一手资料,以帮助评价治疗效果。

1993年医院优先兴建医疗业务用房的同时,又改建和扩建了医院后勤保障业务用房近1000平方米,为医院的医疗、预防、保健、科研教学等项业务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从20世纪50年代建院之始,肛肠专科就列为该院特色之一,加以精心培育。50年来,几代专家在这片独特的医学领域呕心沥血、辛勤耕耘,终于收获了丰硕成果。多年的治疗实践,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长期的不懈追求,培养了扎实的理论素养。勤学而精思,遂在肛肠专科领域形成了突破性进展。该院肛肠科高超的技术水平,独特的治疗方法收效快,痛苦少,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得到省内及中南地区广大群众的一致认同,并成为省内及中南地区肛肠病患者的首选。

该院现有在岗职工542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477人,高级42人,中级159人。拥有美国Picker1200全身CT、800mA电脑高频X光机、美国全身彩色B超、长程心电图、自动化分析仪、体外碎石机、全能洗肠机、美国全能膀胱镜、纤维结肠镜等内窥镜及电视显像系统,为提高医院的诊断奠定了坚实

的物质基础,也为医院的业务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肛肠科医务人员中有全国肛肠学会理事1人,省市学会理事3人。专业人员素质和业务水平较高,在临床实践中总结了很多宝贵的经验,能治疗各种类型的肛肠疾病,特别是对大肠癌症病人能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在提高患者生存率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武汉市第八医院几经易名和组织结构调整,改革开放使医院规模不断扩大,技术力量和设备不断得到充实。47年来,医院不断发展壮大,现已发展成为一所科室齐全、结构合理、管理科学、特色突出、设备先进、环境舒适,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综合型二级甲等医院,并被湖北省卫生厅授予“爱婴医院”,多次被湖北省卫生厅评为“十佳医院”。1996年跨入湖北“省百强医院”。

市儿童医院

武汉市儿童医院是湖北省惟一的一所“三级甲等”综合性儿童专科医院,始建于1954年12月26日。经过近50年的发展建设,今天已成长为拥有600张病床、诊疗业务辐射中南6省、在全国享有一定知名度大型综合性儿童专科医院。医院占地面积62993.8平方米,设有武汉市儿童疾病研究所,担负着全省及邻近地区儿童的医疗科研任务。同时,医院还承担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武汉大学医学院、河南新乡医学院、江汉大学生命科学院学生的教学任务;与武汉大学病毒所共建联合实验室,并承担其硕士研究生实习带教任务。

医院现有职工1003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869人,占职工人数的86.6%。职工职称结构、学历结构不断优化。现有高级职称人员163人,占专业技术人员的18.8%;中级职称378人,占专业技术人员的43.5%;初级职称316人,占专业技术人员的36.4%。现有博士2人、硕士研究生14人、本科毕业生327人、专科275人、中专毕业267人。总建筑面积37970平

平方米,业务用房总面积为 45 182.6 平方米,其中门诊业务用房面积 12 612.9 平方米,住院业务用房总面积 14 138.6 平方米,医科科室业务用房 8 463.3 平方米。设有两个门诊部和一幢 10 层、一幢 3 层共 600 张病床的病房、医技大楼,住院楼内设有中央空调、中心负压吸引、中心供氧系统等配套设施,建设有 PICU、NICU、SICU 等重病监护单元。2001 年医院完成门急诊量 85 万余人次,出院病人 2.9 万余人次,全年业务收 1.167 亿元,其中医疗收入占 52.31%,药品收入占 46.92%。

医院专科设置齐全,有 7 个专业内科、6 个专业外科及眼、耳鼻喉、口腔、皮肤、急救、康复、儿童保健、中西医结合及中医特色治疗科等 22 个临床科室和药学、检验、放射、超声、心电、电子内窥镜等十余个医技科室。配备有全身螺旋 CT、MRI、1250 毫安 X 光机、彩色心脏 B 超、数字成影血管造影机、数字胃肠仪、人工呼吸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细菌培养系统、动态脑电图、高压氧舱等大、中型医疗仪器 150 余台(套)。

小儿心血管、呼吸及新生儿专科是医院的重点。其中列为市重点的心血管专科,在短短十余年时间里已开展高难度的心血管手术 1 000 余例,并以手术患儿年龄小、体重轻、手术成功率高而跻身于全国同类专科前列。现已成为湖北省儿童



武汉市儿童医院

心血管疾病诊疗中心。同时，医院还成立小儿支气管异物治疗中心、小儿哮喘病诊疗中心、小儿腹股沟斜疝治疗中心、病诊疗中心。学科建设和专科治疗水平进一步提高。

近十年来，医院已通过科研成果鉴定 20 余项，分别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及国内领先水平，获得武汉市科技进步奖 10 余项；在国内外各专业期刊发表论文 1 000 余篇。随着对外交流的扩大，医院先后与加拿大魁北克拉瓦尔大学中心医院和英国曼城圣玛莉医院结为友好医院。医院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设立专项基金，近二年来每年投入 200 万元用于重点专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通过引进专业人才和送出去培养等多种方式，加快人才建设。建立武汉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研究培训基地，联合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为医院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储备力量。

医院十分注重质量管理，制定了三级医师查房、单病种质控、疑难病考核、专科护理和整体护理质量标准，坚持质量考核奖惩制度，并开展医疗护理质量年活动，以督促质量管理上台阶。同时，还重新编制《武汉市儿童医院服务守则》，制定 44 个岗位服务标准，规范服务语言和行为，在医院推行标准化服务。通过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质量，赢得了病人的信赖。

医院是连续多年的文明单位，曾连续 3 年荣获“白求恩新风杯”，被卫生部授予“全国卫生先进集体”称号，1998 年荣获“全国百佳医院”称号，连续两年被省委省政府授予“湖北省文明行业先进单位”称号。2002 年，武汉市文明委推荐为省级文明单位。

第三章 名胜遗址

江岸，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这里曾发生过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曾召开过我党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曾是革命烈士夏明翰、向警予进行革命活动和就义的地方。悠久的革命历史给我们今天留下了多达 75 处的历史遗迹和革命遗址，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

一 机关旧址追忆

湖北共进会旧址

在兰陵路西段，有一条古朴的洁净的里弄，为一色的青砖两层结构，每一门栋为一单元。推门而进，有一长方形小天井。白日里阳光由此射入，夜晚几家人围坐在天井里扯闲、谈天，咀嚼美滋滋的生活。这就是楚善里，其中的 28 号（原宝善里 14 号），是辛亥革命前秘密革命团体湖北共

进会的总机关所在地。

共进会于1907年发端于日本东京，成立后仍拥戴孙中山为领袖，并自称为同盟会支派。当时武汉地区各种革命小团体如雨后春笋，诸如同兴俱乐部、集贤学社、军队同盟会、中华铁血军文学研究社等，多达几十个。经过了分化、组合，逐步演变为武汉地区两个较大的、分头并进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为了便于联络会党，减少革命力量之间龃龉和摩擦，东京同盟会中的一些出生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并和这一带会党有联系的会员刘公、孙武等人发起组成了中国共进会。刘公三任总理，并被委派为湖北大都督。孙武任军务部长，负责组建湖北共进会。1909年春，孙武等人自日本回国，以同盟会相号召，利用自己与革命党人和会党的关系，在汉口着手成立湖北共进会。在黄兴、谭人凤的帮助下，孙武等人开始在汉口长清里98号（原法租界内）设立机关，继而又在宝善里14号（原俄租界内）设立机关。并派人在武昌黄土坡22号开设同兴酒楼，以便结纳军队。孙武则赁居于武昌分水岭开设同兴学社，作为重要联络机关。

1911年夏，清政府欲将铁路修筑权连同铁路权出卖给外国人，引起保路运动轩然大波，武汉人心浮动，革命党人跃跃欲试。9月1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代表在雄楚楼第三次集会，决定派居正、杨玉如赴上海，邀黄兴、宋教仁等到武汉主持大计。16日两人乘船赴沪。但武汉革命党人仍有意见分歧。在居正东下的同时，囚禁在狱中的胡瑛带信给宋教仁，力言湖北准备不足，不可轻易发动起义，导致宋、谭两人举棋不定。至此，武汉许多革命党人已按捺不住，亟谋行动了。

就在共进会、文学社联合大会的当天，南湖炮队八标三营士兵梅春福、汪锡九请长假离营，士兵设酒饯别，席间离情依依，慷慨悲歌，排长起而干涉，要行凶打人，当即引起冲突。霍殿臣、孟华臣等革命士兵率众夺炮，但大炮无撞针、炮弹，只好弃炮而逃。事后，社会上纷纷传说：“中秋节杀鞑子”，搞得满城风雨。为此惊动了官府。湖广总督瑞澂召集了防务会议，

调兵布置,加强防范,并命令收缴了各营士兵的子弹,宣布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戒严。有鉴于此,起义总指挥部只得将起义日期推迟至11月11日,同时将已被敌人发现的共进会总机关由汉兴里33号移至汉口俄租界内宝善里14号(现为28号)。

10月9日,孙武和邓玉麟两人在室内制作装配炸弹。邓玉麟外出购物,只留孙武一人在内。当时所装的31枚炸弹壳都是几年前从日本带回的,准备装好后秘密运往武昌炸湖广总督衙门上房。孙武

正在专心致志地装配炸弹时,刘公的弟弟刘同忽然从外面进来,站在一旁边抽烟边观看,无意中将火星落入了配药盘中,轰的一声巨响之后,屋里腾起一股浓烟,孙武倒于地上,头部和两手均被炸伤,其他在场者准备把文件、名册带走,无奈钥匙不在,打不开柜锁。隔壁房间的丁笏堂急忙赶来,将血流满面的孙武用布盖上,从宝善里14号后墙翻出,抬到日本同仁里医院抢救。经该院院长会诊,指出为危害物所炸,不予收留,只得改送共和里12号一同志家中养伤。

宝善里的硝烟伴着一声巨响弥散开后,革命党人迅速躲避,待俄国巡捕赶来,室内已空无一人。便将室内革命党人未来得及带走的名册、旗帜、徽章、印信、文告、弹药及新制中华银行钞票悉数抄走。俄国巡捕将宝善里巷口封锁,开始搜查。在该里1号刘公住宅中,将刘同、刘一捕去。随后由俄领事馆



汉口长清里95号共进会总部



汉口宝善里 14 号共进会机关

引渡给汉口江汉关署。

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躲藏在共和里 12 号的孙武，对前来求策的邓玉麟等说：“现在名册已搜去，如何使同志们得到安全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商议者一致认为局势已经到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关头，惟一的出路就是提前发动起义，以夺取革命的胜利。

消息传到武昌后，刚从岳州返汉的蒋翊武认为起义准备不足，刘复基十分不满，拔出手枪用语激蒋，于是下达了当晚起义的命令。10月9日晚，湖北军政当局也极为紧张。11点多钟，第

八镇统制张彪得到密报，有革命党聚会小朝街 82 号、85 号和 92 号。于是亲率巡防兵、卫兵数十名，至小朝街围捕党人。刘复基听到急促的叩门声立即意识到情况有变，吩咐他人翻越楼窗逃跑，自己手持炸弹欲与清军一拼，结果炸弹未爆，刘复基被捕，蒋翊武头垂长辫，如乡间学究，未引起军警注意，瞅准机会翻墙逃出，另有数人被捕。当日晚，湖广总督瑞澂和武昌知府陈树屏刑讯了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 3 人，10 月 10 日凌晨 2 时至 7 时将三志士在督署东辕门残杀。其后，瑞澂致电陆军总部，声称：“先后拿获匪党 32 名，并起获军火炸弹多件。”屠杀不但没有吓倒革命志士，反而成了革命起义的催化剂。在当晚爆发的武昌起义中，革命党人就高呼“楚有三烈，亡清必楚”、“三烈在前，我们继后”的口号，投入了埋葬清王朝的战斗。

由于宝善里 14 号是武昌起义的两大革命团体之一的“湖北共进会”总机关所在地,加之“十九”的意外爆炸事件,迫使革命党人提前起义,直接引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这就给它罩上了一层神秘的传奇色彩。因此,这条普普通通的里弄成为辛亥革命的著名遗址,格外的引人注目。当地居住的许多老人向晚辈谈起宝善里的爆炸声,就滔滔不绝,绘声绘色,动人心弦。现在,这里已成为人们追忆历史,缅怀革命志士斗争业绩的重要场所。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旧址的保护,解放后,专门组织力量对已经破旧不堪的房舍进行了整修,并保持了原貌。

中华全国总工会暨湖北省工会旧址

位于友益街 16 号的院内(现武汉市文化局),为两幢西式三层楼房。这块地皮是叶开泰药店店东叶凤池的地产。叶家有一女婿叫程汉卿,是北洋军阀王占元手下的军法处长,沦陷时还当了伪黄陂县县长。1920 年,先在东边一半建一栋,程汉卿一家住;1924 年,西边再建一栋,叶家自住。院子占地面积 1 400 平方米,外有 3 米高院墙,内有水池、假山、花坛、走廊。

东楼于 1926 年 10 月至 1927 年 7 月间,曾是湖北省工会办公所在地。两楼于 1926 年 9 月至 1927 年 7 月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办公楼。



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

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于1925年5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工人组织。总工会原设广州。1926年秋,随着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革命重心北移武汉。华中的工人运动进入高潮。为便于及时领导,1926年9月17日,即来汉口设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办事处。由李立三任主任,刘少奇任秘书长,负责领导湖南、湖北、安徽、四川、河南各省的工人运动。10月10日,湖南省总工会成立,向忠发任委员长,刘少奇兼秘书长。1927年2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迁来武汉,办事处撤销。工人运动的领导人苏兆征、李立三、刘少奇、邓中夏、向忠发、林育南、项英(德隆)、许白昊、向警予等都曾在此从事革命活动。

1923年“二七惨案”后,湖北和武汉地区工会组织遭到残酷镇压,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大革命高潮中,各级工会组织开始公开活动,新的工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工会会员猛增。至1926年底,武汉的工会组织增至200个以上,有组织的工人达20万人;湖北全省的工会组织则发展到300个以上,工会会员达30万人。

全国总工会及省工会首先抓的是培训工会干部和骨干。1926年底至1927年上半年,先后办了两期工人运动讲习所,由刘少奇、李立三讲授,董必武、恽代英等也常来作专题报告。有200多工人骨干在这里学习革命道理,增长才干,然后被派往各县各级工会和工厂担任工人运



位于汉口友益街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暨湖北全省总工会旧址

动的领导工作。

为了更广泛地宣传鼓动工人群众，指导各级工会的工作，省工会出版了刘少奇著的《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工会基层组织》等书，还定期出版了《工人导报》、《工人画刊》等通俗刊物。

湖北省工会还发动各级工会组织工人武装纠察队。武汉工人纠察队是省属的总队，总队下面有两个大队，大队下设3个分队，分队下设若干支队。还有女工纠察队。纠察队的各级领导骨干来源于黄埔军校学生和工运积极分子。1926年11月，武汉工人纠察队已发展到2000余人、童子团1万多人，成为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

中华总工会和湖北省工会在1926年9月至1927年7月期间，领导了全国和全省如火如荼、连续不断的革命运动，为中国工人阶级、工人运动谱写了一段光辉灿烂的历史。

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夕，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工会领导干部迅速转移隐蔽。7月16日，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强占了友益街16号的两栋工会大楼。

解放后，两栋大楼回到人民手中。1959年旧址得以复原，成立工会纪念馆。董必武为纪念馆题词。楼内曾恢复总工会“组织部”、“宣传部”、“课堂”、“会客室”、“刘少奇办公室”、还辟有“工运史料陈列室”。十年动乱中，由于刘少奇冤案的影响，纪念馆撤销。后拨给武汉市文化局机关办公用，直到现在。

1982年1月10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中华总工会暨湖北省工会旧址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华全国总工会暨
湖北省总工会旧址

总工会会碑

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

乘4路公共汽车沿解放大道下行,在二七纪念馆(老馆)下车,车站斜对面有一片稍显开阔的地段,紧依路边,有一座青砖布瓦构造的房舍(现解放大道1057号)。这就是当年领导“二七”大罢工斗争的指挥部“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

房舍因长年的风吹雨打,已经陈旧不堪。1982年,人民政府组织力量进行了修缮。房址的正门墙面上有一块白玉石匾额,镂刻着“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9个隶体金字。进入门扉,正东是木质构造的三间房屋。进门左侧的1间12平方米的房间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办公室,其余几间为当时普通住房。办公室内存放的文物有:开会用过的1张小条桌,4个凳子和1盏旧式油灯。整座房舍占地180平方米。

进入室内,那盏古朴的小油灯格外惹人眼目,瞻仰者凝神注目,思绪就会被带进那个腥风血雨的岁月。

1923年,中国共产党为了领导京汉铁路工人进一步开展斗争,决定将京汉铁路16个分会,近3万名工人组织起来,成



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

立京汉铁路总工会。1月,成立总工会的筹备工作就绪,议定2月1日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

由于军阀不断地进行干扰破坏,2月3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由郑州迁到了江岸办公。



江岸分工会

至此,这座坐落在汉口刘家庙操场的简易房舍便成了我党领导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斗争的指挥中心。总工会成员陈潭秋、施洋、林育南、林祥谦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起草各种文件,筹划着京汉铁路工人的全线大罢工。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作为这场大罢工的指挥中心,总工会发挥了巨大的团结组织作用。党的声音通过它向工人中传播,为革命事业的发展埋下了一团团不熄的火种。

今日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青砖布瓦依旧,庄严之风仍在,它与二七纪念馆、林祥谦烈士故居构成了二七革命斗争的“历史长廊”,把当年革命斗争的场景如电视连续剧似地一幕幕展示在前来瞻仰者的面前。来这里参观的人,特别是青少年们,无一不在这里驻足和思索。

中共中央机关旧址

1926年底,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革命斗争的重心迅速由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宣布迁



中共中央机关旧址

都武汉，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和全国总工会、全国学联等也都迁来。中共中央也组织派遣了大量干部云集武汉，总书记陈独秀与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于4月上旬来汉，住进四民街61~62号（在今江岸区胜利街）。这是原俄租界的一幢三层楼房，坐西朝东，红墙赤瓦，临街开了两个门。这房子是由先期到汉的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人员李强负责租下的，陈来后住三楼中间房，左房住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彭述之夫妇，右房住的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机要室。一楼是警卫人员住处及传达

室，二楼是会议室、会客室。协助陈独秀处理日常工作的有任作民、任淑兰、黄然（黄文容）。他们组成中共中央秘书处，任作民任办公室主任，任淑兰管事务，黄文容任秘书。中宣部设在辅义里，中组部在铭新街，都在今江岸区，距离很近。

党中央的一般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如中央宣传委员会研究湖南农民问题会议，瞿秋白、蔡和森、彭述之、李富春、陈绍禹、毛泽东、沈雁冰等都参加了。另外，张太雷、李立三、罗亦农、邓中夏等也经常来此。“农王”毛泽东和工运领袖邓中夏给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等也常出入此地。

4月27日~5月9日召开的中共“五大”，由于代表有80余人，出于安全考虑，并未在此开会，而是选在武昌都府堤的高师附小和汉口自治街31号的黄陂会馆进行。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形势十分严峻，陈独秀7月13日已辞去总书记职务，从四民街（今胜利街）61号秘密转移到花楼街一家商行，其余也都转入地下。中共中央机关从此撤出四民路61~62号，在这里总共只有3个月的短暂时间。

该楼后来一直作为民宅。武汉市人民政府已将其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机关旧址

坐落在中山大道中段黄石路口附近的德润里内。

辛亥革命失败后，湖北、武汉不少革命者先后参加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也有不少政客、官僚混进其间。因此湖北、武汉的国民党组织极不健全。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孙中山亲自主持召开了首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确定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建立国民党执行部，并指派林伯渠、李立三、林育南、项英等为汉口执行部负责人。

在中共方面，实际上由董必武等人主持领导湖北武汉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三大”之后，董必武到上海与党中央有关同志商谈统战工作。为了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1924年春，决定由董必武同志到湖北筹备成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经过一段努力，4月，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成立。1925年7月，秘密选举产生了国民党湖北省临时执行委员会。董必武为书记，陈潭秋为组织部长，钱亦石为宣传部长，陈荫林为农民部长，定中华为工人部长，袁溥之为妇女部长，李子芬为青年部长，吴德峰为军事部长。以上人员大体组成了国民党湖北党部左派阵营。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员在湖北省国民党

党部中起着骨干作用，加大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比例。由于共产党人在省党部起核心作用，并与国民党左派詹大悲、邓初民等密切合作，省党部对尔后的湖北革命活动和迎接北伐军，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董必武参加领导的国民党湖北党部推动下，1925年12月，汉口也建立了特别市党部，湖北各界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也都纷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国民党县党部、区党部，并以国民党名义向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许多地方从发展党员到建立的党各级支部，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全力承担，被吸收者绝大部分为工人、农民。到1926年，全省已成了29个县、市党部，41个区党部，125个区分部。党员达3617人，其中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占70%以上。

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下有区党部8个、区分部37个、党员957人，工人党员占大多数。其中第六、第七区党部的党员，几乎全部是工人。至此，经过改组后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在成分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不同于由政客、官僚为主体的旧国民党。

在积极改组国民党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组织亦有进一步发展。从1923年至1924年1月，李立三任中国共产党汉口区委书记。1923年末，包惠僧受党中央委派，到汉口整顿



中共长江局机关旧址

党务。随着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的扩大，加强党在统一战线的影响成为必要。1924年春，中共武汉区委撤销，先后成立了以包惠僧为委员长（后改为书记）的中共汉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和以陈潭



中共中央长江局举行会议，讨论抗战形势和统一战线工作

秋任书记的中共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同属党中央领导。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机关设在德润里，当时有党员 50 多人，主要分布在汉口江岸一带，担负着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任务。

1923 年 2 月 7 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后，反动军阀加紧对共产党人的搜捕。1924 年 5 月 13 日，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遭到反动军阀、特务通缉，由于党组织早有准备，未遭大损失。其后包惠僧赴上海参加党中央特别会议，书记由董必武继任。到 1926 年春，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湖北区委。由彭泽湘任书记，董必武等任委员。原汉口、武昌两个中共地方执行委员会均划归湖北区委领导，担负起发动工农、扩大统一战线、支援和迎接北伐军的任务。

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汉口建立的党的工作机关。它在建立党的组织、扩大党的队伍、扩大党对统一战线的影响中起了巨大作用，为湖北、武汉地区国共合作的实现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如今，当年的机关旧址所在地已成居民饮食起居的住所，四周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共湖北省委暨中央长江局机关旧址

珞珈山街(原珞珈碑路)12号,是20世纪30年代中共湖北省委和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旧址。

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汪蒋合流,共同反共。此前革命中心的武汉,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党的各级组织及党员完全转入秘密活动,中共湖北省委也不得不从友益街尚德里秘密转移到新址。

这是一栋欧式两层楼。省委书记罗亦农、秘书长马峻山住二楼,后来接任书记的陈乔年等住一楼,底楼是厨房和堆杂物的地方。罗亦农对外称“赵先生”,和李文宜扮做夫妻,另外雇用一男工做饭、一女工洗衣和做家务。

湖北省委工作人员有任旭,黄五一、林育南、任开国、郭亮、李震瀛等,常来此研究工作,偶尔也在此住宿。

1927年9月,党中央机关迁往上海。武汉则成立长江局,管辖湖南、湖北、河南、四川、安徽、陕西等省党的工作。罗亦农任书记、陈乔年、任旭、刘昌群任常委。长江局的领导基本上都是湖北省委的负责人,机关又同在这一栋楼内。

毛泽东、罗章龙、王一飞、李维汉、郑超龄等人以及外省来此联系工作的同志,都曾在此住过。

1927年8月2日发生的“武阳夏八二总同盟罢工”,就是在这里开会研究策划的。这次罢工虽然国民党政府事先采取了戒严措施,但仍然阻挡不住三镇近7万工人的行动。有力回击了反动派的屠杀镇压政策,也是对南昌“八一”起义的积极声援。

8月7日,在邻街三教街(今鄱阳街)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湖北的罗亦农、陈乔年、李震瀛和郑超龄分别以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湖北省委委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会后,湖北省委起草了《湖北秋收暴动计划》,派遣370名党员干部下各地县发动。罗亦农负责鄂南。鄂南的蒲圻、咸宁、通山等地农民霎时纷纷暴动,杀土豪劣绅,攻打县城,风

起云涌。声势最大的还数“黄麻起义”，参加农民有数万人。这些暴动为我党建立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也为后来的红军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湖北省委大力整顿和恢复各级党组织，用很大气力恢复被打散的组织，聚集脱离了党组织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这样，武汉地区党的组织得到了发展，广大党员的斗争信念得以加强。到1927年底，党的组织遍布全省50余县，党员有6000人，其中武汉三镇有党员700人。

由于农村根据地发展迅速，城市白色恐怖加剧，中共中央长江局于1927年底撤销，罗亦农等调离湖北，省委也转移农村。此房屋不再租用。

旧址保存较好。1983年，武汉市公布其为“市文物保护单位”。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

长春街67号是一座青砖钢混结构的四层楼房，日式建筑，占地2390平方米。

这栋房子建于日本租界时期，房主是经营百货的日本大石洋行的老板。门牌号码原是中街89号，楼下是洋行办公，楼上租给日本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住家。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后，中日处于战争状态，中国收回日租界，日侨全部撤走。中街改名“一二八”街，大石洋行由国民党汉口市政府接管，门牌号码是“一二八街89号”。

抗战初期，依据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八路军、新四军改编，并接受国民政府的军饷、军械弹药、通讯器材、药品等的补给。八路军在武汉成立办事处，由董必武负责筹建。10月，在汉口安仁里1号租房，正式成立，李涛为处长。11月，日军占领上海，12月13日又陷南京。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分两批撤退武汉，与武汉“八办”合并。由于人员骤增，机构扩大，安仁里房子不敷使用。经与汉口市政府多次磋商，才同意将

大石洋行拨付使用。12月下旬搬家,1938年1月1日正式办公,由钱之光任处长。

一楼大厅右侧是副官室、接待室、办公室、值班室、传达室(兼收发),二楼有会客室、董必武办公室(兼卧室)。会议室当年曾接待过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白求恩、路易·艾黎等外国朋友,也接待过海外侨胞、国内知名人士、爱国名流、党外朋友、热血青年、革命同志及国民党军政大员。三楼有叶剑英办公室(兼卧室)、会议室,“八办”和长江局的所有会议,几乎全是在这里开的。四楼有电台室、机要科、食堂以及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卧室)、秦邦宪的办公室(兼卧室)。

“八办”的任务很重、很多,要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宣传共产党及其方针政策;开展国际统战工作,争取国际友人和团体的支援;国内统战工作;调运物资,特别是军用物资;接受各界(包括海外华侨、外国友人)捐赠钱物,转送晋陕前线八路军及南方新四军;输送向往延安、向往革命的优秀青年和进步人士前往延安。1938年5~8月,经“八办”甄别录取880人,送西安转赴延安。



修复后的八路军办事处旧址

“八办”建立后，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因此，保卫长江中央局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是“八办”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丝毫不可大意。除加强警卫力量、严格对来访人员把关外，即使是食堂外出采购蔬菜、大米，也不能暴露身份，还要经常变换菜场、粮店，以防敌人暗算投毒。

长江中央局对外一律以“八办”和“中共中央代表团”名义开展工作。长

江中央局由陈绍禹(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兼统战、军事部长，秦邦宪(博古)负责组织工作，项英负责党的东南分局(项是新四军副军长)，董必武分管上层统战、民运和中共湖北省委工作，叶剑英是八路军参谋长，协助周恩来做军事、统战工作，李克农担任长江中央局的秘书长。长江局所辖地区的党员为6.7万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27%。

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此时，日军已西进至皖赣地区，武汉告急。10月24日，《新华日报》汉口版发表《告别武汉父老》社论，“八办”汉口办事处结束。10月25日武汉沦陷。

1944年，美机由后方川、湘、滇起飞，轰炸当时敌占区的武汉，大石洋行被全部炸毁。

1978年，根据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决定，按原样修复“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周恩来同志抗战初期在武汉陈列馆”。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证章



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与新四军负责人在八路军办事处合影。
右起：项英、曾山、周恩来、秦邦宪、王明、叶剑英、张云逸

1979年3月5日，正式对外开放。大门墙上悬挂“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铜牌。一楼大厅有“武汉抗战陈列室”，有200多幅照片和34件珍贵文物，其余各楼按原状陈列。

1982年1月10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文物保护单位”。

自纪念馆成立以来，陆续接待方毅、伍修权、张爱萍等中央领导和革命前辈，也有几十个国家的参观团和国际友人。国内参观者则络绎不绝。也有新团员来此举行入团宣誓，学生来此上政治课、忆革命传统，还有在此举行婚礼仪式的。

《汉口民国日报》社旧址

在江汉路泰宁街2号（原歆生路忠信二里4号），有座灰色老式三层楼，它是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董必武同志主办的汉口民国日报社旧址。许多革命前辈如毛

泽民、郭沫若、沈雁冰等都在这里战斗和工作过。

这栋楼房原是军阀王占元的亲信湖北应山人李振(华堂)所办的《国民新报》旧址,当时是武汉著名的新闻大楼。北伐军攻克武汉前夕,李振闻风而逃,他的《国民新报》也自动停刊。

《汉口民国日报》创刊于1926年11月20日。当时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该报开始是以国民党中央党部、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三家合办。1927年3月22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又在武汉创刊了《中央日报》,《汉口民国日报》遂于1927年3月底正式成为湖北省党部机关报。《汉口民国日报》名义上是国民党办的,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办的全国性第一张大型日报,报纸的编辑方针、宣传内容全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确定。董必武任报社经理,郭沫若、宛希俨、高语罕、沈雁冰先后担任该报总编,毛泽民也曾一度协助董必武领导该报的工作。报社的20多名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编辑部设在德安里1号(今铭新街19号)。

《汉口民国日报》全面忠实地记载和反映了从1926年11月下旬到1927年7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运动和斗争,在全国具有巨大的影响,得到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报纸发行量不断增加,由开始3000份增加到近9000份,这个发行量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它一度起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机关报作用。由于它直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实际上成为党教育群众和对敌斗争的主要阵地。它在党的革命斗争史和革命报刊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新四军创建时的旧址

对于新四军成立的时间和地点,一般历史书都说是:1938年1月在南昌正式成立新四军军部。由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游击队1.2万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这几乎成了定论。



新四军军长叶挺

可是65年后的2002年,通过历史学家、地方志专家反复考古论证,却将这段历史改写。

成立时间要提前到1937年12月25日,成立地点由南昌改正为武汉。具体地址是在今武汉江岸区胜利街332~352号的一栋两层小楼上。原来在1937年11月,叶挺奉命抵达武汉,项英随后到达。经过酝酿,决定成立新四军军部,地点就选取在这栋楼上,时间就定在这一年的12月25日。为了便于联系工作,军部同志制作了一块“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醒目木牌,悬挂在大门上。但因情况紧急、部队分布等原因,于1938年元月初迁往南昌。胜利街现在的路名,

是抗战胜利后命名的,该路段原来是日租界的大和街(也称中街)。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进入战争状态。8月初,日本驻汉口领事馆闭馆,侨民撤走。8月11日,汉口市政府接受日租界全部房屋,这也是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都设



汉口大和街,新四军军部诞生地

在原日租界的原因。

2002年12月25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在原址重新挂牌，省市老领导、老同志沈因洛、陈明、王群、谢培栋、何其雄、栗栖、肖望、陆天虹等出席了揭牌仪式，老同志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副军长项英（右二）、参谋长张云逸（右四）和曾山（右一）、傅秋涛（右五）在汉口新四军军部合影

纷纷赋诗、发言，副市长段轮一代表市政府讲话。他说：新四军军部旧址是新发现的一部活教材，是今后全体市民缅怀先烈及回顾历史的场所，是青少年学生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第二课堂。

二 碧血染红的江岸

辛亥首义烈士陵园

在汉口解放大道与球场路相交处，有一座占地4008平方米，以民族风格建造的烈士陵园，它就是中外闻名的“辛亥首义烈士墓”。

来到这里，首先看到的是门楼上李尔重同志题写的“辛亥首义烈士陵园”8个镂金大字。进得园内，两排水杉葱茏叠翠，簇簇冬青碧绿如洗；6座墓茔，芳草依依，花朵簇拥。白色的

墓壁上，“铁血精神”4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凜然其上，格外醒目、庄重。

陵园正中一座用汉白玉嵌砌的烈士纪念碑拔地而起，巍巍挺立。碑高10.10米，正上方镌刻着“辛亥首义烈士纪念碑”9个金光闪烁的大字。碑座上碑文由辛亥老人喻育之手书：

辛亥(公元1911年)武昌首义胜利后，满清王朝派遣强大精锐之师南下，起义军民同仇敌忾，以3万未经训练之众在汉口、汉阳英勇抗击，官佐身先士卒，士兵浴血奋战，工、农、士、商手执利器，亦拼死沙场。从10月18日起，激战40天，为南方各省大举、次第响应缔结共和赢得了时间。阳夏战争慷慨赴义，有姓名可考者数十人。无名烈士数以千计。时由红十字会就地掩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烈士遗骸集中安葬于汉口球场路、利济北路、汉阳扁担山等地。陵墓几经修葺。呜呼，河山浩气，星芒失色，英勇悲壮，光炳日月，今树旌碑，永志忠烈。

哦，这里安葬着在武昌起义中为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的清王朝而牺牲的上千名将士的忠骨。

1911年(辛亥年)爆发的武昌起义，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经过一夜苦战，起义军占领了武昌城，接着汉口和汉阳起义也获得成功。三镇起义的胜利，迅速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

10月27日拂晓，清军以其优势发起进攻，革命军英勇反击，在滠口、刘家庙、姑嫂树、大智门一带与清军血战，革命军是仓促组织成的，有斗志，但缺乏训练。

清军王占元、陈光远部以机关枪和重炮向民军射击，民军炮队亦在大南湖和循礼门阵地，向敌张公堤炮队和部队射击。转移时目标暴露，敌军弹如雨下，炮队标统蔡德懋阵亡。谢元恺命令各部作好掩护，等敌人进至二三百米时，一齐冲出，肉搏相拼。谢在近距离与敌作战时被机枪射中，战死沙场。两天的苦战中，革命军约有2000余人英勇牺牲。赤十字会将这

些烈士遗体葬于球场路口,共埋了六大堆,取名为“赤十字会义冢”。这些牺牲的将士们虽然连名字都未留下,但他们这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铁血”精神却唤醒了更多的民众。自此,全国人民群起响应,各省纷纷宣告独立,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中分崩离析,彻底解体。

为了纪念烈士们的丰功伟绩,抗战胜利后,当时的汉口市政府在这里修墓立碑,将“赤十字会义冢”改为“六大堆无名英雄墓”。1955年城市规划时,由汉口单洞门又新迁一堆

于此,实有7堆。1956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将这里正式命名为“辛亥首义烈士陵园”。1985年,市人民政府又拨款交由江岸区人民政府组织修葺,将7堆正式移建为6座墓茔。此后,“六大堆”开始以更加肃穆庄重的新貌迎新着所有前来谒拜、瞻仰的人们。



辛亥首义烈士陵园

林祥谦烈士就义处

林祥谦,福建闽侯县尚干镇人,出身在一个贫农家庭。1912年来武汉,在江岸机车厂(今江岸车辆厂)当工人。他为人正直,乐于助人,有着崇高的舍己救人品德,深受工人拥戴,在工

人中有着很高的威望。1922年1月21日,京汉铁路江岸俱乐部成立,林祥谦被推选为财务干事,192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下半年,江岸工人俱乐部改为江岸铁路分会,林祥谦被选为分会委员长。

1923年初,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有了很大发展。为进一步掀起反帝反封建高潮,把京汉铁路3万名工人组织起来。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林祥谦作为江岸分会代表出席了大会。2月3日京汉铁路总工会传来一张纸条,展开一看,上面写着:“耳聋眼瞎,无食可求,急!急!”这是总工会事先规定的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暗语,林祥谦立即下达罢工命令。9时20分,尖利的汽笛响彻长空,顿时,车站上所有的货车、客车、军车全部瘫痪在铁轨上。

2月5日,湖北督军萧耀南,派督军署参谋长张厚生到江岸,指使当地警察出面要挟工会交出总工会及江岸分会领袖。被工会严词拒绝。延到中午,张厚生指挥大批军警占领车站和机车厂,抓走司机两人。纠察队和工人2000多人闻声拥至机车厂门外,冲破军警防线,抢回了两名司机。此时,吴佩孚、

萧耀南继续拘捕了3名工人,京汉铁路局局长(兼任北洋军阀部队中的稽查处长、军法处长)赵继贤则发出布告,限工人12小时内复工,遭到工人拒绝。2月7日下午2时,张厚生派出一名警官到工会说:“奉萧督军命令,特来请贵总工会派全权代表开会谈判。”到了下午5时半预定的谈判时间。军阀以为总工会负责人均来会所等候谈判,便派出两个营的军警分3路包围了江岸总工会,对工人们开枪射击,进行



林祥谦

围捕。

这场血腥屠杀中，有 37 名工人壮烈牺牲，200 多人受伤，工人的血染红了 3 条街道。

林祥谦坚持留在工会里，焚烧着全部机要文件。当他把所有的文件烧完，一群武装军警冲入了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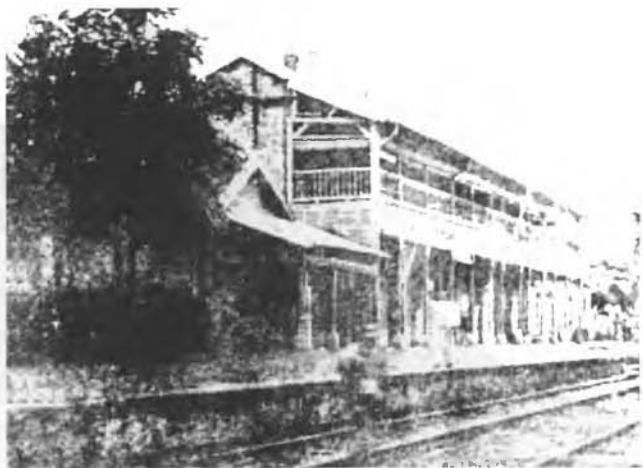
会，林祥谦和 70 多名工人落入了魔掌。

优秀的共产党员、工人领袖林祥谦身挨 7 刀，视死如归，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时年 31 岁。

林祥谦烈士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献身革命的崇高精神。他这种为了人民利益，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献身精神，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对中国人民产生巨大的精神激励作用。为了纪念林祥谦烈士，弘扬他这种崇高的品德，1964 年，党和政府在林祥谦烈士家乡乌龙江畔上修建了“林祥谦烈士陵园”；1983 年党和人民政府又在林祥谦烈士就义处，现江岸车站站台上，建塑了一尊烈士雕像。

土红色的麻石雕座，林祥谦的坚毅目光凝视着整个车站，凝视着过往的列车，凝视着周围日新月异的变化。从他微笑的嘴角上可以看到一种自信，一种深切期待祖国强盛的希望。

如今，每天，南来北往的列车川流不断，旅客们经过江岸时，怀着崇敬的心情，从车窗里探首瞻望……



林祥谦英勇就义处——江岸车站

夏明翰、向警予就义处

汉口黄石路有一所中学，名叫警予中学。1958年建校，因地处黄石路而得名黄石路中学。1993年更名为警予中学，为纪念在这儿英勇牺牲的向警予同志。70多年前，这儿是国民党反动派专门用来屠杀共产党员的刑场。过去，这里叫“余记里空坪”。

1927年1月，为欢庆北伐战争胜利和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迁来武汉，全市工人和市民群众，一连几天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武汉三镇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全市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但4个月

后，风云突变，浊浪排空，蒋介石叛变了革命，暗藏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假左派汪精卫也叛变了，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武昌的阅马场、大东门、裕华纱厂门前桥下、第一纱厂附近的马路、四马路，汉口的大智门、和记蛋厂、济生三马路和余记里空坪都变成了他们屠杀共产党人的和进步人士的场所。

1928年2月9日清晨，余记里空坪这块荒凉的野地，阴云低垂，朔风呼啸，



当年的烈士就义处现已建成警予中学

雪花飞舞。共产党人夏明翰在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面前挺立着，他深情望着他熟悉的印满他战斗足迹的这块土地。

永别了，同志们。

永别了，灾难深重的土地！

明翰一生无遗憾，深信革命一定胜利！

此刻，敌人端来照相机，企图给夏明翰拍出一张垂头丧气的照片。夏明翰识破敌人的花招，他挺起胸膛，犹如一座铁塔，两眼怒视着面前的反动武装军警，没有一丝奴颜媚骨。反动派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警予中学烈士纪念馆

敌人非常气恼，大声

喝道：“准备执行！”哗啦一声，刽子手们将子弹上了膛。

执行官过来问他：“你还有什么话要讲？”

“有，给我纸和笔！”夏明翰大声说道。这时，他真有千言万语要讲，云天万里，关山阻隔，极目远眺，大雾弥天，对党、对同志、对亲人，还有那些苦难深重的几万万同胞，他又有多少知心话要说啊！于是，他用带着铁铐的手，饱蘸浓墨，在一张白纸上，飞快地写了4行正气凛然的就义诗：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

还有后来人。

写毕,将毛笔一甩,厉声喝道:“开始吧!”党的好战士,人民的好儿子夏明翰饮弹倒下。

……

相隔仅仅 80 天,还是在这块空坪上,岗哨林立,刺刀闪着寒光,一派肃杀的气氛。围聚在附近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同情者们,脸色阴郁,心情沉重。紧锁的眉头下,一双双悲愤深沉的眼睛,望着被反动军警从刑车上押下的革命者——向警予。向警予神态从容,高唱国际歌,徒步走向余记里空坪。面对敌人的闪光刺刀、乌黑的枪口,她进行了最后一次讲演:“我是共产党员向警予,反动派要杀我,可是革命者是杀不完的!同胞们团结起来,反动派的日子不会太长了!中国革命很快就要胜利了!”

在敌人罪恶的枪声中,年仅 33 岁的向警予,在余记里空坪壮烈牺牲了,烈士的鲜血渗透了余记里空坪。当夜,老工人、地下党员陈春和用小船把她的遗体运走,葬于汉阳古琴台对面的六角亭下。

70 年过去了,在这块洒满烈士鲜血的土地上,一幢幢高楼平地而起,昔日的荒郊野地,杀人刑场,已变成一座拥有 30 个班级、1 400 名师生的



1927 年,夏明翰和夫人郑家均在武汉合影

中学。一走进校门，“继承先烈遗志、勤奋、进取、开拓、创新，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的校训历历在目。站在当年的刑场上，眼前繁花似锦、高楼如林，身旁欢歌动地，笑语喧腾。烈士的英勇事迹激励着新一代青年成长。



1927年4月，向警予在长沙与家人合影（左一为向警予）

“二七”纪念馆

1956年，在二七路10号（属新村街辖区）与武汉铁路分局江岸地区俱乐部旁修建二七纪念馆，1958年落成。1960年2月7日对外开放。全馆占地10600平方米，陈列馆138平方米。馆前广场是1951年7月公审当年镇压京铁路工人运动的凶手赵继贤的会场（赵被判死刑）。

馆前立纪念碑，占地25平方米。碑高12.6米，正面“二七烈士纪念碑”7个大字，是毛泽东主席1958年9月16日所题。背面是《“二七”纪念碑文》。

纪念馆中有陈列室、资料室、接待室、办公室、外宾休息室等。砖瓦平房，有林木和石碑相互依托，显得庄重肃穆。

1975年，党中央决定重新修建二七纪念馆，选址在解放大道2499号，占地27500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10200平方米、广场4000平方米。

纪念碑主碑 23.27 米，寓意 1923 年 2 月 7 日。碑的正面仍镌刻毛泽东 1958 年 9 月 16 日所题的“二七烈士纪念碑”7 个大字，镏金装饰。碑的顶端是大鹏飞轮，碑的底座镶嵌锻铜汽笛。碑的两侧是高 3.1 米、长各 15 米的弧形雕塑群。内容是再现二七革命斗争的激烈场面。

绕过纪念碑是一座二层楼建筑的纪念馆，占地 3 671 平方米。胡耀邦题写的“武汉二七纪念馆”的馆名，塑铸在正门上方。二楼为 1 200 平方米的展厅，展出 89 件珍贵文物，有国家一级文物 3 件，还有照片、图表、绘画、雕塑、模型、沙盘等展品。一楼是办公室、接待室等。

展厅共分 3 个，7 个部分：1. 血泪筑成京汉路；2. 京汉铁路工人运动蓬勃发展；3. 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4. 罢工斗争；5. 血洒京汉路；6. 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7. 弘扬二七精神创建新业绩。馆内还珍藏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领导同志题词。

新馆自 1987 年 2 月 7 日正式开放以来，至 2001 年，接待了国内观众 360 万人。还接待了 10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 000 外宾和友好人士。

“八七”会址

“八七”会址地处汉口鄱阳街 139 号，旧属俄租界，原为三教街 41 号。这里有一排临街三层楼的俄式楼房，是 1920 年英商惠罗公司修建的公寓，41 号位于这座公寓的中段。楼下是一个印度人开设的小百货商店，楼上是苏联农民运动顾问洛卓莫夫的家。当时，从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及联络方便考虑，会议设在二楼靠后面巷子的一间房子里召开。

现在会址保存完好。会址共二层楼，门檐上方悬挂着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名写的“八七会议会址”6 个镏金大字，格外醒目。会址一楼是陈列馆。馆内展出了大量的照片、图表、文献资料，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八七”会议的情况。二楼是当时

召开会议的地点，26.65 平方米的房间内，陈列完全按当时情形摆设，几张桌子和 20 多张凳椅虽然简单，但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墙上，悬挂着参加紧急会议的领导人的照片。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局势紧张，时间紧迫，交通不便，参加会议的只有当时在武汉的党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顾顺章，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李震瀛、陆沉，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以及共青团中央代表杨善南、陆定一、李子芬，湖南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麟等 21 人。李维汉任会议主席。会议由瞿秋白负责主持召集。党中央秘书邓小平参加了会议的工作。决议决定以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发动武装起义，枪杆子里面夺政权。

建国初期，该楼下面曾开了一家照相馆。1978 年，党和政府经多方反复考证，确定了会址，解决了产权，维修了房屋，恢复其历史原貌，建立起一座纪念馆，常年对外开放。1982 年，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多少年来，会议的参加者李维汉、邓小平、陆定一、郑超麟等人先后实地考察甄别了会址，回忆了会议的经过，为会址的最终确定和会场的复原提供了重要依据。1977 年和 1979 年，李维汉又几次来到会址。他清楚记



八七会议旧址

得八七会议前夜，瞿秋白连夜挥汗如雨，翻译了罗明纳兹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以及8月7日晨，李本人由德林公寓住处出发，沿天津路、三教街步行到会场的情景。1958年和1965年，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最早实地考察八七会址，他沿着昔日步行到会场的路线，边走边找感觉。当年开会、午餐等情景，好像电影一幕幕浮现眼前。

1980年5月20日，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馆牌，寄赠八七会址纪念馆。7月15日，他又故地重游，并回忆起当年在这里冒着酷暑紧张工作了6天，为开会作准备的情景，并对会场的布置作出了肯定或修改补充的意见。

今天，当人们走进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参观陈设简朴的会场，瞻仰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和牺牲的革命前辈的相片时，无不肃然起敬。

苏联空军烈士墓

1938年初，当中国人民遭到日本侵略时，苏联人民无私地派遣了自己的优秀儿女——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支援抗战。中国空军在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协同配合下，在武汉上空与日机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战斗，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英勇颂歌。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全国抗战中心。日本侵略者也将空袭目标瞄准武汉。

1938年2月18日，日机两队分别从安徽、江西来轰炸武汉。我空军四大队从汉口、孝感紧急起飞，在武汉上空列阵以待。数架日机向我机扑来，我机与苏联空军志愿队迎战，将敌机包围追杀。日机或下坠，或逃窜，我机追击至汉阳、黄陂、仓埠等地上空。第一次空战，便击落日机12架。

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长节（天皇生日），日军妄想以“空中大捷”为天皇祝寿献礼，出动39架飞机再犯武汉。中苏空

军出动 67 架战机迎战,分兵把守。有的专门主攻敌轰炸机,有的专门对付敌战斗机,地面则有高射炮助战。日机见势不妙,慌忙投弹,准备轻装逃遁,我机穷追至黄冈上空。空战仅进行 30 分钟,日机便被击落 21 架(轰



苏联空军烈士纪念碑

炸机 10 架、驱逐机 11 架)、日飞行员死了 50 多人。有两名飞行员跳伞,被我军民捉住,成了俘虏。战斗中,我飞行员陈怀民、苏联飞行员舒斯捷乐勇敢地撞向敌机,壮烈牺牲。

沉寂一个月后,5月31日上午11时,日本空军又出动驱逐机、重轰炸机共 54 架,大举进袭武汉。12 时,敌驱逐机护送轰炸机进入武汉边缘,即遭中苏联合机群阻击。30 分钟空中鏖战,敌机不敌,纷纷东窜,沿途被我机穷追不舍,市区、浚口、横店、董家棚直至江西湖口,都留下敌机残骸。这第三次空战,敌机又被击落 14 架。前后三次累计被我击落 47 架。

经过这三次大型空战,日本空中强盗元气大伤,不敢再轻易来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在激烈的空战中,有百余苏联空军志愿队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其中包括轰炸机和战斗机队的大队长。他们的英雄事迹和国际主义精神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员的尸体,因在战争环境中,有的只能就地掩埋,有的落于大江、荒山,无法寻找,仅有 15 位烈

士遗骸被当时安葬在汉口陈怀民路对面的万国公园。

解放后的1956年1月16日，15位烈士骨骸迁葬于解放公园内，建墓立碑。3月29日竣工，4月5日(清明节)举行祭扫仪式。随后，每年的清明前后，全市各界人士、学生代表都来墓前悼念、祭扫、献花。

烈士墓占地约2400平方米，有400平方米草坪。墓前有宽阔的墓道，道旁松柏成行，还有4个花坛。正中矗立着高8米的大理石纪念碑，正面镌刻“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10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背面刻中、俄文“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永垂不朽”。烈士墓呈长方形，高3米，宽6.5米，长32米，用花岗石砌成。墓的正面有15位烈士姓名石碑一块。墓周围遍植观赏树木，墓前两侧建有休息廊，出口处有钢筋水泥的“落虹桥”，环境幽雅，庄严肃穆。

15位烈士是：

瓦连舍·谢尔盖耶维奇·考兹洛夫(1938年2月15日牺牲)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别索茨基(1938年2月15日牺牲)

乌拉基米尔·伊凡诺维奇·巴拉莫诺夫(1938年2月15日牺牲)

莫伊塞·伊萨阿科维奇·基吉里什登(1938年2月15日牺牲)

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师什洛夫(1938年2月18日牺牲)

乌拉基米尔·格拉西莫维奇·多尔戈夫(1938年7月16日牺牲)

伊凡·伊里奇·斯图尔卡洛夫(1938年7月16日牺牲)

马克尔·尼古拉耶维奇·马尔琴科夫(1938年7月9日牺牲)

德特里·巴甫洛维奇·马特维耶夫(1938年7月16日牺牲)

伊凡·尼科诺罗维奇·古罗夫(1938年8月3日牺牲)

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古里耶(1938年8月12日牺牲)
柯西扬·柯西扬诺维奇·楚里亚科夫(1938年8月12日
牺牲)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泰里霍夫(1938年8月12日牺牲)
烈昂尼德·伊凡洛维奇·斯柯尔尼亚科夫(1938年8月
17日牺牲)

德米特里·费奥洛诺维奇·库列申(1938年8月21日牺牲)

滨江公园抗洪纪念碑

防汛纪念碑位于沿江大道一元路口、滨江公园外侧。

1954年,武汉人民防汛斗争取得胜利,毛主席亲笔题词,给了武汉人民极大鼓舞。为了激励武汉人民不断前进,1969年,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决定修建一座永久建筑。3月动工,10月建成大型纪念碑。

碑高37米,占地面积1161平方米。碑顶红五星灯,直径1.8米。碑顶四周由白水泥浮雕图案,一块是毛泽东选集雄文四卷,一块是天安门上升起了红太阳,一块是红五星和枪杆子,一块是灯塔和军舰。簇拥四块浮雕的是20面旗帜,象征着建国20周年。下面塑有7



滨江公园防汛纪念碑

朵大葵花，象征7亿人民团结心向党。

碑身上端塑毛主席头像，中间是毛主席题词“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特大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字是用纯铝镀金制成的。正面下部白色大理石雕刻毛主席词《水调歌头·游泳》。背面下部是“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敬建”字样。

碑基平台高4.9米，表示1949年武汉解放。平台周围8盏火炬灯，加碑顶1盏共9盏，表示庆祝党的九大召开。四周栏杆间的钢、煤、粮、棉图案，表示工农业生产飞跃发展。

防汛纪念碑现已成为江城一景。

少年英雄吕锡三纪念碑

走进市青少年宫，在松柏长青、绿荫成行的一个地方，耸立着一块高5米的纪念碑，这便是少年英雄吕锡三纪念碑。

纪念碑由碑座和塑像两个部分组成。碑座正面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同志1960年6月1日题字：“少年英雄吕锡三纪念碑”10个金光大字，背面记载了吕锡三烈士的英雄事迹。碑座上面是吕锡三英勇救人玉石塑像。

吕锡三，1946年生，浙江宁波人。1955年入武汉市球场街小学，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父母相继去世，寄居姐姐家。1959年6月10日是端午节。生活困难的同学何福连约他去挖野菜，改善生活。他是个乐于助人的好少年，便答应了。挖了一阵子，装满了一筐。二人抬着筐，唱着歌朝家走去，甬说有多高兴了。

突然，前面黄孝河里传来连续的“救命”呼喊声。他俩停止了歌声和脚步。吕锡三便不顾一切地向溃水过膝的草湖和横七竖八的沟壑冲去，“救命”声越来越近了。

暴雨之后的黄孝河激流奔涌，吕锡三看到有两个少年在水中挣扎，脸上露出痛苦惊慌的表情。吕锡三不顾危险，也忘记了自已本不会游泳，而且是个13岁的孩子。他此时的惟一

念头是：救人要紧，救人第一。

他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用尽全身力量把两个抱在一起不肯分开的少年分开，这是施救的第一步。迅即用左手撑起其中一少年的腰部，将其猛推至岸边，让岸边的何福连把他拉上岸，右手再紧紧拉着另一个比他大的孩子，不让他下沉。

当吕锡三做完这些动作后，已经精疲力竭，被水中孩子紧紧抱住，无法使劲，没水牺牲。他谱写了一曲舍己救人的英雄凯歌，成为少年儿童们学习的好榜样。

为了表彰英雄少年，湖北省人民政府、中共武汉市委共同决定：在市青少年宫修建吕锡三纪念碑。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等党政领导参加了纪念表彰大会，并为纪念碑奠基。

碑座占地 150 平方米，平台周围是具有民族风格的栏杆，显得十分庄严肃穆。纪念碑前是一条长春树排成的通道，方便游人的瞻仰。每年清明前后，络绎不绝的学生们、少先队员们前来悼念吕锡三，并在碑前宣誓向吕锡三学习。



吕锡三雕像

三 名人故居忆名人

宋庆龄故居

在沿江大道黎黄陂路口，有一幢门牌为沿江大道 161~162 号的三层楼房。

这块地方原来是俄租界，1925 年 3 月收回改为特二区。1927 年元月 20 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在此开业，当时的门牌号码是一德街 8 号。

这幢楼系欧式建筑，建筑面积 4 000 平方米。造型优雅别致，正面有拱形外廊，楼下有花园，花园底下还有防空洞。

斗转星移，岁月沧桑。经过专家反复调查考证，1998 年武汉市文物部门正式确定：此楼二楼系宋庆龄于 1927 年在武汉的住所。旋即督促使用单位对大楼进行维修，并将宋庆龄当

年所住房间恢复原貌，对外开放。

原来，1927 年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宋庆龄忠实执行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同反革命右派势力作不懈斗争。在大革命蓬勃发展



1926~1927 年宋庆龄故居

之际，国民党内右派势力开始压制工农、背叛三大政策，迫害、屠杀共产党人、爱国人士。对此，宋庆龄旗帜鲜明，立场坚定，7月14日公开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与政策的声明》，谴责蒋介石、汪精卫的叛逆行为，宣布与当局决裂。7月22日，她又与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林伯渠、吴玉章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另立中央的反革命罪行，号召国民党左派和革命人士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贼”。

在宁、汉对立中，宋氏家族发生分化，不断对宋庆龄威逼利诱，进行“劝降”。宋庆龄不为所动，坚予拒绝。因此成为蒋介石南京政权的重要政敌、宋氏家族的“叛逆”。

宋庆龄在汉期间，曾任临时联席会议成员、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在收回英租界、开展妇女运动、主办看护训练班等活动中，做了大量工作。她在此楼大约居住了8个月。

此楼现为广州军区后勤部门使用。故居现已作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

刘少奇故居

友益街尚德里4号2楼，是个不起眼的民居，是省市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26年10月至1927年7月，刘少奇同志在这里生活战斗了10个月。

当时，刘少奇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兼秘书长。

1927年“一三”惨案发生后，刘少奇、李立三领导武汉工人和各界群众，在汉口举行追悼大会和反英示威大游行。随后，组织领导了收回英租界运动、邮政职工大罢工、日租界洋务工会工人大罢工、海员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工大罢工等运动和斗争，取得了斗争的更大胜利。

随着蒋介石在上海“四一二”政变，夏斗寅在宜昌“五一七”叛乱，武汉国民政府里的右派势力抬头。6月14日，刘少奇在



刘少奇故居

省总工会代表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讨伐蒋介石”、“拿办许克祥(湖南军阀)”。他还关心工人纠察队的发展,使武汉工人武装力量成长为5 000多人、3 000多枝枪的队伍。由于党中央当时领导人的右倾,6月28日作出解散工人纠察队、自动解除武装的决定,刘少奇等同志处境危险。果然,29日何键的反动部队就开始冲击各级工会,拘捕工会干部和共产党员。幸亏同志们接到通知,及早转移,避免了更大损失。

7月,少奇同志又病倒。中央决定他离开武汉。

在这间小屋里,刘少奇还写过三本书,这就是:《工会基本组织》、《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这是我党最早关于工会建设的理论著作。

向警予烈士故居

三德里27号(原96号),是20世纪20年代初所建的一栋两层楼房。楼上一间27平方米、南北朝向的房间,曾是1927~1928年向警予烈士租住的地方。她在此小屋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直到被法租界密探、巡捕强行押走。

向警予1895年生于湖南淑浦一个商人家中。1912年到省会长沙求学。1916年春,她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回到家乡,

创办溆浦县立女校，并任校长。她向学生介绍新知识，灌输新思想，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开偏僻山城风气之先。“五四”运动浪潮波及全国时，她带领师生上街游行宣传反帝爱国，唤起民众。此时，她已参加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所创立的“新民学会”，是最早的女会员之一。

1920年，向警予、蔡和森、蔡畅等30多人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她边学习，边工作，还参加各种政治活动，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被法国当局以“扰乱治安”罪驱逐出境。

向警予回到上海，已是1922年初。她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二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1924年八九月间，她先后领导了上海丝厂和南洋烟厂大罢工。丝厂有14家分厂、15000名女工参加罢工，一直坚持了7天，迫使资本家满足了工人的部分要求。烟厂的5000人大罢工也取得了胜利。

1925年，党组织决定派向警予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7年，向警予回到祖国。4月，大革命遭到极右势力反攻破坏时，她来到武汉，立即投身到严峻的斗争中。

4月27日~5月9日，她参加了党的“五大”（4月27~29日在武昌都府堤开会，因安全原因，4月30日~5月9日改在汉口自治街31

号开会）。她曾被党分配到友益街2号（今16号）的湖北省总工会任宣传部秘书，又调汉口市委宣传部和市



向警予故居

总工会工作。“七一五”汪精卫公开反共后，党组织考虑到向警予的安全问题，安排她回湖南工作。她不畏艰险，坚决要求留下。党组织于是安排她到湖北省委，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湖北省委创办了机关报——《大江报》，向警予担任主笔，撰写了许多社论和时评，像一把把匕首刺向敌人的心脏，像一支支战斗号角激励广大共产党员坚持斗争。

11月中旬，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部队占领武汉，提出“宁肯错杀三千，不留一个C.P.”的反动口号，对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血腥镇压。向警予是一位长期公开工作的妇女运动领袖和党内知名人士，无时无刻不在极度危险之中。为了躲过敌人的搜捕和密探的耳目，她经常改变住处，改名换姓，化装易服。有时扮小学教员，有时扮家庭妇女，深入工厂和工人家中，巧妙组织工人和敌人展开斗争。她与党的地下交通员、党组织骨干秘密联络，以图恢复已被破坏的赤色工会、地下区委和支部。向警予就像一团火，走到哪里，就在那里燃起革命热情。她的到来，使工人和革命群众相信“总工会还在”、“共产党还在领导我们战斗”！

在三德里96号二楼，她和陈桓乔同住一室。向警予化名夏易氏，身分是失业小学教员；陈化名易陈氏，身分是家庭妇女；二人以姑嫂相称。以找工作为掩护，每日外出。陈桓乔曾劝向警予暂避，因向警予的名气大、目标大。向警予却说：“目前处境的确困难，但我一离开，工作无人联系，也会令工人们失望。大风大浪的时刻，一定还要沉着、镇定。我决定不离开武汉。”

1928年3月，原先担任地下交通员的宋若林叛变投敌，他先出卖我党早期著名党员夏明翰，使夏于3月18日被捕，20日清晨被枪杀于余记里空坪（今黄石路）。向、陈二人立即警觉，打算找房子搬家，可没找到合适的。而宋若林在20日再次出卖了向警予，亲自带领法租界密探、巡捕包围了三德里96号，继而上楼撞门而入，逮捕了向警予和陈桓乔，还搜查了房内每个角落。幸好她们早已销毁了所有文件，使敌人一无所

获。随后,持枪匪徒将二人押到街对面的法租界巡捕房(今金源大厦所在地)。

4月12日,被反动军阀引渡,200多武装警察如临大敌,前后簇拥,将向警予、陈桓乔押解到武汉卫戍司令部,被关进军法处监狱。

5月1日,向警予被押赴余记里空坪刑场。一阵罪恶的枪声,向警予献出了她31岁的生命。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她。解放后,向警予故居和陵墓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故居经维修后,保持了原貌,现仍作民宅。江岸区人民政府将其开辟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詹天佑故居

詹天佑,1861年出生于广东南海,祖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1872年考取清政府首批幼童出洋预备班。1878年入美国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1881年毕业后归国,在福州船政局学习轮船驾驶,任教。后去广东博学馆任教。1888年,被推荐入中国铁路公司,成为我国第一位铁路工程师。1894年,被英国皇家工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授予工科进士。



詹天佑故居

1905~1909年任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总工程师兼会办,1909年任川汉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1910年任商办粤汉铁路总理兼总工程师,总公所设在汉口。1912年任交通部技术监督,驻汉口专办铁路事宜。

因此,詹在汉口俄租界鄂哈街9号(今洞庭街51号)购地建屋,作为全家住宅。

詹还是中华工程师学会的会长,主持出版学会会报、《工程》杂志、《京张铁路工程记略》、《京张铁路标准图》、《铁路名词表》等书刊。1914年任汉粤川铁路督办,督修武昌至长沙段。

1919年2月,他受命代表我国出席远东铁路会议,操劳过度,旧病复发。4月21日返回汉口,就医于仁济医院。

4月24日病逝于寓所,享年58岁。武汉各界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周恩来曾称赞他是“中国人的光荣”。

故居为二层砖木结构,是詹在武汉工作和生活7年的历史见证。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对外开放。



1917年,詹天佑任汉粤川铁路督办后,携全家从广州迁到汉口。这是詹天佑与子女在汉口的合影

第四章 地名故事

你知道江岸用一、二、三、四、五来命名街道的由来吗？还有那些用历史人物来命名的街道吗？一条街路名都有它的来由，都有一段故事。有些路名你也许能望文生义，但有些路名你不一定猜得出它的来历。路名之中不仅体现了历史，体现了文化，体现了趣味，还更多的体现了民族气节。

一 租界五条街名来历

江岸区历史上曾有过5个外国租界，租界是“国中之国”。租界内的街、路名，全由“洋人”自定。

例如俄租界(1896年6月2日至1925年3月1日)几条主街叫亚历山大街、玛琳街、列尔宾街、鄂哈街……。当我国收回后，成立汉口第二特别区管理局，首要任务之一便是将街路名恢复中国特色。由督办沈子良牵头，请了几位“饱学之士”商量一番后，决定将与江边平行的五条街（即今

之沿江大道、洞庭街、鄱阳街、胜利街、中山大道)依次更名为：一德街、两仪街、三教街、四民街、五族街。由于俄租界在5个租界中面积最小，而它两侧的英、法租界，当时又未同时收回，所以这5条街都不长。

5条街名，需10个字，其中一、两、三、四、五是顺序，使行人便于寻找，无须问路。而另外五个字的组合则是引经据典，大有来头。

一德，出自《书·泰誓》，“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汉桓宽《盐铁论·世务》：“方此之时，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内相信，上下辑睦。兵设而不试，干戈闭藏而不用。”就是同心同德，大家一条心的意思。

两仪，指天地。孔颖达疏：“不言天地而言两仪者，指其物体。下与四象(注：金、木、水、火)相对，故曰两仪。”中国人一贯敬奉天地，把二者放在君、亲、师前面，放在堂屋神龛上顶礼膜拜，常年烧香磕头。

三教，汉儒谓：“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称为三教。”汉徐干《中论·治学》：“先王立教官，掌教国子。教以六德，曰智、仁、圣、义、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姻、任、恤。教以六艺，曰礼、乐、射、御、书、数。三教备，而人道毕矣。”以上两种解释均可。但此处决非“九流三教”或“儒、释、道”之意。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楼上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

四民，出自《谷梁传·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汉书·食货志上》：“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

五族，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曾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后来，革命党人发觉排满不利于革命，改提“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口号，这便是“五族”的来历。

二 “三北”的来历

沿江大道洞庭小路口有幢大楼,后面还有个仓库,武汉人习惯称之为“三北大楼”和“三北仓库”。此外,江边还有个占地5 000平方米的码头,解放后曾为长江航道局汉口航道站打捞专用码头,大家也叫它“三北码头”。现已随江滩改造而迁移。在洞庭街现今还能看到“三北居委会”的牌子,洞庭小路也有一家门面不大的“三北餐馆”。

“三北”的字义,本是慈北、姚北、镇北。慈是慈溪,姚是余姚,镇是镇海,是浙江省杭州湾南岸、东海之滨的三个县。在清代,慈溪、镇海属宁波府,余姚属绍兴府。这宁、绍二府的商人长袖善舞,店铺遍及全国城镇。就是上海,宁、绍二帮也始终执商界之牛耳。本文要提到的三北轮船公司,其创始人虞洽卿就是宁绍帮的杰出代表人物。



三北轮船公司旧址

虞洽卿，清同治六年（1867年）出生于慈溪县龙山村。15岁到上海打工闯荡，先当学徒，再当“跑街”。由于他勤奋好学，27岁以后便到外国洋行、银行当买办。40岁时，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1909年，虞与他人合资，成立宁绍轮船公司，有“宁绍”轮一艘，航行与上海、宁波间。1913年，又开办三北轮船公司，购百吨小轮3艘，取名“慈北”、“姚北”、“镇北”。前两轮往来于舟山之普陀（沈家门）与定海间，后一艘则跑慈溪龙山至宁波一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外商及其所有轮船纷纷回国，“三北”生意火爆。虞决心放大本钱，添购江轮6艘，发展长江中、下游及沿海航线。1919年，公司资本已增至200~250万元。

汉口江边的三北码头是1914年辟建的。汉口成立分公司是在1915年，首任经理殷惠昶。公司大楼和仓库是1924年兴建的。

最初，长江航运几乎全为外轮垄断。如1927年长江航运载运货量各公司所占比例为：日本日清公司占38%，英商怡和公司占26.4%，英商太古公司占20.4%，中国官办招商局仅占2.1%，其他私营的三北、宁绍、美商捷江、法商聚福等小公司共占13%。到了1934年，华资航运公司（含官办与民办）已大有起色，如当年沪汉客运量统计显示，日清占12.74%，怡和为22.77%，太古占29.10%，而招商局、三北、宁绍三家共占32%。

各公司为揽客源，竞争激烈，除船票竞相打折降价外，外资公司还使用过送伞、船上吃饭免费等招数。但爱国同胞不为利诱，仍多尽量搭乘“中国人的船”。外资公司业务逐年萎缩，华资公司不断壮大。如一德街（沿江大道合作路口至洞庭小路口）的三北公司和三北码头，终日人流不息。

随后，卢作孚兴办的民生轮船公司异军突起，走出川江。烟台政记公司规模也不小。而三北公司此时已拥有30多艘轮船，兼营江海联运，故虞洽卿自诩是“中国三大民营航业公司之一”。

抗战军兴，三北公司损失惨重，遭日机炸沉11艘。入川

时，“凤浦”、“新宁兴”、“清浦”、“长安”又被炸沉。入川后，因船体吃水深、燃油短缺等因停航约10艘，仅剩“涪丰”等4轮惨淡经营。1945年4月26日，虞病逝重庆，享年78岁。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航业界横征暴敛，军队为打内战频频拉差，分文不给，致使航运全行业衰落。三北公司汉口分公司向总公司报告中，也哀叹“库空如洗……实深焦虑”。三北公司再已无法恢复昔日的辉煌。

三 保华街的来历

1861年3月21日，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巴夏礼与湖北藩司订立《汉口租界原约》划定英租界地界(立了石碑)。但是英帝国主义贪得无厌，总想得寸进尺。1898年8月31日，清政府迫于英国压力，再签《汉口新增租地条款》，英租界再增面积三百三十七亩五厘。即汉口城堡(今中山大道)以内，合作路以南，全部被其占据。



保华街

1907年汉口城堡拆除后，英人防中国人随便进出，又砌砖、加铁栅建起了围墙，只开了几处小门。

有了墙，虽给华人小商小贩带来不便，但对英国租界当局而言，若想再浑水摸鱼扩大地界，也就不容易了。

当时一些小商小贩、码头工人、车夫等在租界相邻的华界上搭盖了一些简陋的棚屋居住，没有下水道，也没有像样的厕所，卫生条件很差。英国人认为有机可乘，一方面向清政府提出“大小棚屋甚多，恶臭已极，理应驱逐……不准再有盖屋居住”的要求，一方面又指使其巡捕不断对棚户住民进行挑衅、打骂，使其不得安宁。

有几名作恶多端的洋巡捕“神秘失踪”。原来他们在晚上执勤时被华人用绳子套住颈脖（呼救不能），背起就跑，然后投入水塘或江中淹死。这种行动当时称为“背娘舅”。

“背娘舅”事件发生多了后，英国人感到恐慌。想来想去，决定千方百计继续扩界。除和刘歆生秘密交易，吞并了今扬子街一段外，又在事故多发地段（今黄石路至南京路的中山大道），策划了越界建房（原新昌里及今金城里）。所以，后来英租界就不再是长方形，而是在中间又冒出来一个尖角了。

1923年，汉口华商总会的部分会员集资购进刘歆生在华界的一大片地皮，在沿英租界的今黄石路、保成路一带，建成“模范区”，并经与英国殖民者的多次交涉，租界“纳税人会议”决定拆除了围墙。中国人把英国原霸占的金城银行（现武汉少年儿童图书馆）旁边的一段路取名为“保华街”，以表示保卫中华领土的决心。

四 历史人物路名

黎黄陂路

东起沿江大道，穿过洞庭街、胜利街，西与中山大道相交，



江岸区委、区政府所在地今黎黄陂路27—29号

全长580米，宽约12米，门牌1~56号。江岸区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在本路25号，市中医院、市基督教青年会、省纺织公司、省基督教协会也在本路。

1896年划为俄租界，此路原名夷玛街，俄租界的工部局就设在现黄陂路小学。

1925年3月1日收回俄租界，1926年3月2日改名为“汉口第二特别区”，设特二区市政管理局，任命沈子良为局长。

沈子良首先将原来的“俄式”街路名改为“中式”，列尔宾街改为兰陵路，领事街改为南皮路，夷玛街改为黄陂路。这三个路名是为了纪念萧耀南、张之洞和黎元洪。黎元洪原籍黄陂黎家河（现属大悟），人称黎黄陂。

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市政府干脆将其加上“黎”字，免人误解。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曾改名韶山路，1972年恢复黄陂路，1982年又恢复黎黄陂路。

黄兴路

东起胜利街,穿中山大道,西至友益街“磨盘”,全长390米,宽约10米。门牌号单号1~65、双号2~62,“好又多”超市在本路。



黄兴路上的黄兴雕塑

1896年此路只有东半条,1906年法租界扩界,则又加入西半条,总长390米。法人将其命名为“巴黎街”。

中国的官、商认为租界可受洋人保护,比较安全,纷纷来此建房。如36号曾是军阀吴佩孚房产,31号(现新华书店)曾是资本家王雨卿产业,28号是汉奸师长邹平凡私宅,33号是张履鳌产业。

1945年抗战胜利后,法租界收回。为纪念辛亥伟人,将巴黎街命名黄兴路。

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改名保卫路,1972年恢复黄兴路。

蔡锷路

东起沿江大道,穿过洞庭街、胜利街,西抵中山大道,全长340米,宽约15米。门牌1~33号。邻近滨江公园与粤汉码头。在本路的单位有江汉饭店(原德明饭店)、解放电影院(原中央电影院)、武汉电影院(原明星电影院)。市教育局、市园林局也曾设此。

本路原属法租界,1896年后为福熙将军街,1941年改为福熙大街。1945年8月抗战胜利,1946年收回法租界,以护法讨



蔡锷路

袁名将蔡锷的名字命名。

蔡锷(1882~1916年),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在云南响应起义,任云南都督。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回云南组织护国军起兵讨袁,出兵四川,与袁军激战。1916年袁世凯病死,蔡任四川督军兼省长,后赴日本就医,病故。

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改名滨江路,1982年恢复蔡锷路至今。

张自忠路

旧汉口日租界曾有一条街,叫成忠街,“卢沟桥事变”后,中日面临战争状态。1937年8月上旬,日侨及机关、洋行、公司全部回日本。中国收回租界后,首先将街名更换。成忠街更名台儿庄路;1946年为纪念抗日牺牲的张自忠将军,更名张自忠路。“文化大革命”中曾易名红卫八路,1972年改名抚顺路。1985年7月,恢复“张自忠路”至今。

张自忠,1891年出生于山东临清县。青少年时投身行伍,



张自忠将军

因作战建功，得冯玉祥将军赏识，从下级军官逐步提拔为旅、师长。

1935年任察哈尔省主席。1936年调任天津市市长。在任时对日军屡屡挑衅义愤填膺。1937年，张回军队，任五十九军代军长。1938年率部参加临沂作战。打了一个多月，张升二十七军团军团长兼五十九军军长，开赴台儿庄以东，参加会战。台儿庄大捷后，张部补充了兵员，更新了装备。至1938年8月底武汉会战开始，张部南下豫鄂阻

敌，任务完成较好，又晋升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五十九军军长。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张部越过平汉线，在安陆、应城间突围，到达京(山)、钟(祥)、荆(州)、宜(城)地区，构筑防务。1939年1~3月，日军两次侵扰张部防地，均未得逞。5月初，各线战斗激烈，以随县枣阳为中心，称为随枣会战。

1940年4月下旬，日军调集十万兵力，分路进攻襄樊。张自忠被任命右翼兵团总司令。5月8日，张率兵渡汉水急赴枣阳。10日，与敌激战于枣阳黄龙梁。予敌重创。后因部队分散，各自为战，又联络不上。16日，张身边部队伤亡殆尽，只有其卫队尚能以手枪坚持抵抗。敌闻手枪声，知系督战指挥官在此，更加疯狂进攻。张两处中弹，午后又中一弹，壮烈殉国。他殉国的地方名南瓜店。

灵柩移至重庆，隆重祭奠安葬。延安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也分别唁电。

陈怀民路

陈怀民，原名天民，号我华，1916年生于江苏镇江。1932年就读于常州工业专科学校。“一二八”事变后，毅然投笔从军，参加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所属学生义勇军，在上海吴淞一带抗击日本侵略者。

1933年1月，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学习。1936年毕业于，编入空军第四大队，任少尉飞行员。先后参加华北、上海、南京等地的空战，共击落、击伤敌机5架，自己也3次受伤。空军当局曾准备调他到航空学校当教官，但他志在杀敌，稍一康复即返部队驾驶战斗机。

1938年4月9日，侵华日海军航空兵佐世保航空队出动飞机36架空袭武汉，欲以空中大捷来为天皇生日——天长节献礼。陈受命立即与战友升空迎敌。在武汉上空一番鏖战，陈先击伤日机一架。但在紧追这架敌机时，被5架敌机死死咬住，无法突围。在日机连续攻击中，陈的飞机中弹，逐渐失去平衡。如果此时跳伞，尚有保全生命的可能。而他却果断迅速调转机头，猛推油门，向尾随其后的一架日机猛撞过去，与日机同归于尽。

烈士牺牲当日，机场战友还在急切盼望他的归来，最终才查明与敌机相撞，壮烈殉国。经过反复搜寻，直至6月3日才在青山长江边发现烈士忠骸，当晚盛装入殓。5日，武汉各界于汉口市商会礼堂隆重公祭陈怀民等空军四烈士。国共两党要人蒋介石、王明、周恩来、朱德、于右任、孔祥熙、何应钦等赠送挽联、花圈。蒋介石亲临主祭，参加祭奠者企立礼堂内外共2万人。6日上午出殡，沿途市民吊唁使交通为之堵塞。气氛悲壮，备极哀荣。陈怀民之墓地选在武昌青山矶，由陈经畚主持墓园修建，并请济南大学教授卢前撰写烈士殉国事迹碑文。碑文中记有烈士生前所说“我上了天就不想能不能回来，打仗就不能怕死”等豪言壮语。

抗战胜利后，将旧日租界南小路改名陈怀民路，以兹纪念。

郝梦龄路

郝梦龄，字锡九，河北省藁城县庄合村人，1898年3月24日出生于世代务农的农民家庭。少年时只读过3年私塾，14岁时到正定县一家杂货店当学徒，因不堪老板虐待，投奔到魏益三部队当兵。因勤奋被保送陆军军官小学学习，后又入保定军官深造，属第六期。毕业后分到段祺瑞部任见习排长。1922年又到魏益三部（东北军），先后任连长、营长、副团长等职。1924年，在张学良、郭松龄的奉军一、三军中任团长。1925年，郭被张作霖杀害，冯玉祥到山海关策动魏益三部反奉，郝当时是魏的谈判代表。1926年，冯委任为国民军第四军旅长。1927年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冯玉祥被委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部于西安协同北伐，郝擢升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第二师师长。6月1日，从武汉出发的北伐军与冯的西路军会师郑州，经改编，郝任陆军五十四师师长。1930年，蒋、冯、阎中原混战，郝时属蒋军阵容的第三军团，混战结束，



武汉人民恭迎郝梦龄、刘家麒灵柩

郝又被提拔为第九军副军长，兼郑州警备司令。

从1932年起，郝被调往江西参加围剿苏区，再提升为第九军军长。1935年奉调督修川黔、滇黔公路。1937年5月，当局调他去陆军大学学习，未曾到校，“七七”事变发生。郝毅然返部队，集体请缨北上杀敌，经反复申请，始获批准。郝率部路过武汉，与家人诀别时留下遗书，嘱咐子女：“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们要听母亲教训，孝顺汝祖母……”10月1日，奉令驰援山西忻口，参加太原保卫战。卫立煌命令郝担任中央团的指挥。10月10日，日寇逼近忻口，郝于战地再给夫人剧纫秋写下最后遗书，内容充满报国激情，已下与敌决一死战之决心：“不能成功即能成仁……”“为军人者，为国家战死，可谓死得其所。”句句感人肺腑，掷地有声。

10月13日，日军第五师团5.6万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忻口发动全面进攻。正面中央地区战斗尤为激烈，郝亲自督战于永兴村、安家庄一带，与全军将士共冒弹雨，浴血奋战。

郝在一个阵地上动员部下官兵说：“……不打败日本人决不生还。我现在和大家坚守这个阵地，决不后退。我若先退，你们不论是谁，都可以枪毙我。”大大激励了士气。

16日，郝梦龄为夺回南怀化高地，指挥7个旅，于凌晨2时开始反击，连克数山头。5时许，郝要往另一阵地布置作战，官兵劝改派一士兵传达指令即可，不必亲自冒险，因此行要经过敌火力封锁线。可郝不听，还说“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

郝梦龄与刘家麒一行在穿过日寇封锁线时，不幸双双中弹殉国。

10月24日，郝梦龄将军和刘家麒将军的灵柩运抵武汉车站时，前往迎灵的各界代表达4000人。后又举行了公祭，全市下半旗志哀一日，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代表蒋介石主祭。同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郝梦龄为陆军上将。

为纪念将军，将原日租界上小路（又称燮昌小路）改为郝梦龄路，至今。

刘家麒路

刘家麒，字铮磊，湖北武昌人，1894年生。幼读私塾，后入勺庭中学。辛亥革命后参加学生军，驻守黄州。1912年18岁时考入湖北陆军小学，再进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6年22岁时入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东北边防军第一军。历任边防军教导团炮兵排长、连长、营长、团副。1926年，任国民军第四军炮兵第一团团长。

北伐军由广州誓师，攻克武汉。驻防豫南的国民军起而响应，刘家麒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炮兵司令兼第一团团长。1931年任第九军第五十四师少将参谋长，随军进驻江西，围剿中央苏区。

旋任第五十四师一六二旅旅长。再入陆军大学深造。1937年升任五十四师师长。

同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9月初，刘家麒奉九军军长郝梦龄电令，率部北上抗日。10月初，到达山西忻口前线。

10月13日，日寇5.6万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忻口发起总攻。鏖战数日，相持不下。16日，郝梦龄军长于凌晨2时，指挥7个旅开始反击，连克几个山头。5时许，郝率刘等前往一阵地督战时，在通过敌人火力封锁线时，不幸中弹，双双身亡。刘此时43岁。

10月24日，刘的灵柩与郝的灵柩同时运抵武汉。随后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由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代表蒋介石主祭。同年12月，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刘家麒陆军中将。

五 纪念抗战胜利的卢沟桥路

在黄浦路临江一端的西南处，有一条卢沟桥路，街道不长，却有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这条路原是往年日本租界的属地，它一头靠江滨，另一头

正对着三元里铁路孔(现已拆除)。从前日本人把这条路定名为“大正路”。“大正”是日本的一个年号,它是指“明治”以后即从1912年开始的“大正时期”。至于卢沟桥路,是1946年汉口市政府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而更改的路名。

以往,在这条路的两旁,大都是些二三层的建筑,多半是住宅、工厂和洋行。如今,靠这条路江边上口的武汉二米厂,就是过去日本人设的“日华油厂”旧址。这家油厂拥有500吨的炼油设备,它和当年在汉的两家洋行(三井、三菱)都曾在此从事桐油出口贸易。沿着这条路分布的日本洋行有“经营贸易业的大同洋行、阿布一洋行,经营棉花、棉纱的东棉洋行和经销杂货的安昌洋行以及从事建筑业的东京株式会社等。是他们对中国人民进行经济掠夺的据点”。

日本人曾在今卢沟桥路靠近胜利街的一排红砖楼房内开



卢沟桥路

设了妓院。从这条路往胜利街朝北不多远，开设有一处大舞厅，附近还有很多日本人的酒吧间，从早到晚乌烟瘴气。《汉口竹枝词》中就有：“弯环马路亘西东，德法英俄大约同。惟有东洋异风趣，酒楼歌院夜灯红。”

原来这条路上，日本人还设有一处“神社”，地点就在今卢沟桥路与长春街交叉口处的一栋灰色楼房内（即今长春街小学斜对面）。“神社”所崇奉的是“神童”教。这个教主要是为日军服务的，极力宣扬“天皇制”，崇拜天皇是“现人神”。那时住在日租界的神童教徒很多。

在屈辱的年月里，这条路随时可看到日本武装警士巡逻，而且靠这条路的江面一带，经常停泊有日本军舰；还长期设有驻汉派遣军，驻扎的地点就在今武汉二米厂向南不多远的江滨一带。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看到这条路正对铁路孔，由此可直通铁路外，就又沿着这条路越界一直朝后湖一带扩张，进一步侵占了今解放公园北面的大片土地，并设了一处兵营，两个打靶场。当时住在附近的市民对日本在此驻兵都很气愤。《汉口竹枝词》中就专门有一段关于日本兵营的记载：“租界东洋驻重兵，保商何必要连营。可叹卧榻横陈夜，时听旁人鼾睡声。”

还须提到的是，从前这条路原于是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日本增辟的“租界”范围。在此以前，美国早已在这条街边侵占了一大块土地，地点就是现中原机械厂宿舍区内。那时美国即以此处作为美孚洋行的油站，在这条街的江边还设有美孚码头。

六 祖国统一化路名

我们党在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后，正在带领全国人民为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继续奋斗。为了纪念香港、澳门胜利回归祖国和尽早解决台湾问题，实现

祖国完全统一,市、区政府近年来分别改建、扩建了原安定路、西马路、三阳北路,分别命名为台北路、香港路、澳门路。

台北路

位于解放大道以北,全长1380米、宽28米,是连接解放大道与建设大道的主要连通道之一。

台北路原名安定路,是随着武汉市城市建设的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初修建的一条主要连通道。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特别是为了更好地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尽快实现祖国统一伟大历史任务,加强对台工作,经市政府同意,将安定路改名为台北路。

台北路命名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台工作,促进两岸交流,以台北路为主轴,道路两旁所有的居民小区、商店、饭店、学校等纷纷以台湾省的地名命名。如居民小区命名为台北一村、台北二村等等。另外,道路两旁遍布着台湾酒店、台北商场、阿里山饭店、日月潭酒店、台中副食、



台北路

台北路学校等，就连街道办事处也由鄂城墩街办改名为台北街办事处。街道办事处下属社区也均以台湾地名命名，如台南、桃源、澎湖、花莲等。与台北路平行或交叉的几条道路也分别命名为台北一路、台北二路、高雄路、云林路、马祖路。可以说，以台北路为主轴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集聚了台湾省各地的地名，形成了大陆第一条以台湾省命名的道路，充分体现了大陆人民与台湾同胞融为一体的民族情感。

台北路形成之初，道路两旁主要是居民区和为居民生活服务的小型网点，属于城郊接壤之处。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与台北路相连的武汉金融一条街的建设，台北路及附近有了较多的金融机构和机关团体、商业网点、文化娱乐、电影城、酒店等 200 多家。台北路已发展成为中心城区的一条主要连通道。

按照市区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求，区政府、街办事处正在积极开展对台交流活动，引进台商、台资，打造以台北路为主体的“台湾风情特色街”，把台北路建设成为集饮食、商贸、休闲娱乐、高档住宅为一体的台湾风情街。

香港路

香港路处于高雄路和球场路之间，与台北路平行，全长 1400 余米，设有快慢 6 车道及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是解放大道与建设大道的连通道之一，于 1996 年底建成通车。

香港路的前身西马路，长不过千米，宽仅 4 米，而且两旁是一些低矮简陋的棚屋，大都是一些个体加工、汽车修理、废品回收、旧货拍卖以及酱品、豆制品作坊，素有“废品一条街”之称。这里居住的多为手工业者及流动人口，素质较差。

香港路建成后，使这里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栋栋具有现代气息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片片清新恬静的住宅小区纷纷建成，与道路两旁的草坪、绿荫、华灯、秀栏一起构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路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呈现出一派欣

欣向荣的秀丽景象，充分展示了香港路的生机与活力。现在香港路已成为武汉市的一条标杆路。

香港路建成后，对繁荣市场，促进区街经济的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目前道路沿线有近百户经营门点和服务机构，涉及十多个行业。如以小蓝鲸、老干妈、香路香、老成都、跳跳鱼、比耶罗、小夜曲、蒙娜丽莎为主的中西餐厅酒楼，以新永安市场为主的装饰材料市场，以市儿童医院、市六医院、市妇幼保健院为主的集预防、治疗、康复、保健于一体的医疗卫生系统。还有香港路南端两侧的证券、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使香港路初步形成了以餐饮副食、家居装饰、医疗卫生、金融电信为主的特色街道。

在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区政府、街办事处将按照“食、居、乐、医、用、行”为主的要求，把香港路建“美食文化健身娱乐一条街”，让香港路为广大市民的生活提供更多好的服务。



香港路夜景

澳门路

澳门路地处解放大道三阳路以北，是一条全长 1 200 余米、宽 50 米，连接解放大道与建设大道的主要连通之一。

澳门路原名三阳北路。早在 1987 年前，还只是一条只能走三轮车、自行车的泥泞小路，取名为“湖边坊小路”。1988 年 5 月，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房地产开发公司在这一带开发居民小区建设。按照市、区政府要求，在原“湖边坊小路”基础上，开辟了一条连接解放大道与建设大道的大马路，1992 年正式命名为“三阳北路”。1998 年，为了迎接澳门胜利回归祖国，经市政府批准，改名为澳门路。

澳门路建成后，除了沿路的居民小区成片开发建成外，道路两侧的高楼大厦也鳞次栉比。不少党政机关、金融保险单位、学校、医院逐步迁入。目前已有武汉地方税务局、市安全

局、市建设银行江岸支行、上海市人民政府驻武汉办事处等单位迁入道路两侧的大楼办公。还有长航总医院、武汉六中、市六中分校、金融大厦也在道路两侧改扩建成功。同时，道路两侧还布满了商业网点，餐饮副食、娱乐场所，使这条道路日趋繁荣，促进了街道经济的发展。



澳门路一瞥

第五章 名人点击

自汉口开埠以来,江岸受外来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日益加深,逐渐成为人们施展才略的舞台。中国人或外国人、军阀或政客、老板或青洪帮、革命与反革命,都一一在江岸这个舞台上亮相表演。老江岸的成就与辉煌,荣辱与兴衰,都同这些人物的沉浮休戚相关。我们在此挑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谈一谈他们的故事,目的是鉴古知今,启迪未来。

一 革命领导人江岸足迹寻

李大钊

1923年1月底,党的著名活动家李大钊来到江岸,与其他领导人一道,负责组织和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罢工被残酷镇压后,大批工人流落街头,全国50多个工会被封闭,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李大钊积极领导了善后救济工作,并针对艰难困苦的环境和某些人的悲



李大钊

观失望情绪，写下了《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等文章，鼓舞人民冲破艰难险阻，积蓄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李立三

1923年4月下旬，李立三遵照党的指示，从安源来到武汉，任党的武汉区委书记。他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以香山会馆平民学校教员的身份，在工人中活动，相继在汉口、江岸等处培养训练了一批工运骨干，恢复

和发展了工会组织，整顿和重建了一些党的基层支部。1924年1月，李立三奉党的命令去上海领导工运。1926年9月7日，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回到汉口，负责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9月17日，办事处正式成立。这个全国总工会的实际领导机构设在汉口友益街2号（现16号，武汉市文化局机关）。李立三和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一道，在这里领导着全国工人运动。此间，李立三先后领导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和湖北各界人民声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游行，并先后参加了全国铁路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邮电总工会代表大会、湖北省妇女代表大会、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12日，在他离开武汉后，同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等5人被中共中央推举为临时中央常委。

董必武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后,在中国共产党方面,由董必武主持领导湖北、武汉的统一战线工作。同年春,经中共中央决定,由董必武负责筹备成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1925年7月,秘密选举产生了国民党湖北省临时执行委员会,董必武任书记。1924年至1925年,董必武还担任中国共产党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机关设在汉口吉庆街德润里27号(现大智街辖)内。他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团结国民党左派,直接领导和参与组织支持工农运动,镇压各地反动势力,支持讨伐夏斗寅的斗争。

1937年9月受中央委托,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来武汉指导党的工作,住在汉口府南一路安仁里(现属江汉区民意街辖),并在东方旅馆(现车站街辖)楼上租了一间房,接待和会见了各方人士,宣传党的抗日战争路线、方针和政策;还接待了陶铸等党的各级领导,帮助成立了中共湖北省工委。1937年10月,负责筹建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1938年元旦,“八办”由安仁里2号搬到日租界中街89号(现汉口长春街57号)。中共长江中央局亦迁此合署办公。



董必武

刘少奇

1926年10月2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受党的派遣来到武汉,兼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负责指导湖北等



刘少奇

省的工人运动。省总工会机关(现汉口友益街16号,武汉市文化局机关)成为工人运动的指挥中心,对面尚德里4号是刘少奇的住所。在这里,刘少奇写下了《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工会基层组织》等专著,这是我党最早关于工会建设的理论小册子。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在英租界旁的江汉关下向工人群众滥施淫威,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三”惨案。刘少奇急赴现场,怒不可遏,并立即主持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将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通电全国,提出了

立即收回英租界的“六项要求”。刘少奇领导工人群众进行了长达48天的英勇斗争。2月19日,英方被迫签字交回租界,被英帝国主义霸占了60多年的租界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刘少奇在武汉先后参加了湖北省总工会成立大会、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并组织领导了建立工人武装纠察队、举办工人运动讲习所、开办各类工人学校等工作。他还参加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毛泽东

1927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结束了在湖南农村的调查,由长沙回到武汉。在武昌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七一五”反革命前的4月27日,毛泽东出席了党的“五大”。8月7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以候补中央委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批判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并在统一战线、农民土地及武装斗争等根本问题上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正确结论,为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发挥了卓越作用。不久,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离开白色恐怖的武汉,根据“八七会议”决议,去湖南领导举世闻名的湘鄂粤秋收暴动,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



瞿秋白

瞿秋白

1927年3月中旬,瞿秋白从上海来到武汉,筹备召开党的“五大”。瞿秋白在汉口英租界辅义里27号(现属大智街辖)住所里,经常与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精辟分析形势,讨论我党的路线。他对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不顾陈独秀的禁令,将这篇报告亲加序言后交党办的长江书店出版了第一个单

行本。他还在自著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书中加上《自序》后出版。4月27日，瞿秋白参加了党的“五大”，在会上向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7月下旬，瞿秋白住进英租界的德林公寓（现天津路12号），负责筹备党的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在这里，瞿秋白翻译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8月7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了“八七会议”。党彻底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在会上，瞿秋白被选为党的中央书记。

任弼时

1927年春夏之交，团中央代理书记任弼时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国际代表大



会后，风尘仆仆来到武汉，住在汉口太平洋浴池隔壁（现黎黄陂路口），并在这里办公。任弼时参加了党的“五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参加了党的“八七”紧急会议，在会上发了言并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在汉口起草了《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同陈独秀的错误路线作不妥协的斗争，受到毛泽东等同志的赞扬。1928年春，党中央派任弼时任湖北省委书记；10月，作为党中央特派员去安徽指导工作。

任弼时在武汉时的化妆照

周恩来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率中央军委离沪到汉，住进胜利街。7月12日，中央在汉召开会议，成立中央临时政治局，周恩来为成员之一。

1937年12月18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抵达武汉，同蒋介石继续就两党关系和团结抗战事宜进行谈判。中共代表团住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恢复大革命时期北伐军中的政治部。经中央批准，周恩来接受邀请任政治部副主任。

这是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军政部门的唯一要职。在“八办”的日日夜夜，周恩来尽力宣传我党的抗战路线和方针，动员各界人士团结抗战，很多人自此长期与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在这里，周恩来接待了为抗战助威的孩子剧团，为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题字，鼓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而奋斗。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同张国焘进行了严肃的谈话。张国焘不接受挽救逃跑后，周恩来起草了特急电报由“八办”发出，向党中央报告了张国焘叛党的经过，建议党组织立即开除他的党籍。在日本侵略军逼近武汉时，周恩来等共产党员一直坚持到最后才撤退。10月24日晚上，周恩来前往汉口界限路（现合作路）新华日报社，为《新华日报》汉口版口授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社论郑重宣告：我们一定要回来。



周恩来

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25日凌晨，周恩来率中共长江中央局、新华日报社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留守人员撤离了武汉。至此，党在武汉地区的最后一批力量转移完毕。1946年5月，周恩来再次到武汉，10日在江岸杨森花园与蒋、美代表签署了三方“汉口协议”。

贺龙

1927年6月26日，贺龙率独立第十五师官兵从河南来到

武汉，师部驻扎在汉口模范区（现铭新街一带）。面对“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五二一”马日事变后的白色恐怖，贺龙旗帜鲜明地表示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在这里，党中央派周恩来看望了贺龙，贺龙向党表示了要加入组织的决心。在党的领导下，贺龙在已扩编为国民军第二十军的部队中，充实了共产党员和工农骨干，清除了国民党右派。尔后，以“东征讨蒋”的名义，率二十军离开武汉取道九江赴南昌，同叶挺的部队一道参加了伟大的“八一”南昌起义。



贺龙

邓小平

1927年7月下旬，中央秘书邓小平参加了“八七会议”的筹备工作，负责筹备会议的党的负责人秘密居住在汉口旧英租界的德林公寓（现胜利街与天津路汇合处，天津路12号）

内。8月7日,我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八七紧急会议在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秘密召开。邓小平同志全面负责并周密安排了会务工作。

朱德

1938年10月22日下午4时,驰名中外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乘一架老式座机降落在汉口军用机场。风尘仆仆的朱德一下飞机,就和来接他的周恩来到鄱阳街1号楼房的地下室里。

这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空袭频繁的情况下临时设置的办公地点。朱德在这里与周恩来详细研究了中日战争发展的形势及武汉沦陷后的打算。经电告毛主席同意后,朱德签署了给蒋介石的《建议书》,为团结抗战制订了战略方针。



邓小平



朱德

项英

(1898—1941.3),原名德隆,笔名夏英,曾化名江钧、胡成,湖北省武昌县舒安乡人,我党和军队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早期工运主要领导人之一。江岸地区第一个党组织——江岸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



项英

项英出生于一个小职员家庭，幼年因家庭贫困，父亲病故，被迫辍学进厂做工。受尽资本家的剥削、工头的虐待。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1919年我国“五四”运动的爆发，给项英以巨大影响和鼓舞，遂走上了革命道路。1922年1月，他任江岸京汉铁路俱乐部秘书干事时由中共武汉区委书记包惠僧介绍成为江岸地区第一个共产党员。入党后，他全力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先后领导了谏家矶扬子机器厂和汉阳钢铁厂的工人罢工斗争。1923年初，在中共武汉区委领导下，他与陈潭秋、林育南、施洋、林祥谦组织江岸地区铁路工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其后，组织了上海“二月大罢工”，参加了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副主席。1937年8月以后，与叶挺、陈毅同志一起筹建新四军，猛烈打击日伪军，为创建根据地进行了有力的斗争。1941年3月13日深夜，项英同志在“皖南事变”突围中，被叛徒杀害，终年43岁。

二 军政名人在江岸

唐才常

唐才常(1867~1900)，字佛尘，湖南浏阳人。清光绪拔贡。早年与谭嗣同师事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1894年(光绪二

十年)来湖北,考入武昌两湖书院为内课生,开始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李鸿章割地求和,使唐才常异常愤怒,力主维新变法,希望中国在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改革。

1897年,唐才常在长沙积极投入维新运动,任《湘学新报》(旋改名《湘学报》)总撰述,著文介绍西学,宣传变法主张。同时又主持《湘报》笔政,发表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文章,提出改革的具体主张,言论益趋激烈。然后出游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联络侨胞和流亡志士,以图匡救祖国。在东京曾谒见康有为,自请受业为弟子。1899年秋于第二次出国时会见孙中山,又受革命思想影响。于是,唐才常产生反清与保皇的矛盾心理。

1900年春,唐才常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对外称“东文译社”,广交各方有志之士,以图大举。不久,正气会改为自立会,在广泛联络会党的基础上,唐才常组织了自立军,全军分中、前、后、左、右五军,分别部署在长江中游一带,由唐才常任新军统领和总粮台,设指挥机关于汉口英租界,全面节制各路兵马。8月,唐才常来汉口,通过林圭、傅慈祥等人企图运动张之洞谋两湖独立未成,乃加紧运动沿江各省会党和清朝防军,加强军事部署,定于8月9日五路兵马同时举事。但由于康有为的海外接济汇款迟迟未到,秦力山又未获延期



唐才常

通知,如期在大通起事,因无应援而遭失败。张之洞在英国租界当局的协助下,派兵进入汉口英租界,破坏宝顺里自立军机关,逮捕唐才常及林圭、傅慈祥等。唐等面无惧色,从容就缚。

唐才常等先由汉口巡防营冯启钧讯问,唐供称“因中国的事日坏,故效日本覆幕举动,以保皇上复权。今既败露,有死而已”。后被押至武昌总督署内,由张之洞等亲自审问。唐亦慷慨自认,大书“湖南丁酉拔贡唐才常,为救皇上复权,机事不密,请死”21字。1900年8月23日凌晨,唐才常被杀害于武昌紫阳湖畔。就义之时,神色不变,慷慨如平时,仰天大呼“天不成吾事”。葬于武昌小洪山麓。著述辑为《唐才常集》。

刘文岛

刘文岛(1893~1967),号尘苏,湖北武穴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一届毕业生。先后以勤工俭学留学法国、日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少年有爱国思想,不满清政府的腐败政治,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国民革命。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刘任第八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参加汀泗桥和攻克武汉诸役,屡建战功。

1926年9月,刘文岛受任第一任汉口市市长。1929年4月,复任武汉特别市市长,6月改为汉口特别市市长。任人惟贤,颇有建树。鼓励私人集资建造大片住宅等等。



刘文岛

1931年汉口特别市改为省辖市后，刘调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那年洪水淹没了武汉，马路可行舟。刘虽调任民政厅长，仍日日夜夜，赤脚草鞋，驾着小船到处巡视，救济难民，把馒头、面包等食物送到灾民手中。

1932年蒋介石走德、意、日法西斯路线，刘文岛被任命为驻意大利大使。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刘文岛调回国，在重庆以大使级领俸，过着清苦的生活。

他学识渊博，著作颇多。在巴黎大学与其同学的前夫人廖世劭合著《新军论》、《民约论》；在重庆闲居时著有《政党政治论》，又著有《行业组合论》、《行业组合与近代思潮》、《意大利史地》等，分别列入共学社丛书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45年日本投降后，并未能使他改变清苦的生活，只不过多了一个立法委员的头衔。以后在台湾被闲置了十几年，最后以一个空头立法委员终其身，死后萧条。继夫人陆继劭和5个子女都去了美国。

刘文岛一生清廉正直，热爱祖国，子女们虽远在大洋彼岸，还经常去信告诫：“绝不能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一有机会就应为振兴中华出力”。子女们也谨遵父训，共兴父母之邦。

胡宗铎

胡宗铎(1892~1962)，湖北黄梅人。在武昌第二陆军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时，与黄绍竑、白崇禧是同学。

1927年8月，李宗仁与何应钦联合倒蒋，控制南京党政大权。11月15日攻占武汉。李宗仁为巩固桂系在湖北、武汉的势力，将军权交胡宗铎指挥。1928年4月，白崇禧率部北伐，李宗仁后因反蒋不成匿居上海，胡成为实际负责人。他是十九军军长、武汉卫戍司令、湖北全省清乡督办，并一度兼任武汉市政委员会委员长。卫戍部在汉口铭新街（现武汉市劳动局内）。胡则住在沿江大道旧俄国领事馆内。

胡宗铎是桂系湖北籍军人集团的首脑,也就成了湖北、武汉地区的太上皇。重要党务,没有胡、陶参加就无法决定。胡宗铎还办了党务训练所和随营军官学校,培植自己的党羽。湖北的党、军方面的各级负责人,几乎全是胡宗铎的同学和亲信。胡宗铎等还把自己的亲属以官费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

1929年1月,蒋介石利用军队编遣之机,离间胡、李关系,发表胡宗铎为第四编遣处主任,以胡代李。胡意在反蒋,不为所动,并接受李宗仁布置任第三路军司令,由武汉出发讨蒋。不意李明瑞倒戈,蒋介石兵不血刃进占武汉。胡、陶接受孔庚调停,通电下野,乘外国兵舰过汉赴沪。

胡宗铎在武汉期间,与陶钧串通一气,镇压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首先下手的对象是国共合作的湖北省政府,捕杀了教育厅长李汉俊和财政厅长詹大悲,接着逮捕省府常委孔庚、李书城,使省政府处于真空状态。据武汉报纸公布,在胡宗铎把持的1年多内,捕杀了800多人,其中有学生、工人和妇女。

武汉解放前夕,白崇禧任华中军政公署长官兼政务委员会主任,特邀胡宗铎继李品仙任副主任。后又随白到广州,转赴香港,病死于九龙。

陈友仁

陈友仁,祖籍广东顺德,生于特立尼达岛。毕业于圣马丽学院,成为当地第一位华人律师。此时他才21岁。他精通西班牙语、英语。他在海外还接触了许多革命党人,立下以身许国的宏愿。民国成立后,他回国报效,从事外交工作。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5月代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26年末,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来武汉后,陈立即着手与英国驻华公使兰普森交涉,就废除不平等条约、承认武汉国民政府等问题首开谈判。针对英国企图串联北京各国公使,妄图缓和抵制国民运动和反帝浪潮的阴谋,他发表外交宣言,

主张国民政府应“以经济为武器，摆脱帝国主义束缚，恢复中国的独立主权”。

陈友仁对取消外国租界特权不遗余力，促成成立汉口地方法院，取消外国官员在中国法庭对涉洋案件的观审权。旧租界特别区也成立法院，取代原洋务公所。他极力促成外交部、司法部共同起草了《特别区法院组织条例》，从帝国主义手里夺回了司法权。

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登岸刺刀重伤我游行群众1人、伤30余人，发生

了“一三惨案”。当晚，陈友仁向驻汉英领事提出抗议。内容有：英国水兵需在24小时内完全撤退；英国领事在本案了结前不得离汉；拒绝英国当局提出的继续管理租界的无理要求。

5日，发布《国民政府外交部布告》，宣布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决定：设立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主持租界一切公安、市政事宜。

经过16次谈判，迫使英国驻北京公使参赞欧马利同意中国政府收回英租界。但不久，英国又不愿放弃，派兵在上海登陆，对中国施加压力。陈再发表严正声明：国民政府决不与英军订立城下之盟；英国军队必须立即撤出中国；英国政府必须与武汉国民政府谈判，并坚持收回英租界的立场。

陈友仁旋即亲自兼任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首任主席。2月19日，欧马利终于低头，与陈签订《汉口英租界协定》，正式同意中国收回汉口英租界。

3月25日，陈友仁又主持收回了九江英租界。



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

“四一二”事变后，陈与宋庆龄等联名发表声明，指责蒋介石背叛革命行径。7月14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陈极力反对，并受宋庆龄委托，代表宋发言，指出“抛弃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7月17日，以赴日内瓦出席国际会议为由，与宋庆龄秘密离开武汉，经上海、海参崴抵达莫斯科。

1931年12月，出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1933年参加李济深等在福州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外交部长。

1944年，陈友仁逝世，享年66岁。

三 工商巨子沉浮录

宋炜臣

宋炜臣，字渭润，浙江镇海人，1866年生。光绪十五年（1889年），在上海协助宁波富商叶澄衷办厂，在缫丝厂、火柴厂任副经理、经理。1896年，宋年30岁时，已拥资百万元。以25万来汉口谋求发展，先在歆生路（今江汉路）开设华胜呢绒军装、皮件号，结识总督张之洞等政要。1897年，宋和叶澄衷各投资14万，再集小股14万，共42万，开办汉口燮昌火柴厂，官府批准10年专利权。

火柴厂雇工最初为700人，后发展到1000~2000人，以女工、童工为主。日产双狮牌火柴数十万盒，第一年便获利18万两（折合24.4万元）。

宋炜臣知道，欲兴办实业，大展宏图，非依靠官僚、官府的庇护不可。于是捐钱买了一个候补道的官衔，跻身社会名流。他在华胜呢绒军装号的楼上装修了一间豪华客房，专门接待官员和豪门巨富，张彪（镇统，相当于今师长）、黎元洪（协统，相当于今旅长）、冯启钧（湖北巡警道）等军政界要员和刘歆生、徐荣廷、蔡辅卿、万搗伯等大老板，都是他的座上宾。宋炜臣

八面玲珑，呼风唤雨，在汉口算得上是个头面人物，张之洞视为“有为之士”。

1906年6月，宋邀集浙、鄂、赣三省巨商10多人为发起人，在华胜号设立“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7月得到张之洞批准。他在汉口筹资100万元，在汉口招股170万元，官股30万元，共300万元。8月，水、电两厂同时兴建。电厂在大王庙（今利济南路）河边，水厂在宗关河边。1908年，电厂开始送电，再在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建水塔一座。1909年7月，水厂开始送水。

1908~1921年，宋炜臣连续五届任既济水电公司总经理，1921年辞职，改选万搢伯。

宋炜臣1907年还在谏家矶创办扬子机器厂，是湖北当时较大的新兴的机器制作业。1905年兴办了厦门信用银行、常德德兴房地产公司、阳新富池口铜煤矿，竹山铜矿等等，这些企业有得有失。但因资金分散，宋本人鞭长莫及，难以兼顾。这是宋好大喜功失策之处。

由于宋办火柴厂产量曾居全国首位，而水电厂又惠及汉口数十万居民，所以宋炜臣的声誉日隆，为商界推崇。1907年至1913年，连任汉口商务总会一、四、五、六届议董七届会董。1914年任中华民国政府参政院参政。

1927年逝世，终年61岁。

刘辅堂

刘辅堂，山西人，清咸丰年间出生。小时候随父从山西来汉口其父在同乡开的票号里打工，他则成天学习。1875年前后，大约20岁时，他自设蒙馆教过几个学生。不久，又报考武昌圣公会办的仁济医院学医。随后辍学考进了海关，分在江汉关搞抄班工作。

刘辅堂在海关工作期间，认识了不少外国商人。其中和俄国茶商“巴洋人”关系较好。不久，巴洋人当了新泰洋行大

班，除收购茶叶外并建厂就地生产茶砖。聘刘辅堂到洋行担任采购茶叶的“庄首”之一，也支持刘自己开设广昌和茶庄于羊楼洞。刘勾结洋人和产地官绅，在质量、过磅、价格、收购期等环节上坑农肥己，大发横财。洋行也认为他手段高明，把他调到汉口新泰茶厂任“管厂”。

1894年，新泰洋行买办要求加薪，大班不允，买办辞职。大班又让刘辅堂取而代之。

几年后，有俄商来汉创办阜昌洋行，大班是梯托夫（译名“矮洋人”）。巴洋人和他关系不错，便推荐刘到阜昌任买办。汉口茶叶年出口量约八九十万担，全为外商垄断。而外商中俄商又占80%，俄商中又以新泰、顺丰、阜昌三家最大，约占俄商出口总量之90%。

阜昌后来居上，年出口砖茶、红茶30万箱以上。1905年，刘辅堂去世，他留下的财产，估计有200万两银子，另有辅堂里等处房产尚未计算在内。

刘子敬

刘辅堂之子，1884年出生于汉口。曾就读于夏口商业学校、武昌文华书院。

1905年刘辅堂去世，刘子敬才21岁。但梯托夫看中了他，竟要他子承父业，担任阜昌洋行的买办，这也是汉口商场上最年轻的买办。

由于他父亲生前积累了大量财富，所以刘子敬还独资或合资开办了一些工厂和公司，如发华蛋厂、发记蛋厂、河南漯河新华蛋厂、震寰纺织公司、白沙洲造纸厂、义隆公司和义隆油厂（经营桐油出口业务），还代理美商的美亚保险公司，另外还开了一家协记茶行。

此外，他还经营房地产，先后建了辅堂里、辅德里、辅仁里、辅义里、方正里等里份，据说每月可收租3万余元。还在鄱阳街、江西庐山修建豪宅。刘子敬每年夏天都在庐山别墅避暑。

刘子敬除任阜昌、新泰买办，还兼任过华俄道胜银行、德华洋行买办。其弟刘端溪则当过花旗银行、德太洋行买办。刘家遂有“买办世家”、“长江流域第一流买办”、“汉口首富”等美誉。

刘子敬的社会活动也不少，他曾任汉口总商会第七、第八届会董，中国红十字会汉口分会会长、汉口华商跑马场董事长。他还是基督徒，经常参加教会活动。

对慈善、教育事业，他也关心。有时也捐款赞助。如 1913 年创办了辅德中学（纪念其父刘辅堂），1914 年创办了惠民亭小学。

1928 年在庐山病故，时年 44 岁。

刘玉堂

刘玉堂，名权，字世汉，湖北咸宁人。1876 年出生在汉口一家经营染坊的家庭中。



1934 年 3 月 18 日（农历二月初四），各界闻人在汉口联合为青帮大字班龙头大爷刘玉堂庆祝 59 岁生日，二排中为刘玉堂。

少时习武练拳，长大后参加帮会。结识了紫荆山龙头大爷秦泰，当了洪帮的幺兄弟。后又在上海拜在青帮“老头子”张镜湖名下，列入“大字辈”学生。

1900年，基督教圣公会会长黄吉亭在武汉创立了“日知会”，这是一个宣传宗教和传播革命进步思想的组织。1902年，黄吉亭调走，胡兰成接任，胡聘革命党人刘静庵为日知会司理，刘以此处作掩护，大倡革命，使日知会成为革命机关。刘玉堂由卢保山、王玉成介绍，加入了日知会，并成为积极分子。

刘玉堂暗中发行《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刊物，广泛结交支持革命的社会各界人士和国际友人。刘还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和格非堂（今荣光堂）的董事多年。

1909年，刘由孙武等介绍加入同盟会。1910年，又参加了共进会。利用他与会党的关系，革命党得到了许多情报与便利，也掩护了许多同志。刘玉堂还设法帮组织采办武器弹药。

为了供应外省来武汉的革命党人食宿，刘还在江边开了“新大方栈”，不但不营利，有时还要资助党人的车船费用。

革命机关设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刘家住在28号。刘秘密购来的枪弹炸药，均存放在14号。1911年9月18日，因炸弹爆炸，引来俄巡捕，搜出旗帜、文件、名册等，使机关暴露。这也是促成新军发动首义时间提前的原因。

辛亥革命后，刘在汉口负责维护秩序，保护商民和外国人生命财产，被鄂军都督府委任为长江陆路稽查长、鄂军交通事务处处长、汉口总稽查等职。后被黎元洪副总统府委以参议、参谋部副官，并授予勋章。

袁世凯窃取大权后，刘深感痛心，决计弃官从商。先后经营汉口大旅馆（今江汉路人民饭店）、兰陵路光明电影院（今中南剧场，已拆）。

1937年，刘患眼疾双目失明。1949年病死于光明电影院二楼。

刘歆生

刘歆生(1857-1943年),名祥,字人祥,原汉阳县东西湖柏泉刘家嘴人。幼年曾为人牧鸭群、奶牛。他和祖父、父亲都是天主教徒,因常接触神甫,逐渐学会英语和法语,并进太左瑜洋行当练习生。不久,当上了写字与上街。刘八面玲珑,善于钻营,1899年被法商提升为立兴洋行买办。随后,他独自开设阜昌钱庄,又在襄樊等地大量收购白芝麻转沪出售,牟取暴利,从而成为武汉商界巨子。

刘歆生在同西商交往中,得悉汉口市场将大有发展,周围毗连的地皮其价格随着用地的增加而上升,于是决意投资经营地皮。当时,汉口城墙未拆,张公堤未修,城外尽是湖沼和低洼土地,城基之内也多是水凶土坎,一般人很少注意,他就乘机贱价买进。1907年,汉口又拆除城墙,修成后城马路,市区有向外扩展的趋势。这时他所购后城内外的地皮,已经达到“高价而沽”的发财机会。于是他紧握有利时机,雇用廉价劳动力,有计划地运土填基;随后他又在现今由胜利街口起至循礼门铁路止的江汉路两边,以及生成里内建成铺面和住宅出租。与此同时,他还承包了英租界填基修路的土方工程。经反复磋商,终以让基修路作为交换条件而达成协议,修成“歆生路”(今江汉路)。他随即又将该路越过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向西延伸到循礼门铁路边,统称歆生路。同时以歆生路为基干,向南垂直开辟了歆生一、二、三路(今江汉一、二、三路)。接着,他在与商界殷实户发起开辟建设汉口模范区(今江汉路起,下至大智路,西至铁路边,东至中山大道)时,又在中山大道的南京路地段开辟一条“伟雄路”(其长子名伟雄)。至此,上自今民意路,下至江汉路及中山大道外侧,直至大智路,经他逐渐整理经营,都成为铺面鳞次栉比的街市。同时还承包其他业主的土方工程,把这一段地皮统统整理成为地基,建成了大片住宅,构成闹市的雏形。这样,他所有的地皮价格和房屋的租赁率都大为提高,成了暴发户。时人称他为“地皮大王”。

由于刘贪得无厌地投资地产，到1911年，已积欠华洋各界债款500万两纹银。因无现金偿还，不得不将土地的产权全部转移到湖北官钱局和别的业主手里。

刘歆生出身贫寒，发迹后并不滥事挥霍，每餐以牛肉汤或鸡汤补佐，以米饭和面包为主食；衣着朴素，注重轻暖。虽经常奔走周旋于各洋人和权贵之门，在青壮年时出门也不坐车。在循礼门建置的幽雅豪华的大花园，除宴集宾客外，平时很少来此宴居，花界酬酢也很少。

1936年经汉口市政府代为清理，刘歆生于清宣统年间向大清银行及汉口交通银行借款购地，至1919年未按期清偿的押产面积共51万余平方丈，估计地价值银洋286万余元。划出112万余元的土地归财政部及交通银行管业，以抵偿借款外所余部分仍由刘歆生登记管业。

刘氏虽因偿还债务卖去大量地皮，但到1946年去世时，所有地皮面积仍在当时各业主之上。

韩永清

韩永清(1884~1948)，字世昌，湖北汉阳武金山(今属武汉市汉南区)人。在他未谙世事时，其父德湘离世，母亲朱氏带着他流落汉口。15岁那年进入永兴洋行牛皮厂当临时工。他做工不忘课读，并从在汉口“和记”任买办的同乡杨坤山学习英语。韩永清天性好学，不到18岁便能用英语会话了。

1903年，机遇使他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相识，得到赏识，被派为巡警道署通译，同外商打交道。渐渐地学会了同各种人物应酬，加上办事认真，因而获取外商的信任。不久，经过杨坤山的举荐，他被“和记”的洋老板季大班派到长沙担任收购庄经理。在任职的几年里精心经营，使长沙庄的生意日益兴隆。几年后，又被调回汉口任总行稽查。

1910年，韩永清受命往南京开办新厂。因善于交际，争取到地方支持，仅用3年时间就建成了南京“和记”洋行，担任了

买办。任职期间,韩永清显示了卓越的经营才能,广泛联络各方人士,广收广卖,加强资金周转,使南京“和记”迅速兴盛起来,获利数千万元(银元)以上,自己也落实了200多万元,就此他便一跃而为闻名全国的工商巨子。韩永清还先后采取与实业家、金融家经办了大批公司、煤厂、纱厂、银行等。他与汉口商会会长贺衡夫共同办了“武汉桐油公司”,为我国早期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韩永清出名后,和不少军政要人交上了朋友。1911年,他以巨款资助革命党起义,受到孙中山的推崇,孙在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亲书“博爱”横幅相赠,且委任韩为总统府顾问。之后相继被黎元洪、冯国璋总统及江苏、湖北两省首长聘为顾问,参与湖北、武汉的军政大事。

1919年,韩永清回到汉口,在一场大赌博中赢了大房地产主陈景堂的整条华景街,并在这条250米长的街道上盖起了90多栋铺面房屋和1处菜场。1924年全街房屋建成,讨好韩永清的人就把华景街改名华清街。后又买了永清里、永贵里、世昌里和华清里等。

1921年,韩母朱氏去世,扶母灵柩返回汉阳安葬,不惜万金在烟囱山修筑墓地,建造石人石马,花园亭台,成为当地一景区。“文革”中建筑物被毁,仅存汉白玉碑一块,刻有蔡元培、王珊所撰之墓志铭及墓表,现已被地方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韩理完母亲后事,便遵照母亲遗训在汉口、汉阳设立了5所贫民学校,专收贫苦子弟入学,并对穷苦百姓施财施药,因而百姓皆呼之为“韩善人”。

1923年,韩回到汉口接任安利英行买办。一两年后重返南京,振兴行将停业的“和记”,直至1930年隐退上海。

韩永清加入了红十字会,并担任上海分会会长。1931年,武汉发生大水,韩率上海红十字会救护队与南京分会陶遵开同赴武汉,协助汉口红十字会施救灾民,急赈饥荒,并协同汉口基督教会,将部分灾民迁到黄陂横店。事后,韩、陶两氏商请汉口商会会长贺衡夫筹办医院,于是向富商巨贾募集经费,

加上红十字会会费与各地分会捐助,于1934年购得铭新街90号两层楼房一栋,设立红十字会医院,诊治贫苦市民。1938年,贺衡夫、陈经畚等均赴重庆,韩永清腾出汉口四民街(现胜利街146号)的私人房屋将红十字会医院搬到此处,继续收住病人和门诊。韩永清于1948年在上海因病去世,终年65岁。

韩惠安

韩惠安(1887~1950)原名道惠,字道安,排行老四,黄陂六指店人。幼读私塾,因家贫随父兄到汉口经商,贩京广杂货到豫、陕、川、甘等地,带回当地山货,如牛羊皮返销汉口。其父及长兄去世后,韩在汉口开设福庆大西洋山货行,由其两兄分驻西安、驻马店收购山货,并将汉产的棉纱、布匹返运至该两地销售,连年获利。

1911年武昌首义,洋商停止收购山货,价格骤跌,韩却大胆囤积。随着时局的好转,德泰、谦信等洋行大量收购山货,韩立刻以高价抛售而获大利。

1922年,湖北省楚安公司下属布、麻、丝、纱四分厂在汉招商。汉口商会特邀韩入股,聘为经理。1926年,楚安公司被武汉国民政府接管,韩解职后精心经营福庆泰山货行,并在汉口法租界独资开办东方大旅社和大舞台剧场。1930年在李文山等人帮助下,又在汉口开办了



韩惠安

裕和盐号,并在罗田、英山、麻城、黄陂等地设分号。

韩不断将经营所得购买房产,仅在汉口就买下新成、德福、尚德、惠康等8处里弄共100余栋房屋。还在九江庐山建了一座别墅,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邻。在上海和香港也购有洋房,在其家乡建有九门七栋大楼房。取名为惠安新村。

韩经营东方大旅社期间,结识了当时湖北省主席何成浚,还先后与权贵吴佩孚、萧耀南、陈嘉谟、徐源泉、胡宗铎、夏斗寅等往来密切。1928年任汉口总商会会长。

韩在1925年湖北大旱及1931年大水成灾期间,对乡里亦有善举。如在河南收购蚕豆、玉米、高粱运回乡间平糶赈灾,还用船装运馒头、稀饭、药品、衣服救济灾民。此外,还办了一所惠安小学,免费让贫困乡民子女入学。

韩的女儿韩菁是著名作家梁实秋的夫人,曾是港台影歌双栖明星。韩于1949年4月定居香港,1950年病故。

沈祝三

沈祝三(1877~1941),原名卓珊,浙江宁波东乡沈村人。幼学木工,随其舅父在上海做临时工,经友人介绍到杨瑞泰营造厂任监工,后经厂主杨斯盛介绍于上海协盛营造厂。适逢该厂承包英商平和洋行打包厂的工程,沈祝三不怕困难,勤奋工作,为洋人所赏识。1905年平和洋行又在汉口建造打包厂,该行大班商请上海协盛的厂主,指名派沈祝三到汉主持。沈到汉后,一面建造打包厂,一面又承包其他工程。上海协盛厂以鞭长莫及,恐受亏损牵连,声明汉口业务全归沈负责。1908年,沈祝三脱离上海协盛,在汉独立创办“汉协盛营造厂”,后成为武汉最有名的营造厂。

沈祝三青年时,在上海白天学看图纸,协助施工,晚上向守门的印度人学英语,能与外国人通话。懂业务,重信用,做事干练,注意工程质量,因而渐有声誉。

沈祝三重视工程技术,不惜高价,从上海招聘技术员工来

汉工作,还进行岗位职务培训,造就了大批建筑人才。施工机械有英制搅拌机、蒸汽打桩机、电动起重设备,还购置卡车20多辆,货轮、拖驳多艘,并配有专业搬运工人;每年以低于市场20%的价格,直接从德国哈尔钢铁公司采购钢材两三万吨运到汉口,不受市价波动的影响。沈祝三为了工程需要,还自办建筑材料厂。1913年在汉阳赵家台建立阜成砖瓦厂,到1920年,年产机制红砖1000万块,除自用外,还供应市场。1924年又创办阜成轧石厂于硚口双厂巷,自产碎石。1930年又在轧石厂内另建炼灰厂,用立窑烧炼石灰。业务越做越大。

从开业到1937年,汉协盛20多年来承建的建筑很多,有:和记蛋厂,平和、汉口、隆茂等打包厂,第一纱厂、裕华纱厂,福新面粉厂,硚口烟厂,汇丰、正金、台湾、花旗、交通、浙江实业、中国实业、四明、金城、盐业等银行,礼和、日信、永兴、卜内门等洋行,既济水电、三北轮船、英美烟草、三菱、日清等公司,璇宫饭店暨新华公司大楼,协和、普爱、日本、梅神父等医院,保安、景明、南洋等大楼以及德林房子、汉口总商会、西商跑马场、英国小学、圣教书局、武汉女子中学、四明公所、武汉大学等等。沈祝三还利用多余的建筑材料和旧料,建造许多住房和铺面出租。

从1918年起,沈祝三长期患青光眼,国内医治无效,后赴日本求医未愈,双目失明,因此只能听汇报,不能对工程作具体指挥。当1930年承包武汉大学工程时,由于事前估算错误,以低价投标得中。施工后发现建筑材料上山,还须开山辟路,并奉送水塔、水池等配套工程;又逢1931年大水,损失惨重;再加之工地过于分散,管理不周发生弊端以及同业竞争激烈等等原因,竟亏损40万元以上,从此汉协盛大伤元气。经济困难时,只得将三元里、三多里房产和阜成砖瓦厂向银行抵押借款,本利互加,负债日重。1938年武汉沦陷,他靠变存料及财产维持生活。1941年正月在汉口病逝,终年64岁。

四 帮会头目混世面孔

杨庆山

杨庆山，曾名杨震，湖北黄陂横店人，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出生。

幼年贫困。父亲杨金丰是个皮匠，住在汉口华景街，每天挑着担子帮人纳鞋。杨庆山从小就没有上学，到了八九岁，也只能捡柴火、拾破烂，帮助家里减轻点负担。华景街位于租界旁边，三教九流、黄赌毒无所不在，盗抢诈骗、打架闹事无日不有。后来杨父不做皮匠，改开一家极小的客栈，他就在客栈里打杂。自然，也做一些欺骗勒索、贩毒窝赃之类的事，捞些外快。混到十八九岁，由父亲作主与一姓陈的姑娘结了婚。父亲本意是望他成家安分守己，把客栈料理经营好，不搞犯法勾当。

杨庆山20岁时，卢汉铁路已修通，大智门火车站这一带十分繁荣。他父子又在车站对面开了天宝客栈，每天拉客送客，颇为忙碌。杨庆山此时已参加洪帮，是“栖霞山”文志广大爷手下一名小兄弟，结交了一些地痞流氓，势力范围由车站逐渐发展到沿江码头。

辛亥革命后，杨24岁，又参加了“太华山”，在黄子丹大爷名下当兄弟。这时杨在帮会中地位还很低，他每天忙于保护周汉卿（天目山寨主）的“架子楼”（窝赃、销赃处）、余海山（大流氓）吃黑钱。当时最有势力的洪门大爷刘桂苟（友才），当上了民国北洋政府的第一任武汉稽查处处长，红黑两占，杨庆山似乎从中悟出了什么。

杨庆山于1924年来到上海，这时已37岁。经黄陂同乡、大同山大爷张志汉介绍，拜在张啸林名下，加入青帮。也认识了黄金荣、杜月笙等上海帮会巨头。1926年，蒋介石的军事力量进驻上海。上海帮会的杨虎成了蒋的鹰犬，杨虎推荐杨庆

山当上了上海禁烟局吴淞口检查所所长。杨不仅捞了不少油水,而且结交了江湖上的头面人物、军阀、官僚、青洪帮头头。杨后来经杜月笙、陆京士的引荐,加入了陈果夫、陈立夫的“CC”。

由于沪、汉两地洪帮的推荐,1930年湖北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委任杨庆山为公署侦缉处长,少将衔。其任务是布置他的爪牙,渗透到三镇社会各阶层、水旱码头,专门捉拿共产党人。杨庆山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的鲜血。

杨庆山是洪帮“太华山”和“栖霞山”的山主。1930年,他租下北京路智民里2号,对外称道德善堂,其实是帮会议事、收徒的地方(香堂)。杨有数处公馆房产,娶了7个老婆。

1932年侦缉处撤销,杨庆山挂名行政院某部的专员。另外,他还担任中华海员工会国民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汉口海员工会区党部负责人。

1933年,太华山的内堂大爷、酒店老板田子平,保荐第十军(徐源泉军长)的师长徐继武、黄杰,拜杨庆山为大哥。二人一驻宜都,一驻沙市,使杨在长江上游声威大树。

1935年,道德善堂由智民里迁到邬家墩(今市社会福利院)。杨庆山每天早上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江汉路冠生园,在那里吃早点,并与武汉的帮会头目碰头,策划各种阴谋。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杨跑到重庆南岸建了开化善堂,还在旁办了所开化小学。杨与四川的“袍哥”关系密切,他手下的洪门兄弟在四川或经商,或开旅馆、茶馆、戏院,或加入军统,所以杨依然能一呼百应,势力不小。

1945年日本投降,杨赶回武汉成了接收大员,“劫收”了黄兴路天福里2号全栋三层楼房。

1946年,杨当选为海员工会汉口分会理事长、善堂整理委员会理事长。在蒋家王朝快要崩溃之际,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他逃往重庆,后又到青城山出家当和尚(一说是当道士)。

1950年,被四川公安部门逮捕,押解回武汉。1953年10月13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周汉卿

周汉卿，又名胜余、慎裕，黄陂林家田人，1885年出生。父早死，10多岁时母亲带他和他弟弟来汉口谋生。先在华景街卖水果。辛亥革命前，他已经过了20岁，有了把力气，便到德租界江边扛码头，当力夫。

码头历来是黑社会组织青洪帮的据点，山头林立，如太华山、栖霞山、天目山、紫金山等等。清末民初汉口的著名山主（或称寨主）有文志广、黄子丹、潘义等。

周汉卿经人介绍，拜在潘义名下，当了一名小兄弟。他又结交一些惯盗如哈巴老九之流，专做“架子楼”（即窝赃、销赃）买卖，成了华景街一带的地头蛇。不久，潘义因杀人越货案发，被清政府杀了。周依仗华景街一帮地痞流氓的拥戴，接替潘义当上了“天目山”的寨主。从此，周大开香堂，广收徒弟，成了气候。一时间，汉口的其他流氓头子萧济川、李春山、邓堂、余海山等也都投到周寨主麾下。因此，其势力越来越大，汉口的码头、戏院、茶馆、酒楼、赌场、妓院、车站等场所，都有周寨主的“影子”，连当时武汉市公安局局长汪以南也和周称兄道弟。

1928~1929年间，他在法租界巴黎街（今黄兴路）的红房子聚赌，名义上红房子是法租界巡捕房翻译尉迟钜卿开的俱乐部，实际是大赌场。门票5元，每天约有2500元进账，赌场内还设有鸦片烟馆、妓院、酒店，集吃喝嫖赌于一体。赌场每天抽头也至少有3000银元。害得不少赌客倾家荡产，而周则每天坐收1000元“保护费”，大捞不义之财。

1923年冬，洪帮大爷范明山与禁烟处秘书黄文卿的小老婆私通，被黄侦知。一天，范与黄妾在今保成路天隆里幽会时，黄纠集十余打手破门捉奸，强迫二人喝下硝镪水，送了性命，成为轰动武汉的桃色新闻。黄还扬言，谁要敢收范和他小妾的尸，他也要请他喝硝镪水。周汉卿为显示自己的“义气”、“胆略”和势力，硬是将范的尸体找人抬到通济善堂收殓了，黄也无可奈何。周在洪帮的地位和名声又得以提高。

1926年大革命时期，洪帮大爷王子琳等从事反共特务活动，周汉卿也积极参加。王子琳的罪行暴露，被革命政府处决，周等纷纷外逃。直到1927年“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反革命势力再统治武汉时，周汉卿才回到汉口公开露面。

1937年“七七”事变后，经洪帮大爷田东山（军统特务）拉拢，军统局湖北站站长朱若愚也拜在周的名下，成为“天目山”的心腹大爷。至此，军统、洪帮两组织相互渗透、合流，成为蒋家王朝的鹰犬。

另外，有些工商业主为了找“庇护”、避免骚扰勒索，也愿申请加入洪帮，“脚站红、黑两道”。

用黑道内部的话说，周汉卿是“浑水”（干坏事）和“光棍”（流氓）的出身，又是“瞎眼”（文盲），又没有“钳子”（口才），可最后凭借青洪帮寨主的头衔，到处吃红掌黑、窝赃勒索、开赌抽头，又在戏院、茶馆、妓院、码头、车站“募捐化缘”（收保护费），无本万利成了大财主。在友益街、华清街都有他的房产，还是海陆饭店的老板。

天目山的佛堂（或称香堂，是入会宣誓的地方）先设在华景街宁汉茶馆（今华清菜场楼上），后转移东华园澡堂楼上、海陆饭店三楼。武汉解放后，周逃往乡间，隐姓埋名。人民政府1950年将其捉拿归案，判处死刑。

五 外国人江岸留真

杨格非

汉口江岸区黄石路的基督教教堂——荣光堂，原名格非堂，它是以英国传教士杨格非的名字——Rev. Griffith John 来命名的。

杨格非，英国威尔士人，1832年出生。长大后，成为伦敦会的传教士。1855年派来中国，1861年6月21日派来汉口，

住在汉口沈家庙,开始传教。1862年,英国循道会也派传教士郭修理来汉传教。杨与郭划分各自的传教区。杨则在花楼街建花楼总堂,1863又在夹街建首恩堂。1864年7月,又购武昌戈甲营地一块,建崇真堂。以后,他又向周边县城乡镇发展,也到四川成都、重庆和湖南长沙设堂传教。他因平民作风、露天传教,被誉为“街头布道家”。

1866年,在汉口居巷开办仁济医院。1870年,杨回英国休假,介绍在华15年布道心得,鼓励英国传教士来华。1871年回汉,向老河口、宜昌及川西北传教。1876年,在汉创办圣教书会,编印布道单和小册子,供外籍传教士外出散发,因他们汉语说不好。1878年在武昌昙华林建仁济医院。1882年扩大汉口仁济医院,开办黄陂仁济医院。1890年在汉口创办伦敦会经学馆,培养传教人员。1897年,在今胜利街创办懿训女子书院(今市二十一中学前身)。

杨谴责英国在华进行鸦片贸易,但对中英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却表支持。

杨格非于1905年在孝感做礼拜,讲经时突然中风,从此偏瘫卧床。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由其女婿施伯珩等护送,乘英国轮船返英。1912年因病去世。

1931年,武汉基督教的教友为了纪念杨格非诞辰100周年、来华传教70周年,决定募捐建一新教堂,以其名命名。

伦敦会赠送云樵路(今黄石路)地基(购进价48500银元),又将花楼堂出售给四明银行得款赞助。格非堂于1931年秋破土动工,1932年竣工。占地530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191平方米。1933年,又在旁建二层楼住宅。

吴德施

吴德施(1870~1945),美国伊利诺州人。哈佛大学文学院和剑桥神学院毕业。1896年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派遣来中国,在武昌高家巷圣约瑟堂任牧师。1899年改任汉口圣保罗



吴德施主教住宅

堂牧师,1904年任湘鄂赣皖教区主教。他和他的家人一直住在汉口今鄱阳街32号。这是一幢西式二层砖混结构楼房。建筑面积646平方米,保存完好。吴德施住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对外开放,名为“鲁兹故居”,因为吴德施是他的中国名,他的美国名是Roots。

吴德施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在辛亥革命前,他支持过日知会及其领导人刘静庵等。著文谴责清廷对革命者的镇压,批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掠夺。

辛亥革命阳夏战争时,他在教堂建筑临时伤兵医院,为起义军民和战区灾民服务,自任汉口救灾委员会主席。1912年改任鄂湘教区主教,直至1937年10月。他一贯为社会服务,组织人力、物力从事难民、灾民卫生救济工作。

他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有深厚的革命友谊,周曾多次在他家居住。朱德、彭德怀、邓颖超等均去过他家。

著名记者斯特朗、史沫特莱来汉后,在他家住了4个月;白求恩大夫北上之前,也在他家住了几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吴德施宣传抗日、组织捐款、赴解放区慰问八路军、写慰问信,与中国军民共同战斗。

1938年4月19日吴德施回美国,周恩来亲笔题词:“兄弟阾于墙,外御其侮——这是吴主教在华四十年的最后宝获”,“嚶嚶其鸣,求其友声——这是我们希望吴主教带回国去的福音!”周恩来还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屋顶花园为吴德施举行了告别宴会。会后,周恩来、博古与吴德施合影留念。

鲍罗廷

鲍罗廷(1884~1951年),俄国人。早年加入犹太革命团体崩得(The Bund)。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次年被派往瑞士。1906年代表里加(Riga)地方革命团体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统一革命党派会议。回国不久即被逮捕。释放后到伦敦,在旅英俄侨中从事革命活动。1907年移居美国,出版《美国工人》(The American Worker)刊物,并加入美国社会党,担任援助俄国政治犯委员会主席。1918年7月回国,在外交人民委员部任职。共产国际成立后,曾多次为共产国际代表到国外工作。1923年9月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派驻中国国民党的代表。同年12月13日被任命为国民党顾问,协助国民党改组,对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起到关键作用,并为开办黄埔军校和创办国民革命军作出了努力。曾参与指挥镇压广东商团、平定陈炯明叛乱的斗争。1925年7月被聘为国民政府顾问。

1926年12月10日,偕徐谦等到达武汉。12月13日,在他的提议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徐谦为主席,在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到汉之前执行最高职权。蒋介石挑起迁都之争后,鲍罗廷坚持认为首都应迁至武汉,并在蒋来汉后,与其谈话数小时,并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强调反对个人独裁,提高党权。蒋因此提出撤换鲍的要求,被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拒绝。为了进一步打击右派和



位于汉口一元路口的鲍罗廷公馆

削弱蒋介石过重的权力,在政治上主张“迎汪复职”,在军事上主张领先唐生智约束蒋的军事独裁。在对外政策上,主张集中反英,暂时放弃反美,拉拢日本,加速英日矛盾的激化,“要求撤退驻上海外兵”及“指导民众作广大宣传”,借以打破国民党右派向“帝国主义者妥协之倾向”。“一三”惨案发生当日,正值临时联席会议开会,鲍罗廷即提出派徐谦和蒋作宾等到事发现场劝导群众离开,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保证24小时内为人民群众报仇雪耻。并认为“必须占领租界”。

“四一二”事变后,针对武汉国民政府内外交困的国际、国内形势,在经济上建议英美烟草公司复工,保护国民政府辖区内中外各工厂,组织大规模中外合资公司专营出口,使之成为惟一的对外贸易机关等方案;在外交上主张采取“战略上的退却”政策,以期扩大列强间的矛盾和冲突,使之分化而不致联合对付国民政府;在军事上主张进行“二次北伐”,同冯玉祥会师河南,认为可以依靠冯背靠西北,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再图东向。关于土地革命,主张打到北京后再实行。鲍的这些主张在中共党内被称为“西北学说”,曾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受到批评。而冯打到郑州便开始反共,更使鲍的希望落空。

马日事变后,与陈公博、谭平山等6人赴湘查办许克祥,甫到岳州即被迫折返武汉。针对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等人的日益右倾,主张拉拢汪精卫和唐生智“东征”,以对付“共同”的敌人——蒋介石,条件是只要他们在“东征”时期暂不实行“分共”,因而与陈独秀继续执行退让政策,对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采取消极态度。1927年6月1日,被武汉国民党中央解除顾问职务。7月中旬,奉共产国际批示主持改组了中共中央常委会,旋即与瞿秋白赴庐山,商量时局对策。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7月27日,鲍罗廷离开汉口至郑州、洛阳,取道陕西、蒙古,于10月回到莫斯科。

此后,曾任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主编的英文版《莫斯科新闻》的编辑。1949年2月受斯特朗案株连而被捕。1951年死于西伯利亚劳动集中营。

第六章 民族·宗教

江岸辖区少数民族中，以回民最多，港澳台胞、台属等各界人士较集中。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江岸的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天主教建的圣约瑟教堂、基督教建的荣光堂(原名格非堂)、佛教建的古德寺在宗教界都有相当的知名度。

一 二七街——回民聚集地

二七街是江岸区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街道，现共居住有12个少数民族、454户、1386人。其中回族居民最多，有398户、1290人，约占全街总人口的2%。

自二七街形成行政街道以来，各少数民族就与汉族共居在这片土地上，并且和睦相处。长期以来，区委、区政府和街道党委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工作。进入新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把民族宗教工作作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区街经济，加强

两个文明建设,巩固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从建立健全民族工作网络,尊重民族习俗、支持民族活动、共建精神文明,帮助发展民族经济,促进各民族的繁荣和进步等几方面认真抓好民族工作。近年来,区政府、街道办事处积极与有关方面联系并拿出一定资金,修复了二七清真寺,翻修了通往清真寺的道路;帮助回民办起了清真食品厂、清真副食品商店、清真餐馆、穆斯林皮革经营部等十多个经济实体。还兴办了一所回民幼儿园。经济实体的创办,不仅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也为少数民族青年提供了就业场所,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大大促进了少数民族居民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步伐。

由于二七街始终把民族工作作为新时期的一项具有特色的工作来抓,并且抓出了成效。1988年4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荣誉称号。1992年、1994年、1998年3次被武汉市政府授予“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荣誉称号。1998年、2000年被武汉市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局授予“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二七街组织辖区回民参加活动

二 港澳台胞、台属集中地

由于历史的原因,居住在江岸区的港澳台胞、台属相对集中,特别是台属人数众多。据统计,截至2002年6月,江岸区共有台属733户。根据台属身份界定标准(即“上下左右三代”亲属)界定,台属总人数在万人以上。其在台亲友遍布台湾岛内党、政、军、工商、新闻等界。还有不少身居台湾国民党政府要职。如原台湾“行政院”院长李焕、王作荣,原国民党中常委余纪忠,原台湾“国防部”部长唐飞以及李庆华、应克港、宋家绪等的大陆亲属,都居住在江岸区。

多年来,江岸区广大台属在区台联会的带领下,发扬“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精神紧密团结,努力工作,为江岸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为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长期以来,他们坚持“写一封信、打一次电话、致一声问候”的活动,及时将党和政府的对台方针政策传递到岛内。如1995年春节前夕,江泽民同志发表《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而努力奋斗》的重要讲话,庄严而郑重地提出八点主张。江岸区台属便及时给台湾亲人写信、打电话。仅一个月内共发去信函1475封,打进岛内电话678次,有力地扩大了江泽民同志重要讲话在台湾岛内的政治影响。近年来,广大台属还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工具加强与岛内亲友联系。还有部分台属通过互联网向在台亲友发信息,通过邮政快递向在台亲友寄声像光盘,通过因私直接赴台探望亲友等形式,开展对台交流,并积极引进台商台资。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既大大加强了两岸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增强了在台亲人对祖国大陆的向心力,又促进了江岸区经济的发展,为尽早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 宗教活动的名寺名堂

古德寺

古德寺初名“古德茅蓬”，位于今黄浦路上滑坡，由隆希禅师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兴建。起初规模尚小，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昌宏和尚扩建。民国三年（1914年），改为丛林，取名“古德禅寺”，龙波任首任方丈。1916年，始建天王殿、客堂、斋堂、寮房、禅堂、觉幻舍。1921年，再建大雄宝殿、云山堂等，历时13年竣工。为武汉地区四大丛林之一。

古德寺坐东向西，山门上“古德禅寺”匾额为黎元洪所题。山门后是天王殿，殿后有小花园，再进是大雄宝殿。殿虽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但设计的形式仿缅甸“阿难陀寺”风格。

殿基为长宽各27米的正方形，高16米。有象征5佛、4菩萨的9座佛塔，精巧美丽。

殿内供奉释迦牟尼、药师、弥勒三尊大佛的丈六金身，盘坐在雕刻精细的8级莲花座上。前面有和大佛同样形式、形



旧古德寺

体较小的3尊佛像,是建寺初期所供法相。背后为西方三圣、文殊、普贤及25圆通菩萨像。整个大殿威严肃穆,雅致大方。还有观音堂、藏经楼等。



新古德寺

寺后及左侧空地,曾是一片茂密竹林。整个寺院占地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古德寺主要建筑造型不凡,颇具研究与欣赏价值。解放初期,周总理曾陪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到此参观。1959年被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寺内有续藏经两部,手写华严经一部,丝绣大悲咒像全套,均系佛教珍贵文物。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关闭,佛像及文物损坏严重。后又被照相机厂占用,殿堂被改建为车间。澄照方丈及众和尚均另谋出路。

1986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决定:武汉照相机厂撤出该寺,全部产权归还市佛教协会。

现已修葺一新,佛事活动恢复正常。

清济寺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佛教徒胡宗甫夫妇看中了今袁家墩的一块地,面积410平方米,以树皮作瓦,竹壁为墙,建了



清济寺大雄宝殿

三间简易茅屋,命名“清济茅蓬”。里面供奉着一些菩萨,夫妇二人虔心修行。

胡宗甫是江浙人,商人出身,在武汉经商,积累了些财富。他夫妇二

人品学兼优,乐善好施,对佛经研究颇有造诣。取名“清济”,是根据明代高僧灵佑禅师所讲经典:“自修与他修,自励励人,以清以济,成菩提果”之句。

1903年,胡宗甫居士病逝,夫人定妙看破红尘,削发为尼。她才德兼备,为佛教界推崇,被选为茅蓬监院。茅蓬还加入了比丘尼和初发的沙弥尼,规模日大。1914年又扩建庙宇,新增佛像,开始建立丛林制度,各司其职。并将茅蓬头正式命名为“清济寺”。这是汉口第一座比丘尼妇众丛林(或称下居士林),居住尼姑(或称尼僧)百余人。寺内戒律谨严,奉佛虔诚,苦行修炼,声名远播。

清济寺有大雄宝殿(100平方米),韦驮殿(60平方米),客堂(60平方米),斋堂(80平方米)。共两层楼、30余间房。建筑面积900余平方米,占地面积1700平方米。

定妙年老多病,退位自修,改选定禅大师为第二任监院,寺务更加兴盛,法缘广泛。善男信女川流不息,前来烧香礼佛。另有一些富商大贾及其家眷、军政要人也纷纷来寺中参拜烧香。

定禅病退后,由第三任监院定开大师当家,定西大师为纠察,能志大师协助寺务。1938年,全寺比丘尼总数为270余人,1941年增至660余人,1946年再增至1300余人,可见其香火鼎盛。

解放后,大部分青壮年比丘尼还俗参加工作,其余老年尼众留下。这时三任监院等已圆寂西归,大家推选如理大师为第四任监院。

文化大革命期间,清济寺房屋被有关工厂占用,80年代初期前后迁出。后经市佛教协会等部门支持,重新修复。新增大雄宝殿等,虽未对外公开开放,但香客不断,佛事活动经常。

随着城市建设,清济寺于1996年整体迁往古德寺,原址已改为小学。

清真寺

伊斯兰教传入武汉始于元朝,兴于明、清两代,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武汉是内陆水陆交通的枢纽,南来北往的回族人民来此定居繁衍生息。由于宗教活动以及聚会议事、联络交往和婚丧喜庆等生活习俗上的需要,集资建立起了清真寺。

清真寺亦称礼拜寺或礼拜堂,阿拉伯语“麦斯吉德”,意即“俯首叩拜处”。

汉口二七街清真寺,俗称刘家庙清真寺。相传在清光绪末年,河南周口地区连年干旱,随后黄河泛滥成灾,回族贫苦劳动人民相聚逃荒来汉,居住在今刘家庙一带。由群众募捐集资,于1918年在今二七街南边铁路一小附近购房建起一座简易清真寺,当时因军阀部队在寺内喂猪养马而遭破坏。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寺房毁于战火,加之铁路扩建,占去地基。后又在今二七街永和里购买楼房一栋,恢复清真寺。后因房屋年久失修而倒塌,再次筹款集资,在原地扩大修建有大殿三间、水房两间、北屋两间平房的清真寺一座。建国后,在

市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和市伊协的支持下,拨款进行了维修。1993年,当地穆斯林群众再次扩大募捐筹划款,仿西北清真寺的建筑形式,将礼拜殿加为两层,安装了圆顶,装饰一新,为当地河南籍回民、省外和国外穆斯林来寺举行宗教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场所。

三阳路清真寺,又称明星路清真寺,系1945年由居住在京汉街、大智路、三阳路、车站路、公安街一带的河南籍回民集资创办的。将三栋租赁房屋联接打通,楼下做客厅、水房,楼上做礼拜殿。经济来源是每日按户收的“乜贴”费。后因经济困难,难以维持,于1956年关闭。

根据大城市散居的回民来自于四面八方,寺与寺之间没有隶属关系的特点,实行“教坊制”,由穆斯林群众推选,每寺设“社头”1~2人主事,设“乡佬”3~5人或7~9人管理,实行“众意管理”(后称堂董会或民管会),一年一任或连选连任。

阿訇(主持一个寺坊的教务活动)实行聘任制,任期3年,可连聘连任;二师傅协助阿訇传教,代理阿訇领拜、念经和教学;三师傅办理教务事宜,四师傅负责丧葬事务,五师傅为杂工,都属雇佣制,没有固定期限,可连续雇用多年,也可随时更换。

清真寺内的宗教活动,每日5次礼拜:拂晓到日出前为“晨礼”,正午刚过时为“晌礼”,日偏西至日落前为“晡礼”,日落至天黑间为“昏礼”,天黑至破晓前为“宵礼”。主麻日聚礼:每星期五午后举行集体礼拜,称“主麻拜”,时间与晌礼相同,除礼拜和诵读《古兰经》外,阿訇还要宣讲教义。会礼:伊斯兰教三大节日:开斋节、古尔邦节(宰牲节)、圣纪节,届时举行大聚会集体礼拜。会礼在日出后至正午前举行。

清真寺的经济主要依靠穆斯林群众捐款“乜贴”钱资助。几经战乱,社会动荡,以及穆斯林群众经济事业的成败,也直接影响到伊斯兰事业的兴衰。截至武汉解放前夕,幸存下来的清真寺只有武昌起义门、汉口民权路、江岸二七街三座清真寺。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颁布的民族政策和宗

教政策指导下,在政府民族宗教工作部门的关怀资助下,这三座清真寺进行了修复和维修,已列为对外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

黄石路荣光堂

黄石路的基督教荣光堂,原名格非堂,是以第一个进入我国华中地区的英国基督教伦敦会牧师杨格非而命名。荣光堂奠基于1931年12月,翌年冬落成。

杨格非于1861年6月来汉口,传教50余年。在其积极活动下,教务日益发展。1880年,取得汉口英国商人的支持,以2500两白银,在后花楼居巷一带购买大块地皮,在原四明银行旧址盖了一所能容纳300人的平房礼拜堂,作为传教活动中心,取名为“花楼总堂”,是为格非堂的前身。

“花楼堂”面临英租界,是英国的势力范围。经常来这里作礼拜的大约250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与英国在华利益息息相关的人。这些人,从小就得到英国传教士的垂青,培养他们在“博学书院”读书,毕业



荣光堂

后又到英国势力内的洋行、学校、邮政、海关里工作。有的人在这些单位当了买办等高级职员；另外一部分人是想通过教会的关系，从英国人办的企业里找到点工作。

1920年后，英伦敦会差会与“花楼会”中国信徒协商，积极建议中国信徒另建礼拜堂。其用意以外国差会在中国传教的自称为“母会”，力图控制这些“子会”。

从1923年发起募捐，筹备建堂，成立了建堂董事会。由余选臣等13人组成。董事会开过多次会议，聘请了200多名募捐员。进行了4年多，只募得4000余元（银元，下同），离要求甚远。后来，大家想到1931年是杨格非的百年生日，也是他来武汉的70周年，因此以纪念杨格非的名义，继续征募，进度较快。截至1930年底，已达4万元左右，决定在1931年动工。

地基是伦敦差会“捐送”的，坐落在云樵路（今黄石路）；购进时合银元4.85万多元。同时，伦敦差会将花楼堂卖给四明银行，较50年前贱价买进获利千倍以上。

新礼拜堂于1931年秋动工，第二年秋竣工。新堂占地面积530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191平方米。全部造价为5.3万余元。第二年，又在新堂西北隅建起一栋二层住宅，为“妇女会所”，造价6000余元。捐款的信徒共1500余人（其中包括一些团体）。少则一元，多至6000元，捐千元以上的有12人。

堂董事会为教堂的管理机构。董事会由9至11人组成，组成人员多为大买办与洋行高级职员。资本家、外国传教士与他们的亲信各占1/3。

这所挂着自养牌子的教堂，牧师与传教人员的工资是由堂董事会支付的。在旧社会，谁有钱，谁就被人奉承。穷苦信徒在这个教堂里是没有地位的。有一个穷信友衣着破旧，堂董事长魏笃祐（买办）就不许他参加做礼拜。有一个神学院的学生任祖贤来讲道，因身着旧长衫，门房竟不许他进入。

格非堂的活动，大都与其他礼拜堂相同。另有几项特殊活动：

（一）青年励志社：1933年，由杨征远等青年信徒负责开

办,工作性质与青年会近似,联系面较广,包括社会青年在内,有唱诗班。

(二)多加会:在“妇女会所”组织信仰热心的妇女,义务挑花刺绣,在每年感恩节礼拜时举行义卖,所得均捐入教会。抗日战争开始后停办。

(三)《格非堂月报》:1932年初办时,只报道堂务情况,以后逐渐增加篇幅。内容有宗教专著、消息报道,有时也涉及整个教会,故又改名为《汉口中华基督会月报》,仍由格非堂负责编辑发行。每逢杨格非生日或有关杨格非的纪念活动时,即大加宣扬。编辑人为陈忠仁、张锡洪。陈原为格非堂“执事”,后为“长老”,是圣教书会的负责人之一。圣教书会的主要负责人,又是英国伦敦会在武汉的代表。圣教书会有印刷机器,出版甚感方便,费用均由圣教书会负担。前后共出版20年之久,至1952年停办。

(四)奋兴布道会:布道期大约三五天不等,请国内有名气的“奋兴家”来布道。布道的有林宏斌、王明道、蒋彼得等十余人;内容主要是宣扬有神论,宣传今生短暂,来世永生;人的本性是有罪的,没有向善的能力,人类要追求文明进步、社会改革与社会革命都是徒劳的;强调人信仰耶稣即可得救,不信者即使努力行善,死后亦会沉沦。每遇社会上出现灾荒与动乱,即宣传世界的末日到来。也有人趁机捏造一些荒诞离奇的“神迹”,借以骗取钱财。

抗战前后,从北京来的一个“奋兴家”王明道竟造谣说:“日本侵略中国,是因为中国人有罪,是上帝藉日本人来管教我们的。”王明道为了证明他的“管教”论,又编造一个“花猫的故事”说:有一个主人将猫身上的毛剪光,猫提出抗议;这人就带着猫到皮货店,对猫说:这些禽兽因为有美丽的毛,才被挂在这里。如果敢于反抗“管教”,就会受到剥皮的惩罚。

成立全国基督徒联合会。大会由冯玉祥和孔祥熙、钟可托、王宠惠等以基督徒名义发起,于1938年3月6日下午在格非堂举行大会。先由万福林主持宗教仪式,黄吉亭会长讲道;

后由冯玉祥主持,讨论并通过简章,推选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孔、王、冯都讲了话,其内容大致都是要求全国基督徒联合“一致拥护”蒋介石政权。冯玉祥是一位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每一提到日本帝国主义,义愤溢于言表。武汉沦陷前,“联合会”迁往“陪都”重庆。

汉口沦陷后,市内秩序大乱,老百姓惶恐万状。在日寇入城前一天,堂内工作人员就将一些主要东西迁入湖南街(现胜利街)懿训中学(今二十一中)内。工作人员亦避难于此。这时伦敦会(主要是格非堂的西方传教士鲁志兰、高文珍、包士敦),从国际协济会弄到一笔钱,在懿训中学办起“难民收容所”,定名为“懿训公寓”,有教牧人员、信徒,也有附近居民,计300人。伙食由“公寓”供给。在秩序稍定后,许多难民陆续迁回家中,先后维持了两年之久。“难民所”每天早晚有祈祷会,星期有礼拜,每周有查经班、学道班、圣歌练习班等活动,不论是否基督徒,均须一律参加。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传教士被关进集中营,格非堂的英国人被送往上海。懿训中学被日寇占领。格非堂就借用鄱阳街圣保罗教堂开展宗教活动,每星期天下午有礼拜,由李叔芳担任牧师。一切活动皆在日本特务监视之下。

日军入城的第三天,格非堂就为日本兵站所占;后又改为日本庙宇,存放日人骨灰,取名为“皇民道场”。“妇女会所”也成了日本和尚的住宅。

抗日胜利后,格非堂经过修整,重新恢复礼拜,懿训中学因校舍被毁,借用格非堂上课有两年之久。

解放后,随着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开展,格非堂牧师万福林和堂董事会,接受信徒的要求,将格非堂更名为“荣光堂”,取新约圣经“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之意。1958年,全市基督教举行联合礼拜,该堂为全市4所基督教堂较大的一所。牧师为陈建勋,李叔芳为副牧师。文化大革命,该堂受冲击而停止活动。粉碎“四人帮”后,落实了党的宗教政策,由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教牧人员、信徒代表组成工作机构,

着手对荣光堂进行修理、布置,于1980年11月恢复活动。是目前武汉市基督教聚会礼拜以及进行其他宗教活动的场所。

上海路天主教堂

坐落在上海路16号,是武汉市内一座较古老的教堂。1806年,意大利籍传教士明仁笃在汉口英租界购地6044平方米。1875年,由另外一位意籍传教士作宾负责修建天主教堂,耗资12万法郎,1976年落成,命名圣约瑟堂。该堂共占地1024平方米,呈十字型,纵深40米,十字横头26米,堂身宽14米。正面地坪距堂顶十字架处22米。正殿后左右两侧各有圆形塔式钟楼一座。整个建筑为罗马式欧洲古堡风格。1899年,因教徒增多,又在主体建筑旁加修两厢,使教堂面积增至1186平方米。教堂按跪蹬计算,可容纳700余人,实际礼拜时可容千人以上。

20世纪初,天主教鄂东教区活动中心由武昌移至汉口。



上海路天主堂

1923年,该堂成为汉口主教座堂。

1944年10月10日,美机来汉轰炸,教堂中弹数枚,中梁及后侧钟楼受损严重。经教友集资,于1947年修复。

圣约瑟教堂虽然不算得华丽或宽大,但它是汉口教区主教座堂,其地位是突显的。据1947年统计,该堂所辖汉口、汉阳、汉川、黄陂、孝感、云梦、应城等地教区,共有大小圣堂150余座,教徒34530人。中外传教士71人,修女167人,大修士71人,小修士29人。

1956年4月,政府出资对教堂进行了维修,并对周围环境进行绿化,加以装饰改善,使教堂内外显得更加庄重肃穆。

“文革”中教堂被封,宗教活动基本停顿。1980年4月,经整修后的圣约瑟教堂恢复开堂,宗教活动趋于正常。

教堂现有神父7人,修士1人,修女20多人。平日清晨做弥撒,有教友参加。星期日早晚弥撒4台,参加教友数百人。逢大占礼时,进堂人数达2000人以上。

四 基督教青年会

基督教青年会(英文名词缩写YMCA)是具有基督教性质的社会团体。它的宗旨是:“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它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如文化娱乐活动、体育活动、社会公益活动等)吸引社会各界人士接触和了解基督教,从而达到信仰基督教的目的。

汉口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于1909年,为华中地区最早的城市青年会。初成立时没有会址,乃租借汉新昌里二间铺面作会所。1916年至1917年,新会在黎黄陂路中山大道交界处的五族街建成,1944年1月被盟军飞机炸毁。1947年易址于现黎黄陂路10号今所在地。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是以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为背景,仿照美国青年会模式进行活动的,在近代历史上,它曾充任过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不可否认的是,



美国海军青年会旧址

它又起过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的媒介作用。自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这一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民国初年,军阀长期混战,当时湖北一带为北洋军阀所统治,只顾搜刮民脂,抢夺地盘,对科学文化的传播普及毫无兴趣。汉口基督教青年会所从事的科学普及宣传实为武汉地区最早的科普宣传,扩大了市民的视野,与“五四”运动精神正相符合。

汉口基督教青年会在解放前,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以前开展的宣传民主科学思想、反对封建意识,特别是大力推广西方现代体育等活动,对于我国民众的思想的解放、民主意识的提高、人民体质的增强,尤其是对以后全国范围的群众体育运动的蓬勃开展,都作了积极的贡献。

第七章 民俗·文化

江岸的革命遗址众多。为了充分利用这些文化资源,每年都要开展“中华英烈凭吊周”为主题的、以广大青少年为对象的富有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有力推动了全区精神文明建设。

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相互携手,共谋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江岸区的群众文化事业不断呈现出高潮迭起,异彩纷呈的景象。以“四季歌”为内容的传统文化活动,有效地推动了群众文化事业的普及和发展。吉庆街民俗饮食文化,利用地区人文资源,把博物馆建到了街头,成为全市一大文化特色品牌。

一 清明时节话凭吊

江岸区是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城区。在这块土地上,曾留下过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足迹,涌现了以林祥谦、向警予烈士为代表的一大批仁人志士,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从80年代中期以来,江岸区就在中小學生中开展了“我愛校前一条街”活动,让青少年通过查史迹、访前辈了解校前一条街的变迁入手,进而了解全区、全市的历史。在此基础上,通过多方论证,确定了最有意义的74处纪念地为“三史”(即民族屈辱史、革命斗争史、建设成就史)教育基地,并利用这些特有的历史资源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自1986年起,江岸区委、区政府结合清明扫墓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将每年的4月1日至7日定为“中华英烈凭吊周”。每年的凭吊周期间,江岸地区的学校、机关、部队和街道都有10余万人次到辛亥首义烈士陵园、“八七”会议旧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二七纪念馆、林祥谦烈士就义处、向警予故居和向警予烈士墓、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祭扫、凭吊,重温入党、入团、入队誓词,举行成人宣誓等活动,使爱国主义教育找到了一种最佳方式,避免了单调、枯燥、空洞的说教,形像、生动、具体,感染力强,启迪思想,推动行动,使爱国主义教育之花绚丽地开放在江岸的土地上。

每年4月1日这天,“中华英烈凭吊周”活动开幕式主会



凭吊活动

场——“二七”大罢工纪念广场，各界群众上千人集会，凭吊革命先烈。江岸地区“中华英烈凭吊周”活动至今已坚持了17年，每一年都有一个主题，形式常办常新：

——1993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江岸区将“中华英烈凭吊周”的主题定为纪念伟人毛泽东，活动期间请来饰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为群众演出；

——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江岸区请来当年抗战时诞生的“孩子剧团”的老团员，让他们和“新孩子剧团”的小团员一起演出抗日剧目；

——1996年是长征胜利60周年，“凭吊周”开幕当天，江岸区组织老干部合唱团演唱长征革命歌曲，并由时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王重农为“江岸区重走长征路考察团”的11名优秀青年团员授旗壮行；

——1998年，以具有光荣历史的中山舰打捞出水为契机，江岸区在中山舰修复教育基地举行了以“怀念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的先烈们”为主题的第十三次“中华英烈凭吊周”。同时，与武汉市档案馆合办的“纪念汉口人民收回租界斗争史展览”也正式开展；

——1999年，结合1998年抗洪战斗一周年及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广泛开展了“缅怀英烈，继承遗志，热爱长江，建设家园”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使伟大的抗洪精神不断发扬光大，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000年4月1日，青少年教育领导小组在全国唯一一家由农民投资兴建的国际标准展馆——华中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了“建设成就史”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挂牌仪式，同时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举行新老孩子剧团“接过先辈旗、迈向新世纪”纪念演出；

——2001年是建党80周年，区团委抓住这个契机在二七纪念馆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继承先烈遗志，争做新世纪主人”凭吊英烈大会，怀念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流血牺牲的英烈们。本着“面上有形式，基层有活动”的原则，于4月2日至

7日之间,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黎黄陂路街头博物馆、向警予烈士纪念馆、辛亥首义烈士陵园、武汉关广场等8个分会场也举行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

——2002年结合《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开展了以“继承先烈遗志,倡导文明新风,争做合格公民”为主题的第十七次“中华英烈凭吊周”活动。除了历届参加活动的各界代表外,来自各社区的家庭及青年企业家、外来务工代表也参加了凭吊活动,共同缅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17年来,江岸区利用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每年坚持开展“中华英烈凭吊周”活动,使全区各界群众、青少年深受教育,为两个文明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为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增添了新的内涵和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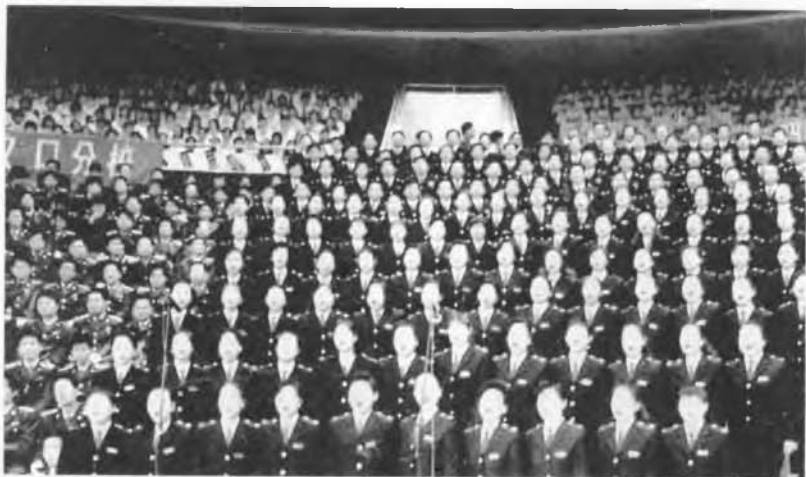
目前,江岸区已建成的74处爱国主义基地中,有民族屈辱史基地27处、革命斗争史基地31处、建设成就史基地16处,遍布整个江岸地区,形成了浓厚的爱国主义教育氛围,逾200万人次的青少年在参与凭吊英烈的活动中接受了教育。

二 群众文化的四季歌

“四季歌”是江岸区于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分别举行的滨江之春艺术节、武汉之夏纳凉晚会、金秋读书节和冬季文体联手4项大中型群众性文化活动的简称。年均吸引观众约60万人次,是江岸各界、特别是江岸群众文化界坚持数年合力打造的一大品牌。

春之歌——滨江之春

滨江之春艺术节,因其举办时间多为春季,表现形式又多以歌舞见长,所以又被称为春之歌。



滨江之春艺术节

1979年春，蓄势已久的江岸群文界在汉口滨江公园抗洪纪念碑前隆重推出了规模空间的首届滨江之春艺术节。由于台宽地广、策划有方，又有关牧村、吴雁泽等众多名家的热情参与，使活动获得了“万人空巷”的效应，在全市产生强烈反响。经1989年第10届滨江之春、全国十城区书画作品交流展、第20届滨江之春全国城市歌舞邀请赛暨电视现场直播后，滨江之春艺术节的影响已达大江南北。北京东城、上海虹口、天津和平、广州海珠、重庆沙坪坝、西安碑林、济南历下、大连旅顺口、杭州上城、南京玄武、沈阳和平、太原北城、新疆石河子及湖北咸宁等市区曾先后派精英来汉参与交流展演，拓展了群众文化的活动空间。滨江之春艺术节是江岸区出人才、出作品的艺术盛会，历届均有佳作脱颖而出，其优秀作品曾两夺全国群星奖金奖，数夺湖北省楚天群星奖金银铜奖。全国艺术摄影展、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和湖北人民广播专栏节目分别展播滨江之春艺术节的创作作品。滨江之春艺术节曾孕育过林萍、黄格选等全国著名歌星。武汉市何湾劳教所多名服刑人员因积极参与滨江之春艺术节等群文活动而获减刑奖励。

目前,滨江之春艺术节已举行了23届,在全市乃至全省群文活动中的突出地位日益巩固,其表现形式也由单一文艺表演向大型演出、书画摄影展、盆景根雕展、民间工艺展、民间收藏展及民俗表演等多门类方向发展,并仍在不断求索新的表现形式,以便能够更好地实现群众文化寓教于乐的服务功能。

夏之夜——武汉之夏

武汉夏夜既热且长,市民们有室外纳凉、下棋聊天的习俗,具有浓厚的民俗文化色彩。因势利导,帮助市民排遣夏夜中的烦闷,是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武汉之夏纳凉晚会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因此,始于1978年的武汉之夏纳凉晚会从未间断,虽逾24届,而仍受广大市民欢迎。武汉之夏一向以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和形式灵活多样而著称。时间一般为7月~9月,历时约3月,表现形式无所不包,活动范围遍及全区街头巷尾,因此每年均获市文化局表彰。1986年江岸区第10届武汉之夏活动,为武汉之夏活动史写下了厚重的一笔。当时由歌舞专场、曲艺专场、木偶专场、楚剧专场、京剧折子戏专场及电影专场等多种形式组成的文化活动赶集会,从武汉剧院至三阳路口的空旷地带一字排开,时间从下午5



武汉之夏文艺演出

时持续到晚上9点。朱世慧、李春芳等名家登上由大型卡车拼成的临时舞台为市民表演。所有专场观者如云、场面火爆，给炎热之中的市民带来了愉悦，赢得了市民的热烈欢迎。

秋之书——金秋读书节

秋之书即金秋读书节，始于1990年，每年一届，持续至今。是以积极倡导多读书、读好书为宗旨的一项群众性文化活动。这主要形式有新书推介、书评演讲、现场办证、书市赶集、书画表演、综艺演出及名人签书等活动，高玉宝、池莉、董宏猷等多

位作家曾亲临现场为群众签书，周永基、程生达、万军等多位知名书画家数次亲临现场作泼墨表演并免费分赠围观市民，使众多市民倍感荣幸；更多的市民则流连于书海之中，各自感悟读书的乐趣，深受作家与读者好评。



金秋读书节活动

冬之韵——文体活动

四季歌中的冬季文体联手活动是随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兴起而渐成一体。时间为元旦前后，是一年中

寒冷的日子，服务对象主要是乡村农民，内容则视服务对象的喜好而定。有折子戏穿插武术表演，有歌舞曲艺穿插武术表演，有农科知识展，还有赠书送春联有奖猜灯谜等游戏活动，给辛勤劳作一年的农民兄弟送去了党和政府的一片深情。

近20年的“滨江之春”、“武汉之夏”活动的开展，活跃了江岸的群众文化生活，孕育了江岸的文艺、文化人才，一批批优秀的文艺、文化作品走出省，走向全国，并纷纷获奖。

1989年4月，由潘代双与他人合作的儿童歌舞《郊游》获全国少儿歌舞比赛创作二等奖。4月，由潘代双辅导的儿童歌舞《少先队进行曲》获全国少儿歌舞比赛辅导一等奖。

1992年10月，由何大彬编导、夏冰(女)和段志超表演的双人舞《汉水情思》，获全国民间民族文艺调演二等奖。12月，由何大彬编导、夏冰和陈涛表演的双人舞《汉水情思》，获全国群星奖金奖。

1998年1月，由杜贵生创作的国画《鄂东秋色》，获湖北省第三届“楚天群星奖”铜奖。5月，由徐义进作词、陈清发作曲的《绿军装》，获湖北省歌曲创作一等奖；由黄晓作词作曲的《社区礼仪歌》和由霍景维作词、陈清发作曲的《我是春天风一缕、



冬之韵

雨一滴》，分获湖北省歌曲创作三等奖。6月，由杜贵生创作的国画《秋林图》，获湖北省“地球·环境·家园”主题画展优秀奖。6月，由王珏和刘赛亚分别创作的儿童画和由陈雪创作的书法作品，分获湖北省第三届中小学生美术书法比赛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12月，由徐义进作词、陈清发作曲的男声独唱《绿军装》，分获全国第九届群星奖优秀奖和湖北省第四届“楚天群星奖”银奖。

2000年1月，由张森、杜贵生、李晴、罗莉萍、吴维丽、秦娟、李甜、祁伟星、高山、杨茂林、唐闻等11人分别创作的7幅美术作品和4幅书法作品，分获全国群众书画摄影大展1项铜奖、10项优秀奖。6月，由桂晶、周怡婧、曹阳、张迪创作的儿童画，获湖北省第四届中小学、幼儿美术书法作品比赛3项三等奖和1项优秀奖。9月，由夏冰编导、白忠义作曲、长航老年艺术团表演的舞蹈《土家老幺妹》，获湖北省第五届“楚天群星奖”铜奖；12月获第十届全国群星奖金奖。

2001年6月，由夏瑜、徐静、周怡婧创作的儿童画，获湖北省第五届中小学生、幼儿美术书法摄影作品比赛3项优秀奖。9月，陈杏明创作的摄影作品，获湖北省第十九届艺术摄影展优秀奖。10月，由江岸区文化馆选送的湖北大鼓《夕阳情》，分获第十一届全国群星奖优秀奖和湖北省第六届“楚天群星奖”铜奖。

三 黎黄陂路街头博物馆

在黎黄陂路靠近长江边的路口，有一块碑式的路标立着，上面除了路名外，多了5个字“街头博物馆”。“黎黄陂路街头博物馆”成为武汉市街头的景观。这座“博物馆”陈列的是街头上有关革命、历史、文化、艺术的文物。这些文物就是这条街上的27栋主要建筑物。

1861年距今已142年。当年的汉口开埠，占地为“租界”

的英、德、俄、法、日5国列强,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的84年间,建立起了它们的“王国”,而当为所欲为的租界历史结束了很久以后,却给汉口留下一笔“遗产”。这些“遗产”,从建筑物本身上体现出多样化的文化和历史。这些欧式建筑的文化内涵,使它们具有了“博物”的价值,成为文化、政治和历史的见证。昔日的“五花宾馆”、“首善堂”曾经是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所在,现在是中共武汉市江岸区委和区政府所在地。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江岸区要把“租界”变为革命传统的教育基地。“租界”的每幢建筑物,都有着它的故事。“租界”是旧中国人民的一部“屈辱史”,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斗争史”,更是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民的“发展建设史”。这也许正是将一条“租界街”建成博物馆的初衷吧。看看这幢“红房子”,它是三层混合结构,共27栋,红砖、红瓦,下有汽车库、杂货室,上有花式阳台。由当年英国怡和洋行投资兴建,设计人是石格司。略显西班牙建筑艺术风格的“珞珈碑路高级住宅区”,曾为旧中国民族资本家或官僚、买办居住,现在拥有它的是普通市民。物是人非,



黎黄陂路街头博物馆

历史变迁是“谁当主人”的最好回答。

黎黄陂路是民国初年为纪念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总统黎元洪而命名的。黎元洪人称黎黄陂(武汉黄陂人),将夷玛街改为这个乡土名称,其本身就是对占领者的一种否定。这种否定是消极地抵制侵略,而现在建成的“博物馆街”则是积极地利用了这一“资源”。昔日的“俄国巡捕房”现在是江岸区财政局,而当年日本鬼子的“放送局”(广播电台)现在是别具特色的居民楼。

走进黎黄陂路,仿佛置身异国。看看这些建筑物吧,他们或圆顶尖塔,或拱窗雕栏,或木梯旋升,或钟楼高拔。不论是俄罗斯风格的庭院,还是哥特式的吊顶,能够完好地保存至今,地方政府的明智和果敢功不可没。

江岸区委、区政府投巨资“整旧如旧”才有了今天的街头博物馆。用该区负责人的话说:“要把历史资源充分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发掘出来。传统文化的精华,外来文化的特征,现代文化的标志,群众文化的广泛,都能够体现精神文明的内涵,也是符合江总书记讲的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黎黄陂路街头博物馆”的沿街建筑无言,而观赏、体会、感悟、寻觅的参观者,心中定会泛起波澜。

四 吉庆街民俗饮食文化

吉庆街民俗饮食文化夜市原名吉庆街大排档夜市,位于中华老字号饮食店老通城背后。因武汉市人夜晚纳凉休闲的需要,于80年代末自发形成,1993年左右达最高峰,形成了以吉庆街为中心、包括邻近的交易街、瑞祥路、大智路在内的大排档市场。其独具特色的汉味小吃、民间艺术和贴近生活的吹拉弹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好奇的观光客人,在旺季时出现万人进餐的景象。不仅成为武汉市一张独具特色的名片,而且在全国已小有名气。

为了使这张名片更加靓丽,江岸区委区政府按照“保持特色、规范管理、兴利除弊、培育品牌”的工作思路,化堵为疏,强化管理。于1997年起,先后投资5000余万元,对吉庆街的排水、路面、人行道、市场环境等进行了全面改造。2002年9月10日,正式更名为吉庆街民俗饮食文化夜市,以全市首家获得占道证的合法身份和全新的市场形象,堂堂正正地开门纳客。

改造后的吉庆街,市场环境整洁,饮食更有特色,文化氛围浓郁,管理更有章法。简洁明快的门楼牌房,江南风情的黑瓦白墙,银光闪烁的霓虹彩灯,新颖别致的门店招牌,古色古香的飞檐挑梁,成为吉庆街的主色调——雅致、民俗、汉味。红灯笼、小酒幌,统一的室内室外排档间,民间艺人或唱小曲,或献乐曲,既有露天的风韵,又有室内的情调。“江上高楼春醉市声民调;天下名街客陶汉韵楚风。”“吉云照影觥樽尽显生活物;庆雨映灯弦歌舒展岁月稠。”这正是吉庆街独特的意境。

这里的文化消费堪称一绝。民间艺人即兴、交互、自选、面对面地演绎风格的随意、自编、平民化、灵活多样的演唱与



焕然一新的吉庆街民俗饮食文化一条街



吉庆街民俗饮食文化节

演奏内容交相辉映。声乐包括小调演唱与中西器乐演奏平分秋色,有自弹自唱的单人演员,也有固定组合的小型班子,所持工具多为琵琶、二胡、竹笛等民族器乐,还有小提琴、萨克斯、手吉他等西洋乐器。演唱曲目从中外名曲至乡村小调,几乎无所不有。还有卖鲜花的、擦皮鞋的、照相的、画像的、卖水果的、卖工艺品的等各种从业人员穿行其间,随时为客人提供服务。歌声、曲声、演奏声、吆喝声此起彼伏,笑声、掌声、闹酒声、欢呼声通宵达旦,成为一种民俗饮食文化的“大超市”,成为一片让人自由自在地宣泄情感的乐土。

著名作家池莉的小说《生活秀》有关人物就取材于吉庆街,2001年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剧组到吉庆街拍摄了有关镜头。

第八章 休闲娱乐

江岸区有不少公园和绿地,但最靓丽的当数沿江大道带。这里有各国的优秀建筑,有三北广场的精彩演出,有清香扑鼻的咖啡雅座,有宽广整洁的街道,而最值得品味的地方是不久前竣工的堤外江滩。

一 沿江大道——武汉外滩

浏览异国风情

当你走在整治一新的沿江大道,你会发现历史在这里延伸,异国风情在这里展现,一幢幢优秀的历史建筑就像一幅幅美妙的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沿江大道从武汉关到一元路全长 1.9 公里,形成于 19 世纪 80 年代,曾是历史上著名的租界区,耸立着多栋优秀历史建筑,有希腊古典式的典型代表——江汉关,体现德国民间风情的最早外国建筑——德国领事馆,体现罗马复兴建筑风

格的花旗银行、汇丰银行、横滨银行，具有拜占廷建筑风格的俄国领事馆，它们使历史在这里浓缩，也在这里延伸。

“不准华人擅闯江边草坪”，承载百年屈辱史的租借地，不仅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也是八方游客、广大市民最好的休闲去处。

江汉关是江边的第一幢老建筑，现为武汉海关，于1924年建成，整个大楼具有欧洲复兴时期的流行风格，揉进英国风味。该楼是解放前汉口的最高建筑，是汉口古典建筑的典范。海关钟楼共4层，大钟电控报时，按刻奏乐，夜深人静，三镇皆闻，一度成为汉口城市的标志。

就在江汉关的另一侧，是日清邮船公司大楼，现为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市分行国际业务部，于1927年建成，钢混结构，由景明洋行设计，汉协盛营造厂承造。

整旧如旧的沿江大道，让一个世纪的历史都重新在这里展现。因有9条支路通向沿江这条主干道，所以又有“九龙望江”的说法。在旧租界里，曾经聚集过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22家外国银行和众多的本国银行，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金融中心，辉煌一时，素有“金外滩”之誉，异



沿江大道商务、旅游、休闲景观带

国风情从它们身上得到诠释。

坐落在南京路口的湖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就是原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建于1921年，采用的是日本式屋顶。墙面装饰多西洋风格，为景明洋行海明斯设计。

紧挨着它的是原太古洋行，现为长江航道工程局武汉分局，30年代建成。它是汉口较早的一家外商轮船公司，后由于资本扩大转向经营地产。

在青岛路口的两侧分别是原花旗银行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大楼。其中左侧的花旗银行，现为武汉市公安局一处办公楼。1921年建成，5层花岗岩石结构，设有地下室。由美国建筑师亨利·墨非设计，属古典建筑风格。另一边的汇丰银行，现也延续了其作为金融大楼的功能，是光大银行武汉分行所在地。这座大楼建于1917年，系汇丰银行在武汉设立的汉口分行及江汉关税金库，占地面积为4322平方米，建筑面积11656平方米。古典主义建筑，花岗岩外墙基与爱奥立克柱列及线条丰富的屋檐形成鲜明对比。整栋建筑庄重雄伟，高26.8米，3层，钢混结构，由英籍工程师派纳设计。

继续东行，可以看到临江饭店，它是原亚细亚火油公司所在地，于1924年建成，为现代派先驱建筑，风格简洁明快，魏清记营造厂承建，高22.3米，5层，砖混结构，是当年英租界内最富丽堂皇的大楼，质量和造型都堪称上乘。

接下来三座具古典风格的大楼也都是于上世纪20年代建成。其中日清汽船仓库，也就是湖北省商业储运公司沿江二库，为砖木结构；新泰大楼和三北轮船公司都为钢混结构。新泰大楼的特点在于其入口设在拐角处，顶部有椭圆形穹窿塔楼，高31米，5层。它们分别由永茂昌营造厂和汉协盛营造厂承建。

特别值得一看的是位于黎黄陂路口的宋庆龄故居。这栋楼立面严谨、端丽典雅，具有俄罗斯建筑风格，原为华俄道胜银行。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这里为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大楼。宋庆龄故居就在二楼，卧室内墙壁上挂有孙中山先生

遗像。楼下有一个花园院落，花园地下修有防空洞。该楼共3层，正面有拱形外走廊，在上面扶栏可以远眺长江和雄伟的江汉关钟楼。宋庆龄在这里居住了8个月，“七一五”汪精卫背叛革命，宋庆龄离开了武汉。

再接着往前走，可以看到汉口保存最好、也是最早的砖雕艺术品——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大楼，它于1901年建成，现为武汉市越剧团。

既然是租界，领事馆当然是少不了的。在这一段可探访到原美国领事馆和原德国领事馆的所在地。美国领事馆位于车站路1号，现为武汉市人才交流中心。1905年建成，砖木结构，建筑造型有“巴洛克”风格，类似西方城堡，曲线墙面呈现动态，宏伟别致，极富韵律感。德国领事馆现为武汉市人民政府所在地。1895年建成，坐西朝东，是一栋二层砖混结构维多利亚建筑，四周卷廊，轻盈活泼，门及屋顶又具有德式建筑风格。建筑面积3202平方米。

每到夜晚，这里灯火通明，古建筑是更显辉煌，多国建筑风格在这里融合，又交相辉映，竞相绽放着异国风情，令人感慨良多。

在即将进行的沿江旧城改造中，武汉历史上的日本租界以及半个德租界位于其中。这里也有几栋具有特色的历史建筑遗迹。租界建筑往往代表着当时占领国的最新建筑技术和流行风格，作为财富炫耀，它又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准。因为其异域风貌，还能活跃城市建筑面和城市天际线，成为城市景观一部分。

据历史记载，1944年，日军将俘虏的3名美国飞行员押往汉口，一路上游街殴打，最后烧死。年底，美军飞机报复性地轰炸了汉口德、日租界，两区建筑大部毁坏。这一地区作为历史地带成片保留已不具价值，但也有十余幢劫后余生的又颇具特色的老建筑成为无声的“石头博物馆”。

旧城改造首当其冲的卢沟桥路以北有几幢较有特色建筑。一幢在刘家麒路7、9、11号，清水墙，带古典主义风格的“横三

纵三”立面,底层其实是当时的车库。据居民说,此楼建于1934年。

拐角就是长春街85号,现为民居。二楼带柱廊,门前有双台阶,中央有天井。

最有特色的当推胜利街373号红砖

楼,深墙大树下爬满爬山虎,红绿相映,充满神秘感,路人回头率很高。它既是巴洛克的曲面,也有古典主义的三段式。住户说,现仍在用的花色水磨石、地板和部分窗户,都是原物。在挂镜线以上靠近天棚一周,都是粉蓝二色日本仕女绘,因用白粉掩盖至今,才逃过“文革”一劫。

卢沟桥路以南残存老建筑稍多。张自忠路江边到郝梦龄路东段,都是总后基地机关幼儿园,曾是日本战俘医院。楼上有钢骨水泥瞭望塔,塔内铁梯就是当年铁轨所制。当时它是日租界制高点,太阳旗曾挂在塔尖旗杆上。山海关路有几幢旧楼。胜利街口的三幢洋楼都是当年日本军官宿舍,其中胜利街245号列为市一级保留历史建筑。汇申饭店的骨架本是旧日本领事馆。1913年,日租界按前领事山崎桂方案建成,在此举行落成典礼。对面的山海关路1号虽显凋敝,但风韵犹存,是很打眼的一幢房,拉毛墙面上“三菱公司”标徽清晰可见。它和领事馆都列为市二级保留历史建筑。

胜利街靠近六合路处,“中力公司”所在的洋楼粉饰一新,是旧日本租界内最显姿色的建筑。它侧面有弧形门廊和阳台,



沿江大道街景

正立面却是三段式,属折衷主义风格。

这些都是日本早期西洋风格建筑,在日本国内也受保护的。作为日租界内仅存不多的历史见证和文化遗迹,经过改造,它将与沿江大道一期整治工程中的优秀历史建筑一样,成为万国建筑林,展现异国风情。

咖啡屋小座

素有“金外滩”之誉的武汉沿江大道,在这里,有一道别致的风景线,那就是一临街的咖啡屋小栈。计有大大小小的咖啡屋近 20 家。它们定位有别,风格迥异,犹如一个个“精灵”,在这里撒下了温情的色彩,营造着咖啡香浓的浪漫。夜幕降临,在装饰考究、音乐环绕的空间里,品尝着咖啡的味道,那真是无法形容的美妙,从现实的喧闹中进入到了非常幸福的世界,用浓郁的咖啡舒缓尘嚣心灵……

如果想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让心灵在海一样澄清的境界中漫游,你不妨去山川海洋咖啡馆小坐。



沿江大道上的咖啡屋

走进山川海洋，就如进入了海洋世界。这里四壁湛蓝、古典别致的大型鱼缸将正厅一分为四。不同区位的鱼缸，内部设置也不同。角落里，设有敏感活珊瑚配上娇



沿江大道旅游、休闲的人

小多彩的热带鱼，是一个默契的礼仪组合，即使轻轻走来，它们也会立刻觉察，向人们致意。在这里，可以看到轻盈美丽而又长须飘飘的“燕子”，有面相滑稽而品质勤劳的“清道夫”，有雍容华贵、气宇轩昂的“招财鱼”，有憨厚老实的“狗仔鲸”，还有阴险狡诈的“鸭嘴鲨”……它们时而嬉闹，时而切切私语，时而暗箭伤人，时而也主持公道……

约克英式茶馆弥漫着悠闲的文化气息。店主是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忠实读者，YORK 是作家的故乡。据说店主最初想用“YORK PUB”命名，而“PUB”与中国的“茶馆”有许多共同之处。本着中西合璧的原则，因此“YORK TEA ROOM”产生了。为了拥有地道的英式风格，店主专程聘请英国技工装饰。外国友人在这里找到了回家的感觉，犹如坐在温暖的壁炉旁喝上一杯伦敦红茶，或是在泰晤士河畔的大笨钟下品上一杯香浓的爱尔兰咖啡，一边阅读新闻杂志，一边欣赏优美的钢琴曲。你可以用英语交流，还可为你画上一幅素描漫画，一切都那么随意、自然，真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最具规模的咖啡馆——老街咖啡馆，将法国塞纳河畔的艺术与品味带到了长江之滨。它稳重、华丽、典雅的欧式风格，大型古罗马油画、镏金罗马柱，整个大厅金碧辉煌，让人仿佛置身于艺术殿堂。宽敞的休息大厅，音乐舞台和背景音乐，六大字根表舒适的贵宾房，悠闲、温馨的吊兰区，视野宽阔的临窗小座，给人一种休闲而又洒脱的感受。这里精心调制了源自世界各地、不同风情的咖啡饮品。在这里，能品尝到各类极品咖啡。从牙买加精选回来的蓝山咖啡，是咖啡中的极品。其甘、酸、苦三味完美配搭，香醇甘滑，适合情感丰富的人细细品味。康加恋舞咖啡，它源自于中南美洲 Conga 舞曲，是将香浓的椰奶淋上炭火咖啡，口味独特，醇郁爽口，宛若在热情洋溢的舞曲中舞蹈。还有巴西摇摆咖啡，灵魂吉力马扎罗咖啡，日本炭火咖啡，雪国之秋冰咖啡，交响乐咖啡，活力咖啡……在这里还可以享受出自名厨的正宗西餐、传统或新派的甜品系列和味道独特的三明治系列。作为大规模的咖啡馆，接待过不少名人。

这里，每天还有不同风格的乐队演出，3 小时足够让人享受。法国人认为这里有巴黎风味，葡萄牙人把这里看做自己的故乡。晚 8 点左右可能座无虚席了。

停止喧哗，安静点，让我们到沿江大道的咖啡小座去品味一番。

三北广场看演出

三北演艺广场是随沿江大道——武汉外滩改造工程应运而生的一处群众文化场所，地处沿江大道蔡锷路至黎黄陂路之间，于 2001 年 10 月竣工。其临街搭建的活动舞台及与之配套的灯光音响等舞台设施，总价值达 30 万元以上，是市、区政府注重开发沿江特色的一大手笔。除重大节日及特殊庆典活动安排专场以外，每周均有两场文艺演出供市民及游人观赏。至今累计推出各类演出 200 余场，使近百万市民及各



三北广场

方游客享受。江岸区迎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专场文艺晚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武汉歌舞剧院众多专业演员及吴少华、王丹萍等名家登台表演,市区领导与市区文艺工作者及众多市民同庆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使江岸区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平添几分喜庆。三北演艺广场是展示江岸区群众文化活动的

一大亮点。

江滩漫步

沿江大道的堤外江滩,虽然位置优越,面积也不小,但因每年汛期被淹,所以谁也没想去投资开发它。只是有些单位利用它堆放砂石、建材或安放跳板作码头。个体户则利用它来经营宠物、花鸟、金鱼、盆景,但都是短期行为,汛期来了只有搬家或停业。因此,多年来一直呈无序状态,环境脏乱,乏

善可陈。2002年,在沿江大道改造工程完成的基础上,市政府下大决心对江汉路至粤汉码头江滩进行改头换面的整修。

江滩公园一期工程到粤汉码头为止。二期工程已显现,将到长江二桥的黄浦路江边,然后继续往下游修,使江岸区长江江滩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江滩公园开放后,每天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观光,有外地的,也有本市的;有晨练的,也有来排练文艺节目的,而更多的是来休闲散步的。每到此地,视野开阔,江水粼粼、空气新鲜,游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说一声:感觉好极了。

傍晚,滔滔江水,艘艘游轮,在阵阵微风的吹拂下,老人、小孩、情侣们一对对、一群群纷纷来到江边。人们走在瓷砖水泥铺设的地坪上,耳边伴随着轻歌曼舞的乐曲声,眼花缭乱的霓虹灯,让你陶醉,让你心旷神怡。

从江汉关随江而下,人们首先进入武汉港的下侧。江滩公园的大门。这是一幢雄伟标致的建筑物,给人以清新淡雅的感觉。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一栋展览馆。确实,这个大门又是一座大楼,可以举办展览或举行会议。



在种植大量的树木花草中穿梭,人们又会被紫铜雕塑、喷泉所吸引。老人们见到体育健身器,也要上去摆弄摆弄;儿童乐园处,更是孩子们的天下。到露天环形舞台,还可以去展示展示。餐馆、小货亭等商业服务设置应有尽有,考虑得多么周到啊。

朋友们,来江滩走走吧。

二 独秀的江汉路步行街

走在花岗岩石铺设的步行街上,从江汉关传来的近一个世纪之久的钟声,依旧萦绕在耳边,仿佛又将记忆带到若干年前。江汉路曾名歆生路,它是以前时的本地买办刘歆生命名的。

作为汉口旧城商业中心地带的江汉路,北接解放大道,南至沿江大道。曾有“车马如梭人似织,夜深歌吹未曾休”的诗来形容它。一个世纪以来,江汉路以其浓郁的地方特色、丰富的历史文化、独特的建筑风格、繁华的商业氛围,成为武汉市商业街中的杰出代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江汉路历史风貌特色淡化、街道景观杂乱、市政基础设施不足等不利因素日见突出,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江汉路商业的发展。为了充分挖掘这条百年商业老街的潜力,恢复传统的活力,进而美化城市环境,促进武汉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市委市政府决定投资9 000万元,对江汉路北起江汉四路、南至沿江大道全长1 210米的路段进行环境综合改造。

2000年2月10日,经过武汉地区专家、教授详尽论证和指挥部周密筹备后,百年老街江汉路改造拉开序幕。江汉路步行街按照“标志点”、“轴线”、“区段”、“五大空间”的结构进行规划和整治,实施了市政道路、管线入地、建筑立面、商业门点、园林绿化、街景亮化、广告招牌、交通组织、雕塑小品、拆迁还建等10大专项改造工程,并以江汉关、黄陂街、鄱阳街、花楼街、中心百货商场等5处为重点,精心建设了5个小广场。

开工以来,在市政、自来水、供电、房地、环卫、园林、电信、市商委、公安交管、文物办、新闻宣传等单位以及江岸、江汉两区共2 000名建设者们的日夜奋战下,一条集购物、休闲、旅游、文化为一体,繁华、亮丽、舒适、文明、历史传统与现代生活相协调统一、国内一流的武汉市第一条步行商业街于当年国庆节前夕展现在市民和广大游客面前。

如今,老路焕发青春。这条和北京王府井大街、上海南京路步行街齐名的商业步行街,每天吸引着大批的市民和无数海内外宾客,成为展现21世纪武汉城市形象、展示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是江城武汉一张最靓丽的“城市名片”。当您阖家而至,漫步在江汉路步行街上时,一定会乐不思家、流连忘返。江汉路两旁的店铺达400多家,既有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又有国际、国内知名品牌专卖店、专营店和连锁店。各商店临街橱窗全部为世界流行的透明式和落地式,使街景同店堂融为一体,展现出浓厚的现代商业风貌和各店经营特色,方便游客光顾选购。从江汉关至鄱阳街口400米间距形成以金融业、保险业为主体的商业区段,建筑和环境布置稳重、典雅、大方;从鄱阳街至中山大道300米距间,形成以国家级老字号及现代国内名牌商品为主体的商业区段,如精益眼镜店、老亨达利钟表店以及“班尼路”、李宁服饰、高邦服装、“真维斯”等专卖店,繁华、亮丽;从中山大道至江汉四路510米间距,形成以中心百货商店、港澳中心等现代大型商场为中心的综合商业区段,舒适、清新。与江汉路垂直相交的中山大道将江汉路和六渡桥两个商业区融为一体,形成规模庞大的中心购物区,王府井百货、新民众乐园以及各类时尚店、专卖店、快餐店、影楼在街道两旁鳞次栉比,各显风采。

江汉路犹如一座街头博物馆,见证着江城武汉的沧桑巨变。来这里购物,还可以领略到形状各异、多姿多彩的近代历史建筑。一字排开的各种建筑有欧陆风格、罗马风格、拜占庭风格、文艺复兴式、古典主义、现代派……中西合璧,相得益彰,石柱回廊,钟楼天桥,拱顶圆窗,深巷老屋,令人目不暇接,无

数风流人物都曾在此留下足迹。扼守长江的是位于沿江大道江汉路交汇处的近代武汉标志性建筑——江汉关，即现在的武汉海关大楼。汉口对外开埠后，清政府于1862年在汉口设立海关，取名“江汉关”，它由英国建筑师景明设计，1922年动工，1924年落成，占地1400平方米，高约40米。楼顶有一座塔式钟楼，四面装有直径4米的时钟，按时奏乐，寂夜可声传三镇。整个建筑具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流行风格，糅合英国风味。日清洋行和日信洋行旧址与江汉关隔街相望。日清洋行大楼建于1927年，拐角处角塔为拜占庭风格。日信洋行则壁柱分格、线条丰富，建于1929年。信步向前，是永利银行（今民生银行），它建于1946年，是武汉解放前最后一栋大型现代派建筑。对面的台湾银行（今武汉商业银行）则交融东西古典主义，由武汉第一家房屋设计所景明洋行设计，解放前最



江汉路步行街夜景

大的建筑商汉协盛营造。分别建于1935年、1936年的中国实业银行(今红楼医药商场)和四明银行(今省保险公司),皆出自建筑师卢镛标之手。它们是武汉现代派建筑典范,具有里程碑意义。穿过中山大道,大清银行(今中国银行武汉分行)和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今市金银首饰店)坐落于江汉路与中山大道的十字路口。大清银行大楼建成于1916年,呈四方形,气势雄伟,古典风格突出。再往前走,当年为抵制日货推广国货而开的新华公司大楼(今璇宫饭店、中心百货)呈现出一派欧陆风格。它于1928年开工建筑,造型奇特,呈L型。一座座历史建筑营造了江汉路步行街浓厚的商业氛围。

逛江汉路步行街最能体味到的是浓浓的汉味民情。在街头上还不时可以看见反映老武汉人生活的铜雕,使繁华街市洋溢着几分古朴和怀旧情调,体现了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的交相融合,浓缩了武汉的市井风情。瞧!一位老汉生起炉子,摆张小桌,正提起漏斗下着香喷喷的热干面。走近一看,原来是街景的一尊铜雕。过往行人常常在此驻足观看,回忆着生活中一些有趣的琐事。几十年来,热干面一直深受武汉市民的喜爱,与豆皮、汤包、水饺、豆丝等并称为武汉小吃“十二绝”。在不远处的广场边,是雕像——“棋趣”。一个人拿着蒲扇坐在竹床上下棋,另一个人则端着茶杯在一旁津津有味地看棋。这是当年武汉人暑夜生活的一幅生动写照。武汉素有“火炉”之称,尤其到了晚上,空气湿度大,昼夜温差小,热得使人难以入睡,所以在武汉大街小巷便出现了户外露宿的习惯。每至盛夏时节,太阳刚刚落山,人们便纷纷走出户外,在街道两旁巷道里洒水,让烈日暴晒了一天的地面降温,然后便搬出竹床、躺椅等卧具,横七竖八地摆放起来。吃过晚饭后,再洗个透心澡,男女老幼手执蒲扇,穿着薄衣短裤,聚在一起纳凉休闲,共同打发这酷热难熬的长夜。曾被外地人誉为奇特的景观。现在,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空调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市民街头露宿已成为武汉一段往事,将永远存留在老武汉的记忆之中。

夜幕降临时，华灯初上。夜色中的江汉路步行街灯火辉煌，流光溢彩，跳动的霓虹灯，轻快的街头音乐，使人沉浸在歌舞升平，繁花似锦的都市之中。逛了许久，也许你会感到饥乏，那么可以到“肯德基”、“麦当劳”“牛扒馆”里吃顿快餐，也可以步行到附近的吉庆民俗饮食文化美食街，听听各种韵味的吹拉弹唱，品尝一下独具特色的汉味小吃，也会感到无比惬意。

2002年7月，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启动江汉路步行街周边地区环境整治工作。通过再加力度、再加投入，全面整顿交通秩序、清除违章占道、整治建筑立面、规范广告招牌、整修道路设施，把江汉路地区建设成为武汉市的“示范区”，从而揭开了江汉路步行街环境创新的新篇章，迎来了江汉路步行街的“第二个春天”。

三 市民休闲多少好去处

解放公园

位于解放大道西侧，北为永清街，西南为解放公园路，占地38公顷（其中水面7.5公顷）。系武汉市解放后最早兴建的大型市属公园，原址为汉口西商跑马场。

1952年，中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将原西商跑马场41公顷土地拨交武汉市建设局。11月成立武汉市第一苗圃，1953年，决定在苗圃基础上筹建公园。1955年5月1日起免票对外开放，1957年1月16日开始售门票。园内分两大景区：柳林区、规划区。柳林区的内建有浣花池、浣花桥、灵芝石、寿石亭、晓春轩、露华台、依亭等景点。规划区有朝梅、夕桂两岭。1956年在两岭间兴建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以后又陆续修建展览馆、露天剧场等。建国10周年大庆，曾举行大型游园大会，内容有焰火、狮子舞灯、相声、评书、体育竞技等，参加人数达20万。

70年代以后，该园布局转向自然，在园林造景方面，陆续



解放公园一隅

开挖露华台(即八角回廊)周围水系,形成 1.14 公顷的中心岛。1975 年,在柳林区西北兴建自然开放式的猴山一座,周围环绕观众厅、休息廊、花径、园亭、品种笼等。1978 年,在一号门南侧修园中园形式的盆景园,面积 1.4 公顷。1985 年,东厅建成开放,有飞檐碧瓦的建筑群,呈现江南园林风格。1981 年建疏影、望舒、浸月 3 座古典小亭和游划艇码头,扩建露天剧场、改展览馆为室内电影院。1976 年再建电动大转马。

1985 年,相继增设碰碰车、电瓶车、森林小火车、飞碟等游戏项目和水上漂流、水上乐园等设施。1986 年 1 月,1 125 平方米的“明珠地宫”建成开放。1990 年 1 月 24 日,又建成“宇宙宫”,面积 1 160 平方米。内设录像放映室和音乐茶座。

1981 年,公园重新规划文娱活动区与安静游憩区。2000 年,文娱活动区北有大面积草坪,供大型活动用。南为青少年活动基地,有儿童游乐场、电动转马、森林小火车、电脑游戏设施。娱乐场所有露天剧场、电影院、明珠地宫、宇宙宫、水上乐园等。服务设施建有咖啡厅、照相馆、小卖部、餐馆等。安静

游憩区含朝梅岭、苏联空军烈士墓、夕桂岭、曲水桥、晓水轩、中心岛、涵秋桥。此区大树成荫，鲜花如簇，绿草连片，水波涟漪，是修养身心的好去处。

园内植物多样，朝梅岭以红梅、腊梅为主，夕桂岭因桂花得名。此外，碧桃、樱花、紫荆、石榴、紫薇、红叶李、夹竹桃、月季、迎春、疏漫等花木遍植园内。水中还有睡莲，荷花绽开，草地则有多种草坪。1988年统计，全园共有树木120余种、18782株；草坪176133平方米；花坛18块，面积5739平方米。

花卉基地1.7公顷，温室2座。还有盆景基地，可产木本、草本及温室花卉、树桩、山石盆景201种。

解放公园秀丽的自然景观，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和游客。清晨，热爱体育活动的市民，早早来到这里，民族舞、交谊舞、太极拳、羽毛球、气功等等，人们按着自己的喜好，聚集起来，尽情欢乐、晨练。夜幕降临，一对对情侣相依树下。大白天，这里形成了江岸各大婚纱摄影的外景点拍摄地。周末，更是小朋友的天下。

滨江公园

当你面临长江欣赏江内江岸无限美景时，建议你去市内惟一临江的公园滨江公园一游。滨江公园位于沿江大道武汉



滨江公园旧影

市人民政府前防水墙外，濒临长江，故名。面积 5.17 公顷。该园始建于 1954 年，竣工时在沿江大道建有水泥柱大门一座，靠粤汉码头建木花架式侧门一座；园路分煤渣路、条石间隔路、水泥路、水泥块道土壤路四种；建木桩树皮顶园亭和六角亭各一座，树枝状花栏杆、长廊式花棚和八角棚各一座；沿江装有栏杆，还有茶亭、果皮箱和路灯。栽植各种落叶、常绿乔木、灌木 40 种 3 502 株，有花坛 12 个。廊、架旁及花坛内栽有宿、球根花卉和一年生草花；草坪 10 300 平方米。于 1954 年 5 月 1 日正式对外开放，不售门票，游人可日夜自由出入。

园内种有水杉、法桐、柳树、枫杨、盘槐、龙柏、侧柏、毛柏杨、朴树、喜树、紫薇、夹竹桃、石榴、棕榈、蜜桔、栀子花、罗汉松、凌霄、樟树、池杉、芭蕉、小叶女贞、大叶黄杨、葱兰、麦冬草等。

1985 年，园内均改为水泥路面，建钢筋水泥结构琉璃瓦顶小亭两座，带有亭和楼的花架式长廊一座，为会议和花展之用。“渡江指挥部”为每年“七一六”横渡长江之用。于 1969 年兴建的“防汛纪念碑”，是为了纪念武汉人民战胜历年来的抗洪胜利。碑建成后，前来观瞻的中外游客络绎不绝。1979 年在靠粤汉码头边修建一座有 2 800 座位的露天电影院，1980 年在园南侧修一露天剧场，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创造了条件。另有茶社、小卖部、木靠椅等，是群众清晨早锻炼、盛夏纳凉的好场所。

园之东南隅辟有花园，附设温室和荫棚，生产各种木本和草本花卉。花卉一是使用于市、区举办的各种花卉展览，二是为园内和街道花坛使用。

随着汉口江滩二期改造工程全面竣工，滨江公园已融为汉口新江滩公园的一部分，以新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每当清晨东方吐白之时，这里就成了健身强体的场所，银发者舞动着红绸寒剑，英俊少年随着音乐节奏跳着刚劲有力的健美操。休闲之时，遛鸟的，下棋的，嬉戏的，随处可见。如果你是一位戏曲迷，遇到票友还可一唱为快。

生前，毛泽东多次亲临武汉并畅游长江，并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词。此后，武汉市每年7月16日都要举行全市横渡长江的活动，上岸地点就设在滨江公园内。

青少年宫

解放大道循礼门附近有一处占地22平方米，绿树成荫，环境优美的公园。在这里，能经常听到孩子们欢快的歌声，看到孩子们的天真的笑脸。这就是全市惟一的青少年活动场所——青少年

宫。园内设有培训大楼、活动大楼、业余体校、田径足球场、网球场、滚轴溜冰场、儿童游乐场、碰碰车场、健身健美馆、台球馆、银河舞厅、水上世界等教育设施及活动场所，还有风景秀丽的人工湖和植物园等，为青少年儿童开展各项学习、训练和文体活动提供了



青少年宫内的跳伞塔

良好的条件。

每到节假日、寒暑假，这里就成为孩子们放松心情，培养兴趣特长的绝好去处。游乐场内，孩子们兴奋地忘记了疲倦；健身馆中，孩子们舞动着优美的舞姿……。

青少年宫每年除接待数十万青少年儿童前来参加各种活动以外，还主办有艺术、体育、科技、文化等类别 30 多个项目的 300 多个培训班及少儿艺术团、合唱团、书画协会等 10 余个团队组织。

宝岛公园

宝岛公园位于台北路与高雄路之间，是由皖子湖改造而成。占地面积 248 亩，其中湖水面积 148 亩，陆地面积 100 亩。湖心岛陆地面积 10 亩，环湖马路 12.7 亩，绿化面积 87.3 亩，绿



宝岛公园鸟瞰

化覆盖率 87.5%。湖面在雨汛期主要担负江汉北路、台北路、台北一路、台北二路的渍水调蓄,最大蓄水容量 30 万立方米。经过 1998 年、1999 年二次大水的考验,全面发挥了调蓄、排渍功能。

宝岛公园是一处具台湾园林建筑特色的城市微型公园,面积虽小,但却以大面积湖面与绿色的自然风景取胜。湖面波光粼粼,鱼影闪动,江鸥翩翩起舞,岸边垂柳倒映,绿树葱葱。宝岛公园东大门位于高雄路,仿台湾竹南镇慈裕宫风格而建造,造型奇特。西大门位于台北二路与长江日报路的汇合处,为台湾省美农镇东门城楼式建筑,极富客家气息。宝岛公园主要以水草树木等自然风景为主,结合独具台湾特色的风景建筑——龙虎双塔与湖心岛以桥相连,系按台湾慈济宫龙虎塔仿建而来,塔身 7 层,高 31.7 米,巍峨耸立,造型典雅。湖心岛外形为台湾省的微缩,寓意大陆人民与台湾同胞息息相通,水乳交融。

宝岛公园度假村位于公园东北角,为中西合璧风格的两层建筑,外形别致典雅,内部设施豪华考究,功能齐全。健身房、美容院、桑拿房、卡拉 OK 包房、客房,服务应有尽有;还有独特的药浴。度假村将是市民的超值享受的去处。整个公园设计精细,布局考究,巧妙独特。为周围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活居住环境与休闲娱乐场所,满足了城市居民提高生活品质的需求,使公园在功能上得到了最大的利用和发挥。

昔日的烂湖塘,如今是风景如画,树绿水清。晨练的人们川流不息。宝岛公园现已成为周边群众娱乐、休闲的理想场所。

田田广场

田田绿化广场位于竹叶山地区,南望黄浦立交桥,北接岱黄高速公路,西邻多个居民小区,北靠京广铁路干线,是武汉市重点景观天梨路上一颗璀璨明珠。

20 世纪 90 年代,这里还一度是垃圾的集散地,淤泥的堆



田田广场

积场, 陋棚的落户区。随着武汉市创建山水园林城市、实施环境创新战略的不断深入, 田田绿化广场被列为市政府贴近群众、造福百姓的绿化重点工程之一, 于 2001 年 7 月建成开放, 成为武汉市首个“森林广场”, 并填补了江岸区无大型绿化广场的空白。

融合自然、饱揽生态是广场最大的特色。4.5 万平方米的广场内, 共种有植物 64 个品种、43 600 株乔灌木, 其中特大规格乔木 24 个品种、778 株。这些自湖北、湖南等偏远郊县移植来的大树, 曾使“大树进城”成为市民间的美谈。广场共用三峡石 800 余吨, 其中位于涉水池内最大的一块主景石重达 17 吨, 形似“憩狮”, 令人啧啧称奇。整个广场芳草萋萋, 疏林缓坡, 小桥流水, 亭廊呼应, 为都市的人们营造出清新、优雅的绿色空间。

广场设计定位以人为本, 依地势起伏和功能各异划分为三大区域: 体育健身区、天然戏水区、林荫休闲区。从朝阳初

升到夜幕降临，每天都有众多的市民在广场内晨晨练、跳舞、散步、娱乐，倾听美妙的音乐，沐浴清新的气息，已与竹叶山周边 30 万居民的生活密不可分。为丰富市民文化生活，2001 年金秋菊展、“田田之夜”晚会等大型活动都曾在此举办，给广大市民带来了愉悦。

新世界水族公园

公园位于市政府确定的生态走廊——江岸区塔子湖，由武汉市国营汉口渔场与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开发，于 1997 年 6 月建成开放。该公园是全国第一个国家级水生野生动物公园，规模大，设计新。同时也是全国首家集科普、观赏、园艺、垂钓、游乐、餐饮、购物为一体的新型公园。总投资 6 600 万元。



武汉新世界水族公园

水族公园景点以两大板块组成,即珍稀水族观赏区和郊野游乐区。前者占地 33 200 平方米(绿化面积 27 401 平方米,绿化覆盖面积 30 727 平方米)。由爬行动物馆、金鱼馆、热带鱼馆、垂钓馆、锦鲤馆、长江馆、标本馆、游乐场 8 大景点构成。后者占地 20 001 平方米(绿化面积 18 401 平方米,绿化覆盖面积 19 121 平方米)。由郊野烧烤、垂钓、滑草场、射箭场等组成。

公园以淡水水族为主要展示品种,其中不少珍稀鱼类。公园拥有中华鲟、扬子鳄、巨蜥、胭脂鱼、金钱龟、娃娃鱼(大鲵)、孔雀、黑天鹅、黄鸭、大蟒等一、二级保护动物 30 多种,还有日本锦鲤、南美“七彩神仙”、金龙鱼等名贵鱼在内的 500 余种鱼类。

公园草坪 32 143 平方米,绿地率 86.1%,绿化覆盖率 93.7%。水面面积 13 658 平方米。观赏植物 200 多种,包括酒瓶椰子、酒瓶兰、假槟榔、旋转露兜等珍稀植物。园林布局美观、精巧,为江岸庭园与南国雨林相结合的格局,具有古朴典雅、中外合璧的建筑艺术风格。植物高低交错,相互映衬。水绕绿地,小桥相连,花、草、树、藤、石、水、亭、阁、楼、廊、栏、架、桌、凳、雕塑、假山、景墙等无不独具匠心,师法自然而超越自然。

公园一改传统的室内“火车窗”式鱼缸展示的水族馆建筑模式,而代之以墙内镶嵌式鱼缸、鱼池形式,在国内首次将园林建筑与水族展示有机结合起来。园内各馆布局风格各异,特点鲜明。热带景园等馆采取全封闭式管理,电脑控温。为配合学生科普游园活动,公园专门增设了电脑科普室、科普长廊,免费对游人开放。

新世界水族公园为“武汉地区旅游定点单位”、“湖北省、武汉市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1999 年 11 月,被中宣部、科技部、全国科协命名为“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后 记

《江岸史话》是一部反映武汉市江岸地区历史发展梗概,着重记述江岸重大历史史实普及性读物,是“武汉史话丛书”的其中一部。在中共江岸区委、江岸区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和武汉市档案局的精心指导下,我们历时一年多,终于编写完成并得以正式出版发行。本书不仅是了解江岸地区近代以来历史变迁的参考用书,而且也是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采取编年的方式,按时间顺序,主要记录江岸历史发展的轨迹,突出反映江岸地区的政治、经济、城市建设的发展沿革。下篇着重反映了江岸地区的特色经济、文化、风俗人情、地域风貌等,旨在追忆历史掌故,讴歌时代巨变,展现建设成就。

本书在资料征集和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武汉市档案馆、江岸区政协、区委研究室、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工商联、团区委、区党史办、区发计委、区科技局、区外经委、区经贸委、

区房地公司、区城管局、区水务局、区文体局、区建设局、区教育局、区卫生局、区园林局、区农业局、区物资处、车站街、丹水池街、谌家矶街、后湖乡政府、后湖乡竹叶山村、红桥村、武汉市六中、武汉市二中、武汉市七一中学、武汉市文联、市政协文史委、武汉市中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儿童医院、江岸车辆厂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我们在编写本书时，参阅并吸收了《武汉文史资料文库》、《江岸文史资料》、《汉口忆旧》、《汉口五百年》、《在江岸这块土地上》、《汉口租界和武汉人民的反帝斗争》、《武汉市志》等资料的有关内容。在此，我们谨向上述各单位和书刊的有关编辑单位及作者们深表谢忱！

我们在编写工作中，还得到了武汉市社联副主席皮明麻、武汉市档案局副局长涂文学、曾在江岸区工作过的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周洪宇、武汉市文联党组书记陈元生等的精心指导。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润柏、区委办公室副主任杨人猛、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商楚、区党史办主任田居万同志参加了有关章节的编辑修订工作，一批在江岸区工作过的离退休老领导、老同志也对该书的编撰给予了热情指导；特别是黄兰田同志不顾年事已高，为本书撰写了大量的章节；杜大振老师利用休息时间从文字上给全书以指导订正；区档案局全体同志热情投入，努力工作，组织专家、学者及有关部门的同志撰写稿件，考证真伪。武汉市档案馆宋晓丹先生对本书提出了宝贵意见；武汉出版社

肖德才、吴涛两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全书最后由丛书主编涂文学研究员审定。我们向所有为此书献出力量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由武汉市江岸区档案局主持编辑，袁远、黄兰田、税翠红执笔，柴文琴负责文字的打印工作。

本书是我们首次运用档案资料编撰的地方性历史读物，由于经验不足，时间有限，疏漏、不妥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2003年11月

武汉市江岸区《江岸史话》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朱毅 何艳

副主任：刘继光 蔡杰 周润柏
焦跃华 连汴生

编委：杨人猛 田二伦 商楚
钟家全 田居万 罗述伦
姚莉 陈昌有 陈石烈
李晓阳 刘清萍 沈建松
罗贵庚 张远季 鲍训勇
李振高 李英皋 高嘉琪
王佑民 宋冬仿 彭涛
袁善炎 陈慧春 龚明
戴裕明

主编：袁远

副主编：李缙云 税翠红 王芳
王辉

编务：柴文琴 祁理 李荣
薛玮 杨玫

照片征集：税翠红

策划：涂文学

肖德才

责任编辑：肖德才

齐大勇

封面设计：臧涛

版式设计

江岸史话

武汉史话丛书

WUHAN SHI HUA CONGSHU



JIANGAN SHI HUA

江岸史话
江汉史话
硚口史话
汉阳史话
武昌史话
青山史话
洪山史话
蔡甸史话
江夏史话
东西湖史话
黄陂史话
新洲史话

ISBN 7-5430-2911-1



9 787543 029118 >

ISBN 7-5430-2911-1

K·255 定价:35.00元

丛书定价:420.00元(共12册)